

黃欣周編
沈雲龍校

常燕生先生遺集

政論與時評上

常燕生先生七旬誕辰紀念委員會印行

政論與時評（上）

政論與時評

目次

野戰抗日·····	一
中國的解放與對日根本方針·····	八
建國問題平議·····	一九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	三五
獨裁政治之內在的必然矛盾性·····	八五
民主的力量建設在那些人身上？·····	一〇二
人民陣線乎？國民陣線乎？·····	一一九
對於全民救國聯合陣線的意見·····	一二六

保衛民主政治的保壘——捷克·····	一二九
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認識和期待·····	一三四
立誠·····	一三七
憲政運動在中國·····	一三九
非常時期下中國政黨的使命·····	一四七
國勢·國策·國運·····	一五六
無爲政治論·····	一七三
戰後國策研究的重要·····	一九一
戰後國際局勢·····	一九八
過去的錯誤·····	二〇七
建設戰後世界的幾個原則·····	二一五
民主運動者應有的風度·····	二二二

中英文化之異同	二三二
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二三七
學術與政治	二四五
國策比國都更重要	二五二
人物與風氣	二五八
衍人荒	二六四
憲法及其背後的力量	二六七
論學者當知所以自處之道	二七一
論熱中	二七五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	二七八
國防與外交	二八二
遙贈威爾基先生	二八六
變化裏的統一	二九一

超過和戰的戰爭·····	二九四
培養專業精神·····	二九九
戰後處置日本問題·····	三〇二
回憶過去，創造將來·····	三一二
開誠心，布公道，解決國事之本·····	三一七
教育應該改革了·····	三二六
努力比賽立國的能力·····	三三〇
從情治到法治·····	三三五
努力學習認識英國·····	三三九
民主政治與政黨·····	三四四
我們的言論態度·····	三四八
慎重考慮國民大會問題·····	三五三
大國的風度·····	三五七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問題	三六〇
教育改造的途徑	三六五
立即實現民主措施	三七〇
政信不可自毀	三七五
看世界，想中國	三七九
談自由大學	三八三
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	三八八
對國事要樂觀	四〇六
告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	四一〇
人心風俗之憂	四一四
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四一八
公是與公非	四二二
「解放區」的地方政權問題	四二七

民主政治需要獨立的人格	四三六
學人與政治	四四八
憲法問題的我見	四五八
三條路線	四六七
安定第一	四七二
所期望於當代政治家者	四七六
今天的世界上還有中立的可能嗎？	四七九
恢復國民的自信力	四八三
成功不必自我	四八七
赫爾在汎美大會之表示	四八九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四九三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	四九六
抗戰與民主	五〇〇

建國與法治·····	五〇四
苦幹與樂幹·····	五〇八
汪精衛的終身八字·····	五二三
第五屆國民參政會所遺留下的三大問題·····	五一九
恭讀蔣委員長爲實施糧食管理告川省民衆書書後·····	五二三
敵人果能南進麼？·····	五二七
他山之言與吾人之反省·····	五三一
今後的東西兩戰場形勢·····	五三五
歷史上中印國交之回憶·····	五三九
日本的危機·····	五四五
現階段的國際戰局·····	五五〇
英印談判經過給我們的教訓·····	五五四
青年的指導問題·····	五六〇

朱森教授之死與尊師重道問題	五六四
同盟國應急取攻勢戰略	五六七
民國卅一年國慶獻詞	五七〇
把握物價問題的中心點	五七三
管制物價問題之關鍵	五七七
紀念牛頓出世	五八一
應該紀念的幾種國家恩人	五八三
中土友誼之回顧	五八七
瑞德關係的惡化與納粹的北顧之憂	五九一
收復東北計宜早定	五九六
我們願意當「東方猶太人」嗎？	六〇〇
第二戰場開關的前夜	六〇四
祝福甘地先生	六〇九

政治與軍事·····	六一二
一種隔離物價惡化瘟疫方策的建議·····	六一五
歡迎華萊士副總統來聘·····	六一八
羅馬之收復·····	六二一
瞻望法國復興的前途·····	六二五
納粹死期臨頭·····	六三〇
論小磯戰略·····	六三四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六三七
要顧實際，莫爭面子·····	六四〇
非島登陸、戰的展望·····	六四五
汪兆銘死矣·····	六四九
奉勸囤積者趕快拋售囤貨·····	六五二
盟國有加強對日作戰之必要·····	六五五

迎民國三十四年.....	六五九
慰勞冬防出力人員.....	六六三
這幾天.....	六六七
尊重民衆的節日.....	六七一
裁員簡政問題.....	六七四
黨派團結中之所謂黨派.....	六七七
中國對舊金山會議應持的態度.....	六八一
兒童節略談關於兒童教育三四事.....	六八六
亞洲需要蘇聯.....	六九〇
我們的準備怎麼樣了？.....	六九四
敬悼羅斯福總統.....	六九七
紀念羅斯福總統要實現四大自由.....	七〇〇
爲波蘭關懷.....	七〇三

紀念五一要實現經濟民主	七〇七
德國瓦解，日本不算數了！	七一〇
用事實來答覆日寇的和平攻勢	七一四
言論報國七週年	七一九
爲民營企業呼籲	七二五
日本向盟國投降	七三〇
煥發新猷與民更始	七三三
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感想	七三七
以憂勤迎接勝利	七四二
始事於西北，收功於東南	七四六
團結的大路	七五〇
速援暹越僑胞	七五三
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中我國應有的努力	七五六

和平，奮鬥，救中國！	七六〇
充實各大學的研究所	七六五
中國不堪再內戰了	七七〇
發揮協調的精神	七七六
兩重統治下的人民	七八一
自由經濟與平抑物價	七八四
怎樣提高兒童體健	七八九
邱吉爾演說與法國的歧路	七九三
勉抑意氣，相忍爲國！	七九八
敬告一部分反美的中國黨派	八〇一
和諧的空氣最重要	八〇六
善保政府的威信	八〇九
宋子文辭職後之政局	八一三

臺灣事件的處理·····	八一六
杜魯門演說的劃時代性·····	八二〇
汎亞洲會議的瞻望·····	八二三
人民至上，救命第一！·····	八二七
恢復農村的經濟力·····	八三一
附錄一 歐戰縱橫談·····	八三七
附錄二 從春秋到戰國·····	八六九
附錄三 事業心與生命向上創造·····	八七四
附錄四 民主是什麼？·····	八七九
附錄五 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	八八一

野戰抗日

今天我們召集這個外交問題講演會，蒙諸位來賓光臨，是非常榮幸的。本來我們國家主義者在現在一黨專政之下，是沒有公開發言資格的，公開發言就叫做「反動」。不過現在日本人已經殺到我們頭上來了，中國的領土已經去掉四分之一了，我們天天看了從北寧路上成千成萬來的被難同胞，我們忍不住要以國民的資格自動地出來講幾句話。想來當局受了這一次大教訓以後，也應該有一點覺悟，破壞全國國民統一力的一黨專制政策，也應該早點放棄了吧。我們現在決定，不管當局讓我們出來講話不讓，我們總是要講，而且要公開的講。

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事變發生的原因和野心，國人已經討論得很多，我們不必再來複述。這次事變在日本並不是一個突然的舉動，他們在數月以前已有充分的準備，南陸相公然說增兵朝鮮是爲的解決滿蒙問題，幣原外相公然說中村事件如不得

適當解決，雖再釀第二濟南慘案亦在所不惜，這些話報紙上都公然登載過，國民政府當局不應該不知道，知道而事先毫無準備，軍隊打不過人家還猶可說，外交上何等重要，連駐歐美公使都殘缺不全，這就是當局對不起我們中華民國的地方，這次王正廷的被打，就是中國國民自動起來責問當局誤國之罪的第一步。以上這些責任問題，我們現在姑且不談，我們現在要同大家研究的，是敵人侵略到了如此地步，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抵抗他？這是舉國國民所一致要研究的問題。

現在先將幾個國民政府所已經實行或一部分人所提出的主張，略加批評，然後再提出我們的意見。

第一個辦法是不抵抗主義，這是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這種辦法祇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不能算是一個政策。在他們以為我們不去抵抗，讓日本人自由進兵，才算我們有理，才能獲得國際的同情。這個觀察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祇有爭氣的國民，才有被人看得起的資格，祇有兩造打起架來，才有第三者出來調停的機會。若是一方祇管進攻，一方祇管退讓，則退讓者就是甘心願意讓別人來進取，是一種

自願的行爲，不是被強迫的行爲，就引不起他國的干涉。凱洛格非戰公約是要兩國發生戰爭行爲時才有效的，若是我們一味不抵抗，就與和平出讓土地一樣，不擾亂東亞和平，就沒有非戰條約發生效力的可能餘地。所以不抵抗主義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主義。

第二個辦法，就是訴諸國際聯盟，這也是國民政府所自詡錦囊妙計之一。國際聯盟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幾個強國把持的欺騙弱國的工具，一切唯強國之命是聽。現在國際的形勢，與遠東利益最有關係的英美兩國，正在鬧失業和財政的恐慌，並且「滿洲問題」與他們利害較淺，他們決不會替中國出死力對日宣戰。英美尚且如此，法意等國更不必說。幾個強國不出頭，國際聯盟就一點自主的膽量也沒有。這一次國聯對於中日兩國的爭執始終是模稜兩可的滑頭態度，現在算是勸日本於十月十四日以前退兵了，我們且看看國聯的命令力如何！

第三個辦法是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打倒帝國主義，這也是當局的高調之一。弱小民族各有各的利害關係，弱小與弱小之間也免不了互相衝突，那裏有聯合的可

能？遠者不必言，兩月以前屠殺我們的華僑的，就是弱小民族的朝鮮人，並且還是同受日本壓迫的，現在奉天殺我們同胞的也有朝鮮人。在西半球同時屠殺我們華僑的，是弱小民族的墨西哥人。排斥我們華僑工作，取締華僑教育的，是弱小民族的菲律賓人。其餘距離較遠的，雖無衝突，也無力幫助。試問我們能仰仗印度、安南、土耳其人的援助就可以打退日本人嗎？所以這種高調完全是不明國際情形的一種夢想。

第四個辦法是聯俄抗日，這種主張是共產黨乘機煽惑的一種謬論，我們也不可輕易受惑。蘇俄和日本還不是同樣帝國主義的國家？前年中俄戰役的國恥還未雪，我們就已經忘記了嗎？俄國若是有力量和日本開戰，他早已不等我國哀求而逕自出兵滿洲了；若是不敢和日本開戰，縱然哀求也是枉然。況且即使蘇俄能夠和中國聯合起來打退日本人，試問打退日兵之後的東三省還是誰家的土地？從前李鴻章憤於馬關條約的失敗，唆使俄國出來干涉還我遼東半島，結果將滿洲送與俄人，釀成日俄戰爭。現在的聯俄抗日論倘若實行，就是把李鴻章的覆轍再來演一遍。況且事實

上俄國已經佔領我們的外蒙十餘年之久，受俄國卵翼的共產黨人也佔領我們的湘、鄂、贛三省數年之久，先後攻陷我們的廣州、長沙等地，比日本的佔領瀋陽，其屠殺尤有過之，這樣的國讎，還可以忘記，還可以主張聯合，那麼又何必反對日本人的佔領奉天呢？

以上這幾種辦法，我們都認爲是不能實行的辦法，甚至有害而無利。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呢？我們提出兩個有效的辦法，全是靠自己而不靠他人的。第一個辦法是平和的，就是對日本澈底經濟絕交以制日本經濟的死亡；第二個辦法是激烈的，就是用野戰的方法去實行和日人作戰。前一個辦法的效力是國人所知道的，現在祇求事實上能貫徹就好了。但是單靠這一個方法還不夠，因爲日本人現在已實行佔領我們東北數省了，他們利用東北的天然富源發展他們的工商業，就能夠與世界產業先進國競爭，開拓世界的商場，即使中國對日澈底經濟絕交，也尚不能完全制其死命，所以必須有第二個方法來輔助，擾亂他的佔領地，務使其不能安穩佔領以利用東北資源，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

所謂第二個野戰的辦法，就是中國國民，尤其被佔領地的東北國民，自動地結合起來，三十人，五十人，零碎組成隊伍，在日人佔領的區域內，向橫暴的日本駐軍施行個別的攻擊。凡遇有日本兵士或武裝人民的地方，祇要人少，立刻施行攻擊，對於日人所把持的鐵路工業及其他機關盡情地加以破壞，日本大隊人馬來時，立即退開避免犧牲。這樣一來，可使日本駐軍晝夜不能安枕，所佔領的地方，完全不能利用，持久下去，敵人必然悔悟而自動退讓，但是需要國人長久的犧牲。

這個辦法是一切弱小國民抵抗強暴最有力的方法。從前五代時候契丹人滅了石晉，入主中國，就被中國人用這種方法抵抗回去。西班牙人抵抗拿破崙，近年來愛爾蘭新芬黨人的抵抗英國，摩洛哥人的抵抗法國，以及臺灣生番的抵抗日本，都是用的這個方法。中國的國際關係較為複雜，如果能用這種方法支持一年以上，以殉國的血震動世界的耳目，則國際視聽必為之一變，日本人終不能用對付臺灣生番的方法來對付我國，但是我國人却不可不如臺灣生番。

這種辦法當然是犧牲很大的，日本人如果能有覺悟，早點退兵，則我們也不必

一定非如此犧牲不可，自然可能以其他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兩國的衝突。但是日本人能否有覺悟呢？現在十月十四日的撤兵期限已經快到了，且看着吧！倘若十月十四日日本人不依限撤兵，就是有永久佔據我東北土地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國民應當自決的時期到了，我們應該奮起全國國民的精神，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在關內經濟絕交，在關外實行野戰以抵抗到底，給世界上看看我們中國國民的精神！

載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號醒獅

中國的解放與對日根本方針

十六年前，日本對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嚴重要求的時候，梁任公先生在「大中華」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名叫『中國何敢望土耳其』，意思是說中國與土耳其同稱爲無獨有偶的病夫國，中國人也常拿這個來自已解嘲，但是實際上中國又何敢望土耳其？人家土耳其是一戰再戰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俯首就範的，決不是像中國這樣受人家直接打到臉上來，還以和平王道自豪的無恥舉動。梁先生這種意見，到現在完全應驗了。土耳其自歐戰失敗以後，受綏佛爾條約的壓迫，已經完全亡國，但是他們的國民以不怕戰爭的精神，爲最後的誓死奮鬥，終於一九二二年戰敗希臘，恢復了祖國的獨立自由。土耳其的病夫徽號，到如今是完全湮滅了。至於我們遠東病夫的中國，則在二十一條簽字後的第十六年，東北三省完全被敵人拿去，天津無故被敵人一再砲擊以後，號稱革命外交的黨國當局，還在高唱和平、鎮靜、

無抵抗，還在自行提議劃自己的國土爲中立區域，歡迎國際來駐兵代管。相形之下，我們還夠得上配稱是一個要臉的民族嗎？

土耳其自十八世紀以後，就與俄國成爲生死的對頭冤家，單就十九世紀的百年間而論，自一八二一年希臘受俄國的德惠起而爲獨立之戰始，中經六年的波折，至一八二七年英、俄、法三國聯合援助希臘強迫土耳其退讓，然而土耳其並不因此屈服，一八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土耳其海軍與英、俄、法三國艦隊血戰於納窪黎洛 (Navarino)，完全覆沒，但土國政府並不因此喪膽，隨即對三國宣告神聖戰爭。從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到一八二九年九月，土耳其人經兩年半以上的抵抗，最後精疲力竭，君士但丁堡有爲俄人陷落的危險，始忍痛求和，締定亞得里亞諾堡和約 (Peace of Adrianople)，承認希臘的獨立。土耳其的屈服，是戰到最後一滴血才屈服的，並不是臨事不發一彈，將疆土和平讓入者可比。

一八五三年俄國又假借保護耶穌墳墓的名義，向土耳其挑釁，土耳其得英法兩國的幫助，於一八五三年十月對俄宣戰。這個戰爭延長了兩年，就是歷史上有名的

克里米戰爭。到一八五六年俄國戰敗求和，開和會於法京巴黎，列強承認土耳其帝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與歐洲列國處於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一戰之賜。

一八七四年以後，土耳其所屬的各斯拉夫系異民族起而叛亂，俄國乘機以大斯拉夫主義號召，加以援助。一八七七年俄土開戰，土軍主將奧斯曼帕夏 (Osman Pasha) 與普列澤那 (Plevna)，抵抗俄國與羅馬尼亞聯軍至五個月之久，卒因衆寡不敵失敗。嗣後結聖土提反條約，土耳其大受宰割，但未幾以外交形勢轉變，列強開會議於柏林，重訂柏林條約，使土耳其又恢復一部分領土。

在十九世紀百年之間，土耳其以積弱的國家，凡對列強開始三次大戰，雖然結果勝負不同，但沒有一次不是抵抗到最後才屈服的，決不像我們中國民族那樣永遠保持和平鎮靜的態度。土耳其人有這種精神，所以才能有斯麥拿最後的戰勝。

二十世紀以後，土耳其人的對外政策仍然是取積極抵抗的態度。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青年黨人革命之後，隨即有一九一一年意大利突然進兵佔領土耳其的北非洲屬地突利坡里，對土宣戰。意大利這種對土的暴舉正與今日日本人對我國所採的手段

完全相似，但是當時青年黨執政的土耳其政府却不像今日國民黨執政的我國政府這樣和平，鎮靜，無抵抗。他們立即對意大利應戰，頑強抵抗將近一年，意大利已無勝利的希望，不幸因巴爾幹戰事爆發，使土國無力對意，才不得已割讓突利玻里以和。嗣後第一次、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土耳其都參加戰團。到歐洲大戰爆發，土耳其更加入德奧方面，對協約國抗戰四年之久，終至敗衄，而受綏佛爾條約的宰割。一般批評的人莫不以爲土耳其以好戰而亡國，從此將不敢再談戰爭了。不料好戰成性的土耳其民族，雖至國破家亡也不肯放棄爲國家獨立生存的戰爭的權利，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軍隊佔領小亞細亞的斯麥拿起，土耳其的國民領袖凱末爾起兵東部，與希臘軍隊漸次接觸。嗣後血戰三年，卒於一九二一年九月將希軍總司令俘獲，攻下希軍最後的根據地斯麥拿，土耳其的獨立自由是經這樣苦戰才得來的。土耳其人的屢次對外宣戰，並不是因爲有戰勝的把握才宣戰，只是不甘心自己的國土國權無抵抗讓別人拿去而已。凱末爾對希臘的抗爭，最初也並不是有什麼戰勝的把握，也只是敢戰，要戰，不怕戰而已。這種精神是思深慮遠的老大民族所絕對辦不到的。

。但是土耳其的復興就是靠着還有這一點精神。在這一點上，中國「何敢望土耳其」？

豈止土耳其是這樣，世界上那一個弱小民族的獨立自由運動不是由苦戰得來的？十六世紀荷蘭人因反抗西班牙而有五年的獨立戰爭，十七世紀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與奧、法、俄、瑞四國爲敵，而有七年的中歐戰爭，美利堅因反抗英國的壓迫而有七年的獨立戰爭，十八世紀西班牙因反抗拿破崙而有五年的半島戰爭，德意志爲求統一而有普丹、普奧、普法三次戰爭，意大利爲求獨立而有參加克里米戰役及聯法抗奧的戰爭。以上這些都是歷史上彰明較著的事實，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靠武力而能恢復獨立自由者，實在不可多見。因爲正義、和平、人道等好聽名詞是嚇不退野心的帝國主義的，要打倒帝國主義，外抗強權，只有靠着鐵和血。

中國現在站在一種次殖民地的地位，一切不平等條約壓在中國民族的身上，如同五行山鎮壓了孫行者一樣。中國的問題不是很單純的對國內的問題，國家的統一強盛，必須待諸國際壓迫解放以後，這是很顯明的事實。舉一個例來說，譬如中國

要求強盛，必須要先求經濟的復興，產業的發達，但是在關稅協定的桎梏之下，產業如何能夠發達？經濟如何能夠復興？可見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有不可分解的連帶性。尤其是與我國疆土相接，利害相反，時時野心在抱的日本帝國，對於中國的統一強盛最抱不安之感。中國強盛之日，即日本國家的獨立與發展感受威脅之時，至少在一般日本當國的人物裏是同抱這種感想。所以日本對於中國的復興必定處處加以破壞壓迫，務使不能達到目的而後止。在這種強烈的障礙之下，中國若想恢復國家的獨立自由，不先求國際間的解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確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對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中國人士間無形中分為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以為中國的解放可以用單純外交的手段，乞憐於強國之前，獲得國際同情哀憫，然後才可以逐漸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一切主權。另外一種意見，則以為中國的解放，最後非訴之鐵與血不可。前一種意見是為自北洋派政府以至現在的黨國當局所繼續採用的政策，後一種則是一部分有革命性的國民所主張的。

假如國際同情真可以幫助中國恢復獨立自由的地位，我們也歡迎這個辦法，可以使中國國民少犧牲一點。然而這個意見的無效是顯然的。自北洋系時代的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以及最近幾年來的修改條約的交涉，成績如何，不難覆按。希望列強將到口的肥肉和平吐出，這種樂觀的幻想，比任何幻想都更渺茫些。在一般自命通達實際情形的穩健派人士而有這種幻想的主張，實在有點不可思議之至。

現在日本的佔領東三省，就是給倚靠國際同情來解放中國的主張以一種事實的教訓。國際同情，甚至於有組織的國際聯盟，對於日本暴行的制裁和中國國權的保持究竟有多大的幫助，從這一次事件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兩次撤兵的決議，不能禁止日本人不砲擊天津的中國土地，這就是國際同情所給予我們的援助。這一次東三省的問題若不得適當的解決，則以後日本干涉中國內政的機會更多，更容易了。怎樣對付日本，就成爲中國解放運動中第一個先決的問題。

對於日本是不是可以用外交親善的手段，獲得他們的同情，使不爲中國復興的障礙呢？這種主張在現在中日衝突正激烈的時候，自然都不敢出諸口來，但是我相

信有一部分中國人確持此見解，並且見之於實行。最近「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因秘密赴日，受國人攻擊，特發出辯護的通電說：

「……友仁以爲過去南京政府之對日外交，仍不免承襲北京官僚政府時代因循苟且之習慣。我弱日強，而外交上之應付如此，其前途之不利與失望，可斷言也。在此種情況之下，欲轉變外交之失望，而別謀永久和平，則惟有依照中山先生之遺教，中日兩國間應力謀親善共存之道，而排除一切仇視與不諒解之障礙。德國與法國親善之結果，保持歐洲之和平與秩序，至東亞和平之保證，有待於中國與日本之互相提攜也。……」

陳氏這種主張，據他自己所說，是「中山先生之遺教」。我們姑且撇去一切感情衝動的論調不談，承認陳氏這種「中日共存共榮」的主張，是出於謀國的誠意，而非勾結日本以盜取政權的手段，則這個主張，我們也值得加以仔細考慮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並不是不能成立親善的關係，但是重要的條件是在兩國之間有無絕對不相容的利害衝突和當前共同一致的敵人。沒有這兩種條件，而欲成立特

別的親善關係，是不可能的。陳氏舉戰後德法的親善以與中日國交爲例，不知德法的情形與中日的情形有許多重要不同之點：第一，法國現在爲歐洲大陸國家的領袖，欲望已足，正在持盈保泰，不欲多所進取，但求德國不圖復讎卽足；而日人則方視滿蒙爲其國家生命之所繫，非盡得之不足鑒望，故親善共存可以感動法國而不能感動日本。第二，德國因歐戰的關係，變爲列強的公敵，其一舉一動頗爲困難，故不得不曲意與法親交，以圖釋去國際疑慮；中國雖受國際壓迫，外交上尙未至完全孤立，不必一定非與當面的敵人親善不可。第三，德國雖敗，內部仍然統一，不授法人以侵略機會，故兩國和平得以暫保；中國則方在內部紛爭之中，時時授日人以侵略的機會，雖欲日人之不生進一步的野心而不可得。第四，德法親善不過感情恢復，除凡爾賽條約外，並無其他繼續的權利損失；而中日的親善，則須以承認吉會路敷設權及商租權等條件爲交換之具，這些條件雖有條約的根據，但不是如凡爾賽條約一樣，由戰敗之後，全國國民代表通過，堂堂正正簽字承認的，不過是一時串騙之所得。以上幾點都可證明中日關係和德法關係並不盡同。在德國，斯托拉斯曼

的親法政策，雖爲協約方面所歡迎，然尙遭激烈的國權黨人所反對，並且也幸而法國有眼光遠大的外交家白里安，主持法德親善的政策，才能相互苟安一時。中國現在所受日本的侮辱，百倍於德法的關係，而日本又沒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外交家，一味追隨於軍閥的後面，對我步步侵略。這樣的態度，如何能使中國與之親善？如何能給予中國以安定復興之機會？所以希望從中日親善的關係上以解放中國者，卽從最好的動機來講，也還是不明白日人對華的根本觀念之兇險。要想騙得日人一時的同情，以徐圖改造中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中國的解放既然與對日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而想以中日共存共榮的口頭話騙取日本人置身於中國事件之外，讓中國人有自行徐徐統一改造的機會，又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那麼，中國的解放，除了對日一戰之外，更有何法？日本經過此次侵略之後，在東三省的基礎穩固，必定更進一步來侵略黃河流域，是中日衝突之機會愈多，戰爭更不能免。中日之必出於一戰，除了少數迷信國際同情和中日親善政策的人以外，大多數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事實上絕難避免。但是戰爭時間的遲早間

題，却各人意見不同。普通的意見以爲中國此時決無對日戰勝之能力，故不如稍緩須臾，待國內完全統一，政治修明，整軍經武之後，再對日一戰以求收回國權。這種主張，是效法俾斯麥勝法的政策，固然計出萬全，但是事實上日本人能否容許我們有這樣從容準備的時間呢？拿這一次的事變來證明，就可以曉得日本決不會這樣愚蠢。中國的復興只要稍有希望，日本必以全力來破壞的。所以必勝而後戰，在中國只能當作一種可望而不可卽的妄想。我們的環境，只容許我們下最後犧牲的決心，隨時隨地準備對日的戰爭。最上能如意大利之聯法戰奧，已算很大的成功，萬一外交不利，我亦當以孤軍血戰的精神，效法荷蘭之抗西班牙，美利堅之抗英，爲乾坤一擲之壯舉。甚至如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之往事，雖以一敵八亦在所不畏。有這樣最後犧牲的決心，才可以獲得最後的獨立自由。否則，敵人得寸進尺，東北失陷，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至全中國都有失陷的可能，田中內閣的秘密奏章，已將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示給我國人，我們還可以一讓，再讓，聽敵人從容建設大陸的根據地嗎？國人其猛醒！

載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號火線

建國問題平議

——讀獨立評論以後的意見——

中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這是胡適之先生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也是全國有心國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問題——一部分自命世界主義者除外。建國必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統一，這也是大家所都可贊同的。中國究竟要聯邦式的統一，還是中央集權式的統一，我以為這個問題關係還小，因為無論何種方式的統一，至少軍事和外交總應該是中央政府主持的，而地方上也總不能不多少有點自治之權。現在所急切要問的是怎樣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的民族、文化、語言、文字、乃至經濟生活，本來都早已是統一的，所以中國的問題就僅僅餘下了個政治統一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中國政治統一？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迫切要問的問題。

蔣廷黻先生告訴我們說，中國需要經過一個專制的時代，如同英國之有頓頭朝，法國之有布彭朝，俄國之有羅馬諾夫朝一樣，先讓專制的勢力把國家弄成一個

民族的國家，然後再談革命和民治。這個主張的是否我們目前姑且不必討論，我們應該首先要問的是，蔣先生所理想的專制王朝怎樣才能產生出來？問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慨歎地說，蔣先生的主張可惜提出的太晚了，假使在三十年以前，滿清政府尚未推倒的時候，蔣先生的話是或者可以實現的，因為那時中國尚有三百年歷史久遠的中心政治勢力。我們須知英、法、俄幾國的王朝都是由歷史上自然發生的，他們的專制權利是有歷史背景的，是為全國人所公認的。現在的中國有那一個人，那一種勢力配來講這種話？我們常推想中國現今內亂所以不能中止的緣故，沒有固有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在西歐各國，由衰弱而強盛，由分裂而統一，大抵是因為國家的中心勢力並未失墜的緣故。英、法、西班牙等國的革命，大致都是首都革命，中樞組織根本沒有動搖，雖然是使用暴力，其實與和平禱讓無異，故法國能經四度革命而元氣不傷。俄國的革命也是首都革命，雖然在革命之初各地軍閥已經紛紛割據起來，但因為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個國家的中心已經落入布爾什維克黨人手中，所以其餘也就無法存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是兩個向來分裂

的國家，其所以能統一是因為有普魯士和撒的尼亞兩個固有的國家做中心勢力。即在中國歷史上歷朝的遞嬗也大半是實力的遞嬗，平民起兵，赤手空拳可以成功的實在很少。蒙古、滿洲等外族入主中國者不算，其餘的朝代更變大致可以分作四種方式：第一種是純粹憑藉中樞勢力篡奪成功的，如王莽之代漢，晉之代魏，南北朝之禪代，隋之代唐是。第二種是雖非中樞但也是憑藉固有勢力成功的，如唐之統一是因為李淵做太原留守，有晉陽的正式軍隊為憑藉。當時羣雄大半是起自草澤，惟有李淵和王世充是憑藉固有勢力，所以王世充能擊敗李密，而唐朝能統一中國。宋太祖的統一也是憑藉五代相傳的中心勢力而成功的。漢高祖雖起自草澤，但他和項羽所憑藉的都是楚國的固有勢力，楚是大國，受秦欺最甚，人民猶有故國之思，項氏又是楚舊將，故陳勝和項梁的起兵都必以楚為名，秦滅之後，項羽最強，也是因為憑藉楚國舊勢力的緣故。及漢高祖定三秦之後，秦的精兵都歸於漢，然後才能與楚相距。光武的實力是憑藉更始所給的名義造成的，沒有更始的名義，光武就不能安定河北，也就不能南向以爭中原。南北朝的代嬗雖由篡奪，實際也是地方軍閥憑藉實

力而代中央的，也可以歸入這一種裏面。第三種是雖無實力憑藉但名義上猶有憑藉可以號召的，如曹操的起兵是無憑藉的，但他憑藉的是議郎的官職，是世家大族，是尊王室討賊臣的名義；袁紹比他的憑藉更大，故袁紹更強；董卓有西涼精兵爲憑藉，故董卓最強。第四種是毫無憑藉，由流寇或平民起兵的，這一種人在中國史上雖然很多，但大半皆歸失敗，如張角、竇建德、黃巢、李自成等，其中成功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漢末的更始，一個是明太祖，而這兩個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更始的成功是因爲人心反莽向漢，明太祖的成功是因爲人心反對胡元。卽中華民國的成立也是因爲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爲號召，一方面憑藉新軍的勢力，並不是完全平空起來的。以上的許多例，並不是說平民革命決不能成功，但只是指明無論是談統一，禦革命，總是有憑藉的容易成功些。此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中國現在有沒有中心勢力呢？我們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如民國十三年以前的北洋系，現在的國民黨，都勉強可以算做中心勢力，所以蔡松坡先生生時曾有志插入北洋軍隊訓練勁卒以改造中國（見與石醉六書）。不過平心說起來，這種中心實力實

在都薄弱得很。因為像英、法、俄等國的王朝之所以能造成一種中心勢力，來源是很久久的，一因有數百年的歷史背景，二因有全國心悅服從的倫理權威，三因當時國家本未分裂，軍政大權本來集中，這三點都不是中國現在的中心實力派所已具的，要培養起來至少也還需要相當的時期。

如何才能培植一個中心勢力出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據吳景超先生告我們，照中國內亂史上的成例推測起來，「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所以現在的中國所希望的是產生一個「能幹的領袖」，這領袖「要有爲國爲民的聲望」，「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此外再加上「現代的眼光」和「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如得其人，則中國立可統一，否則尙須延長內亂的年代。

吳先生這個武力統一的見解，是熟讀過「三國演義」後的中國人所共具的見解，不必一定要待用歷史的社會科學的方法才能歸納出來。民國以來的實力派，自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以至於當代英雄，都早已奉行過這個見解了，然而成績

還是渺茫的。所以渺茫的緣故，就因為現代的中國已經不是完全適用盤古以來的成例所能應付的。現代的中國，有幾件新要素都是從前所沒有的。第一是科學——特別在軍事和交通方面；第二是國際的複雜關係——特別是租界；第三是民治思想。這三種要素都是以前中國所絕對沒有的，第一項是利於武力統一的，因為較大實力派可以利用飛機重砲及交通器具摧毀地方的割據勢力，但第二、三兩項却是不利於武力統一的。舊時代中國武力統一所以能成功的緣故，因為失敗的人可以斬盡殺絕，無路可跑。一個領袖能夠武力成功，其實不必遵照吳先生所提的三個條件，那三個條件都是好聽的門面話，與實際毫不相干，漢高帝不見比項羽豁達大度，不過來得更狠辣些罷了。舊時領袖的成功，其要訣全在狠辣二字，在未成功以前，對於敵人要斬盡殺絕，在既成功之後，對於功臣也要斬盡殺絕，這就是領袖成功的得力原因。而這兩條秘訣在現代中國都是不容易實行的，其原因為有租界，有外國人。我們設想項羽在失敗之後有上海租界可跑，那麼漢高帝還能安心統治天下嗎？——縱使項羽負氣，不肯入租界，彭越、英布之流也必入租界的。古代的逐鹿者在失敗以後，兵盡糧

絕，縱不被擒也必須自殺，現在的逐鹿者在失敗以後，除出洋之外還可以借點外國款，辦一批軍械回來，再圖大舉。所以現代的領袖除非有力量能夠戰勝外國人，否則武力統一總是很難的，濟南慘案以後的事實不是顯然在我們眼前嗎？

其次民治思想的傳佈，也是武力統一的一個大障礙。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所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個思想所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壞事有餘。』雖然自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繼創牌以來，民治思想似已相形落後，然而我們要知道那兩種主義之在中國也不過說說而已。人人之所以贊成法西斯主義，因為自己想當莫索里尼，假如到了知道自己決不能當莫索里尼而反要受另外一個莫索里尼鞭策驅使的時候，法西斯主義立刻就要坍台。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達林可以開除託洛斯基，在中國，手

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爲時髦，以挖苦人爲幽默，以成人之美爲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專制可以成功，這是夢想。舊式中國武力統一之所以成功，因爲尙有君臣大義可以維繫，一經委身事主，當然應該終身不二，所以忠臣是常軌，叛逆是例外。即使故主身亡，也還有嗣君可奉。在這樣的社會倫理之下，政治容易走入軌道。現在則人人可當領袖，人人想當領袖，倒戈叛主，視爲常事。至於領袖死後，奉其子繼任的事，更絕無僅有。因此任何大的勢力，不幸領袖一死，立刻就要發生內爭，偉大的中心勢力不容易造成。在現在的中國，領袖與部屬的關係已完全成爲勢利的關係，而別無道義的關係爲之維繫，勢力的關係是暫時的，只要環境形勢一變就要發生變化的，以這樣的薄弱基礎，想來武力統一，豈不是南轅北轍嗎？

還有與武力統一政策相伴而來的困難，就是財政問題和民意問題。凡使用武力統一政策的人，勢必盡力擴充軍備，向外挑戰，這樣政策的結果，財政必陷於困

難，財政困難之後，必須向人民身上盡量搜刮，結果民意對於這個實力派必發生怨憤，民意雖然無力，然實際向背可影響軍心，這是歷次內戰我們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統一之故，對於謀臣猛將不得不加意聯絡，予以金錢美人及其他種種權利，結果政治上的種種罪惡就因此發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標榜廉潔，則謀臣猛將必因失意而爲敵所誘，自身也難免失敗。因此武力統一與政治罪惡又有因果的關係，而政治上的罪惡越多，民心也越去，統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遼遠。歷史上固然有逆取順守的，然絕對違背民心而能統一者確乎很少。現代的世界，打一次仗很不容易，戰爭所給予人民的負擔和痛苦遠過古代數千百倍，故古代用武力統一或可不失民心，而現代則勢有不能。同時因報紙及其他社會事業的關係，民衆容易表示他們的不滿，容易傳佈反抗的思想，容易結合起來消極抵抗，任何領袖都不能不向人民榨取而可以武力統一——除非做賣國賊，有外國人供給款項。因此任何領袖也都不能免於人民的怨恨而影響到他的成功。我們要記得，歐戰以後，革命的國家雖多，內戰的國家却少，純粹靠武力統一的國家更少。意德兩國法西斯的成功都沒有

經過內戰，法西斯和共產黨的爭鬪只算鬪毆傷人，不是大規模的戰爭。土耳其基瑪爾的成功是對外戰爭，不是對內戰爭。捷克、波蘭等國的獨立也是國民戰爭，不是內戰。西班牙的革命雖有內戰，而時期不長，影響也不大。比較上只有俄國在革命後曾經過武力統一的時期。蘇俄政府之所以成功，一因俄國地勢僻遠，能免各國的積極干涉；二因正值歐戰後列強疲敝之餘，無力大舉干涉；三因英、法、波蘭等國的幫助白黨，反激起俄民愛國的情緒，列寧政府爲俄國國民的國家主義所拯救。這三種特殊情形都不是中國今日所能援例的。中國今日人民心理怨恨內戰已到極點，任何主義，任何口號，想用武力來統一都難望成功，國際的環境和民衆的勢力都妨害武力統一的進行。在這種情勢之下，我不相信武力統一會能成功。

然則中國今日究將循何道以建設一個統一的國家呢？「以建設求統一」，這是一句好聽的口號，在現在羣雄割據，互相猜忌的形勢下，建設受財政的牽制，很難如意。仿照俾斯麥和基瑪爾的成例，從外戰中去求統一，這個形勢也許會到來，然而這種犧牲不是我們所忍言的，況且以中國國力之弱，敵人之強，外戰的結果也許

完全和我們的期望相反，我們不必存這種微幸的心思。

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為沒有像普魯士、撒的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已往雖有兩次創造中心勢力的機會——北洋系和國民黨——但都將機會失去了。一個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一的政策却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我根本贊同胡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統一或其他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在幾千年官僚政治訓練之下的中國，妄想以國家的力量來興作一切，結果每辦一事即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機會。中國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國的家族制度、中國的倫理觀念有不可分解的關係，一時急

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義，裁官減政，無爲而治，使官僚無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滅。我說這話並不是反對建設，但我以爲建設之前必須有一段預備工夫，古人中也頗有懂得這個道理的，故云「禮樂百年而後興」。我認爲中國今日欲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第一個是休養的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減政，減稅，澄清吏治，剷除盜匪，使人民的負擔逐漸減輕，能夠自由吐口氣，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樣的政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說說談談，把不平之氣放出一點，社會上自然減少許多亂子。這個時期經過之後，人民的能力逐漸恢復了，然後再可進入於第二個小規模培植的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興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動建設小規模的實業，將大建設的人才和條件都預備好了，然後才能進入於第三個大規模建設的時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負擔，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數政治領袖的環境來視一般窮苦無告的人民，以爲連這一點點小小負擔，何至都擔負不起，這正如勸飢民食肉糜一樣，終是一種笑話。現在一般建設論者，都把中國窮困的原因歸在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身

上，其實我們若從內地農村及小城市中親身閱歷一下，就可知中國人民現在的經濟破產大原因，還是在苛捐雜稅過多，以及官吏的侵吞壓榨。苛捐雜稅的過多，因為要負擔過大的軍費。故不裁兵，不減政，決不能使人民休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還在其次。

我所理想的建國步驟是如此，這個意見的是否姑且不論，假如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要誠意實行這個政策是很容易的，但在現時則幾乎不可能，因為政治不統一，各方實力派互相疑忌，不能不各擁一部分雄兵以圖自衛。裁兵之說在目前的局勢下是很難能的，所以有人主張非先貫徹武力統一政策不可。但武力統一也幾乎同樣的不可能，在前邊已經說過了。我們因此不能不於武力統一之外，另尋有效的辦法。

我以為這事情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確實需要一個領袖，但這個領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領袖，而是心平氣和，開誠布公，使大家不至於畏忌他的。這領袖當然要有一部分實力，不然就是黎元洪第二了。但實力只能以維持他自己的

勢力範圍爲限。這個領袖應該從政策和行動上明白表現他決沒有武力統一消滅異己的野心，應該坦白承認中國割據的現狀，應該正式給予地方實力派以完全自治的權利，這樣的辦法不但使老百姓安心，也可使地方實力派安心，如此才能在實力派中樹立起「互信」的關係來。這個關係是政治安定的要訣，在現在地方實力派慄慄畏懼各圖自守的時候，這個政策的實現並不困難。老實說，所謂中心實力派應該自己承認是一個封建時代的盟主，而不是天子，他的責任是保障列國的勢力平衡，制止強凌弱衆暴寡的地方爭奪戰，討伐野心無道的暴徒，做一個公平的經紀人。在平時應該有一種類似國際聯盟會議的組織，以消弭各方的惡感，發抒各方的不平；在外侮到了的時候，應該學齊桓、晉文去糾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之所以能爲霸主，因爲他不貪土地，不肯盟信，所以爲列國所服。現在的盟主照這樣做去也並不爲難，只要有誠意，有毅力，日久自能獲得各方的信仰，發生一種道義上的力量。這力量不是打幾次勝仗，花幾百萬金錢所能獲得的，只有一個公忠體國，深明大體的領袖——或政治集團——才能得到這種報酬。這種道義的力量一樹立，才能真正奠

定國家的中心基礎，這就是李石曾先生所謂的「分治合作」，中國今日只有走這一條路。

我深信中國未來政治的演進，必然地要走這一條路，一切過去袁、段、吳、張的武力統一政策的失敗，都證明那個政策早已此路不通，現在的局面也仍然是如此，適之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裏——武力統一論——已經說得很明白。人民政府的失敗，只能證明福建的武力革命政策是失敗了，而並不能證明南京的武力統一政策可以成功。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假如有人不信，仍想試驗這種政策或鼓吹這種理論，也不過使中國的內亂更增加一些，並不能達到建國統一的理想，並且難免是「治絲而益棼」。

有人說，如果照我上面所提的辦法實現起來，豈不是使地方割據勢力越穩固，中國的統一越無望了嗎？這話至少在表面是如此的，但我們知道在這樣情勢之下，中央政府並不是沒有控制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王得力秘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

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為這樣才可以制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大法，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後，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後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權的，與天下共擊之。如果中心實力派真能這樣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無血氣的，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仗中央的聲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實力派算賬。在地方實力派與人民的權利衝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機仗義執言，逐漸削減軍閥的權力，培植民權的基礎，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制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是永遠無辦法的。

我對於中國建國問題的意見是如此，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載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四日獨立評論第八十八期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

在今日中國，無論是贊成共產主義或者反對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共產運動總不能不承認它的嚴重性。在江西的共黨根據地雖然放棄，但自紅軍主力由川入陝甘以後，漸漸有打通國際路線的可能。假使一旦與蘇俄成立充分的聯絡，武器、資源、人才、消息都有相當的準備，則他日捲土重來，實有不可輕侮之勢。再加上國難嚴重，經濟破產的國家現狀，在在都予共黨以發展的機會，不是隨隨便便得以應付得了的。

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單獨中國國內的問題，是一個整個世界的問題，而且還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問題，實是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運動，一種新理想的原則，再加上實際的力量，所以成爲最嚴重的問題，而不是用普通政治的方法所能應付得了的。

就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去檢討共產黨的問題，簡單分析起來，可以分作幾個部分：第一是馬克思主義，第二是列寧的世界革命政策，第三是蘇俄的實力，第四是中國共產黨的動向。這四個問題雖然實際上是整套的，然而為研究便利起見，不妨把他分作四部分來分別看，最後再歸納起來。

討論到共產運動的問題，最好要平心靜氣，用客觀的態度去加以科學的分析。我們不能把共產黨看得太低，以為不過是殺人放火的土匪；但也不必把他們看得太高，以為他們有什麼絕對正確的理论，和神妙莫測的手段。我們應該曉得共產黨也不過是普通的人，他們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也不過是世界上許多學說中之一種，他們的黨也不過是世界許多政治組織之一。我們應該用科學的眼光去平心靜氣將他們的理論和事實檢討一番，還他一個真面目。我們並不要預先抱着成見非反對它不可，也不必抱着成見非贊成它不可。這是一切討論共產問題的人所應該首先抱定的態度。

講到理論方面，共產黨的理論有首尾一貫的系統的。它的總稱便叫做馬克思主

義，分別來講，在社會觀方面，他以唯物史觀爲中心而建立經濟一元論的說法；在邏輯方面，他竊取了黑格爾的玄學辯證法而稍加名義上的修改，以成所謂「唯物的辯證法」；在經濟學方面，他建立了剩餘價值論，把經濟的利潤完全歸之於勞動的功勞，而否認資本及其他的影響。從這三個要點出發，他把一部歷史的演進看做是純粹階級鬭爭的演進，根據階級鬭爭的觀點，把歷史的演進分作許多階段，而預言未來的社會必然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所有這些說法，國人多已知道，我們在此地不必細細介紹。

依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本身實是一種宗教式的教義，而不是純學理的探討，因爲他的注重點在預言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這話可以欺動一班信徒的希望心而發生行動的力量。宗教和學術不同之點，就在學術祇注重純理的探討，不問實際影響爲何，宗教則是以實行爲主的，教理不過是實行的一種宣傳方法。任何宗教都有「教」、「理」、「行」、「證」四個部分，教就是判教，是要把許多不同或類似的教派用一種標準排列起來，自己的教當然排在最高的地位，以示唯我獨

魯之意。理就是這宗教本身的理論，行就是實現宗教理想的方法。證就是實行宗教理想以後的實際效果。馬克思主義關於這四部分都有的。他把思想分作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無產階級的思想等等，又把社會主義分作烏托邦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等，就是一種判教的方法。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教理。他的階級鬭爭說，無產階級專政說，以及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就是一種行的方法。至於證果就要看實現他的主張以後的成效如何，現在蘇俄號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所以蘇俄的成績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果。普通宗教注重在個人修行方面，所以證果只好由個人自證，他人無法評判。現在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在改造社會，所以他的效果可從社會上看得出來，我們容易評判。凡宗教皆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自以為是而目他人為外道，這也是宗教與學術根本不同之點。馬克思主義的排他性是最強的，所以這也是他的宗教性的證據之一。舊式宗教多講神話，現在時代不同，神話不能起人信仰，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以科學招牌自命的，然而事實上他的科學招牌是假冒的，仍然是類似的神話。說馬克思主義是宗教，這話並不含有輕視的意思，因

爲從生物史觀的見地看來，一切宗教都是社會集團自身樹立集團意識的工具，一個社會要求鞏固集團的權威，或者要推翻舊社會而建立一個新社會秩序，必須有一種宗教式的理想把一部分人團結起來，使他們發生狂熱的信仰和勇敢的行動，耶穌和釋迦牟尼也都是社會革命的領袖，他們的宗教也就都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一種新集團建設的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現代一切主義（如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等）也都是如此。若抽去了宗教性而祇剩下單純的學理，那就只是少數學究們的紙上空談，在實際上不能發生力量。

現在我們不必因馬克思主義之含有宗教性而鄙視他，我們祇把馬克思主義看作現代許多新宗教（新主義）中之一種。人生於世不能無一種信仰爲生活的中心，沒有信仰的人容易陷於懷疑派的迷圈，對任何事情皆抱懷疑的態度，結果必將事事不能爲。因此人生於世必須信仰一種宗教，而且祇能信仰一種宗教，斷不能同時信仰兩種以上的宗教，若是一個人同時信仰這教又信仰那教，結果必發生人生觀的矛盾衝突而自趨絕路。不過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宗教信仰都是習慣的，常識的，並不加以

理智的判斷，因為一種新信仰取得了社會的承認以後，便使大多數人無條件接受下去，這樣才能鞏固社會意識的統一而免於分裂。我國過去二千年中皆在傳統的孔子教義之下，西洋則以基督教為中心，這些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對於所信仰的教義並不時時加以考慮，祇是照習慣奉行下去。但一個新興的宗教則不能如此。新興的宗教尚未取得大多數人的信仰，並且新興的宗教必然是為反對舊宗教而起的，因此大多數人習於舊宗教的教訓，對於看不慣聽不慣的新宗教都抱深惡痛絕的態度而加以壓迫，如果這種新宗教確是應社會的需要而起的，他本身的理論和犧牲精神確能自立，則受了壓迫之後不但不消滅，反能更增加信徒的勇氣而獲得一部分的成功。基督教和佛教初起的時候也都受過許多壓迫，不止今日的各種主義為然。

馬克思主義是應現代社會組織的缺陷而起的。自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上發生勞資不平的弊害，許多不滿現狀的人都想加以改革，因此發生種種的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多數是感情的，沒有首尾一貫的系統理論，更沒有近乎

宗教式的預言，因此在實際上力量較薄。到馬克思出來，才把社會主義用宗教精神整理一過，他把自己的主張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堅固人們的信仰；他又預言世界革命一定成功，反對無產階級的人一定沒落，猶如基督教高唱「末日審判」，凡信教者必入天國，不信者即降地獄一樣，使信徒發生極大的希望，反對者也因暗示而動搖。這樣新宗教便成立了，這種新宗教現在支配着一個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大國和全世界許多的信徒。

我們現在且從社會的觀點來看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和它的變化。我是信仰生物史觀的人，根據生物史觀的見解，一切思想皆是集團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或階級的產物，一種思想是反映着整個集團社會的意識形態，即是民族性的表現。馬克思主義根據唯物史觀主張思想是階級意識的表現，這話拿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本身就有點講不通，因為馬克思是一個中產階級出身，何以他不具有中產階級的意識而反高唱無產階級的學說呢？可見思想並不受經濟條件的決定。若用生物史觀的理論去解釋則很容易了解。生物史觀派認一切思想都是民族性的表現，因為同一民族

的人先天遺傳的血統和後天的集團環境都同，所以他們的意識和思想自然具有特色。馬克思是一個德籍的猶太人，他一方面遺傳着猶太民族強烈的宗教性，世界上幾個大宗教多半出於猶太人之手，摩西和耶穌都是猶太人，穆罕默德雖不是猶太人，而是同猶太族血統相近的阿剌伯人。猶太人的宗教無論新舊（如猶太教、基督教及回教）皆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與印度民族和平忍辱的佛教不同，馬克思主義正是這種猶太民族宗教性和排他性的遺傳再現。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受了德意志民族性的影響。馬克思祖先之中是否有日耳曼人的血統，我沒有細研究馬克思的傳記，不得而知，但他自祖先以來就定居於德國，以及他的信徒中有多數德國人是一種顯明的事實。德國民族性是尙集權重秩序的，馬克思主張集產的社會主義而反對無政府共產主義，正是德國民族性的表現。德國民族性又是重理論，驚玄想而忽視實際的，馬克思採取黑格爾文學的辯證法邏輯而反對形式邏輯和實驗邏輯，也正是德國民族性的表現。德意志民族性又是尙武力重鬭爭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和平的社會演進論而主張階級鬭爭，暴力革命說，也正是德意志民族性的表現。所以馬克思

主義從生物史觀的觀點解剖起來，正是猶太民族性經過德意志民族性濾汰之後而產生的綜合形式。

從馬克性主義以後發展的經過看來，民族性的影響更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主義始終不能發展於英國，就因為英國的民族性是重實際，重歸納，重經驗，而對文學的、綜合的理想。所以只有費邊式的社會主義能流行於英國，而馬克思主義則絕對不同。美國也是如此，因為美英原是同一民族。在法國也是如此，法國民族雖與德國民族同一重視抽象的理想，但法國民族是感情的，衝動的，與德國民族性之堅忍強毅又不同，所以將來法國或許有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可能，而決無實現共產主義之可能；即使共產主義也必是一種狂熱的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即有此傾向），而決非像馬克思主義的冷靜深刻。到了俄國民族性又不同了，俄國民族性其冷靜深刻頗類於德國，但態度之陰鷲，氣魄之宏大，則又比德國過之。馬克思主義到了列寧手裏，就另換了一種俄國風味，今日的蘇俄政府，其種種做法皆是承繼帝俄時代的遺風，特別是對內政策之殘酷專制，完全是俄國特有的辦法。俄國是維持農奴制最久

的一個國家，今日五年計劃下的集體農場不過就是變相的農奴制度的復活，不過把共產黨政府代替了從前的地主階級，把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代替了從前希臘正教的信仰而已。再看今日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雖名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其實在宗教信仰方面，在手段激烈方面，在排他性方面，在高遠而不切實際的理想方面，種種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變形，不過把紅期換做了卍字旗，把崇拜馬克思換做了崇拜希特勒，把壓迫資產階級的主張換做了壓迫猶太人的主張罷了。若再進一步分析起來，希特勒主義可以認作是從馬克思主義中排斥了猶太民族性的成分而祇留下德國民族性成分後的表現。原始的猶太人是民族觀念非常狹隘的，摩西的猶太教正是民族的宗教，但到紀元前六百年以後，巴比倫民族和腓尼基民族均已覆亡，他們的民族血統混入了猶太民族血統之內，於是原始的小猶太民族一變而為今日分布全世界的大猶太民族。巴比倫民族和腓尼基民族都是世界性的民族，所以猶太的民族思想逐漸含了世界主義的成分，耶穌基督就是這種猶太民族血統混合後的新產物，含有很多的世界主義成分。耶穌教與猶太教的鬭爭，即是猶太民族中兩種民族性的鬭爭，結果基督教不容

於本國而反傳佈於含有世界性的羅馬民族之內。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強烈的世界主義色彩，也是這種猶太新民族性的表現。希特勒主義則是將這種猶太的世界主義的傾向排除之後的純德國主義。所以在種種方面它都襲取馬克思主義的成法，而惟獨在世界主義這一點則絕對加以排斥。

上面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和生物學的背景，這不過是單就馬克思本身而言，至於當時的德意志和歐洲社會也有促成馬克思主義出現和擴大的生物的社會的原因，因為問題牽涉太多，所以本文不便詳說。

馬克思主義本是為救正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後的經濟不平現象而起的，論原來他的動機說本是一種很好的動機。不過可惜馬克思生的時代太早，為種種舊思想所困，而且又急於見諸事功，把他的學說來當作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並不當做真理的研究，因此就攙入許多宗教式、預言式的成分，失去了學說的客觀價值，雖然在實際運動上發生很大的作用，而經嚴格的學理一批判，就站不住了。

馬克思主義中舊思想的鬼影處處很顯明地表現出來，我們試在下面略舉幾項事

實。

第一，他受十八世紀以來淺薄的民約思想的影響很大，始終脫不出「社會原子論」的舊見解。盧騷的「民約論」是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是十九世紀一切運動的原動力，這種思想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觀點之上的。從前歐洲的社會是建設在基督教神權思想之上的，把社會和國家看做了神意的表現，而忽視個人的作用。十八世紀末年，一般新進的思想家要打破神學的專制勢力，就創立一種民約論的思想。照這種思想看來，社會並不是由神意造成的，而是由人民相約而成的。因此社會便成了個人的工具，個人如感覺不需要時就可把社會解散。這種思想與十八世紀機械論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相應的，在當時是反抗舊式宗教貴族集團社會的一種有力的工具。民約論的思想後來已經多數社會學家駁倒，最明顯的理由便是社會的起源並不是如盧騷所想像的由原始的自由人所同意結合而成的，所謂原始生而自由的個人，從社會學、人類學上看來並無此事，人類生而為社會的動物，社會集團對於個人自由的控制力在原始時代比現在還要強固。但是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却很流行，

一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運動都建設在這種觀點之上，社會主義也是這種思想的一個支流。他們第一承認人類是絕對平等的（即所謂天賦人權說），第二承認社會是為保護個人權利而設，第三承認個人的最大目的就是為自身的權利而奮鬥。民主主義者既然為個人爭政治平等權利的運動收了很大的成效，社會主義者當然要為個人繼起而爭經濟平等的權利了。馬克思主義是當時許多社會主義派別中的一支流，間接也就是民主主義的一支流，所以始終脫不了社會原子論的舊思想。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相繼進步，許多學者專門研究的結果，才使一般人漸漸曉得：第一、人類並不是生而平等的，人類之中有賢劣、智愚、強弱等等先天的區別，生而平等之說僅為一種理想；第二、社會並不是為個人而設的，社會本身是一種有機體，個人不過是社會組織下的一個細胞；第三、個人的目的是為社會服務，是完成集團社會的共同理想，而不僅為自己爭權利。一個建設在個人爭權奪利觀念之上的社會理論，根本就是反進化、反有機的思想。馬克思當時對於這些科學的研究還不曾接受（或者懷有反對的成見），他仍舊囿於社會原子

論的舊思想。照他看起來，社會的演進就是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彼此爭權奪利的結果，因此構成了他的「階級鬭爭」的歷史學說。這是馬克思的第一個大錯誤。

第二，他受當時德國黑格爾派的女學思想影響很大，根本未能接受進化的觀點。馬克思當時的德國是在女學支配之下的，尤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發展說支配人心最有勢力。這種思想把萬事萬物都看成是從一個無形的神妙本質中有計劃有法則的開展；即黑格爾以爲萬事萬物都不是新的，都已具含於理性本體之內，依辯證法的發展而漸次展開於人間。這種觀念正比如說世界是一幅已經繪畫成的圖畫，宇宙的發展祇是把這幅已成的圖逐次展開，而並不是新加上些什麼。這種思想的遠祖是基督教的哲學，基督教把宇宙萬物都看成是上帝的預定意旨，在上帝創造世界的第一日起就已預先支配好世界的課程表，一直到最後世界末日審判爲止。一切宇宙的發展不過就是上帝預定意旨的表現。這實在是一種荒謬絕倫的神秘觀念，不值一駁。黑格爾生當歐洲女學最盛之日，知道上帝的觀念已不能支配人心，故把上帝換成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理性，實際上依然還是那一套。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徒孫，他自幼中了

玄學鬼的毒，終身不能滌洗，不過他又生於科學漸有萌芽的時代，所以他竊取了黑格爾的全部理論而祇把「理性」換做了「經濟條件」，實際上仍然還是那一套。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因生物學、社會學的長足進展，科學的方法論已有很大的革命，特別是達爾文的「種源論」發表以後，科學的演化觀念已代替了玄學的預定開展說。照演化論的見地看來，萬事萬物並非自最初已有預定的計劃，演化的方向也並無必然一定的路線，生物的變異祇是生物在酷烈的生存競爭之下用種種方法試驗的結果，同一的動機，同一的環境，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生物的演化是許多盲目的錯誤和試驗的結果，我們雖可根據事後的結果而把生物的進化分作若干階段，但是不能預言同一原因一定產生同一結果。所謂階段祇是蓋然的，而非必然的。因為生物的本身是一個活的東西，對於同樣的環境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應付方法，這是十八世紀機械論的學者所不能懂得的。即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思想，是受物理學的影響，把萬事萬物都看成是一種機械，循一定的理法向前進行。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至今日，生物學的觀點代替了物理學的觀點，大家明瞭社會是一

個生物的有機體，而非物理的機械體。馬克思的思想仍沉滯於舊物理機械論的觀點之內，這是他的第二個大錯誤。

第三，他生於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尚未具體成功之時，不能了解最新科學所研究的結果。馬克思晚年已經趕上達爾文的「種源論」成功之後了，他對於達爾文主義確懷有崇拜讚歎的心理，並且想將它引入他的學說之中。但是可惜他受玄學影響太深，不能充分了解達爾文主義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在研究科學的方法方面。並且他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理想，在許多方面是和生物學的研究結果有點衝突的。社會主義所根據的是人人平等的理想，是人人皆應該有平等享受的理想，而在生物學者看來，人人平等的觀念和制度是反選擇的，對於種族的生存鬭爭未必有利，至少也是一個待考慮的問題。此外社會學和人類學還沒有充分發展，馬克思僅根據當時幼稚的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結果，來辯護他的主義。即如他和他的信徒們（至今猶然）所最得意援引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就是一本未成熟的人類學著作，在今日已為許多人類學家所駁正，而一般馬克思信徒至今還把這本書當作寶典，真是可笑之

至。馬克思解釋社會發展的原理而不能與後來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一致，這是他的第三個錯誤。

第四，馬克思生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工業革命初期，祇看到工業革命的流弊，而未看到人爲的補救方法，因此他的推論多數錯誤。工業革命開始於英國，英國是一個向來限制國家干涉權利而擁護個人自由權利的國家，而且當時對於工業革命毫無經驗，因此無形之間放任下去，致演成社會的種種慘象，這是當時有心人所感不快的，所以第一個社會主義者洛伯特歐文(Robert Owen)出現於英國，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產生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但英國並不能代表其他的國家，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後，歐洲大陸國家從德國起，逐漸實施了社會政策的種種方案，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去改正社會的不平，保護工人的權益。這種政策不但在實際方面收了很多的效果，即在思想方面也壓倒了馬克思主義。試觀歐戰以前代表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表面上仍堅持馬克思的理論系統，而實際上已拋棄了社會革命的空想，而漸趨於改良主義。同時修正派的馬克思主義更大大地奪取了正統派

的地盤。這是爲甚麼？爲的是馬克思主義經過客觀的事實的反證，已表現出許多弱點非修正不可的了。當初馬克思預言工業革命的結果必然是生產集中，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小商人漸次受了大資本家的壓迫而沒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去，事實上生產的集中祇是企業權管理權的集中，而並不是產業權的集中。他預言中產階級必然消滅，而近代各國統計的結果，中產階級只是增加，並無減少的傾向，更說不到消滅。他預言工業革命的結果是使無產階級的痛苦日益增加，而事實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之類，其工人的享受遠比其他國家舒服，今日英美的工人若請他們到蘇俄去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下的工人，享受一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恐怕他們是要掉頭遠去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發展得過度之後，必然發生世界經濟恐慌，於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崩潰，而社會革命就必然到來，這個說法猶如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說一樣，最能引起信徒的希望，增加信仰的勇氣。從前基督教徒一遇到天災水旱地震的年頭，就說世界末日快到了，勸人家趕快悔改。現在的馬克思信徒也是一遇到經濟恐慌的年頭，就說馬克思的預言中了，社會革命快成功了。這幾

年世界在不景氣的經濟恐慌之下，因此馬克思的預言恐怕更能動人些。其實經濟恐慌是一件事，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革命又是一件事，猶如天災地震是世界上常有的，但是與世界末日上帝震怒無干。馬克思信徒常常說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結果，而自誇蘇俄獨在例外。其實蘇俄人民的苦痛狀況比其他號稱資本主義的國家遠過數倍，誰又能曉得？一次飢荒死了幾百萬農民，誰曉得？因為農民的反抗集體農場，彼目為反動分子而屠殺的又有幾百萬人，誰曉得？在G P U的密探制度之下，無緣無故的被陷害了的又有多少人，誰曉得？許多外國人研究蘇俄所根據的材料，都是共產政府所特製的宣傳品，蘇俄今日尚無言論的自由，比希特勒的德國還厲害。因為德國的外交記者還能報告一點實在的消息，而蘇俄則絕對不能。到蘇俄遊歷的人處處在政府密探監視之下，連和人耳語也要受嫌疑，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所得的證據都是說蘇俄怎樣快樂，怎樣舒服，怎樣不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的。馬克思根據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工業革命經驗來預言八十年後的世界，這是他的第四個大錯誤。

第五，馬克思誤信國家觀念可以打破，工人可以不要祖國，而高唱世界革命的

論調。世界大同的思想並不是一個新思想，它是一個很老舊陳腐的觀念，在中國和西洋古代都有許多人相信世界大同的道理。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民族中最多這種自命高超的世界主義學者，因為德國在近代史初期始終沒有構成一個國家有機體，神聖羅馬帝國的鬼影還在籠罩着一般人。但是嚴重的國難和法國大革命以後國家主義的普遍潮流，把落後的德國人喚醒了；迎頭趕上最前線去，只有一部分思想落後的人，如馬克思之流，還在迷戀舊日的骸骨。其實事實上的證明，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不但沒有衝突，而且根本就是一種潮流的兩面。在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的成功同時也就是國家主義的成功，在二十世紀所謂社會主義不過就是民主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之下，把國家從許多王公貴族的手裏奪來交還全體國民，建設在全民共同生活的基礎之上的新國家，其集團性，其自尊心，其發展的能力和要求，必超過舊國家數十百倍。愛國觀念是發生於生物的本能，是生物經過無數代天演競爭所得的結果，決非淺薄的階級思想所能打破。在馬克思當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拉薩爾領導之下，已帶着充分的國家主義的色彩，後來第二國際的國家本位化，是人

所共知的事情。歐戰以後蘇俄號稱世界主義，而事實上一步一步趨向國家主義化，斯達林之打倒託洛斯基，就是國家共產主義戰勝國際共產主義的顯著事實。馬克思執持腐舊的大同觀念，誤信人類的愛國天性是可以口舌消滅的，這是他的第五個大錯誤。

要詳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內容，不是這一篇短短的文章所能辦到的。祇就以上所舉的五點看來，就可以明白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十九世紀許多陳腐學說中的一種，其中含有許多玄學的、神秘的意味，所根據的是一百年前的舊事實。單就社會科學思想史上演進的程序看來，他應該排在個人主義之上，集團主義之下，他代表從個人主義的政治觀點進化到集團主義的政治觀點的一個中間過渡階段。即是：

個人主義（社會原子論者，認社會為許多獨立的個人所集合而成）——階級主義（即馬克思主義，認社會為數個階級對立而成）——集團主義（認社會為一獨立的有機體，個人不過是有機體內的細胞，階級不過是有機體內的器

官。)

這種思想的成功在乎他們的組織嚴密和信仰心強固，並不是學說的本身有何不可磨滅的真理。回教和基督教也會因他們的組織和信仰而戰勝了反對者，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回教與基督教所信仰的神秘思想是可以站得住的。我相信人類永久不能脫離信仰的生活，因為共同的信仰是一個集體社會鞏固的主要條件。不過我們生在二十世紀科學開明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信仰建築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特別是劃人類史時期的達爾文主義之上。富於玄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過了時的東西，不值得我們去崇拜。並且這種主義現在已成爲俄國公開利用的侵略工具，俄國人要吞滅別的國家，便先用馬克思主義去在別人國內宣傳世界大同的思想，消滅其他國民的民族國家意識。等到民族國家意識枯亡之後，就可以甘心做蘇俄的順民而不會反抗了。今日中國在共匪屠殺下犧牲的幾百萬人民，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恩德，這是一種嚴重的文化侵略，比其他國家利用孔子王道思想來同化中國人的文化政策還狠毒幾倍。我們要反共，要防共，要拯救中國不至變成蘇俄的保護國，必須首先下大決心抵

抗馬克思主義的流行。講馬克思主義的人雖不必一定都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可憐地無意識中已做了共產黨和蘇俄的工具。思想自由和人道主義政策可以用來對付一切的黨派，而決不可對付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並沒有許別人自由，對別人也並不講人道主義。容許一個馬克思信徒活動，就是容許一個吃人的虎狼在市內公行，間接就是斷送許多良善人民的生命，凡是親眼見過，親耳聽過共匪在各省屠殺人民的真況，或蘇俄在恐怖政策之下屠殺陷害人民的真況的人，都可以證明這種態度的決非過分。若是用姑息養奸的態度去對付共產黨，希望他們感化覺悟，甚至一面反共，防共，一面仍令馬克思主義公然流行，這就無異於替共產黨造反攻的機會，其危險實不堪言狀。這是因馬克思主義附帶談起的話。

以上批判馬克思主義竟，以下再談到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談到蘇俄的問題，我的意思倒不像一般反共的人一樣，把它看做是一個洪水猛獸的國家。我以為我們對於蘇俄至少應該有兩點好的感想：第一點，現在一般領導蘇俄政權的共產黨領袖，不但在智識和能力方面，就是在個人的品格道德方面，至

少比帝俄時代一般驕奢淫佚的皇室貴族要高出數倍。蘇俄的國家領袖，自列寧以至斯達林，個人的刻苦廉潔生活似乎是沒有問題的，雖說傳聞託洛斯基被貶到土耳其的時候，隨身行李有八百多件？加里寧是一個見了女性就追逐的騷老頭子，斯達林也有虐待女性的謠傳，但這些說法是都待證明的。我以為一個成功的政治領袖，一個入了軌道的國家，最低限度的政治道德如廉潔勞苦之類，總是絕對要遵守的。中國政治之所以不如西洋，在這些地方關係最大，這是幾千年來的家族主義思想留給我們的禍害，西洋似乎少些。第二點，在目前共產黨統治下的蘇俄，一般下層民衆的生活和人格總較帝俄時代提高了一點。我們承認蘇俄人民在目前生活的舒服還遠不及英美德等國，但比帝俄時代總該強些。

一般人反對蘇俄政府最大的理由，就是反對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蘇俄曾用極嚴厲的恐怖手段，對付一切異己的人，就連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信徒都在內。在恐怖政策之下，不但資產階級和智識分子要被屠殺或驅逐，就是一般農民因反抗公田政策而起的暴動，也經過極嚴厲的手段鎮壓，一次內亂總要死好幾十萬

人，全世界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蘇俄，大抵注重此點。我在十年以前也抱着這種見解。但是現在對於歷史上革命事件研究的結果，覺得恐怖和獨裁政治乃是革命過程中必然不可免的階段，一個微弱的新興的革命勢力要想避免舊勢力的反動，陰謀，或投機取巧，從中分化，只有採取絕對不妥協的嚴厲政策。革命的失敗多數是因爲同舊勢力妥協而失敗，故過渡期間的鎮壓統制，乃是任何革命過程中所不能免的。不但法國大革命和近來意德兩國的法西斯革命是如此，卽號稱尊重自由的英吉利民族在克林威爾革命時代之下，也是很嚴厲的。甚至在基督教回教的宗教革命史上，不容忍和恐怖也是必然經過的現象。加爾文教派所統制的瑞士日內瓦新教政策，和當時舊教徒一樣對於異己決不容忍。可見恐怖政策並非蘇俄獨創，我們不必拿這一點來責備蘇俄，而且毋寧認爲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點上，就是蘇俄革命成功的最大的原因。觀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失敗和蘇俄共產黨之成功，可見革命與專政是分不開的。以上是單就政策方面來看，若再就革命心理去分析，一個真正的革命勢力，就是一大批激進，極端，不容忍分子的集團。革命黨而沒有極

端的態度（無論主張是左是右），必不能吸收過激的分子，結果中庸分子充滿，革命永無成功之一日。故真正革命黨之必然走上極端不容忍的路是無疑的。革命根本就是一種狂熱的宗教式運動，在狂熱的革命心理支配之下，自然要表現許多慘酷不人道的舉動，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人類心理已經失了常態，個人心理已爲集團心理所壓服，不可以常情評判之。不過在恐怖政策之後，需要一個極強烈的信仰心做後盾。沒有信仰的專政，是個人自私自利的專政，結果祇能自速其禍，帝俄時代的專制和今日蘇俄的專政其根本不同之點在此。今日蘇俄的領袖分子自私自利的心我們不能說他沒有，然而背後有少數（革命分子永遠是少數）信心很強，意志很堅定的黨徒去擁護支持他，這是無疑的。沒有這種精神勢力的基礎，專政決不能久存。

其次，蘇俄現行的種種共產主義對內政策，自戰時共產主義以至於五年計劃，集體農場，當然都是可批評的問題。世界上對於這些政策抱反對意見的人是很多的，因爲單就個人主義的立場看來，這種政策對於蘇俄人民並不見得有多大利益。

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實在就是中古封建社會農奴制度的變形，在封建制度之下，農奴沒有土地所有權；在今日，農民依舊沒有土地所有權。在封建時代，農奴終歲辛勤的結果，除僅足以糊口以外，剩餘價值全被貴族地主所掠奪；今日也仍然爲共產黨政府所掠奪。舊日統治俄國的是貴族，今日統治俄國的是新貴族（共產黨）。在今日農民固不憂衣食的無靠，在昔日封建制下的農奴也不必憂衣食的無靠。今日蘇俄的農民動輒以「反革命」、「富農」等罪名而被屠戮，昔日的地主還不敢這樣慘無人道。所以若單就個人的自由幸福去看，則今日的蘇俄人民（特別是農民，工人則爲天之驕子，比較待遇要好些，不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假名義下，罷工和要求增薪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所受的苦痛並不見得比從前減少許多。然而若就整個國家的立場去看，則蘇俄這種辦法，確是在國際競爭場上比較最有力的辦法。近代政治進化的特徵，一方面是把政權從少數貴族手中奪出來交到大多數民衆身上，另一方面是把國家權力擴大，可以干涉人民的一切自由，這兩種運動表面相反，實際是相成的。因有多數民衆的擁護做基礎，國家權力的擴大才不至變爲舊式的專制；因有

國家權力的擴大，自由運動才不至流爲無政府的混亂社會。故兩者相反而相成的。十九世紀初年，民主主義的運動和民族主義的運動正是一個大潮流的兩面，到了二十世紀，民主主義進化爲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進化爲國家主義，其實本質仍是一樣，不過程度更進一層罷了。卽十九世紀人民所爭的權力僅限于爭政治平等權，國家所享的權利也僅限於政治統制權，到了二十世紀，政治問題已有相當的解決，所以這兩種運動的目標又擴充到經濟方面去。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運動成功的結果，到了下半年便產生出幾個組織精密、意識顯明的「近代國家」來，彼此之間發生的鬭爭比從前貴族時代遠強數倍，因爲貴族時代的國際競爭不過是少數王公的個人野心所推動，全國人民對此並不熱心，戰爭結果對人民也沒有好處。到了十九世紀下半年，國家已逐漸變成全民的國家。每一個國家的向外發展都可以說是爲着全民的利益，得着全民的支持的，故其鬭爭的程度更加酷烈。不過當時人民經濟權利尚未平等，故有人仍可以國家爲資產階級的國家，鬭爭是爲着資產階級利益之說而反對向外發展。若到了社會主義的運動成功之後，全民的經濟利益

已經平等，則人民愛護國家之觀念必益盛，而國際間的競爭程度必益酷烈。現在有人以爲社會主義成功之後世界便可和平，正如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人以爲民主主義成功世界便可和平一樣，都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因爲民族國家的觀念是基於生物的本性而成立的，生物間的生存競爭現象，也是自有生物以來就永不能避免的。從前在貴族和資本家統治時代，人民尙肯爲國家而犧牲，到了國家變成真正全民的國家，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享有極大的利益之後，他們更要愛護這個國家，更要爲這個國家而犧牲，而向外鬪爭了。所以二十世紀下半期，假使人民的經濟平等權果然爭到以後，國家不但不能消滅，和平不但不能永保，國際間的鬪爭必更加酷烈無疑。在這種情勢之下，凡一個國家能趕快完成有機體的結構，把全體民衆的生活自物質的以至精神的都統制起來，使全國成爲一個統一諧和的有機體，則必能在國際競爭場中佔最後的優勢，否則必不免於相形落後。現代各國國家制度的演進無不向此方向力趨，蘇俄當然是最急進的，故其對外發展力也最大。試觀前幾年蘇俄煤油對華的傾銷，英美煤油商人的驚惶失措，就可以證明一個國家在實行社會主義以後，其對

外的侵略力是非常可怕的。我們不幸而與此一大強國爲鄰，其前途危險實不堪言！故我們不必批評蘇俄現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之缺點，也不必因羨慕蘇俄的改革而甘心願意做他的順民，我們只應該一面認識蘇俄進步的可驚，一面也應該認識他的真面目更爲可怕，唯一的方法只有迎頭趕上前去，採取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本精神，把整個中國改造起來，使完成有機體的結構，以便抵抗各式野心強鄰的侵略，而永保國家的獨立與自由。

照上面的理由看起來，蘇俄關於內政方面的種種改革，雖細微方面不無可議之處，而根本精神（國家社會主義）則爲全世界各民族在最近的將來所必然共趨的方向，無可非難。我以爲蘇俄最大的失敗，還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在這一方面，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烏托邦的幻想終難戰勝鐵鑄的事實。

馬克思站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國家意識尚未發達的時代，抱着烏托邦式的幻想，以爲世界大同可以不勞而致。他在他的錯誤的唯物史觀學說上，推演出階級鬭爭的錯誤學說。他不知道民族是血統的結合，是先天的，比後天的經濟結合的階級遠爲重

要；他忽視了一部人類歷史全是種族與種族鬭爭的歷史，而並不是階級與階級鬭爭的歷史；他不知道古代階級的分野是生物的、種族的副產物，一個優勝的民族征服了其他民族以後，爲保持本民族的優勝權起見，才創設了階級制度，離開了民族的關係而專講階級，便是玄想而非事實。他因爲不懂得這些道理，所以幻想全世界人可以放棄民族國家的分野而改採階級的分野，全世界的同一階級的人都可以不分種族聯合起來，以構成一個世界大同的烏托邦，這種想入非非的說法，自然是經不住事實試驗的。

從俄國革命以後，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幻想之下，當然要盡量推行他的信仰。但列寧是個實際的人，他懂得一點實際的教訓，不比馬克思完全是個書呆子，只會不顧事實的幻想。在俄國革命初成功的時候，曾受過波蘭軍隊的威脅，幾乎將革命政權推翻。當時拯救共產黨政府出於危亡的，不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而是蘇俄人民的民族國家意識。當時許多俄國帝政時代的軍官，雖然並不贊成共產主義，但激於愛國的熱誠，甘願投效敵黨以反抗波蘭人的侵略，這種顯著事實給予列

寧以一種深刻的覺悟，從此他不敢忽視民族的感情，而轉過來想利用民族的感情做世界革命的工具。他定下了「西進」、「東進」兩大政策，對西歐他完全採取階級鬭爭的政策，圖謀煽動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起而為社會革命。在亞洲則利用弱小民族的愛國情緒，煽動他們與蘇俄合作以反抗英國的亞洲霸權。在他的意思以為西歐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地方，勞資的分野非常分明，照馬克思的理論講來，階級鬭爭必然爆發，社會革命確有幾分成功的希望。不料煽動的結果處處失敗。匈牙利的赤色政權只有曇花一現，德意志的斯巴達斯卡團為社會民主黨所剷平，意大利的赤化為法西斯打得粉碎，至於英法等國則根本就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到了一九二三年以後，西歐赤化的運動已不能不認為是完全失敗了。這為的是什麼？就因為後天經濟關係的階級意識，敵不過先天血統關係的民族國家意識，人類的思想，社會的結構，是受生物學法則支配的，不是受經濟學法則支配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根本受了事實的死刑判決書。

但是蘇俄的東進政策却收了很大的成效。他在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鮮、

印度乃至中國，用援助弱小民族的口號，協助這些民族的反英反日運動，獲得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其收效之大出於意料之外。所以然者，因為民族國家意識本是人類的天性，蘇俄利用這種天性去煽動，自然容易成功。即以中國的共產黨勢力，還不是利用五卅慘案以後中國人的愛國情緒而發展的，但這種發展並非蘇俄政策的本顯，照馬克思的理論本來祇承認階級意識而不承認民族國家意識，在他們看來，民族革命祇是一種過渡的工具，最後的目的還在完成這些國家中的階級革命。並且蘇俄的最後野心既在利用第三國際的招牌以吸收全世界的國家歸順蘇聯，完成世界統一的迷夢，所以若使這些被壓迫民族中的愛國意識過於發展，也非蘇俄之利，因此他的最得意的法寶便是在煽動起各民族的愛國感情，把其他強權排斥之後，便趕快指使他們的走狗共產黨，發動所謂階級革命以期樹立親俄派的政權，一舉把這些國家變做了蘇聯的一分子。然而結果這麼一來，除了在外蒙古因為民族程度和環境的關係，已完全達到蘇俄的目的外，在其他程度較高的民族中，便顯然地招致了大失敗。最顯著的例是在土耳其和中國。在土耳其，蘇俄幫助土耳其做反英運動，費

了九牛二虎之力，然而凱末爾成功，便將鮑羅庭驅逐出境，完全禁止共產黨的活動，結果只落得白爲他人作嫁。在中國，共產黨利用國共合作的勢力，促成了國民黨的北伐，然而國民黨勢力一到長江，便發生了清黨一幕，結果使蘇俄忠僕的朱毛至今不得不流離西竄。蘇俄的東進政策至今已證明可算是仍然失敗了。爲甚麼？依然是爲了階級的意識勝不過民族國家的意識。蘇俄對外政策的失敗，就是階級鬭爭說的失敗，就是唯物史觀的失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失敗。甚至到了今日，蘇俄本身也由託洛斯基的世界革命轉變到斯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了，愛國情緒已在蘇俄高漲起來了。蘇俄既然完全變成了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中國人爲什麼還要迷信世界革命的幻想，甘心主張拋棄祖國，加入蘇聯，而高唱『擁護蘇聯』的口號呢？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請仔細平心想一想。

底下我們就可以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本身問題。照馬克思主義嚴格講起來，無產階級的革命應該發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因爲無產階級乃是由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而產生的，照辯證法的順序說來，資本主義是正，無產階級的運動便是

反，「反」孕於「正」之內，沒有「正」便無從生「反」。中國和俄國都是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中國根本就沒有進化到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照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理論解釋起來，中國就沒有發生共產革命的可能。然而共產黨居然在中國造成一部分勢力，在思想上吸引了許多青年的注意，在實際上構成了威脅現狀的勢力。這是爲甚麼緣故呢？馬克思主義既然不能解釋，我們就應當另找正當的解釋。

我以爲共產黨在中國所以造成一部分勢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利用愛國的感情。共產黨是反對愛國的，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在其他各國一樣，完全是利用各該民族的愛國意識發達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於民國九年，但在最初幾年中並無勢力。所謂二七事件（卽京漢路的工人運動）是站在階級立場上的一種運動，但完全無甚結果。共產黨的發展，全靠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之一幕。特別是五卅慘案以後，利用中國民族對英的反感，煽動起一個廣大的民族運動，共產黨的勢力便在這個機會中發展起來。若不利用這種機會，共產黨能否發展，是一個疑問。

第二是利用蘇俄的後援。中國是一個國際強權勢力支配下的次殖民地的國家。凡是有外國勢力作背景的，在中國都比較有發展的可能。因為世界上幾個對華有特別關係的強國，在本身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以及文化思想方面都比中國雄厚高明，拿這種勢力來對付散漫糊塗的中國人，當然比較要優勢些。中國共產黨完全是蘇俄所創造出來的，蘇俄共產黨人積四十年革命之經驗，關於黨的組織、宣傳、活動的方法已非常精密，拿這種經驗來訓練中國共產黨，結果自然非其他未受訓練的黨派所能抵抗。此外蘇俄對於共產黨的經濟援助，也是可驚的事實。共產黨靠了這每年大批的羅布（據十八年江蘇某縣某鎮的共產黨文件，該鎮共產黨支部每月活動費即在四百元左右，以此比例推來，全國各縣的共產黨活動總經費真是可驚。）才能夠收買無業的青年，國家意識未成熟的智識分子，去做宣傳煽動的工作。現在一般人徒見左傾思想在中國傳佈之廣，青年赤化之多，以為共產黨主義真有不可磨滅的真理，殊不知這完全是羅布製造出來的。共產黨每年在文化政策上花的錢不知道

有多少，他們用這筆錢開辦幾十個大小書店，每年出版的書籍雜誌將近千種，內容完全是清一色的左傾理論，在貧弱幼稚的中國出版界中，這樣大量的有系統的文化侵略，怎能不征服中國人的精神。現在有一位被禁在南京著名的文學家，他本來是愛國心很強的，做過幾本發揚民族精神的戲劇，個人性格是浪漫的，與左傾氣味也不合，但是他後來居然左傾起來，並且大賣力氣，因而坐監，爲的是什麼？他自己對人講，就爲的是共產黨對他每月有六百塊津貼。這話我是聽別人傳述的，究竟是否事實，當然不能斷定，但共產黨之以羅布收買智識階級分子則爲公開的事實。所以近年來左傾思想之流行，並不是什麼客觀環境的需要，也不是什麼理論立場的正確，完全是俄國人拿出錢來製造的文化侵略，這種文化侵略政策把中國青年的精神都征服了，許多人都願意甘心做外國人的順民，比其他國家的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手段厲害百倍。對付這種文化侵略單用消極的禁壓方法是不成功的（何況禁壓並不澈底），應該以國家的力量來補助正當的文化機關，大規模介紹正確的西洋文化思想，及消極的糾正共產黨理論的錯誤。若是每年能有一千部糾正馬克思主義錯誤的

書籍出來，則青年思想不勞禁壓而自改變。現在當局用許多力量去剿共，但是一面前線對共苦戰，一面社會上仍然充分製造共產信徒，這種方法是勞而無功的。如果把一師軍隊的經費來省下做有計劃的文化運動，則共產黨麻醉青年的故技早已失效了，何待今日。

第三是十餘年來國家內亂和政治不良的結果。內戰是破壞農民的正常生活，製造失業分子的最大原因。二十年來，每經一次內戰，傾家破產者不知有多少，所以造成土匪遍地的形勢，共產黨之能由思想運動而變成實際運動，也是由於這種形勢所造成，這是人所共知的。還有政治不良，苛捐雜稅的繁重，也是造成共黨的一個原因。近來一般人每說中國人民經濟太困難了，所以共產黨的理論容易煽動，這話是也對也不對的。中國現在既少資本家，也少大地主，階級對立的形勢並未造成，所以照理說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黨沒有成立的可能。但是中國人民的貧窮確是事實，貧窮的原因約有三種：一是科學不發達，人事未盡，二是列強的經濟侵略，三是苛捐雜稅的壓迫。這三種原因使中國的有業人民漸漸破產變為窮愁牢騷的不平分子，大

家沒有辦法，只好希望一種神秘的奇蹟降下來拯救大家。共產黨的理論便是這種奇蹟之一，它給一部分窮苦人民以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所以大家經濟越困難，共產黨兩字越能感動人。

共產黨在中國發展的原因雖不止上述三種，但這三種都是最重要的。共產黨一面利用國內國外的客觀形勢，一面接受蘇俄的物質幫助和精神指導，造成一個嚴密的政治集團，用慘酷的手段去對付一切反對的人，所以每佔領一處即能得到民衆的歡迎，其實並非民衆真正歡迎共產黨，不過不肯歡迎的分子都殺完了，剩下的自然是不敢不歡迎的人。這樣的民衆完全是靠威力得來的，若是看見共產黨統治下民衆不敢反對便認爲共產黨的政策得民心，這是錯誤的觀察。

中國今日對內對外的問題，都非用共產黨的理論和方式所能真正解決得了。中國今日對外的問題自然很嚴重，照共產黨的理論講起來，應該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決心除了蘇俄以外都是應該反對的敵人。但是這樣做去，就使本來可以不必做仇敵的國家也轉而爲敵人所利用。譬如武漢政府時代在鮑羅庭指揮下的反英運動，徒結怨於英人，爲蘇俄吐氣，對中國祇有害處，沒有好處。九一八以後英國政府的親日

政策，就是由那幾年的對外目標錯誤的結果所造成的。至今還有人稱贊陳友仁的強硬外交，不知道是完全做了蘇俄的工具，替國家多樹立了一個大敵，真是可嘆。中國今日對外如有出路，必須緊緊拉住幾個對遠東利益有關的強國，而把目標縮小到一點，共產黨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斷不能用。並且共產黨的勢力若在華伸展一步，英日的關係必接近一步，結果連美國也可拉入英日的共同對俄戰線上的，這樣的形勢是非常危險。所以中國近來有一部分人希望以聯俄容共政策來解救國難的，是完全不明大勢的空想。單就聯俄論自然不失為外交路線之一種，但必須以不傷英、美、法感情為前提，若因聯俄而陷中國於孤立，則其計甚危；若聯俄而兼許容共，則不啻為中國造外人環攻的口實，助內亂的滋長，其禍害更不堪言。

再就對內方面言，中國人也無接受共產黨理論主張的必要。中國今日誠然還未到太平時代，仍然需要革命，並且需要澈底的革命，但是共產黨式的革命却非中國所需要。因為中國今日封建制度早已取消，歐洲人民所煩惱的土地問題，對於中國無關；中國又沒有完成了工業革命，所以歐洲人所煩惱的資本集中問題又與中國

無關。在歐洲可以用打倒資本家、打倒地主的口號來煽動階級意識，在中國，革命的對象根本不是這些人。中國現在誠然也有少數開工廠的資本家，和擁有幾千畝田的地主，比起外國標準來雖然夠不上配叫做地主和資本家，但就中國標準看起來，也可勉強榮膺這兩個徽號了。所以前幾年共產黨的階級鬭爭目標，就集中到這兩種人身上。不過我們若仔細考察考察這兩種人的造成原因，就可曉得並不是馬克思想中的那樣統治階級。中國這種地主資本家的造成，完全是中國特殊的情形，他們是官僚資本的結果，馬克思想本不懂得做官也可以發財，因為他是西洋人，西洋的社會裏似乎很少這種現象。所以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之中，竟沒有把做官也可以發財這樣一項生產方法列入，然而在中國這確是幾千年來最重要的現象之一。這種現象證明經濟不是社會唯一的動因，政治有時也可以影響了經濟。在中國，官僚資本的蓄積確是經濟界不平等現象之一，然而這種現象不是用單純的經濟革命所能防止的，它只有從澄清政治的積弊入手，政治方面有了辦法，這種現象自然消滅，若使政治沒有改革，則即使讓共產黨統治了中國，這一班共產黨的黨老

爺們，也依然會變成一個官僚資本的蓄積者，向小民在國家統治的好名詞下重施其剝削手段的。要防止官僚資本的蓄積，只有擴張民權，使人民有監督政治的能力，則弊象始可漸漸防止。但是打倒豪紳的口號一來，把民間的團結力分散了，人民就無力與官僚反抗了。換言之，中國今日的社會組織，既非封建式，也非資本主義式，而是一種東方帝國特有的專制式。產生這種專制式社會的根本原因，不是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而是政治的組織。要救濟人民的痛苦，所需要的仍是政治革命而非經濟革命。

以上是單就共產黨的對內對外主張而言，可以看出他們的主張並不適合於中國的現狀，接受了共產主義也不能拯救了中國。並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完全是蘇俄的工具，共產黨在中國勢力的擴大，即是蘇俄對華勢力的擴大，無論我們主張獨立自主的中國人民決難忍受，而且必引起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進改。中國和十年前的蘇俄不同，既無強大的自衛力，也無蘇俄的地形，並且時代也非歐戰後各國疲敝的情形可比，所以結果難免有招致滅亡的危險。靠蘇俄嗎？蘇俄連一個日

本都不敢得罪，更那能幫助中國與全世界爲敵。即使蘇俄能幫助中國戰勝一切，結果還不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把中國送給蘇聯。所以說來說去，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能依賴共產黨。

解決中國問題不但不能依靠共產黨，而且因爲共產黨的運動反成了中國解放問題的大障礙。中國今日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全國一致團結去外抗強權，其次是怎樣澄清內政，共產黨對外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以致失却國際的同情；對內高唱階級鬭爭的口號，以致分散全民合作的戰線，結果使中國問題更加紛亂，反變成了國家解放的障礙。

在今日要談對外抵抗，不能不對共產黨的問題先有一個適宜的辦法。要征剿嗎？共產黨的國際路線現已漸次打通了，得了蘇俄的軍事經濟後援之後，有什麼澈底消滅的辦法？要和解嗎？共產黨如果真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自然可以鑒於國難的嚴重而暫時放棄階級鬭爭的態度來與其他黨派協力一致對外，但共產黨在思想上既根本不承認民族國家的觀念，在組織上又完全在蘇俄的控制之下，蘇俄決不許在中

國共產黨內自主派比親俄派佔了勢力，陳獨秀的被打倒就是一例。所以對付共產黨根本無絕對完善的辦法。

我以為對付共產黨無絕對完善的辦法，猶如對付日本無絕對完善的辦法一樣，問題的根柢是在中國人自身。如果中國人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確有自立之道，則共產黨與日本都不成問題；如果自身沒有辦法，則不但共產黨和日本的問題成爲極嚴重的問題，就是比這些問題小的問題也無從解決起。所以根本還在中國的自身。

如今單就共產黨的問題來講，我們既然知道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單純政治經濟的問題，而是整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問題，在共產黨所標揭的高遠理想之下，確可以煽動起一部分青年及智識界優秀分子的熱誠信仰來，所以單靠政治的壓迫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須同樣地樹立一個廣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理論上，組織上，行動上，精神上處處要有勝過共產黨的辦法，才能至少抵抗共產黨和蘇俄勢力的進攻。在底下我向全國熱心擁護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權，而反對蘇俄陰謀操縱的愛國國民們，貢獻一個系統的、有效的抵抗共產黨運動的方案。

甲 建設系統的理論

一、蘇俄御用的共產黨以階級立場爲中心，來分化中國全民的戰線，以企圖貫徹吞併中國加入蘇聯的陰謀，我們中國國民爲抵抗這種文化侵略的陰謀起見，必須把思想中心建築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才能和它對抗。

二、共產黨的理論，是打着科學的招牌，我們中國人自衛自救的國家民族觀念，也必須是建築在科學上（我以爲最要緊的是生物學，人類學，社會學），用真的科學來打倒假的科學，一切神學，玄學的觀念早已落伍，決無引用的價值。

三、共產黨有唯物史觀爲理論的中心，我們也必須建設一種正確的史觀，從史的發展上指出國家民族觀念之所以產生，及其未來的趨勢，以堅固國民的愛國心。

四、共產黨以革新爲號召，我們應該知道革新的趨勢是一個國家民族必要的自救方法，我們應該有一種「新國家」的理想，把眼光放在未來，一切迷戀骸骨的復古粹運動，是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大障礙，必須用全力來打倒它。用復古來擁護國族觀念，是一種自殺運動。

五、共產黨以革命爲號召，我們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也必須是革命的，前進的。我們應當要求一個理想化的近代有機體的新國家，在這種觀點上，對於現有的社會組織有全盤革命之必要。

六、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現已日趨沒落，二十世紀的主要潮流，是集團主義的新理想。共產黨祇採取了一半集團主義的理想，已戰勝了自由主義，我們現在應當充分接受集團主義的原則，對於個人主義的意識，一樣要用全力去打倒它。

七、站在集團主義的觀點上，我們應該以國家統制的經濟政策來抵抗階級鬭爭的經濟政策；應該以國家保障人民生活權、工作權的原則，告訴人民，以防止共產黨用搶飯喫的口號來誘惑。

八、共產黨的革命主體建設在無產階級之上，從集團主義的觀點看來，有產無產不是重要的區別，我們應該以有職業民衆來做革命的主體，凡無職業或無正當職業的民衆，上自坐食的不勞而獲的享受者，下至流氓地痞，都是國家社會之蠹，應該

加以嚴重的制裁，應該作爲對內革命的主要目標。應該把一切有正當職業的民衆聯合起來，作革命救國的主體。

乙 建設嚴密紀律的救國組織

一、共產黨發展的主要原因，在其組織之精密與紀律之嚴明，這是一切集團勢力成功的必要條件，並非共產黨獨得之秘。中國人民要圖自救，要抵抗蘇俄及其他野心國家的侵略，必須用全力促成整個國家的組織化，紀律化。在政治方面應促進全國的統一，改造政治的機構，澄清腐化麻木的官僚積弊；在經濟上應充分發展近代工業的組織和管理法，反對小農無治的思想；在教育上應充分應用軍事訓練的原則，把全國國民都軍事化；在文化思想上應建設爲國家服務的集團主義倫理，反對以家族爲中心的家族主義，反對個人自由浪漫的個人主義，更反對獎勵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的階級主義。

二、要照這個標準去改造國家，必須先將一部分已有覺悟的愛國民衆聯合起來，建設一個組織精密、紀律嚴明的核心，從這核心中去樹立新國家的規模，去抵

抗共產黨的侵略。

三、這種組織必須以國家民族觀念及具體的理論主張爲中心，而不以任何個人爲中心。負領導責任的人，應該以身作則，造成公忠體國，綜覆名實，嚴守法紀的風氣。一切私人的利益，親屬的情面，俱應澈底破除。

丙 確定急進澈底的行動原則

一、共產黨養成勢力的又一原因，在它的不妥協態度和激烈偏狹的行動，這種態度誠然可引起大多數中庸分子的不滿，但大多數中庸分子並無實際行動的決心，故滿意與否，無甚關係。最要緊的是將全民族中最有奮鬥力的細胞團結起來，使在國家民族的大目的下爲國奮鬥。凡最有奮鬥性的分子，祇能爲極端澈底的原則所激動，而厭棄中庸調和的態度。故反共的勢力如不能採取急進澈底的態度，則必驅一切急進分子都走到共產黨路上，反變了蘇俄侵華的急先鋒。

二、共產黨以恐怖手段威脅一切中立分子，要抵抗共產黨，必須也採取恐怖威脅的手段，對於共產黨決不能用感化調和的手段，否則必爲共產黨所打倒。

三、共產黨處處採取直接行動，對付共產黨也必須處處採取更高度的直接行動，以恐怖鎮壓恐怖，才能使中立分子安心，不至動搖。

四、對於共產黨的種種活動，絲毫不能客氣，一切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縱使在表面上是極溫和的，其內幕處處蓄有陰謀，故必須決心加以嚴厲制裁。思想自由的原則不適用於共產黨，因為中國是文化落後的國家，對於敵國的文化侵略陰謀，必須有一種文化保護政策來抵抗。

五、在對付共產黨以外的問題，大而國際交涉，小而社會糾紛，也必須處處用快刀斬亂麻的積極精神，喚起麻痺的國魂，養成鬪爭的人生觀，以改造傳統的和平中正的中國舊人生觀。

在理論、組織、行動三方面都有澈底的改造以後，集團鬪爭的新精神自然可以產生出來。有了這種新精神的民族，不但怕共產黨的侵略，就是其他一切強敵也都可以抵抗回去。若沒有培植出這種精神，單靠政治經濟的改革，是不能防止共產黨的進展的，因為共產黨原是一種新宗教，新人生觀，除物質的力量以外還有精神

的力量，要抵抗共產黨，也必須同樣地造成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不能靠金錢收買，不能靠官爵羈縻，只有在系統的理論，嚴密的組織，澈底的行動三種聯合的基礎之上，才能喚起一種精神的共鳴，把全國人心未死的國民，集中在國家民族的大目標之下，爲祖國去作戰，去與一切受外國人豢養的漢奸國賊們作戰。

載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國論月刊一卷四期

獨裁政治之內在的必然矛盾性

馬克思主義者好說什麼「資本主義之內在的必然矛盾」，這個公式是否正確，我在這裏不必加以批評，我却要仿照他們的論調也來提出一個公式，這個公式便是「獨裁政治也有內在的必然矛盾性」。

我所說的「獨裁政治」，是包括一切古往今來施政取決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旨而不取決於大多數民衆的意旨的政治方式而言的。這裏面包括有君主專制，貴族專制，一黨專制，軍閥專制，僭主專制，以及近今的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制，和意德等國的法西斯專制而言。這些政治在形式上、口號上雖然各有不同，但其根本性質是一樣的。所一樣的是施政取決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旨，而不取決於大多數人的意旨；再進一步說，是政權的基礎建築在少數特殊勢力的集團身上，而非建築在大多數民衆身上，民衆雖然對於這個政權不滿意，也除用暴力以外無法轉換這個政權。不過

其中如貴族政治之類，雖然不是民主，但尚非集權於某一個人，故由嚴格的意義說，謂之爲非獨裁也可。

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和意德等國的法西斯獨裁，在名義上似乎是個新奇的東西，其實從歷史上看起來並不新奇。因爲在希臘時代，政治方式中就有僭主專制（Tyranny）一種，現在的斯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其實就是古代希臘之所謂僭主，僭主並不含有暴虐的意義，不過說他們的取得政權是突然的，非法的，與正統的帝王有些不同而已。希臘大哲亞里士多德曾把政治制度的演化分爲四種階段，卽：

1. 貴族政治，
2. 君主專制，
3. 僭主專制，
4. 民主政治。

這四種政治的演化是循環的，週而復始。亞里士多德的這種政治演化論，在十

九世紀是被人反對的，因為那時的政治似乎是向民主政治一條直線上進行，但是就歐戰後的情形看來，似乎又有點開倒車的樣子，因此亞氏的政治循環論又有可注意的價值了。

我們現在先不談人類政治的演化是循環的抑直線的問題，單就民主政治與其他三種專制獨裁的政治比較看看，究竟誰是較進步較穩定的政治？歐戰以前，這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因為那時候人類的政治理想認民主政治為惟一政治的正軌，無人敢加以懷疑。到了歐戰以後，一般人的心思就大不相同。民主政治已被認為落伍的政治方式，而許多好奇的人，心目集中於左右兩極端的兩種獨裁政治。今日全世界的激進分子，分別集中於人民戰線和國民戰線兩大旗幟之下，而居其中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民主主義者），只好附庸於其中之一而苟存。這樣的轉變是否人類政治思想的進步呢？抑或不過是一時的變態呢？這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尤其是在今日中國正徬徨於民主和獨裁路上，舉棋莫定的時候。

我們不反對獨裁政治有種種的長處，如同國策的確定，意志的統一，行政效率

的敏速，政治機密的容易保持等等（以上當然指好的獨裁政治而言）。但是我們也不可以不知道，獨裁政治有其內在的必然矛盾性，因為這些內在的矛盾，就孕育着它未來的必然崩潰性。這種崩潰的趨勢，在國際競爭越是激烈的場合，越容易縮短實現。故獨裁政治不但不是國際競爭的利器，反是促進本國失敗的一種有力的動因。實行獨裁政治的國家，暫時雖然似乎百廢俱舉，有興旺的樣子，也不過如同服壯藥以健身的一樣，藥力一過，反受其害。

獨裁政治有什麼內在的必然的矛盾？我們在底下分別申說申說。

第一，獨裁政治的產生和維持是基於暴力而非基於民意。這話不是說獨裁政治絕對不得民衆的贊同，絕對不得民衆贊同的政治根本就難以出現，故比較長久一點的獨裁政治，其政策自然也必須有獲得人民贊同或使人民獲益之處。不過無論如何，他的取得政權非由於人民的合法擁護，而多少總帶點暴力的性質，最低限度，其維持政權的方法是用暴力而非任人民自由的。目前的獨裁政治國家，如蘇俄、意、德之類，雖然也依然要用徵求民意的的方法以維持政權，但實際上在這種政權之

下，異黨異派既已根本排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種種自由既已大部剝奪，在徵求民意的時候不外用種種威迫利誘的手段去製造民意，縱使表面上採取選舉投票種種形式，實際不過掩耳盜鈴，其政權的基礎仍是建築在暴力上，政權的產生和維持既然依靠暴力，故人民之政見不同者絕無可依和平手續取而代之的途徑。因此與統治勢力政見不同之人民，一部分被屠殺，一部分被收買，其殺不完、買不盡的人，自必被迫而走入秘密革命之途，即以暴力打倒暴力，何時被壓迫人民的暴力養成，獨裁政權就何時崩潰，時間雖有遲早，但其崩潰為必然。因為人民的政見決難強定於一尊，無論怎樣威迫利誘，總有殺不完、買不盡的人。故獨裁政治之孕育反對黨革命的種子，乃為必然的事實，也就是獨裁政治本身內在的必然的矛盾。由此矛盾促進獨裁政治之必然的崩潰。壞獨裁崩潰得快些，好獨裁也不過崩潰得慢些。因為好壞的觀點也是難於統一的，任何好的政治總有人反對。民主政治不怕人民政見的不同，不怕反對黨，因為反對黨可以依和平手續自由競取民意以取得政權。故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時時可以崩潰，而國家不至崩潰；在獨裁政治之下，政府雖

然暫時不至崩潰，而一到崩潰之時，社會秩序必然大亂，國家也許隨之而崩潰。

因爲獨裁政治的內部有這種根本的矛盾，所以自古以來，所有各種形式的獨裁者，無不兢兢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爲務。在平時深居簡出，晝伏夜行，如鼠竊狗盜一般，幾乎無行動的自由，甚至連精神上也沒有一時一刻安寧的。這般獨裁者既然憑藉暴力，將人民應享的自由權一律剝奪，所以他自己也不能享一點自由之快樂，雖然身握大權，與囚犯並沒有什麼兩樣，這是自然界很公允的報應。近年以來，各國獨裁政治的領袖如希特勒、斯達林、墨索里尼、乃至凱末爾、舒尼斯嘎等，無不失去行動坐臥之自由。希特勒每出外，其保護生命安全之法有四：（一）事先不宣布其欲往之地點；（二）專坐飛機；（三）僱用面貌相似之人代替本人；（四）對於常到之處，用最高速度之汽車疾馳而行。墨索里尼每出行，有三百名富有訓練的普通警察和政治警察隊隨時隨地秘密保護。其每日出行之路時常改變，並加以嚴密的警戒。斯達林日常處於克里姆林宮中，非特別大事絕不出外。斯氏與其二子在克里姆林宮下之一小屋居住，由此往其辦公室所有經過的路徑都在其衛隊嚴

重保護之下，就是這樣，還難免發生危險。斯氏的最大親信走狗基羅夫（Kirov）的被刺，就是在這個夾道中發生的。自此以後，凡欲謁見斯氏者，均須經過嚴密的檢查。當其在紅場檢閱軍隊時，參觀者必須領許可證才能入場。凱末爾的衛隊曾經發生暴動，凱氏將其全體槍決。凱氏平常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帶武器的親信六人包圍，另有二十名偵探及多數衛隊防護。這些獨裁者的保護生命方法雖然這樣嚴密，但仍時時有危險的可能。列寧的死是由於被人槍擊受傷所致，在此以前已受過好幾次暗殺。墨索里尼自秉政以來，也被人槍擊過好幾次。斯達林在最近幾乎為暗殺的大陰謀所犧牲。人民對於獨裁者的反抗，不但用這種簡單的暗殺手段，並且還有大規模的革命陰謀，不過在時機未成熟以前，這種革命運動還不能將獨裁者勢力推倒罷了。

第二，獨裁政治因為權力集中的結果，所以不但一般人民對之痛恨到極點，時時有反抗的陰謀，即其勢力集團的本身以內，也潛伏着許多爭奪政權的陰謀分子，伺機而發。故獨裁勢力下之派別之爭遠較民主政治下為殘忍尖銳。德國國社黨在未

得政權以前，已經屢次發生內爭，既取得政權以後，就發生著名的六卅慘變。幾個著名的國社黨領袖在六卅事變中犧牲，希特勒才能保持其領袖的地位。但誰能保此後國社黨內部永久沒有反對希氏的陰謀呢？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執政以後，未曾發生內變，固由於墨索里尼的威望足以服人之故，但墨氏平時對於黨內領袖之稍露頭角者，必設法加以排斥，亦爲其保持權位之一種方法。如航空家巴爾波（Italo Balbo）爲法西斯進軍羅馬時四大領袖之一，歷任全國民團總指揮及航空部長等職，自率意大利航空隊飛渡大西洋訪問美國後，聲譽更遠馳於全世界。因此竟招墨氏之忌，歸國後即被解職。意大利的報紙曾受密令，對於登載巴爾波的姓名每月不得超過一次，遇不得已必須登載時，以利比亞總督的名義代之。墨氏用心之苦可見一端，但誰能保法西斯黨的內部以後再沒有取墨氏地位而代之的野心家呢？至於蘇俄內部的黨爭更是層出不窮，自列寧死後，即發生託洛斯基派與幹部派之大衝突，其後託派又與金諾維夫、加米諾夫等右派合作，而擴大反斯達林的勢力。近年以來，蘇俄內部幾乎年年有大陰謀案發現，無聲無臭死於格白烏暗探手中的反政府派分子，不知有多

少。至今年的大陰謀案，牽涉範圍更廣，甚至共產黨元老如金諾維夫、加米諾夫等都被判處死刑，可想見蘇俄國內之不安了。但是雖然反對派這樣的被屠殺，雖然蘇俄的警探制度和箝制言論制度特別嚴密，誰能保蘇俄今後永沒有反對政府的運動發生呢？獨裁者越是用盡苦心，屠殺異己，被壓倒的異己分子越是痛恨，越要擴大其反抗的勢力，這也是獨裁政治的內在必然矛盾之一。

第三，獨裁政治的存在既以獨裁領袖的本身權力為基礎，人民平時對於獨裁者既無自由選擇之可能，獨裁勢力的集團本身方面，也無一定的繼承法律軌道，故獨裁者在生前無論如何有權，一到死後就必然發生繼承問題。而因為獨裁者多數在生前不願有能夠繼承自己資格的人物存在，故死後非發生繼承之爭不可。歷史上獨裁政治之有軌道的繼承方法不外三途：（一）依君主政治的習慣傳之子孫；（二）由集團內高級領袖互相推選；（三）由於獨裁者自行指定。第（一）法因獨裁政治與君主政治性質不同，傳子不易使部下信服，在今日的新獨裁政治下更難採用此法。且獨裁者的子孫未必具有與獨裁者本身同等的才能與威望，勉強繼承，終必失敗。

如英國克林威爾死後，其子里查即因不克負荷而致演成王政復古之局面。今日各國的獨裁者，除墨索里尼或有傳子或傳婿之私心外，其餘似均未存此望。第（二）法在昔宗教集團多取此制，如羅馬教皇的選舉即由各大主教組織一選舉團體從中互選，回教在最初哈里發的產生亦由長老互選而來，其後不久即變為世襲。現在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組織法西斯大評議會，亦即受羅馬教會的影響。此法就獨裁勢力的本身言，比較最為公允而合理。因為近代的獨裁政治，其勢力的構成是集團的，非僅由一個領袖所能造成。故領袖死後，由高級幹部互相推選，最為合理而易得人悅服。但此法在原則上雖易行，在事實上却有許多困難。因獨裁政治在獨裁者生時絕不願高級幹部中有特殊的人才，更不願高級幹部的組織有左右領袖的權力。故在平時所謂高級幹部組織勢必等於虛設，一旦領袖死後，欲求其有決定國計的大權，實在很難。且獨裁者死後，如果高級幹部中盡屬平庸分子，在選舉繼承人時固然可以減少爭端，但所選出之人既屬平庸，則決無維持獨裁勢力之能力，所謂獨裁政治將變為貴族寡頭政治而最後等於獨裁政治的崩潰。如果高級幹部中有三數野心分子，

則選舉繼承之時，必然要發生爭端，而結果也必促進獨裁勢力之分裂以至崩潰。事實上即使平庸的人，也沒有對繼承問題不起野心的，在古代，回教的獨裁者穆罕默德死後，即發生素尼派與十葉派的爭教統；在今日，蘇俄共產黨的領袖列寧死後，即發生斯達林派與託洛斯基幾派的爭黨權，這都是很顯著的例。其他各國的獨裁者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凱末爾等，其本身都是獨裁勢力的創造人，故暫時無人能與之爭，但一到身後，必然要有兩派或兩派以上的人演互爭繼承的把戲，甚或因此發生內戰，這都是必然的，雖然在法律上有明確規定，也依然難以防止這種暗潮。第（三）法在十六世紀耶穌會的繼承即用由最高領袖指定之法。在中國古代，如堯、舜、禹之傳賢，如墨子教派中鉅子之傳授，乃至袁世凱的金匱石室，都是採用此法。即在民主國家中，如捷克總統馬沙列克博士退休時也曾指定現總統貝奈斯博士為候選人，交由國會選舉。此法自亦不失為繼承方法之一。但我以為此法在民主政治下實行尚易，在獨裁政治下實行較難。因民主政治的領袖對於政權廓然大公，素無自利之心，故如自覺精力不能擔負政治時，即預儲賢才以為後繼，平時養其威望，彰

其才德，使國民心目中有此繼承人物的印象，到選舉時自易選出。獨裁政治則不然，其領袖平日作威作福，一片私心，惟恐有人攘奪其權勢，必不願有繼承自己的人物造成地位。一旦臨死，縱以命令指定，不但無此衆望所歸之人，且領袖死後，其權威僅能欺騙一般民衆而不再能控制有野心的人物，故其指定等於無效，而爭端仍不能免。由此看來，獨裁政治不能解除繼承問題的糾紛，也是獨裁政治內在的必然矛盾之一。

第四，獨裁政治無對外戰爭的能力。近來一般鼓吹獨裁政治的人們所持的最有力的理由，是說獨裁政治便於對外的鬭爭；他們說：在一個敵人環伺，國勢危迫的國家中，需要產生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去統一全民族的精神，整齊全民族的步伐，然後國家才能對外抗爭，這話實是似是而非的話。對外抗爭需要有偉大的領袖領導，這是不錯的，但這領袖必須是以德服人的領袖，而不是以力服人的領袖；即應該是民主的領袖，而非獨裁的領袖。民主的領袖，是由人民心悅誠服而公推出來的，國內的人民既然一致擁護，對外作戰自然有力。獨裁領袖的地位是用暴力陰謀等種種

非法手段攘奪來的，在平日爲保全權位起見，既須屠殺異己，箝制輿論，人心敢怒而不敢言，一遇戰事發生，反對黨中之極端者，自然要利用機會，起而反抗，所以聰明的獨裁者，平時決不製造戰爭，且竭力避免戰爭，到不得已而作戰時，則必於戰前戰中，犧牲其獨裁權力之一部，以緩和反對的空氣。如蘇俄近年以來，雖極力擴充武備，而在對外政策上却極力退讓，以避免戰爭。最近且制定略帶民主性的憲法，以緩和國內人民的反對，這就是聰明的獨裁之一例。蘇俄現政府的放棄世界革命的高調，而改唱集體和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國內的矛盾現象日益劇烈之故。不過獨裁與和平是個不兩立的名詞，聰明的獨裁者雖欲長久保持和平，而事實的矛盾終有迫其不能不放棄和平，冒險加入戰爭的賭博，以爲孤注一擲的投機行動之一日。這因爲任何獨裁政治都是建築在壓迫民衆的基礎之上的，獨裁政治之能維持，全賴假借一種題目，移轉國民的目標，刺激國民的敵愾心，使國民反對的目標向外而不向內，才能暫時麻醉國民的心理，使獨裁政治得以偷偷延長下去。這種目標雖不必一定是對外國，在國內也可製造一種假想的公敵，以移轉國民的視線。如

蘇俄政府之攻擊資產階級，攻擊富農，及德國政府之攻擊猶太人，皆屬此例。但此種對內的攻擊既有違於國族的感情，又易擾亂國家的秩序，且國內一切事實真相比較地容易爲民衆認識，不能長此受政府的麻醉欺騙，故獨裁者如果長是用對內製造目標的方法，勢必使國內人人自危，反促獨裁政治之崩潰。獨裁政治如欲維持其勢力，勢仍必須不斷地製造對外的戰爭，才能緩和國內的反對，因此任何獨裁政治皆與戰爭有不可分解的因緣，獨裁者必須時時製造戰爭的空氣，以轉移國民的目光。從前拿破崙第一完全靠對外戰爭維持他的地位，他的姪子拿破崙第三也想步其後塵，在位二十年中屢興大戰，最後終失敗於戰爭。現在墨索里尼之必須征服阿比西尼亞，希特勒之必須時時鼓吹戰爭的空氣，蘇俄之必須高唱全世界進攻蘇聯，也是爲國內的環境所迫，不得已而然。但獨裁者對於戰爭的投機是許勝不許敗的，不怕百戰百勝，只要偶一失敗，革命立刻便會起來。故無論任何獨裁者，不失敗於和平，必失敗於戰爭，絕無長此保持政權之理，這也是獨裁政治的內在矛盾之一。

以上四端，可以說都是獨裁政治本身必不可免的矛盾，幾乎無法避免。有人

說，獨裁政治如果對內施政能使人民福利或對外戰爭能使國威遠揚，也不至於必倒。這話當然是不錯的。不過我們要知道，在獨裁政治之下，要對外作戰就不能不對內搜刮，對內搜刮就必不能使人民福利。若對內不搜刮，則對外無以作戰，又不能有戰勝的把握。況獨裁政治之下，用人以與領袖的關係爲標準，而不以人才爲標準，國內常有特殊的階級存在，政治既難真正清明，對外戰爭也難真有力量，這又是獨裁政治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兩個矛盾。

天下事沒有不含矛盾的，就政治上說，民主政治也有其本身的矛盾，不獨獨裁政治爲然。但民主政治的支持力量分散於全民衆，至少大多數民衆身上，其重心可以隨時更動，故雖有矛盾而不至崩潰。獨裁政治的重心集中於一點，如將一座塔倒置於地，縱使暫時可以保持不倒，終有必倒之一日，不如將塔正立於地，塔尖在上，塔座在下，重心得其平衡，傾覆的機會比較減少些。

現在的時代是一個過渡的時代，人心不安，故左右兩極端勢力得以發展。今日世界各國皆有人民陣線與國民陣線之分，幾幾乎不歸於楊，便歸於墨。這一次西班牙

牙的內亂，便是充分表現這種兩極端勢力的尖銳衝突。所以留心時事的人，多揣想到未來的世界大戰也許就是這兩種陣線的血戰，而競想來判斷最後的勝利究竟要落到那一個陣線之手。我以為在未來的戰爭中，兩種陣線的對壘自然要佔一個重要的成分，但結果却決不是這一個陣線打倒了那個陣線，而必然是兩種陣線的兩敗俱傷，民主政治的重新光復。爲什麼呢？因爲這兩種陣線雖然在表面上似乎極不相容，而在本質上實際完全是一個東西，實際上都不過是一種獨裁政治。紅的共產黨，黑的法西斯，褐的國社黨，在顏色上雖然各不相同，在實質上全是一套東西。他們都是以暴力的方法代替民主的方法維持政權，都有一個強有力的不可更易的政治中心，都主張個人的權利要爲集團的權利犧牲，都要屠殺異己，都要箝制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都要施行極端的干涉主義，都把秘密偵探當作維持政權的有力工具，至於反對猶太人與反對資本家，擁護馬克思與擁護希特勒，主張經濟史觀與主張種族史觀，那不過是政治上方便的假面具，與本質無甚出入。

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獨裁政治，無論其表面上的口號如何不同，既屬同一的獨

裁政治，即均含有獨裁政治內在的必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即是其最後崩潰的命運已經預含在本身中了。世界大戰如果不起，這些獨裁政治尙可苟且多延幾年壽命，大戰一起，必然要促進它們的總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俄、德、奧三大帝國的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就是俄、德、意三大獨裁國家的覆亡。故我們今日應當把眼光放遠些，不要震驚於什麼國民陣線、人民陣線的一時反動潮流而見異思遷，在中國今日尤其不需要在這兩條陣線之中選路走，中國應該自有中國的路線，也就是未來政治常軌所必趨的全民陣線，中國要想長治久安，只有避免走任何獨裁政治的快意一時的道路，而早日確立民主政治的正常軌道。

一個有機體的國族集團，必須要使全體細胞都富有活力，才能完成有機的使命。獨裁政治的結果使集團內的一部分優秀細胞受摧殘而滅亡，使其他一部分優秀細胞享特權而腐化，這都是自殺的政策。獨裁主義者雖然常引國家有機論爲制度的辯護，但真正的有機論者，應當常是反對任何方式的獨裁政治而擁護民主政治的。

載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上海國論月刊二卷三期

民主的力量建設在那些人身上？

「民主」，在十年以前是一個落伍的、反動的名詞，在今日又成了一般時髦的口頭禪了。國民黨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本來應該是擁護徹底的民權主義的，中間雖因受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暗示，有些人不免動搖對民主政治的信仰，但一個忠實的國民黨員，假使對於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講演曾經仔細讀過一遍以後，必不會認國民黨是一個應該主張專制獨裁的黨，所謂訓政時期，始終不過是向着憲政走的一個過渡時期，在國民黨的理論上，始終沒有抹煞民主憲政的證據，如果有之，那就是違反國民黨的原始理論，也就是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一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決不能忍受的。

這種觀點不但為忠實的國民黨黨員所認識，最近國民黨的各領袖似乎也都一致承認此點了。如汪精衛先生自歐洲回來以後的演說，就是證據。所以民主政治的理

想，在最近國民黨的立場看來，是並不加以反對的。

共產黨從前是個反對民主政治最力的黨，他們認民主政治爲資產階級的政治，不應加以擁護。無產階級要求的是獨裁，而不是憲政。蘇俄政府便根據此種理想而建立。但是到了最近，蘇俄因爲受法西斯國家的逼迫，自願孤立可危，不得不設法博取英、法等民主國家的歡心，因此在國內初次創設了號稱民主的憲法，在國外則聯合左派，製造人民陣線，以擁護民主政治爲口號。固然蘇俄這種擁護民主的憲法和運動是別有用心，事實上斯達林政府仍然是一個極端暴虐的獨裁政府，就拿屠殺反政府派領袖一事看來，連法西斯國家也不能再比他們暴虐，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在理論上終已對民主主義讓步，而以自稱爲民主政治爲榮。因此之故，中國的親俄派，連共產黨以及一切所謂左派包括在內，也都跟着改變了口號，而也靦顏擁護起民主政治來了。

現在世界上反對民主政治的就祇剩了法西斯國家，但法西斯主義果然是根本反對民主政治的嗎？事實上也並不盡然。我們記得墨索里尼有一次演說就曾明白地

說，法西斯主義才是最進步的眞正民主主義，可見法西斯主義在理論上也並沒有根本否認民主主義。並且在事實上，現代法西斯的代表國家意大利和德意志，他們領袖之取得政權，都是由多數民衆的擁護而來的，即在今日兩國之中也並未取消議會，並且每有大事必訴之於國民的總投票，希特勒尤其善於利用此點。固然在法西斯國家中的人民投票難免受種種威迫利誘的干涉，不能眞正表現民意，但是在蘇俄的人民投票不是也一樣的受威迫利誘嗎？甚至即最標準的民主國家如英、法、美三國，當選舉投票的時候，威迫或者可免，而利誘不也是照樣發生，不過僅有程度之差嗎？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上的曲線擱過暫時不提，單就理論方面來看，我們也不能發現法西斯主義是根本否認民主政治的。

由此看來，民主政治至少在理論上並未被反動的赤色、黑色、褐色專制勢力打倒，並且自蘇俄轉向以來，民主政治更有蒸蒸日上之勢了。中國處在這個全世界民主政治復興的大潮流中，也跟着復興了對於民主政治的信仰，促進民主政治的早日實現，乃是必然的趨勢。

不過，口號與內容往往是兩件事，提到民主政治的口號，也許大家無分左右，一齊贊成；提到民主政治的內容是些什麼？就很難說了。因為大家心目中對於民主政治的觀念是很有許多不同的，譬如說，民主政治必須有個憲法，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憲法？美國式的憲法呢？法國式的憲法呢？威瑪德國式的憲法呢？蘇維埃俄國式的憲法呢？這就人人意見不同了。又如民主政治當然是以人民爲主人翁，但誰是真正的人民？依據德國社黨的理想，只有純粹本族的人才算公民；依據蘇俄共產黨的理想，只有農工，甚至只有無產階級的工人才算公民；就是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中，雖然普通選舉逐漸施行，但財產納稅資格的限制，或者說財產的潛勢力，依舊不能完全避免，所以在名義上雖然全民都是平等的，然而一到實行起來，就不能不仍然把參政之權永遠集中到少數人手裏。

這第二個問題比頭一個憲法的問題還重要，因為我們如果主張民主，而不去注意這支持民主的力量是些什麼人，那麼民主政治縱使實行，也不過是空文的政治，依舊難免蹈過去二十年的覆轍。

民主的力量建設在那些人身上？

我認爲這個問題，是與中國社會的本質問題有關的，必須了解中國今日社會是在那一種形態上？中國今日社會的大問題在那裏？才可以明白中國的民主力量是應該建設在那一些人身上？同時也可以曉得中國民主政治的敵人是什麼人？

中國今日既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農工大衆是沒有勢力的，資產階級也同樣的沒有勢力。今日支配中國上層政治的，是有槍階級和依附有槍階級爲生的官僚、政客、以及保護政權的軍隊、警察、憲兵等，這一團人構成了中國的統治勢力。至於在縣村中支配地方的下層政治的，則是當地的鄉紳、地主。在通商大埠之中，資產階級的勢力似有萌芽之勢，尤其銀行家比較的對於中國政治逐漸發生關係，然而事實上，中國是個次殖民地的國家，所謂民族的資產階級很不容易獨立形成一個勢力，說他們可以完全左右政治，似乎爲時尚早。中國今日的資產勢力的代表，只有買辦階級，他們也只能作外國人經濟侵略的附庸，對於中國政治可以發生一部分影響，然而也不能說有左右政治的大勢力。

由此看來，中國今日的社會結構和歐美等工業發達的國家完全不同。歐美等工

業先進國，軍閥、官僚、乃至貴族的勢力早已消滅，地方上鄉紳的勢力也已消滅，地主階級在有些國家中雖然仍有勢力，但左右政治的時代也大半過去了。歐美今日支配政治社會的大勢力是資產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而經濟上需要民主的保護者則為小資產階級、薪俸階級、勞工及農民。在他們的國家中，民主主義的運動不是政治的，而是經濟的，所以社會主義成為時代的要求。

在中國就完全不是這樣，中國今日的民主運動，其性質仍然是政治的較經濟的為多。中國今日資產階級既然尚未形成，資本的獨占更談不到，所以有些在外國非常困難解決的問題，如煤礦國有，交通國有，電力國有等問題，在中國並不成什麼大問題。中國今日實行工業的社會化真是如反手之易，因為中國本來沒有工業資本家，一切生產事業尚未發達，在這一方面只有預防的問題，而沒有須用死力鬭爭的問題。

土地國有問題比較難些，因為中國今日的地主尚有許多勢力，但是地主的形成大半仍是靠官僚積蓄而成功，並非靠土地經營而成功，所以其性質仍是政治的而非

經濟的，只要政治有了變化，這些地主們自身並不能有絕對反抗的勢力。事實上現在農村的土地，有一半是屬於在都市中做官或營其他職業的人手裏，他們之保有土地，僅是爲了萬一的退步，以及傳統的置產心理，而並非爲了實際上生活的依靠。在目前苛捐雜稅的政治剝削之下，土地對於他們是一種負擔而非一種權利，所以只要政治上有相當的辦法，要他們讓出土地歸於農有或國有，也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由此看來，中國今日社會的大問題並非是經濟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並非是一件很難的事，無論社會主義是否實行，都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因爲中國今日最大的痛苦仍在政治的不民主化，即專就經濟方面來看，中國今日社會普遍的窮困，並不是由於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而實在是政治不良所產生，若不從政治改造入手，則中國的經濟問題也無從解決。

說到政治的改造，自然是怎樣促成民主化的問題。一說到民主化，我們就感覺到是非常困難的，不似社會化那樣容易實行。因爲民主化就是要和前述的那些構成統治中國的上層勢力分政權，這些統治者的獨占政權猶如歐美資本家之獨占經濟一

樣，要他們自動退讓出來，談何容易。所以今日在中國談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麼實際的障礙，然而要談到民主主義，所遇的實際困難就很多了。

從歐美過去民主運動的歷史看來，民權的獲得不外兩種方式：一種是由統治者自動覺悟而讓出政權，一種是由民衆起而自行爭奪政權。由統治者退讓是一件理想的事，事實上很少得見到的，就連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由民衆幾次爭鬪所促成，而且事實上還不澈底，以致成爲今日軍閥反動的局面。其他如英、美、法、德等國，民權爭鬪的運動更指不勝屈。民衆若不起而要求民主，民主如何會自己產生出來？況且中國今日是一個地方割據的局面，縱使中央的統治勢力能夠尊重民權，也難保全國都能尊重，所以民主運動在中國今日依然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要民衆自行起來爭權，所需要的是民衆的團結力量，民衆若不團結，則自行分裂的結果，必難免各引實力以自重，反延長專制勢力的運命，中國今日不幸即陷於此境。

造成此種民衆分裂的主要負責者，實爲馬克思主義派的階級鬪爭理論。階級鬪

爭的理論，本身是否合理，姑且不論，但就其理論之性質看，純然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是適應於歐美工業革命後的社會，而不適應於中國工業革命尚未發達，資產階級尚未構成的社會。中國今日的剝削者，並非獨占的和自由競爭的資產階級，而是獨占的和自由競爭的有槍階級。資產階級的勢力是生產工具和財權的獨占，所以歐美的社會運動是要求生產工具和財權的公有；有槍階級的勢力是槍桿和政權的獨占，所以中國今日的問題應當是政權的民主化和軍權的國家化，兩者目標決不相同。從另一方面看來，在歐美被剝削者是工人，農人，以及小資產階級，薪俸階級等，在中國，則被剝削者不但此種人，即地主資本家也在其內。馬克思主義者不知此種事實的不同，強欲以歐美的方案施之於中國，因此在他們的運動之下，獎勵農工和資本家地主的互鬪，甚至於工人和農人的互鬪，促成了民衆陣營的分裂，反之，他們却甘心受統治勢力的驅使，幫助統治勢力實行社會化的公有國有政策，在目前政治機構之下，國有公有的社會化運動適足以爲統治者造成剝削民衆的口實。從前的統治者尚有畏於民衆，不敢肆行搜刮，現在則藉口於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不妨

盡量搜刮起來了。結果不但政治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即連經濟權也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民衆只好永遠做奴隸而不能翻身了。國家社會主義誠然是個好的理想，但是必須與民主機構的完成相輔爲用，如果在非民主的狀態下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結果只能造成官僚社會主義，使政治權的獨占者一變而兼握獨占的經濟支配權，於民衆有百害而無一利。

天下沒有能治百病的藥方，只有對症就是良藥。今日中國的病不是資本家和地主，而是有槍階級，要解放民衆的痛苦，對症的藥方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的成功須要民衆有團結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能夠表現出來。用革命的方式表現出來是國家的不幸，我們並不希望，我們所希望的是和平的鬭爭，能夠表現和平鬭爭力量的，莫過於使民衆有選舉權，而且有一個議會機關使民衆的力量能夠團結表現出來。李璜先生在論「和平統一之路」一文中，主張迅速恢復各省的省議會，各縣的縣議會，使民衆勢力有所憑藉，地方軍閥知所顧忌，實在是適時的救國之策。

國民黨是一個信仰民權主義的政黨，中山先生的遺教是要喚起民衆，現在在國

民黨的領導之下，武力統一既不可行，而統一又爲迫切的需要，則舍恢復各級議會，喚起民衆力量，以擁護統一政府；減少各地軍閥的剝削外，別無其他方法。特別是各省的省議會應當迅速恢復，因爲單靠一個中央的國民大會是不夠的，地方民衆所受的痛苦更百倍於通都大邑，不給他們一個表現意見的機會是不合於公道和正義的，並且這種民意的表現對於中央政府是極端有利的。

反對地方議會的最大理由，不外說這種議會只能選出地主豪紳的代表，而不能代表真正的勞農大衆的利益。這話誠然有一部分是事實。但是我們試問農工大衆的利益怎樣才可以獲得？在目前的政治之下能夠實現嗎？馬克思派黨徒的理想是把軍閥官僚和地主豪紳一齊踢開，實現社會革命。但是這種理想在實際上已屢次證明失敗了，因爲這種理想的達到必須先有一個已經發達的無產階級作主體，無產階級是由工業革命的結果造成的，中國今日工業革命尙未發展，全國的產業工人總數不過佔總人口百分之二三，不但爲了這少數工人的利益而抹煞其他各級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卽單就勢力來論，也不能構成大的單位。至於農民誠然較多，但農民受地理

的限制根本即難以團結成廣大的勢力，同時又因生活和智識的關係無力過問政治。今日若欲以農民爲民主的唯一基礎，勢必先開化農民，教育農民，否則便如共產黨之強姦農民，嗾使流氓土棍自稱農民的代表。前者是緩不濟急，後者縱使成功，也只是流氓土棍的成功，真正的農民恐怕比在地主豪紳之下所受的壓迫還多。

單純就農工的立場說來，要爭取本身的利益，必須希望對面的敵人勢力愈小愈好。在現在情形之下，農工的利益掌握在許多較高大的有槍階級手裏，農工永無翻身的機會，只有藉民主的力量使多數地主豪紳代替少數軍人握政，農工才慢慢可以出頭。因爲地主豪紳固然也是和農工利益有衝突的，但是這些人一則無槍桿，遇事不能不比較講理講法些，二則勢力分散，沒有統一壓迫的力量。在他們的統治之下，農工總比較有出頭的希望。

再就全民的利益來看，民衆要和統治者爭民權，本身必須有一種組織，尤其是不能不有少數人做民衆的領導。社會扁平化的理想，是不合於事實的，即在蘇俄國家之內，從共產黨的最高幹部起，到最下層的不熟練工人和農人，也可以分作幾十

等。所以領袖的產生乃是必然的。在今日民主政治的運動之下，地主豪紳天然是普通農工的領導。因為他們比較有錢，有勢，有智識，有槍階級可以任意槍斃農工，但槍斃一個地主豪紳以及資產者究竟總得有所顧忌，所以將地主豪紳拉到民衆的陣營，乃是爲爭取民權必要的策略。不幸一般馬克思主義者不了解這種策略的必要，硬要將歐美對君主貴族鬪爭成功後的第二、三階段的鬪爭原則拉到尙需要第一階段鬪爭時期的中國來應用，以致分裂民主運動的陣線，迫使地主豪紳投到統治者的陣營裏去，助桀爲虐，中國民主運動的頓挫，他們不能不負大部分責任。他們的理論是說地主豪紳天然是統治階級的擁護者，其實這是感情之論，而非事實之論。明明現在地主豪紳的利益是一樣受着軍閥的剝削，他們要求減免苛捐雜稅之心比一般農工還要迫切些，若不是左傾的公式主義者硬要逼迫他們沒有生路，甚至幫助軍閥去摧殘這些人，何至於使他們與統治者勾通一氣呢？

歷來民主運動的進展，有若干階段，真正熱心民主運動的人，對於這種階段的進展程序不能不加以認識。歷來民主運動的進展可以分作左列的幾個階段，即：

第一階段 鬭爭的對象是君主專制勢力，鬭爭的主體是貴族、地主、紳士、資
本家、小商人、農人、工人的聯合戰線。

第二階段 這時候君主專制勢力已被打倒，然後資本人、小商人、工人、農人
才聯合起來向貴族、地主爭平等權。

第三階段 貴族地主的勢力減削以後，資產階級取得獨占權，於是小資產階級
和農工聯合而爭取平等權。

第四階段 尙未到來，如以蘇俄爲例，大約是資產階級被打倒以後，工人取得
獨占權，而農民利益仍在被壓迫，於是農人起而向工人要求平等權。

這四個階段的劃分並非我們嚮壁虛造，是歷史上明白的事實。以英國爲例最易
證明。如英國從十三世紀的大憲章運動起，就是貴族、地主、豪紳領導全體民衆向
國王爭民權的第一階段，直到一八六八年的革命才算成功。一八六八年以後，國王
已無權，政權爲貴族地主所把持，於是其他民衆才聯合向貴族地主要求平等。一八
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運動，就是第二階段的民主運動，直到一八六七年才大部成

民主的力量建設在那些人身上？

功。

現在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第三階段的民主運動，即貴族地主已經失勢，政權落於資產階級手裏，工人階級領導其餘民衆起來爭平等權。至於蘇俄的農民反抗工人專制的屢次被屠殺，則是屬於第四階段的。

我們並不是說這四個階段是必須絕對依次經過的，如法國大革命之同時反對國王和貴族，俄國大革命之同時反對國王、貴族、和地主、資產階級，都是將幾個階段并作一次爆發的。但這都是非常例子，必須客觀的形勢造成這種條件才行，這種條件是很難遇到的。況且躡等前進的運動往往被實際的事實仍然扭轉過來，法國打倒了專制的布爾奔王朝，又產生一個更專制的拿破崙王朝，俄國打倒了羅曼諾夫王朝及貴族地主的獨裁，又產生了斯達林和共產黨人的更殘酷的獨裁。今日的蘇俄共產黨人依然是一種新貴族，集體農場就是大地主的化身，農民在集體農場中當佃農和從前替大地主當佃奴，一樣是受壓迫而得不到多少利益。可見社會是一個客觀實在的東西，憑少數人的理想很難扭天而行的。

中國今日雖無國王貴族，但每一個地方軍閥就是一個實際的皇帝，地主豪紳就是貴族，中國今日的民主運動依然在第一階段，地主豪紳應該和其他民衆聯合起來，爭取第一階段的民權，在這個意義之下，各級議會特別是省議會迅速恢復的必要。

本文並不是替地主豪紳要求權利，因為作者既非地主，亦非豪紳，不過舉最極端的例以證明民主統一戰線之必要，而階級鬥爭論之不合國情罷了。我們要知道社會上的階級若依實際現象分起來，決非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我們不能說地主、紳士、大資產者和農人、工人之外再無其他階級。舉例來說，如小商人、薪俸生活者、工廠經理和高等僱員、自由職業者、宗教師、以及在家庭中的婦女，這些人合起來要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即將家庭婦女除外不論，其餘的人，除了農民以外，恐怕要佔全國人口的第二位。對於這些人的利益，我們當然不能置之不理，而專說產業工人的利益。特別是小商人的地位，在今日工業革命未發達的中國，其重要僅次於農民。我們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不能不注意保護這些人的利

民主的力量建設在那些人身上？

益。而各級議會的設立，正是給這些人以一個保障自身利益的機會。

爲貫徹第一階段的民主運動目的，並預防第二、三、四等階段的民主運動發生的原因，使真正民主早日實現起見，我們不妨在各級議會的選舉法中加以注意，使議會的代表能夠真正適合各職業人口的比例，不至專爲地主紳士所壟斷，如：

- 一、實行普通選舉法，撤廢財產等限制。
- 二、兼用職業選舉原則，使各職業者自行產出代表。
- 三、依各職業人口的比例，制定代表數額，分別選舉，並嚴禁冒充。
- 四、嚴禁現役軍人及官吏充當代表。
- 五、嚴禁指派及賄賂之選舉。

以上種種，當由立法家去仔細立法，不必多贅。總之，我們的結論是：爲求民主主義的早日成功起見，各級議會實有早日一體成立的必要。除國議會之外，省議會及縣議會尤所必要。信仰民權主義的國民黨，如想使和平統一早日實行，這種地方民意的集中表現機關，尤應特別加以贊助，使其早日實現。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載國論月刊二卷八期）

人民陣線乎？國民陣線乎？

近年來歐洲有所謂「人民陣線」與「國民陣線」的對立，此種對立運動大約發起於法國，而逐漸傳佈於全歐洲各國，自西班牙內戰發生以來，這兩種陣線的對立形勢更爲顯著。按法國自歐戰後至魯爾問題發生以來，政黨間即有「左派聯合」與「國民聯合」兩種運動的對立，現在的兩種陣線形勢也不過把舊日政黨的分野擴張到民衆方面，且手段更趨激烈，態度更爲尖銳罷了。不過此種對立的形勢由法國一國而擴張到全歐洲，甚至連我們的東隣日本也有此兩種陣線的醞釀和運動，却爲始創者所不及料罷了。

中國是向來以模倣外國人爲榮的，外國有共產黨，中國也有共產黨；外國有法西斯主義，中國也照樣來一套法西斯；現在外國既有什麼人民陣線和國民陣線，中國自然不免也要照樣來鈔一回把戲試試，因此也就難免有人要把這個問題來當作一

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了。

從名義上看來，無論人民陣線也好，國民陣線也好，都是好東西，因為「人民」「國民」都是好名稱，都能夠吸引一部分人的同情。不過在政治上名詞是一件事，實際又是一件事，我們不要單看了名詞而忘記了名詞背後隱藏着的實際。

打開了天窗說亮話，所謂人民陣線，其實不過就是共產黨的工具；所謂國民陣線，其實也就是法西斯黨的化身。但既稱為陣線，必然是各黨聯合構成的，而不是任何一黨所能夠單獨支配，不過在實際上，聯合陣線的構成，必有主力，在平常時代，態度愈和緩的愈能得大家的同情，故陣線的主力恒在比較中和派方面；但到了鬭爭開始以後，則態度愈激進、組織愈嚴密者，愈能把握到領導的權力，故結果極端派必代調和派而得勢。兩種陣線的構成既然都為的是對敵人鬭爭而設，故事實上必然日趨激化，始能維持本陣營的鞏固而免為敵人所壓倒，故極端派結果必逐漸壓倒調和派而取得最後的領導權，乃為陣線本身發展上必然的趨勢。西班牙這次的內戰便充分表現這種趨勢，尤以政府派方面的逐漸極端左傾，更明顯地表示這種事實。

因此縱使在目前兩種陣線之中，極端派未必均能得勢，但其結果必然如此。況法西斯背後有德意兩國的整個國家爲後援，共產黨背後也有蘇俄的整個國家爲後援，比較其他各黨在競爭中已有許多佔便宜的地方了。

我們假定把這兩種陣線的對立，視爲共產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從另一意義看來，也就是蘇俄勢力對德意勢力的鬭爭，其他各種黨派勢力不過依附其間，各個民族國家不過供這兩種勢力的試驗犧牲。假定承認這個前提，我們再看兩種陣線衝突的結果和中國對之應取的態度。

我們應當知道，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現在雖然是生死不兩立的對頭冤家，但從另一意義看來，却也是一線的發展。假如用辯證法的觀點來說，也就是依據「對立物之統一及鬭爭」的法則而產生的。辯證法承認凡物都有矛盾，在運動中由矛盾而發生鬭爭，以促進本身的進展。依據這個理論，辯證法者承認共產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這個話當然是有一部分道理。假如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能夠將資本集中的現象預防住，則勞資對立的現象不至極端化，社會主義乃至共產

主義也許不會有如此的發展。因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而引起共產黨的反抗，這可以承認是合於辯證法理論的一種發展。但一切左傾朋友們講到此處就不肯再往下講，他們承認資本主義的矛盾產生共產主義，但他們不承認共產主義本身也有矛盾，也能引起他種對立的發展，似乎社會進化一到共產主義的階段就會完全靜止，失去了運動的性質，而更絕無矛盾的一樣。這種看法無異於自己否定了辯證法的原理，而承認社會進化有終止之一日，這是宗教家的態度，不是學者的態度。在真正辯證法的立場看起來，共產主義既是由資本主義的矛盾產生的，其本身也必依據辯證法的法則而發現新的矛盾，由此矛盾產生新的否定，引起新的對立的鬭爭。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由共產主義本身的矛盾而產生的對立的鬭爭。我們即使不採用辯證法的觀點，單用物理學上的機械法則來看，也應當知道凡一種運動過乎「中」時必引起其他相反的運動。當初共產主義的革命本是對舊社會的不平而發生的，但當其革命之際，不能本公道和「中」的原則，使各種勢力平均發展，反以暴亂的手段任意殘殺壓制，始引起本來可以同情者

的反感，而發生法西斯的反動。法西斯在組織上、運動上、鬭爭方法上，無一不模倣着共產主義，但是却和共產主義成爲生死冤家，這就是充分表現了辯證法上由內在的矛盾而產生對立鬭爭的發展法則。即以我們中國過去的情形而論，若不是因爲武漢政府時代共產黨的任意屠殺和高壓，何至引起國民和軍人的反感而致有「馬日事變」乃至「清黨運動」發生？所以無論我們贊同法西斯也好，咒罵法西斯也好，總而言之，沒有共產黨產生不了法西斯，正如沒有資本主義也產生不了共產黨一樣。所以說它們的發展是一線的，也就是辯證法發展的過程中所必然要產生的，一切相信辯證法原理的朋友們，應當在此反省一下。

自有法西斯出現，共產黨便遇到了生死的對頭。從前資本主義的黨派一碰到共產黨就要失敗，現在共產黨一碰到法西斯也就非失敗不可。德、意、葡等國，固其先例，卽最近西班牙內戰的發展也可證明，用中國俗話說起來，這就叫作「一物降一物」。共產黨雖然狠毒，但碰到了法西斯就束手無策，因爲法西斯的出現就是由於共產主義的必然矛盾性而產生的。

人民陣線乎？國民陣線乎？

我們現在不是捧法西斯，因為法西斯本身是個窮凶極惡的怪物，誰也知道，但反對法西斯不能靠着共產黨，更不能靠着共產黨所製造的人民陣線之類。這因爲一、在實力上共產黨不是法西斯的對手，二、在事實上共產黨之窮凶極惡也決不下於法西斯。關於第一點，不必多說，有事實可以證明。關於第二點，法西斯是眞小人，共產黨是僞君子，平心而論，眞小人之惡還不如僞君子，因爲眞小人實行侵略，是明目張膽昌言不諱，其行爲雖可惡，猶不失爲坦白。僞君子則一面裝上和乎慈善的假面具，一面却擇肥而噬。從前的共產黨對於鼓動世界革命、武力鬭爭是昌言無忌的，近來因爲屢遭失敗，乃一變態度，扭扭捏捏，裝成和平的面目，想利用人民陣線的工具以欺騙一般無知無識的朋友；他們製造出一種理由，說人民陣線是和平的陣線，是民主的陣線，愛護和平與民主的人都應該加入這個陣線。這話只可以欺騙一部分以耳代目的人，而不能欺騙稍有常識的朋友。過去共產黨在各國用種種陰謀詭計鼓動內戰的事實，縱然人們也許忘記了，試問在今日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之下，大舉屠殺了多少人？因內戰而犧牲了多少人？再看中國的共匪屠殺了

多少人？這算是主張和平嗎？至於民主政治更根本談不到，今日的蘇俄仍和法西斯國家一樣是個人獨裁，所謂新憲法不過是一種欺騙民衆的工具；西班牙的人民政府其專橫的態度也不下於反對方面，試問民主的精神又何在？因此在事實上，所謂人民陣線既非和平，又非民主，依然和國民陣線是一樣的侵略和獨裁，不過後者猶不失爲坦白無忌的真小人，而前者則竟成爲扭扭捏捏裝模作樣的偽君子罷了。

中國今日所重在舉國一致對外，應該以全民救國的陣線代替階級互殘的陣線，所以無論是人民陣線或國民陣線，在今日中國都用不着。鑒於西班牙內戰的殘酷事實，我們更應該預先打銷這兩種不祥的名詞，把全國愛國家、愛獨立、愛自由的人民統一於一條戰線之下，但親日、親俄以及一切依附任何帝國主義的漢奸國賊却必須除外。

作於民國二十六年

對於全民救國聯合陣線的意見

國難嚴重日迫一日，人人都感覺到有全國一致團結禦侮的必要，因此全民救國聯合陣線的問題就應時而起。我對於這個口號是根本贊成的，因為「全民」是對以何階級、任何黨派、任何特殊勢力為中心的畸形組織而言的，既談「全民」，便不許再分階級、黨派……之見；「救國」是對一切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反國家主義、乃至一切親日、親俄……的各色漢奸理論而言的，既談「救國」，便不許再承認一切分解國家、消滅國家的運動，再容許任何漢奸的活動，這是我對於全民救國陣線的一個根本認識。

根據這個認識，我以為凡構成全民救國聯合陣線的分子最低限度必須有以下幾點共同的認識：

一、必須承認民族國家的利益至少在目前要高於一切階級、黨派……的利益。

二、建設這個陣線的動機既在一致對外，其目標自當專限於對外，一切對內易陷糾紛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必須以互讓的精神暫時擱置不談，否則意見難獲統一，陣線無從構成。

三、要做到真正全民一致的團結救國，必須依主張公道的原理，使全國各種力量獲得均衡的發展，此種均衡的勢力，非在民主政治軌道之下不能實現，故在全民救國聯合陣線中雖對於一切政治上枝節問題理應避免，但對於民主的原則必須根本承認，否則全民陣線即無從構成。

四、全民救國陣線必須杜絕一切漢奸之加入，共產黨受蘇俄豢養指揮，承認分裂中國領土的外蒙獨立運動，與受日本豢養指揮承認滿洲獨立之親日漢奸立場毫無二致。若許共產黨加入聯合陣線，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與救國之目的根本相違。

五、或謂共產黨現已放棄「世界革命」，承認民族利益，似不妨予以寬容。不知共產黨來言行不一致，此種陰謀，對於過去共產黨在中國屠殺異己之歷史稍有認

識者，豈能相信？最低限度，如許共產黨加入，必須共產黨在其勢力範圍以內先開放一切自由，容許異己活動，否則其本身即無誠意與他人合作，何能使他人相信？以上五點如辦不到，則全民救國的聯合陣線的問題就無從談起。

作於民國二十六年

保衛民主政治的堡壘——捷克

國社主義的日耳曼人，自合併奧國以後，陰謀分裂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國，已非一日。最近因捷克選舉的問題，引起了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衝突，致有打死日耳曼人二名之事發生，歐洲大戰已迫在眉睫，如果張伯倫的調停失敗，則全歐立即陷入戰爭漩渦，前途之悲慘，比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恐怕還要更甚十倍。

我們這被強權侵略的中國人，在血戰抗敵之餘，對於中歐和我們同一命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不禁寄以深切的同情。惟有我們中國人才深切感到捷克民族在強敵侵凌下的悲哀義憤之情，日耳曼人二名之被殺，令我們憶起八二三前夕上海虹橋機場的事件，更有無限的同感。我們謹以中華國民的資格，對捷克國民的外抗強權精神，寄以最偉大的敬意。

我們不僅以同樣被壓迫的弱小國民的心情來同情捷克的不幸，我們還願意以愛

好民主自由的精神，來慶祝捷克的勝利。

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個對我們遠東的中國人比較生疏的國家，實際上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模範民主國家。在民主政治被法西斯和布爾什維克左右兩大專制勢力夾攻的今日，捷克是民主政治砥柱中流的堡壘，捷克的勝敗存亡，不僅關於中歐的大局，並且也關於民主主義的生死存亡，我們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應該一致為捷克祝福。

過去愛好民主的人，雖把西班牙的內戰認為是民主陣線與專制陣線之爭，實際上西班牙的政府還不配稱民主，馬德里政府在赤色勢力支配之下，屠殺反對黨，虐待民衆，其專制暴虐並不下於法西斯魔鬼。赤色的馬德里政府和黑色褐色的佛朗哥政府，同樣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我們並沒有必須對某一方面特別寄以同情的理由。至於號稱已經民主憲法化的蘇聯，實際上更不過是一個斯達林的新沙皇帝國，其專制殘暴的程度，比希特勒還有過之，這從幾次黨案和無數農民學生的大量被屠殺的事件看來，可以證明其沒有一點民主的態度。

就是現在世界上幾個比較民主的國家，也沒有一個能如捷克的真正民主精神。英國是貴族的民主，美國是富豪的民主，法國是政客的民主，都還去真正民主的理想尚遠。過去瑞士是一個理想的模範民主國，但自歐戰以來，瑞士墮入了幾個保守派紳士政黨的反動政治家之手，也失去了許多民主的精神。真正的模範民主國精神，已轉移到波希米亞來了。

捷克斯洛伐克不但有全世界最理想的民主政治，還有全世界最偉大的民主領袖。捷克的開國元勳馬沙利克總統和現任的貝奈斯總統，就是當今的堯舜。馬沙利克總統是書生政治家的模範，他創造了捷克民主國，他博得了全體國民的愛戴，然而却沒有一點濫用過他的權力，更沒有憑藉過一點武力。在他統治之下，捷克的內政完全依最賢明的理智和科學精神來進行着，馬沙利克是個博學的學者，他的政治證明了用智識和學問來統治國家是最幸福的，他的成功證明了書生不是無用的，秀才不是不能造反的。他的學生貝奈斯是他革命時代的助手，是他當國以後的智囊，是歐戰後世界最著名的外交家，是同樣的博學多能的學者，在馬沙利克總統以高齡

倦勤之後，就開國會推舉他爲總統的繼任者，這是今日的堯舜禪讓，這件事證明了民主政治並不是衆愚政治，民主政治並非不能與賢人政治並存，比較列寧死後蘇聯斯、托兩派的互相屠殺情形看來，我們很可以了解真民主與假民主的區別。若說列寧、斯達林、希特勒、墨索里尼輩是霸道，則馬沙利克博士和貝奈斯博士統治下的捷克政治，才是王道。

歐戰以後，民主政治似乎走了背運，左右兩派的專制惡魔，以及其他殘餘的各色專制勢力橫行於全世界，在這種情形之下，捷克的民主政治試驗給了我們愛好民主自由的人以一個最成功的榜樣。今日捷克的存亡，就是民主政治的存亡，我們必須一致擁護這個民主的中流砥柱，不要使他消滅。

事實上民主政治是最堅固的政治，決不會爲專制勢力所消滅的，除非他是假民主。如果歐洲大戰真正爆發的話，我們敢斷言，無論這仗打到多少時候，一切法西斯專制，國社黨專制，布爾什維克專制，以及什麼君主專制，軍閥專制等等反動勢力都將爲偉大的戰爭所淘汰，最後必然都免不了崩潰的命運，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真

正民主精神，將廣被於全世界，後代的青年，將以崇拜列寧、斯達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精神，來崇拜這民主主義的聖人，書生政治的模範，秀才造反的成功者，——馬沙利克總統和貝奈斯總統。

波希米亞在宗教改革時代，就已經是民主自由的策源地，反抗日耳曼惡魔的殉道者了，我們相信今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必將以同樣殉道的精神來爲民主政治而抗戰。

作於民國二十七年春

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認識和期待

在今日對內對外這樣一個重大階段的情勢之下，國民參政會的召集有比較重要的意義，這是無疑的。不過其重要的程度是否能如一般會內會外人士所期望，我以為尙待檢討。

第一，我們應該明白國民參政會召集的目的是對外重於對內。今天抗戰的形勢迫成了朝野各黨各派的放棄宿嫌，團結禦侮，在這個團結禦侮的大前提之下，才有今天國民參政會的召集。國民參政會的最大作用是在表示給敵人以及全世界以中華國族團結一致的顯明事實，因此參加這個會的各黨各派以及無黨派的會員根本就沒有一個人還存着對內自相摩擦的心理，國家的情勢以及全體國民的期望也不容許我們這樣作，因此國民參政會的召集不過把這個全國團結禦侮的既成事實正式表現一下，此外沒有什麼更新的意義。

第二，從對內方面來看，國民參政會誠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階梯，然而它本身不能就算爲民主政治的正式表現，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今日的政治實質距離民主階段尙遠，不但像國民參政會這樣一個非由民選而來的機關不能認爲民主政治卽算成功，卽使我們今天有了一個正式的憲法，正式的國會，也依然還是形式的，因爲真正民主政治的成功必須大多數國民在實質上形成了一種組織的力量，這力量可以制裁一切反民主的行動，否則一切都是紙上空談，今天中國是否能夠如此，無待多說。因此，若認爲國民參政會的召集，是民主政治將要完成的先兆，我以爲去事實尙遠。

根據這對外對內的兩種事實判斷，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任務並不存過分期待的心理。

我這話並不是打斷一般人對於國參的興致和期望，更不是說國民參政會的同人們應該一味放任現實，無所事事，相反地，我以爲只有認清了國外國內的客觀現實情勢，才能切實推進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對外對內都能有真實的貢獻。

我們應該知道，國民參政會的召集也不過是一個既成事實的承認而已，今天出席國參的二百名參政員，每一個人背後都代表一部分政治和社會的力量，即使沒有國民參政員的頭銜，其力量依然存在，現在，不過政府比較賢明一些，能夠承認這個既成的事實，使之形式化，結果把這些本來難免和政府相反的力量集合起來變成和政府相輔而行的團結力量。今天中國一般國民雖然還沒有能夠切實形成一種支持抗戰建國和民主政治的偉大力量，然而這二百名參政員背後所代表的却無可否認地是一部分已經成熟的民衆，具有支持民主政治的實力，因此，我以為每一位參政員，應該自己認識自己的地位並非由政府賦予的，應該認識自己本身所代表的民主力量，善於運用這個力量來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引導國家逐漸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同時也應該了解現實的中國不是會議席上的空談和紙上文章所能改造得了的，應該把精神少用到那些紙上的條文和繁瑣的枝節問題上，而聚精會神來解決幾件有關抗戰和民主的重大問題。爲着這個，我覺得各級地方民意機關的設立是抗戰建國中一件最關緊要的事。

立 誠

處危疑震撼之際，當大任者無他術，要在一「誠」而已。

誠則有切切實實爲國爲民之心，不矜才，不使氣，不譁衆取寵，不立門戶之見，不爭枝節，不但圖苟且敷衍，能如此，庶幾可以任非常之事。

能誠則能仁，必有與生民共憂樂的誠意，然後始能切切實實感到生民的痛苦，而後有不忍人之心。仁是從同情心上發出來的，若是對人對事都無誠意，那裏有同情心可言？

能誠則能知，中庸說：「誠則明」，又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人能以一誠遇人遇事，則自無我見，無意氣，無偏私。天下事利害本不難知，只是徧心私見作梗耳。一誠則萬蔽皆去，然後可以談真知灼見。

能誠則又能勇，凡人之所以無勇者，只是把個人的小利害攪在大事裏去，以致

遇事顧忌耳。誠則無不公，公則無個人利害之見，於是才有真勇。

今天國事至此，皆維新以來四十年中一切擔當國事的政治家，一切談論國事的政論家，對國計民生缺少誠意所致。現在一切術取計詐的手法都已成了塵羹土飯，人人見慣，無所用之，有擔當國事的責任者或準備擔當國事的人，都應該先從「立誠」入手才好。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國論週刊（重慶版）第五期

憲政運動在中國

憲政運動在中國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至少已經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了。當我生（戊戌）的前兩年，康有爲已在聯合會試舉人公車上書要求變法了；在我的那一年，清德宗已經下詔明定國是了；在我九歲的時候，滿清政府已經發布預備立憲的上諭了。四十年前已經開始要求的憲政，到了今天還止於在談談而已，這是中國民族的恥辱，但是到了現在若連談都不會談，那更是恥辱。

提起了憲政，就聯想起外患。每一次憲政運動總在受了外患嚴重的教訓之後，康有爲的公車上書在甲午中日戰役之後，清廷的預備立憲在日俄戰役之後，現在依然是外患非常嚴重的時候來談憲政。中國民族必須在受了外人嚴重的鞭撻之後才想到談憲政，這是中國民族的恥辱，但是如果在那種慘酷的教訓之後還不敢來談憲政，那更是恥辱。

四十年來，整個的中國和整個的世界不知已經變化過若干次，四十年後的今日，人們對於一切事物的觀念已和四十年前絕對不同，對於憲政的觀念當然也是如此。現代任何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決不會像十九世紀的憲政迷信者一樣，以為憲法是一劑萬應的靈藥，一副起死回生的仙丹，無論任何烏七八糟的國家，只要把這副萬應仙丹吃下去，立刻就會撥亂反正，變弱為強。一切藥的效力一半在本質，一半也在信仰。相信藥吃了會治病，這藥就有幾分靈驗，反之就減少幾分靈驗。十九世紀的人相信憲政可以救國，憲政就有幾分的效力，現在的人對於憲政沒有四十年前那樣的熱誠了，所以憲政就有時靈，有時而不靈。

憲法不過是白紙上寫了幾行黑字，如果有人相信幾張白紙黑字會改變了整個的國家社會以及每一個人，這未免太頭巾氣一點。民國元年的南京參議院相信一本臨時約法就可以拘束了袁世凱，歐戰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相信一部憲法就可以解決了戰後德國政治社會上一切的矛盾困難，對於這些想法的人，我們只有同情他們的勇氣可嘉而已。

然則我們爲什麼還要在今日之下來談憲政呢？我以爲一切事物的本質是在特殊的空間與特殊的時間中才能顯現出來。每一個特殊的環境，每一個特殊的時代，就有每一種特殊的事物和觀念。中國的環境不同於外國的環境，今日的中國又不同於四十年前的中國，所以今日中國的憲政運動，也必然有他的特殊的意義。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了今日中國的時代與環境所需要的是什麼，才能規定今後憲政運動的途徑和憲法的內容。

首先我們所最容易認識的，當然就是眼前嚴重無比的國難。沒有眼前國難的嚴重教訓，也許還不會感到憲政運動的迫切需要。因爲我們要抗戰，必須要團結全國的人心，所以要憲政；因爲在國際形勢上，我們必須站在民主國家方面，所以要憲政；因爲抗戰必須集中人才，而人才必須有思想、言論、信仰自由的保障才能發揮其專長，所以要憲政；因爲抗戰必須組織民衆，而組織民衆則必須使人民獲得集會結社自由權的保障，所以要憲政；因爲抗戰必須完成真正的統一，而真正的統一必須全國各種政見不同的力量得到平衡，所以要憲政；因爲抗戰必須發展生產，而發

展生產的前提則必須使人民享受一個法律下的秩序生活，所以要憲政；因為抗戰必須發動廣大的人力，而發動人力必須使人民身體得到合法的保障，所以要憲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全國人民一致起來保衛大家的祖國，也必須先使人民感覺到這個國家是真正屬於大家公有的，是保護他們的利益的，這是在抗戰時期特別應該發動憲政運動的一個最根本，最有力的理由。

在抗戰時期必須發動憲政運動的理由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但有上面所舉出的幾項已經夠了。我現在所要說的，不是在這個時代爲什麼應該談憲政，而是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憲法？和怎樣去促成憲政的真正實現？

我們知道法律不過是事實的一種追認，先有了事實，才會有承認事實的一種法律制定出來。憲政運動過去曾經普遍於全世界各國家，但有些國家早已完成真正的憲政，有些國家則尙待努力，這不能不說是基於各國家事實情形的不同而分。中國過去憲政運動的屢起屢挫，不能不說是基於中國特殊的事實環境，但中國的憲政運動雖屢挫而仍屢起，也不能不說是由於事實環境上有這種需要而來。今天中國的憲

政運動並不是少數熱心者所鼓吹起來的，也不是專靠政府當局的賢明遠識而發動的，今天的中國在客觀環境上自有不能不湧發憲政運動的事實要求，無論是政府或是人民，都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都不能不受這個事實潮流的推動。客觀的事實鐵則無情地推進着，即使平日懷疑憲政的人到今日也不得不舉起雙手來高呼憲政萬歲，這就是事實支配了每一個人，這就是主觀必須屈服於客觀的一個鮮明的例。我們如果明白這種客觀事實的必然趨勢，就不必憂慮憲政前途的是否真能成功，和如何推進他的成功。因為客觀的事實環境已經明明白白指給我們兩條路，一條是實行憲政以團結救國，一條是不實行或假實行憲政以自促其生命。以滿清皇室的昏聩糊塗，最後尚不能不承認客觀事實的教訓而有十九條憲法以告太廟之舉，不過可惜太晚而已。今日中國民族無論朝野上下已迥非滿清之比，所以必然會辨清了這兩條路的利害而不久就有一個真正的憲政之花開放出來。

但是在這個時期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憲法呢？我以為首先必須認識一切客觀的事實本身都是一種有機的過程，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因此我們今日來談憲

政，首先就必須拋棄十九世紀認憲法爲萬年不朽的大法的陳腐之見，老老實實承認憲法雖然比別的法律較爲基本些，然而依然不過是一種因時制宜的救國之道而已，憲法本身也應該和其他一般法律一樣，使它有隨時代環境而不斷地修改適應的能力。因此我主張我們不要求一個萬世不變的大法，而要求一個富於彈性的容易修改的憲法，不希望有一個過於硬性的條文和修改手續。世界上最善於運用憲政的莫過於英國人，然而英國的憲法是最富於彈性的，其彈性至於沒有一個成文的法律的程度。世界上最硬性而難於變動的憲法莫過於美國的憲法，然而世界上最不能適應國家環境而反致障礙國家發展的，也莫過於美國的憲法。明白了這個道理，則一切有誠意爲國家的人，應該不要把憲法變成一個作繭自縛的硬性傢伙，一切過於抽象的原則最好不必規定，即規定也應該替後代的人設想，使將來有依法修改的容易途徑，因爲將來事實的環境也許變化很多，今天爲適應眼前環境而定的條文，到了明天事實環境變了也許要丟到爛紙堆裏。與其讓將來的人忍不住硬性的條文束縛而採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去修改這些條文，反致影響全部憲法的尊嚴，倒不如早點替將來

的事實留幾分餘地。因為事實的變化總有那一天，不過爲國家民族生命設想，希望它是由法律的途徑去慢慢變爲較好些而已。

既然如此，我們就更進一步希望憲法的條文不要變作一本應有盡有的萬寶全書。憲法不是用來裝門面的，是來適應當前事實的需要的，與其過高過遠，不如切實實斟酌眼前的需要規定幾條簡單的大法。譬如，我們今日最需要的是人民的身體財產的保障權利，是准許人民有一些信仰、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公民基本權利，是一個可以實際監督政府的代議機關，是增加人民負擔必須取得人民代表同意的合法手續，是一個簡捷靈活的行政系統，能夠辦到這幾點，便是今日中國所需要的——一個好憲法，其餘一切高深的學理和繁博的條文，不妨暫時擱一下再說。漢高帝統一中國只靠得約法三章，我們今日也止需要幾條簡單而扼要的憲法。我們不希望像民元臨時約法那樣不適應現狀的大法，結果反迫使有力者挺而走險；我們也不希望像立法院制定的新刑律一樣，把西洋的好聽理想盡量擺上去，結果弄成一個法律自法律，事實自事實。我們希望的憲法是一個條條能夠實行的憲法，既然如此

此，這個憲法就必須使現在中國的執政人物和老百姓都能夠了解，並且樂於實行。

我們要知道，憲政運動在現階段中國的意義，並不是想靠一部白紙黑字的條文就立刻使中國起死回生，真正的意義不過是使中國人逐漸享受一種法律軌道內的起碼生活，以代替過去無法無天的生活。我們須知道，因為法家政治在中國失敗的結果，二千年來中國人民始終沒有養成一個遵守法律的習慣，不但是執政者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也是如此。現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還不懂得法治生活的重要，還在以爲法治手續的委曲繁重不如人治的直捷痛快，像「韓青天」一類的「施公案」上的人物，還在爲一般民衆理想上的政治模範人物。因此我們現在對於一切法律的要求不可太高，當先求其平易近人，使人易於了解，易於實行，然後才能希望逐漸養成一個法治的好習慣。憲法既是立國的根本大法，就最容易陷於抽象和理想，故更應求其具體化，現實化。如果一個憲法每一條的條文都能夠使不識字的中國老百姓懂得它的意義，並知道對於他們的好處，則這樣的憲法才能獲得廣大民衆的後盾，而不致變爲紙上的空談。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成都國論半月刊

非常時期下中國政黨的使命

敵國日本是一個軍閥官僚專政的國家，自九一八以後，國內有名無實的幾個政黨，意氣日趨銷沉，有些不要臉的政黨如社會大眾黨及時局同志會之類，更追隨於軍閥官僚馬足之後，趨奉阿諛，惟恐不至。在這樣的環境下，七十老人的齋藤隆夫居然敢發出空前的狂吼，對日本的已趨腐化的既成政黨和氣燄不可一世的軍閥官僚，加以公開的指摘，雖被除名在所不懼。齋藤的演說，雖然在我們中國人民的眼光看來，尙嫌其觀察不甚正確，議論也不澈底，但在日本那樣的環境之下，畢竟不失爲朝陽鳴鳳。

齋藤在致各政黨書中，對於日本既成政黨的腐敗情形，曾有不客氣的指摘。其中所論，大有堪供我們中國人反省之處。如其謂：

「我是政黨的一員，三十年來繼續着政黨的生活，但是從未見過像最近我國

(指日本) 政黨那樣沒出息，不中用的政黨。昭和七年五一五事件以來，政黨意志銷沉，勢力失墜，被官僚所玩弄，被國民所輕視，政黨本來的目的與使命亦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雖然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但是所謂非常時期決不能成爲應該官僚逞威，政黨萎縮的理由，照理來講，愈因爲其是非常時期，所以政黨愈應發揮牠的本領，擔當指導國家的大任。但是今日的政黨，無論從何處去敲打牠，總難生出這種思想和氣魄來。……』

『……爲什麼會使軍部和官僚能在政治上握有這堅強的推進力呢？推測其原因，還是因爲政黨沒出息，要是政黨能照着正路堅強的做法，決不會被其他任何勢力所凌駕。……在今日我國現狀下，欲僅以政黨支配國家政局，確係有點不合。但是立足於國民基礎的政黨，動輒立於與國民毫無交涉的官僚之下風，遙拜官僚的後塵而引以爲安，這不僅表示政黨的無力，簡直沒有面目來對每次選舉時投票於政黨之全體國民。……』

中國現今尙未實行憲政，各種既成政黨，除國民黨外，其餘均不過甫經爭得公

開的生存權利，凡齋藤隆夫所指摘日本政黨之處，中國今日尚無此狀況。但以民國初元政黨活動失敗的歷史看來，其無出息而專仰軍閥官僚的鼻息以生存，情形殆無以異於今日的日本。當時袁世凱雖挾北洋軍隊的勢力，攫得大位，但革命初成，民氣尙旺，如果代表國民勢力的各黨派政治領袖，能夠捐棄宿嫌，聯合一致，以控制政局，則政權不致全隳於軍閥官僚集團的北洋系之手。不幸自宋漁父先生被刺以後，國內缺乏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既成政黨紛紛依附軍閥，自相魚肉，結果國民黨固被解散，進步黨亦得兔死狗烹之結果，政權遂隳入反動派軍閥官僚之手，國事日趨敗壞，雖後來兩黨人士覺悟，合組民憲黨以與官僚御用的公民黨相對抗，埋頭於制憲事業，但時機已失，不久國會全被解散，袁氏遂成獨裁帝制之局。

當時政治的腐敗，本由於政黨政治的未能實現，乃狡黠的官僚反以責任嫁在政黨身上，數千年專制政體下訓練出的中國人民，本未習慣於政黨的生活，對於政黨的主張和行動向來即少見多怪，至此遂益集矢於政黨。當時的政黨也不知自愛，但圖接近政權，不惜自隳所守。進步黨人既甘爲袁氏奔走，對國民黨挑撥破壞，無所

不至。國民黨也強拉趙秉鈞等北洋官僚入黨，欣欣然自以為政黨內閣已經實現。政黨這種自貶地位的舉動既為官僚所窺破，才越法大膽無忌起來。所以國事的敗壞雖非政黨直接的責任，而政黨不能不負間接之責。

自袁氏解散國會以後，政黨意氣愈趨銷沉，進步黨既已官僚化，大唱毀黨之論，國民黨也對於未來的革命意志逐漸動搖，甚至願與袁氏妥協。孫中山先生當時之另組中華革命黨，正因憤慨此種政黨墮落的情形而出。如果把孫文學說中論知難行易的說法仔細看一下，便可知道中山當日那種堅持革命到底的精神，不但不為國人所諒解，並且也不會為黨內同志所諒解。

帝制失敗，國會恢復以後，各政黨居然避諱黨字，不敢以黨自居，而僅僅就制憲的名義，各組所謂「研究」、「商榷」、「討論」等會，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此政黨已失去堂堂的氣概，既無公開的政綱，又無國民的後盾，僅僅憑藉國會的地盤蠅營狗苟，朝三暮四，做些政治買辦的把戲。政黨既墮落為政客集團，所謂憲法和國會也就成為下流的政治交易所。曹錕賄選以後，舉國痛恨國會，因而根本摧毀

憲政的軌道，其原因蓋非一朝一夕之故。

今天政黨和憲政運動之所以復活於中國，乃由於民國十三年以後幾個新興政黨的艱苦奮鬥所致。自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中國青年黨結黨於法京巴黎，十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改組，實行國共合作，國內政治始入於新的機運。革新三大黨彼此之間，主張行動雖各不相同，然其同立於民衆和革命的陣容，有公開的政策綱領和民衆青年的後盾則同。舊政黨的所以沒落，新政黨的所以勃興，其關鍵全在於此。

今天舉國要求憲政，政府也誠意要實行憲政，然而憲政的運用全在於政黨，是我們所不可不知的。如果沒有政黨做憲政運用的樞紐，則所謂憲法不過是幾張白紙，所謂民衆不過是一盤散沙，世界依然是官僚的世界，決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出現。要求真正的民主政治，就必須政黨自己覺悟自己所應負的責任，民衆也應該肯定政黨這種應負的責任。

政黨是什麼？政黨是一羣依政見而結合的政治團體，這就是政黨之所以異於官

僚政客之處。官僚是無政見可言的，官僚是以趨奉長官爲惟一目的，伺長官之喜怒以爲喜怒，故不但無一定的政見，而且深怕有一定的政見，尤其怕結合公開的團體以觸長官之忌。政客則似乎有政見，並且也有團體，但是所謂政見不過是一種欺騙人的幌子，自己對於自己的政見並無實行的誠意，惟在必要時拿出來做做幌子而已；對於團體也是如此。因此政客的結合是朝秦暮楚，政客的主張是朝三暮四，其惟一目的在投機於政治漩渦中以接近政權，滿足私的慾望。民國初元的政黨，後來都日漸墮落爲政客的集團，民主政治之所以失敗，其故蓋由於此。

今天的中國不像普法戰爭前的普魯士，義大利統一前的撒的尼亞，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有一個傳統的皇室做政治的中心，更沒有一個像德日那樣比較幹練的官僚政治機構做推行政治的樞紐。中國是民國，只有靠民衆自己站起來管理自己的國事，而怎樣才能組織民衆，推動民衆，就只有靠政黨。但這政黨必須是堂堂地有具體綱領，有民衆後盾的政黨，而不是少數人士在私室裏秘密做買賣的政客集團。凡政黨而墮落爲只有少數人做把戲而忽略了黨內黨外的羣衆者，其黨必日趨沒落，反

之，只要能把握住適當的政綱，出之以堂堂的行動，縱使一時受有阻抑，將來必有前途。

中國今日正在非常時期，但正如齋藤隆夫所說：「愈因爲其是非常時期，所以政黨愈應發揮牠的本領，擔當指導國家的大任。」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政黨，還不僅是像英美等常態國家那樣普通的政黨，而是具有遠大眼光和剛毅手段的革命黨。革命並不僅僅是流血暴動，也不僅僅是爭取政權，因爲土匪也會暴動，官僚政客也想爭取政權，但與革命無干。革命是對於國家社會秩序的從新建設，是創立新秩序以代替腐爛的舊秩序。中國這一次的對日抗戰就是一種偉大的民族革命，而在這三年來的抗戰過程中，整個的中國已經起了空前的變化。這一次抗戰必須獲得最後的成才罷手，是無疑的。成功之後，對外是東亞國際不平等的舊秩序的顛覆，對內是二千年來傳統的舊社會秩序的完全改造。破壞容易建設難，我們將來準備建設一個怎樣的新中國？怎樣的一個新國際？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打算，而每一個擁護抗戰建國的政黨都應該擔負的遠大責任。我們應該知道對日作戰不過是這偉大的

建國工作的第一步，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們的艱難正多，我們的責任也更重大。一切政黨都應該深切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任何政黨在準備擔負這種大任之先，必須認識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抗戰建國的偉大工程，不是任何一黨一派所能包辦得了的，必須與全民衆共之，必須求得民衆的了解和擁護。政黨不過是設計圖案的工程師，民衆才是實行建築的工人，因此政黨的主張決不能與民衆的利益脫節。同時抗戰建國的偉大工程，決不能依靠傳統氛圍內培植下的腐惡官僚去支持。中國的官僚是全世界無比的腐惡勢力，有二千年長久的歷史背景。二千年來的中國，表面上雖是嬴、劉、曹、馬、楊、李、趙、朱的天下，實際上永遠是一個官僚的天下。今天中國國勢之至於如此，也就是官僚應首負其責。所以今天若在中國國內談革命，其惟一的對象，既非君主貴族，又非地主資本家，就是這個萬惡無比的官僚勢力。誰人來革命，就只有靠政黨站在民衆的立場上去革官僚的命。但是官僚有二千多年長久的經驗，其應戰方法非常巧妙，他們的戰略是以柔克剛，永遠不硬對硬。所以一個革命的政黨，容易克服強暴的敵人，却

無力拒絕官僚的投機獻媚。官僚用這種方法，篡奪了革命的集團，排擠了革命的分
子，而掛起了革命的招牌。像這種情形在東西革命史上都是常有的，而尤以中國的
官僚最擅長此道。所以任何有勇氣擔當國家重任的政黨，自始即須決心拒絕官僚分
子的滲入，嚴防黨員的官僚化，更不可大開方便之門，使官僚盡量加入這個集團。
假使任何政黨不幸採取這種短視的政策，那不但是黨的自殺，也是國家的大不幸。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五日國論半月刊

國勢・國策・國運

「歐戰縱橫談」擱筆甫逾月，世界形勢又有不少猛烈的變化：法國不但投降，且建立德義式的獨裁，一也；英法本爲同盟友好，竟翻臉成讎，二也；法國投降以後，衆料希特勒即將乘勝大舉進攻英國，不料英國不但未失敗，且反守爲攻，連日空軍大舉轟炸德境，三也；蘇聯在此期間，檢得許多便宜，四也；日本的米內內閣剛剛辦好了對英美的交涉，忽然又被逼下臺，五也；英國對日態度忽軟忽硬，六也；美國大選，羅斯福之三度競選本在意中，但共和黨候選人之中，一般預料的杜威、塔孚脫等都未當選，斜刺裏殺出一位名字不見經傳的威爾基來，居然弄得民主黨心驚膽戰，至少令我們非美國通的人感覺有點出人意表之外，七也；眼看歐洲小國紛紛被強有力者攫奪而去，而美國的孤立派和南美各小國，仍然不知警懼，但圖一時苟安和小利，八也。凡此八者，均與我中國的抗戰建國前途息息相關，有應法

者，有應戒者，有應知者，有知其當法而力不足以學者，故比而論之。

一國有一國之國勢，有一國之國策，有一國之國運。國勢者，一個國家本身具有之力量及其在當前環境下所處之內外情勢也；國策者，根據國勢所定之應付方針也；國運者，根據國策所生之後果也。國勢之強弱安危，全繫於過去所執行之國策之正確適宜與否，而當前國策之決定又爲後此國運盛衰安危之所繫，故自古國家未有不講求國策者。有基本之國策，有一時之國策。基本之國策由一國之歷史文化、地理經濟環境及民族心理性格所決定，不問執政者之爲何人，爲何種性質之政府，俱無以易之，英之保持海權，俄之打破封鎖，德之稱霸中歐，義之向地中海發展，美之門羅主義是也。一時之國策，由一時之國際情勢所決定，而決策之適當與否則與政治家之才能識力有關，此即吾人所欲致論之主要問題也。

先就法國說起。法國今次之敗，由於汙於上次歐戰之倖勝，苟安偷惰，上下紀綱廢弛，臨戰又不能先發制人，惟恃馬奇諾防線以爲金湯鐵壁，故敵人得以乘其虛而摧之，世人論之詳矣。若再推其遠因，則此種個人主義過分發達惟知享樂的民族，早

已不能競勝於國際戰場上，雖上次歐戰亦是倖勝。當上次歐戰最後之兩年中，主和運動已起，前線已有兩師團陰謀叛變，若非俄國參戰於前，美國參戰於後，而又有強毅不屈之老虎總理以鎮壓之，恐上次歐戰之勝利亦未必即在協約方面。足見此次之敗，並非偶然，惟其潰敗如此之速，則非局外人始料所及耳。至論國策上的錯誤，則最大失敗在於失去蘇聯的友誼。法國地處中原，既以德國為假想敵人，則必須拉緊俄國，乃情理之常。故上次歐戰以前，法國外長狄爾喀西竭力拉攏英俄兩國的交情，促成三國相互間的諒解和協商，戰勝之基全由此奠定。希特勒登臺以後，當時的法外長巴爾都也竭力拉攏蘇俄，成立法蘇互助協定，此為法國外交上之大成功。不幸巴爾都被刺身死，後繼者不能繼續貫徹此項政策，設法使英蘇接近，以促成第二度的三國協商。法國既在形勢上非拉緊蘇聯不可，又非仰仗英國不可，而英俄之間嫌隙素深，如何拉攏兩國之交，是法國政治家所應該竭全力以赴之的工作。在第一次歐戰之前，英俄兩國實際上的利害衝突比今日尤甚，然當時狄爾喀西尚能乘俄國對日戰敗之機，促成英俄的接近。蘇聯自斯達林執政後，專心國內建設，標榜

和平主義，其與英國的衝突僅係歷史的和心理的，實際上已無利害不相容之點，故李維諾夫長外交時代，其政策處處對英法遷就。乃唐寧街的外交家，目光短淺，尙存對德妥協之妄想，以致有慕尼黑協定之產生，英國外交向來如此，固不足責。法國爲其自身利害，當此緊要關頭，卽應以去就力爭，不應一味仰英人之鼻息，蓋捷克亡卽小協約國亡，小協約國亡卽凡爾賽體系完全崩潰，法國之衛星完全離散，法國所感之利害自與英國不同。法國倘以去就力爭，未必不能轉變張伯倫、西門、哈里法克斯輩之親德態度，卽使英人一味自私自利，不肯爲東歐國家犧牲，則法國卽應乘此時機大下決心，停止追隨英國之政策，與蘇聯發生進一步之關係，則蘇聯亦不至被迫而採取急不暇擇之親德政策，大陸均勢猶可保持。彼英人對利害計之較熟，卽使法國政策改變，亦斷無助德反法之理，故法、蘇、英三國間之聯合關係猶可徐圖恢復，希特勒猶有所顧忌。乃計不出此，坐視英蘇國交之貌合神離，不思挽救，至有德蘇協定之產生，局面因此大壞而不可收拾。此法國政治家因循誤國之罪，雖萬死莫贖。至於坐視西班牙人民政府之爲佛朗哥所滅而不救，猶其小者也。

然則今後法國之國運將如何？曰：以貝當政府成立以後之種種舉措卜之，法國已有復興之氣象，其前途仍光明無限，不可認爲從此一蹶遂弗振也。何則？國不患戰敗，而患在內亂，內潰，以至於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法國之不能再戰，乃係事實，雷諾政府對美之呼籲已公開言之。不能再戰而毅然決然忍辱爲城下之盟，雖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甘爲之，此貝當以八十老翁出而支持此殘破局面之心理也。自貝當出任總理以至元首之後，雖有戴高樂輩在英之活動，然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各屬俱一致翕然遵奉維琪政府之命令未聞有公然叛變者，改革政制之舉，竟得參衆兩院最大多數之贊同，此可見法國尙爲一統一完整之國家，貝當之人望猶足以使全國擁戴信任，今日之貝當卽昔日德國之興登堡也，八十老翁復何所求而忍辱貶節以至於此，豈非胸中別有更堅忍之計劃而爲國人所共諒乎？自貝當柄國以後，法國內政，次第刷新，曩日法國政治之弊，曰金融寡頭，操縱政治；曰小黨林立，中樞屢更；曰紀綱廢弛，上下相蒙，貝當出而一舉廓清之。懲罰誤國罪魁，處分叛將，則整飭紀綱之道也；改革政制，統一政權，則鞏固國基之道也；沒收私人產業，統制經濟機

構，則廓清資本主義勢力之道也；而其於未來國運所託之青年，則以體育運動代替軍役以避強敵之忌，以強迫訓練養成守紀律重服從之習慣，以矯自由浪漫之習。凡此種種，皆德之所以致復興之道，而法國今則一一效之，謂非其力圖發憤自強可乎？若謂維琪政府一味降敵賣國，其種種設施不外獻媚強敵，摧殘異己，則應知今日法國除德軍佔領區外，其餘維琪政府所轄土地，固尚有自由發號施令之權。觀其對於參戰有功軍士之獎勵，誤國罪魁之懲罰，國哀紀念之制定，可知法國貝當政府並未對德國掩飾其哀悼戰敗及希望戰勝之心，謂貝當政府為完全降德者，殆於此等事未嘗注意也。至於戴高樂之流，為保持國家榮譽起見，在國外繼續抗戰之活動，使敵不至認法國為無人，其為功亦不可沒，所謂居者行者各有所宜是也。吾故曰：以近事卜之，法國之國運仍未可限量也。惟法之民族本身已趨衰老，將來即使有完全自由之一日，其在國際上之地位，恐已不能如過去之煊赫矣，此則自然所限，非人事之咎也。

次論英國。今日之英國，正在賭國運於一擲之際，其左支右絀之狀，殆為大英帝國歷史上所僅見。英人之有此結果，皆由過去政策之過於短視，打小算盤而不打

大算盤。九一八之對日讓步，義阿戰爭之對義讓步，慕尼黑協定之對德讓步，凡此種種，今日均自食其果。夫以英之地位，在今日宜執行世界霸主之責任，救災恤鄰，義不容免。乃張伯倫、西門輩，自視其國不出於西歐一島國之範圍，不但東亞、東非與彼無涉，即東歐問題亦似乎距英尚遠，非所欲問，卒之捷克既亡，波蘭繼之，而英仍不得不捲入漩渦，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此英國政治家之舉措，不但自誤其國，亦誤盡天下弱小國家也。

希特勒自勝法之後，致力於巴爾幹問題者逾月，在此期間，攻英之聲忽焉沉寂，惟見英德空軍，互翱翔於彼我之野而已。近數日間，攻英之聲忽又四起，報載義軍已向北非大舉進攻，此殆爲攻英之先聲。以歷史言之，凡由大陸渡海進攻島國者，恒歸失敗，如西班牙腓力第二及法國拿破崙兩次之征英，及我國元世祖之征倭是也。惟此均在過去航海術未發達之時，帆船橫海，自所甚難，非所語於海空聯合戰爭之今日也。希特勒究恃何術以渡海，吾人非軍事家，未敢預斷。以常理測之，希特勒既勢成騎虎，非冒險一嘗試跨海西征之滋味不可，但此舉成固可喜，敗則數

十萬大軍委棄海外，其後果亦不堪設想。希氏果不爲一時感情之所囿，則萬全之計，莫如以直布羅陀及蘇彝士爲進攻之目標，而對英國本部之進攻僅虛張聲勢，如此東西二要塞俱入軸心國家之手，則地中海內之英艦將與本國失去聯絡而有全部瓦解之可能。夫蘇彝士之進攻雖似較難，然由法屬摩洛哥以拊直布羅陀之背，固非甚難事也。希氏之爲人，雖似鹵莽，實甚謹慎，觀其自去秋以來，和蘇，攻波，攻法，平定巴爾幹，步驟井然，毫不凌亂，則此次攻英，苟非另有萬全之登陸方策，吾終不以爲德軍竟將蹈腓力第二、拿破崙之覆轍，而冒險徼倖以圖一逞也。

德軍苟不能進改英國，則英將利用此時機，養成氣力，以復問鼎於歐洲大陸乎？此於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勢，則大陸之遠征島國固不易，而島國若思以單獨之力問鼎於大陸，則更難之又難。考英國與歐洲大陸之歷史，自十四世紀百年侵法戰爭失敗後，卽未嘗以單獨力量經營大陸，惟恃縱橫捭闔之策以煽構之，使大陸諸國互相爭伐，而已得從而利用之。卽第一次歐戰亦利用法俄之力以夾攻威廉。此次大戰，復思利用法軍以對德，不意法國潰敗過速，以致倉皇退師，幾遭覆沒。今後在

短期內，英欲出兵大陸，恐已甚難，若有此機會，則必在德蘇正面發生衝突之後，爲期或亦不甚遠也。

若德不能往，英不能來，則演成長期相持之局，英恃海軍之優勢，經濟封鎖較易，世多謂德軍終必敗衄。吾以爲德國固有最後必敗之因，但非由於封鎖，亦不能坐待封鎖至數年之久。蓋今日之德國，與第一次歐戰時德國之形勢迥乎不同，非單純封鎖所能奏效也。吾以爲在此相持之局面中，蘇聯之態度如何，實爲最主要之關鍵。苟蘇聯不欲德國失敗，則稍稍以其資源接濟德國，英人終無法困德；若蘇聯爲自衛起見，與德國發生衝突，則英國又得利用大陸勢力之衝突而上下其手。以近來蘇聯當局之舉措觀之，其態度亦至明哲而審慎，吾意非萬不得已，蘇德間決不至發生戰爭，但須視希特勒之腦筋能否清楚到底耳。

然則希特勒將懸崖勒馬以頭腦清醒終其身乎？抑將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終於忘俾斯麥之諄諄告誡，不惜躬蹈拿破崙及威廉第二之覆轍以與斯拉夫民族爭衡於東歐漠漠之廣野乎？此則視乎希氏個人與夫日耳曼民族之性格而定。夫希特勒何如人也

？世皆曰，彼獨裁之領袖也，專制之魔王也，侵略之魁首也，大政治家也，大外交家也，羣衆之煽動家也，余獨曰不然。凡此種種，無論毀譽，俱非眞知希氏者。希特勒蓋始終不過一藝人耳，彼維也納之名演劇家也，彼所演者悲劇而非喜劇也。彼希氏蓋自矢獻身於德意志國家之舞臺，對世界觀衆表演一出色之名劇，但使演劇成功，其結果之爲悲喜所弗計也。凡非常之業，皆成於大演劇家之手；而所演者恒爲悲劇，項羽、拿破崙皆是也。況希特勒所廁身者爲日耳曼民族之劇團，彼日耳曼民族蓋世界上惟一善演悲劇之民族也，彼整個民族所孳孳追求者，非若英美民族之斷斷計較實際的錙銖利害，亦非若拉丁民族之沉醉於個人英雄式的虛榮，彼等所追求者，蓋在脫離現實的淺薄環境，而深入於內心之理想的境界，目的日不達，卽不容一日罷手。今日國社黨之德國所追求者爲何種之理想境界乎？曰德國德國高於一切也，曰日耳曼民族爲全世界之主人翁也，其所追求之理想如此，而謂其可以與蘇維埃之俄國長此平分歐陸之霸權，吾弗信也。

然則蘇德之間其終有衝突之一日矣，衝突之結果在希特勒果爲悲劇乎？彼斯拉

夫之紅騎果能敵日耳曼之褐軍乎？曰，非此之謂也。自希特勒登臺以來，標榜反共之幟，與義日東西勾結，誓以保護西歐文化自命。彼時蘇聯自願實力未充，外交孤立，故不得不為隱忍自重之計，棄其平日反對資本主義之口號，而低首下心與英法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握手言歡，其意但求希氏兇鋒之不我指而已，乃英法老獺之政治家，誤信希氏反共之誓言，始終認法西斯為可親，妄欲鼓吹希氏東進，使兩兇火併於東歐，而西方之市儈坐享逍遙之福。故對蘇則始終冷淡，對德則再三屈膝，蘇聯當局覩此陰謀，乃知市儈尚不如流氓之易與，遂翻然變計，李維諾夫下野而莫洛托夫上臺，德蘇協定一成而歐陸大局旌旗易色。彼斯達林氏豈不知希特勒之野心勃勃，有囊括宇內、鞭笞四海之心，臥榻之旁，終難鼾睡，其始或亦未料及英法失敗如此之速，姑縱鵲蚌之相持而收漁人之利而已。不意波蘭戰事，十八日而解決，法比戰事又僅逾月而決定，蘇聯當此時期，將何以自處乎？助英法以攻德則時已晚矣，坐視德人之吞供弱小，則藩籬盡撤，將何以禦其後，故不得已劍及屣及，西割波芬，盡收波羅的海三小國於版圖，南割比薩拉比亞以臨土耳其，雖曰在道義上與

德義日同其凌弱逼小，然苟就蘇聯之處境而論，未始無可以辯解之理由也。然德之立國，在於大陸，海上非力之所及，目前雖以騎虎之勢，非攻英不可，然苟渡海之謀不遂，巴爾幹諸國勢力範圍已定，則今後大陸發展終必有與蘇聯正面衝突之一日。以吾策之，今後德人之動向或未必逕向東境發展，其始可能由巴爾幹以窺近東，而土耳其首當其衝，土苟不向德屈膝，勢必步波蘭之後塵爲德蘇所平分，義亦或將染指，然伊斯坦堡之重要遠非華沙之比，德義蘇三國之間能無勢力之衝突乎？即使土耳其問題幸獲解決，德國能無循巴格達鐵道之舊軌，逾小亞細亞而進窺波斯灣之野心企圖乎？莫洛托夫演說既公然對土耳其、伊朗二國和以指摘，墨索里尼亦久視阿刺伯諸邦爲其外府，蘇聯能坐視德義勢力伸入其南疆乎？凡此皆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兩者將來衝突之媒介也。惟蘇聯紅軍之實力如何？雖云尙係未知數，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向來宣傳過於事實，以蘇芬戰事與德波戰事之比例而論，恐斯拉夫民族之遲鈍終非勇悍之日耳曼人之敵。斯達林輩於此必有自知之明。吾意倘一旦蘇德發生戰爭，紅軍決不蹈甘末林、魏剛輩之覆轍，舉全軍與敵決勝負於烏克蘭之野，必

將步武我國抗戰之戰略，誘敵深入而以堅壁清野困之。以布黨民衆組織之徹底，其發揮效力必遠過於我國。此爲俄國傳統之戰略，不但拿破崙失敗於此，即大彼得對瑞典王查理十二之戰略亦係如此。彼時不但英國未能征服，英蘇之間尙有合作之可能，即義大利雖曰爲納粹德國之良友，然亦不能坐視德國之併吞全歐，故歐戰之最終期必將以英、蘇、義聯合對德之戰爭而迫使德國承認均勢之恢復，彼時法國及西班牙之參加反德方面自不待言。自今以後，希特勒所要對付者非復張伯倫、達拉第輩太平洋紳士之流，而爲斯達林、邱吉爾等梟傑之士。希氏及其國家縱有腓特烈大王七年血戰孤城奮鬪之精神，亦終於成爲悲劇之下場而已，何況尙有富強之美國以盾其歐人之後乎？

美國今日之國勢方在如日中天之際，以形勢而論，大類十九世紀以前之英國，當時英國賴北海及英吉利海峽之保障，得免於大陸之侵襲，故常標榜光榮的孤立主義；同時因奄有世界財富之故，故常得以其財力操縱大陸之政治；又因其民主政治發達最早，故隱然爲世界民主運動之最後堡壘，自由主義者之遁逃藪。凡此三者，

皆今日美國之所同也。惟美國有遠不如昔日英國者一事，蓋英國政治之維持，全賴久經訓練之貴族階級爲之支柱，英國每一貴族，自其少時卽準備將來擔負國家之責任，故其所受教育與一般平民迥乎不同，中學則必入伊頓，大學則必入劍橋、牛津，然後服務於市政府等自治機關多年，其傑出者漸得被選入巴力門而過問一國之大政。彼等所受之訓練既純然爲準備擔負國家責任而作，加以門第閥閱之涵養，社會禮俗之陶鎔，故人人無論才具如何，皆有一種士君子之風度，對人對事，皆能以中庸常識的態度出之。英國民主政治之久維不墜，實賴有此輩飽受訓練之貴族階級以爲支柱，此非戲言也。美國之大危機卽在缺乏此種中流砥柱之階級，在昔開國草昧之際，尙有清教徒之操守精神以爲維繫，自後國土愈擴，流品愈雜，西部開拓之後，一切流氓惡棍向所不齒之人，皆坐擁厚資，成爲大王。此輩新興資產階級，自幼本未受完備優美之教育，而其所以致富之道，又全賴巧取豪奪而來，以此輩不知政治爲何物之人，而其勢力乃足以操縱一國之大政，雖有賢豪，難乎爲力。在上者既指導無人，一般民衆亦不過隨波逐流，以耳當目。故美國之政治，名爲民主，實

則衆愚之政治耳。在此種政治情勢之下，宜乎羅斯福總統之內政既備受資本家及參衆兩院頑固分子之死命反對，而其對外政策，又屢爲孤立派所阻撓。今日之美國亦幸而遠離歐陸，不至直接受法西斯之攻擊耳。倘易地而處，以其政治社會之紊亂，陸軍軍備之微弱，恐求如法國之敗而不亂尙不可得也，又安能以其武力與德日爭衡於東西洋之上乎？

抑美國之危機尙不僅在其政治社會，卽在民族精神上亦有重大之危機。美國人之性格驚新好異，易受衝動，遠非英人堅忍之比，如人在青年，使氣好動，無老成練達之識見，故遇新奇可喜之事物，則趨之若鶩。以此種性格之國民，當今日世界風濤簸蕩之頃，欲其終爲民主政治守此殘壘，恐尙是問題。今日美國兩大政黨雖皆以擁護民主政治自命，然社會上潛伏之法西斯勢力及夫梟傑之士欲利用此新奇招牌以遂其政治欲望者，當不在少。林白格以一流浪子弟，一旦橫渡大西洋成功，卽一躍而爲民族之英雄；考格林神甫以一教士而可以無線電操縱全美之聽衆；烏泊頓·辛克萊以一無聊文人，忽而左傾爲社會主義者，忽而反動至於研究靈魂學，居然受

一部人之擁戴而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昔年被刺之路易布朗，以一土豪惡棍，居然盤踞州長之位多年，且屢屢欲與羅斯福競爭總統之大位。凡此皆已經知名之梟傑也，其未露頭角者尚不知幾何？以此種輕浮易動之國民性，欲求永久維持平衡之民主政治，恐事實甚難。吾意在易世之後，舊世界之法西斯主義或已失敗，而新世界必有梟雄起而創立以擁護民主爲口號之法西斯政治，或竟有所謂民主法西斯主義者出現於美國，此亦非戲言也，徵諸歷史及現實而敢斷言其必然也。

凡此種種，姑置不論，但就目前情形言，美國雖據有絕大之發言權，然以其內部現象言之，無論何黨執政，固不至放棄其傳統之對歐洲及遠東之政策，但亦決不能希望其立即捲入東西任何戰爭之漩渦。惟美國之富力足以接濟英蘇使力與法西斯國家爲長久之鬭爭耳。實則舊世界國家所望於美國者亦不過此也。

以上略述吾人對於並世列強之觀察如此，吾於吾國之敵人日本，則其國運已如櫻花之即趨凋落，國人評之者至多，茲不具論。

立國於今日，其興甚難，其亡甚易。自去秋歐戰爆發以來，亡者已有波蘭、丹

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摩納哥、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十國矣，其芬蘭、羅馬尼亞之橫被割掠者尙弗計也，其法國之國土被人佔領者尙弗計也，其奧地利、捷克、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之亡國於歐戰之前者尙弗計也。凡今世屹然有以自立之國，其始必經無數之艱難，其立國之策必有可以資人反省者，均非徼倖所致，不然，以法國之強尙不免於城下之盟，有國者其念之哉！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無為政治論

『無為政治』為我國二千年來民族政治哲學思想之結晶，垂諸經典，見諸實際，二千年來，聖哲相承，翕無異議。自吾生之後，受外力之刺激，而後民族思想，翻然一變，向之奉為經訓者，至是羣焉詬病之，目為亡國弱種之學說。四十年來，朝野談政治者，罔不以建設改革為急務，建設也，改革也，胥「有為政治」之作法也。在此潮流之下，無為政治之為人所詬病固其宜矣。猶憶六七年前，胡適之先生鑒於當時所謂建設事業者之病民，於「獨立評論」上力主無為之說，並闡明漢初陸賈新語之說以為論助，愚當時深贊其說，曾為文以應之。無如潮流所趨，非一二人所能挽回，適之先生至以此為人目為落伍，反動。今者國難日深，世變日亟，謀國是者方以積極建設，迎頭趕上為立國之大經大法，凡百興革，齊頭並進，惟日不足，於斯時也，而忽揭無為政治之說，無亦過於違反時代之心理乎？雖然，愚將有說以處

此。

夫無爲政治之所以爲人詬病者，曰此黃老之說也，閉關自守時代之思想也，非所以語於大戰國之時代。不知黃老之徒固唱無爲政治，而無爲政治非黃老一家所能專有，實古代中國各家思想共同之趨向。儒家主制禮作樂者也，然孔子之論政治，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凡此所言，未嘗有一毫作爲之意。其欲奮然有所設施者，獨周禮一書，則漢代迂儒之僞製也，王莽用之，以殘其民，以覆其國，以殺其身。法家者流，世以爲『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者也，然韓非之論政也，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慮則下飾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教，審罰賞；』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曰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倚，故聖人執一而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世皆以商君廢井田，開阡陌，爲千古變法革命之始，不知井田至商君之世，久已廢爲阡陌，商君特因之而已；秦皇、李斯之廢封建，立郡縣，亦不過因時之變而爲之制其宜而已，法家曷嘗不重無爲哉？由此觀之，先秦之世，諸子百家，雖齊流並進，而論政之要，則一歸於無爲，而考其制論之世，則正值戰國紛爭之時代，非一統承平以後之議論也。秦漢而後，善觀歷史消息而斐然制作成一家之言者，莫過於太史公，其論政也，則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太史公豈苟簡之徒哉，彼亦深識夫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夫爲政之當要，而始發爲此言而已。故曰無爲政治爲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結晶者，非過情之譽也。

夫無爲政治之所以爲今世耳食之徒所詬病者，其故蓋由於誤解「無爲」之意義，彼蓋以委心任運，偷惰苟安爲無爲也。不知先秦諸家之所謂無爲者，乃指政府不當妄想包辦一切，惟應因勢利導，使人人自動發抒其力量耳，非盡天下而束縛

斷喪之也。故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四方來效』，曰『彼自以之』，是政府自居於無爲而導天下以有爲也，無論任何國家之政府，比諸民衆，究居少數，以少數政府官吏之精神才力，欲包辦盡一切事務，其用力雖甚勤，而收效必甚寡，即使所有官吏奉公守法，鞠躬盡瘁，天下待辦之事正多，亦豈能一一皆舉其事，而況官吏未必盡爲循良，政令未必盡能美善，徒恃人主一人之聰明才力，察察爲明，今日設一官，明日布一令，後日殺一人，號稱奮發有爲，實則死灰槁木遍天下，而惟人主一人勤勞至死，終無濟於事而已，古之人有行之者，王莽是也，明懷宗是也。若此之所謂有爲者，少數人之有爲而束縛天下使盡成無爲而已，堯雖賢豈能代天下人耕，舜雖賢豈能代天下女織，此其所以用力甚勤而收效甚寡也。無爲政治者則不然，爲人上者，以虛靜自處，以因勢利用，鼓天下之智而不自見其智，動天下之力而不自用其力，因天下之利而利之，則人人樂於有爲，人人樂於有爲則不必鞭笞撻伐而國自治。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可馬談之論六家要指也，曰『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

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此卽老子『當其無有車之用』之意。豈惟道家如此哉，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傳統精神蓋胥不外此也。

而或者謂凡此所言，皆平世之論，不可施於據亂之世。大抵承平一統之朝，欲民之安靜不擾，故無爲之說尙焉。方今列國並立，武競是務，有國者方且日日申儆其國人而惟恐不及，一日之懈，遺禍百年，方斯時也，何敢言無爲，又何忍言無爲？況今日抗戰建國，百務並舉，前方之整軍經武，後方之建設統制，在在皆需以大有爲之人，領導大有爲之業。以世界形勢言如彼，以國家需要言如此，是以二十世紀以後，一切國家皆已放棄自由放任之政策，而羣趨於干涉統制，政府之干涉統制最力者，其國勢亦最強，反之則雖以英法席豐履厚之國，不免於戰敗，此豈言無爲政治之時乎？此其言似矣，然而猶未暇深考也。爲斯論者，但見他人建設計劃之猛晉，與乎干涉統制之奏功，遂以爲任何國家皆可循斯涂軌，一蹴而及，而不知凡

與一利，舉一事，其間必有一定不可越之步驟，良工不能爲無髻之簪，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人但見現代強國之突飛猛進，而不知其奠基實在於數世以前，使無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之軍事組織與夫官僚政治之訓練，則希特勒雖英雄不能以八年而舉席捲全歐之大業；使無大彼得以後現代化之基礎，則布爾什維克黨人雖日日言五年建設，亦豈能於咄嗟間造成國防之完整壁壘乎？夫言建設則人才經濟皆須有先期之培植，言統制則調查統計皆須有預立之規模，苟並此而無之，則所謂計劃云云者，僅成其爲紙上樓台而已，至於國民精神之培養與夫道德心之鍛鍊則又一切建設統制政策推行之先務矣。吾先民知其如此，故其立言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又曰『雖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知建設之不易，而言之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曩年愚在『醒獅週報』嘗爲文討論建國計劃，主張建國事業應分三期：第一期爲休養生息之時期，在此時期政府所應作者祇爲吏治之整飭，治安之保障，其餘一切應儘量讓民間自由發展，使民力由寬裕而充實，人心穩定，國基自固，然後始能進而入於第二期之培植時期。在第二期中，政府應集中全力於交通之開發，教育之建設，使人才與

環境兩者均有準備，然後始得再進而言第三期之大規模建設開始，此其意見，至今仍堅持如故。此文發表在十餘年前，當時正在軍閥內戰時期，民生之凋敝，國勢之凌夷，俱非輕言建設之時，而必以休養生息爲主。今雖時異勢遷，然而國土淪陷，戰亂相尋，民生之苦痛或更有過於曩日者，然則今日而言國家之建設，吾言或尙不無一顧之價值乎！

建國之要既如此矣，以云抗戰，兵員之補充，財政之徵發，軍備之充實，交通之開拓，在在皆須民力忍受重大之犧牲，此爲國民應有之負擔，無人敢加以反對。然在執行政策之時，亦須同時兼顧國防之需要與民力所能擔負之最大限度，何則？目前中國之抗戰爲國際最大戰爭之一，其性質爲長期的，其最後勝負非僅決於戰鬥之進退，而實決於整個國力之充實鞏固的程度。國力何由以表現？表現於民力，更表現於民心。故戰勝之要，在固結民心，安定社會，使一切潛伏的病菌無由發作，能支持至最後五分鐘者，卽爲最後勝利者。而其所以致此，則必在行簡易之政，布寬大之法，使民與環境相安，有樂生之心，無畏死之念，然後始能親上死長，與政

府共患難而效死勿去。昔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除秦煩暴，而三秦自定，道偵塗察之術，偶語棄市之禁，一概勿用。馬文淵之遨遊於二帝間也，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反盛陳陞戟以延故交，此井底蛙耳，惟世祖能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是知戰爭之際，文法貴於簡易而不貴於繁苛也，孰謂無爲政治無裨於抗戰哉？

夫無爲政治非委心任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之謂也，特謂爲人上者善執天下之樞機以因勢利導，而不與田夫野老爭一手一足之烈耳。政治一技術問題也，不知爲政之要者，終日驅其政府人員辛苦不休，人人而訓練之，事事而干涉之，似若有爲，而所遺甚多，流弊甚大，此正如手工業技術下之生產事業，所恃僅匹夫匹婦之人力耳。善爲政者則不然，彼以國家爲一大工廠，全民爲一大機器，組之以法度，運之以神智，因其勢而利導之，所費僅彈指之力，而凡百庶事樞紐一動，自若跳丸轉轂而不能自休，此無他，恃機械而不恃人力之效也。無爲政治精意如是而已。

是故善言無爲政治者必謹法度，法度之於國家，猶齒輪引擎之於機器，所以執簡御繁，運萬彙於指掌者也。人治之效有限，而法治之效無窮。法治有時而不效

者，非法治之無效，乃有法而不能執守之過耳。善爲國者，不貴用人，而貴用法，法不貴繁而貴簡，不貴高深而貴平易，立法之始必度人情之可行者而制之，法一定則不可易，朝令夕改，使人耳目不知所從，雖有聖智無能爲教。法之行必自上，必自近，無有例外。不於法外賞人，不於法外罪人，賞罰之權不操之於一心而一斷之以法，雖布衣走卒皆能據法以爲斷，如是則國是定而人無徼倖之心，人無徼倖之心則自能各奮於所業，而爲人上者可以無爲而治。非然者，惟市恩於私門，門巧於暗室，使有法而不能行，雖日日鞭策其國人，將何益哉？故善言無爲者，必自謹法度始。

法度定矣，而所以運用之者則在於審勢，法之形有定，而勢之變無窮，故守法易而審勢難。中人皆可以守法，而上智有時昧於審勢。審勢之要在於不持成見，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言雖爲修身，可以與言爲政。世之爲政者，每好以一己之見強人以必從，爲其下者又復從而阿諛煽揚之，孔子所謂『意、必、固、我』之蔽，一一皆犯之，雖其善者不過用一

人之智而已，將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此其蔽皆在乎有我。夫專己自私，匹夫小人之事也，而非所語於執政，執政以身任國家之重，則不能不棄小我而就大我，彼其身已臻爲國家之代表，則其所以自處者，非獨個人小己之能而已。故人人可以有爲，而權勢愈高、責任愈重者，則愈當以無爲自律，惟其無爲，故能滙天下之智而爲己智，集天下之力而爲己力，其所舍愈多，其所就愈大。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豈沾沾於有爲者之所能躋哉！

儒道法皆言無爲，而又皆言因循，因循者無爲政治之核心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因循者，因勢利導之謂也。古之善爲因循之政者莫如管仲，桓公實怒蔡姬，管仲因之以伐楚。今之民古之君也，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圖始，卒然語以非常之業，加以難堪之法，莫有不掩耳而疾走者。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善導之，不善爲政者逆其勢而與之爭。夫民猶水也，導水使就下則易，逆水使趨上實難，拂民之欲，而欲以成大功，難乎其爲政矣。夫惟能無爲者，始能審當前之勢因而利導之，及其成功，有過於拂民之欲者萬萬，奈之何其弗思也。

夫爲政者之所以因民之欲而鼓導之者，所恃者何哉？一曰義，二曰利，此兩者人心之所同也。人心莫不有好義之念，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鄙夫可以與效死。抗戰以來，舉國影從，辛苦五年而不稍泮渙者，豈非愛國大義有以範圍乎人心者哉。然徒義又不能以久行也，則又必繼之以利。爲天下者與天下共其利，爲一國者與一國共其利，利散於人人則衆集，利集於一己則衆散，故爲國者不患言利而患利之不溥及也。夫人心莫不嗜利，利之所在，不策而自勉，爲國者苟知此義，則行政之推行不必待鞭策之時時隨其後也。無爲政治者無他，與天下共其義，亦與天下共其利而已矣。

中國古聖王相傳之心法曰「允執厥中」，執中者又無爲政治之精意也。世之蔽於宋儒理欲之辨者，每以爲人欲之外別有超然之理，而所謂中者，卽懸於此超然之理界內，於是專制之主，偏執之臣，各以其所謂中者責人於廟堂之上，而中之理愈晦。清世宗之著「大義覺迷錄」也，明代諸臣之議大禮爭三案也，皆以其偏私之見而強指爲事理之中，其所爭愈烈，其去中愈遠，而馮道之徒，持模稜兩可之見者，又誤

以調停折半爲中，此兩者各有所蔽。夫古之人言中者必言庸，又必言和，故中之理非懸於象外，實寓於此圓顛方趾之寰中，質言之，中庸者常識之見耳，多數之意思耳，人欲之諧和調整者耳。善爲政者，即在能於雜然抵觸之諸多意見中，求得一人情事理之當然軌徑，所謂「允執厥中」者在此。而必爲政者自處於無爲無欲，始能於人情事理之間尋得常識上之中點，否則將執一己之見而悍然指爲絕對之中矣，尙何能物來而順應哉！

夫無爲之政，其立名似淺，其寓義實深，雖累千萬言不能盡說，然尋其要點，則不外「天下爲公」四字，惟公則無私，無私則無我見，無我見則可以守法度，審勢宜，因民之欲而善導之，不至有四海困窮之失。世之善用無爲政治者，不必其心果公，然必以無我之見應事之變。方其初若無所利於天下，及其有成，天下不足以盡其利也，何必斷斷爭一時之喜怒得失而後始爲利哉。

無爲政治之思想大成於西漢，而政治上之收效亦以西漢爲最著。高帝創業之始，卽懲秦苛暴，力反所爲，以寬大爲教。高帝之爲人，智不如良平，勇不如絳

灌，其人蓋百無所能者，惟其無能，故能盡用人所能，收天下英傑於彀中，以視項羽之喑鳴叱咤，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者，度量之相去不啻天淵。彼其一生，所用者概爲無爲之術，而又輔以子房之陰教。黃石公圯下之事，所以教子房者，在於能忍，在於不與暴秦爭血氣之勇，而陰持其隙以待天下之變，蘇長公論之詳矣。黃石以是教子房，子房以是教高祖。方項羽之自立西楚霸王而封高帝於漢中，雖帝之豁達大度有所不能忍也，子房則勸帝因燒棧道以示無東還意。及羽殺義帝而東擊田齊，子房則勸帝因而爲義帝發喪以收天下之心。韓信兵下三齊，謀自立爲假王，子房則勸帝因而真予之。諸將聚議於沙中，謀爲不軌，子房則勸帝因封雍齒以安反側。及夫鴻溝定約，羽以糧盡而東歸，子房則勸帝因而擊之。此五者，劉項成敗之大關鍵也，而皆得力於因勢利導，勢不可爭則避之，勢可爭則崛起急爭而勿失，凡此皆無爲之術之一端也。漢之君臣承高帝子房之遺教，以無爲爲訓，對內對外概用此術。曹參爲相，知天下初定，不可以更煩擾之使復亂，故自居於無能而以追隨蕭何成規爲務，客有來見者，飲以醇酒，使毋妄言與革。冒頓之遺書謾辱呂后也，季布請斬

樊噲以杜大言壯語者之口，彼蓋審知當時內外之形勢，而知其非如此不可也。文帝繼之，其一生蓋純粹秉無爲之教者，趙佗稱帝於南越，高帝所不能屈，而帝以一紙書屈之。吳楚諸王，割據江南，尾大不掉，賈誼所以痛哭流涕，而帝賜几杖以安之。漢初羣臣，張良、蕭何、陳平、周勃、陸賈、婁敬之流，概知無爲之要義，其奮然欲有所設施以改絃更張者，獨一少年氣盛之賈誼耳，誼亦幸而不用而已，使其得志，欲其不爲王安石之變法失敗不可得也。吾嘗深考西漢初當時之情勢，國基初定，人心未安，匈奴坐大於北方，西斷河湟，東盡遼海，成三面包圍之勢，高帝以百戰精兵三十萬衆，而困於平城，當斯時也，漢之爲漢，幾幾乎有晉、宋、晚明之危，使其君若臣不察形勢，漫然爲自欺欺人之壯語所中，樊噲之徒將其軍，賈誼之流持其政，內則法令紛更，外則戰鬪輕啓，漢之爲漢，未可知也。獨幸當時中國民族尙在務實而不務虛之神智健全時代，南宋晚明理學家所造成之囂張氣習尙未深中於士大夫之腦府。漢初之士大夫皆自農民出身，故思想平易而近情，始終持無爲之教以立國。文帝之末，家給人足，太倉之粟至朽腐而不可食，匈奴雖強，顧無釁以啓之。

至於武帝，遂能席累世之資，乘匈奴之衰，而開大有爲之盛業。武帝之大有爲，自高祖以至文景累世無爲之所賜也。此其成敗之林，蓋有大可以供吾人深考者也。

並世世界各民族中，善用無爲政治者莫過於英國，其對內對外亦概採無爲之術。民權運動在他國爲釀成革命之媒，在英人則爲改良政治之階梯。政府對於民衆，不但不採禁錮壓抑之手段，且常迎其勢而利導之。一八三二年改革憲法之爭，貴族恃其上院之多數屢駁下院之議，而其君若相反助民黨以抑貴族，勅任同情民黨人士爲上院議員，以改變議場之形勢，憲法改革案終於通過而革命得以不作。世界任何政府莫不嫌忌反對黨，而英之反對黨領袖乃與國務大臣同領國庫之薪給，同成爲憲法之一部，故曰「陛下之反對黨」。英之貴族至今仍爲國家之中堅階級，其所以然者由國王每年勅任民間出身之社會領袖若干人加以封爵，以增加貴族階級之新分子，故英之貴族得以不至完全朽腐。凡此皆因勢利導之一術也。其馭殖民地也亦然。因其舊俗而不革，寬其羈勒而不禁，爲之役屬者久而忘其爲屬國，故西葡諸國之屬地皆不數世紀而失，英國獨得保存至今。其滅印度也，一公司之力耳，克萊武

因印人種族宗教之仇怨，用印人以制印人，坐得一大國，至今治印度者仍持其術，利用土王以反對進步開明分子之獨立運動，其於印人之優秀者，則誘之以官爵，分之以權位，使其效忠而弗叛，凡英人之所以宰制印度者，皆無爲之術也。當十六世紀以還，歐陸各國日尋干戈以爭進退於大陸咫尺之地，英人獨持人棄我取之術，拓地於海外，坐得全世界之半而人不知，其術亦誠狡矣，問其根柢，則不過無爲之術之一端而已。

其次，蘇俄近年來之政術，亦有深令人注意者。俄之內政，純以規持專霸爲務，帝俄然，今之蘇俄亦然，其去無爲政治甚遠，其道太艱不可以久，故不具論。獨其近十餘年來之外交方略，則亦可謂深得無爲政治之竅要，其得力在於審勢。九一八之後，日寇囊括東北，駸駸有北進窺俄之意，俄人知勢不可敵，則隱忍退讓，寧以廉價出讓中東路而不與較。及七七中日開戰之前，日人砲擊黑龍江俄艦，以試探俄人之態度，俄則又隱忍示弱而不與較。於是日人趾高氣揚，遂陷入「中國事變」之泥淖，俄人得乘機以繕務其東境國防，中日之戰俄之所深利也。最近之蘇日

中立協定又爲噉使日本陷入南進泥淖之一大手法，鬪日美於南洋而坐待其變，此又俄之所深利也。其於歐洲事變亦如之。德蘇協定之結果爲驅德國與英法戰於西歐，德人犧牲生命武力，僅得征服十四國，俄人按兵不動，亦攘得波羅的海三小國及波、芬、羅馬尼亞三國之土地。今日德國武力正在如日中天，俄人則迎其勢而與之合，未嘗以德之染指近東而忿忿與爭也。吾人試回想數年以前，國家環境之惡劣，四圍仇敵之多，孰有過於蘇俄者，乃數年之間，向之仇敵皆已化爲友國，東境西境晏然無事，國防因以整頓，國際地位因以日高，此何術之恃哉？蓋亦彼之領袖深察夫「物來順應」之術，而能因勢利導而已。此眼前之例，爲吾人所熟知者也。

烏乎！世變日亟，來日方長，吾以弱國而孤處於虎狼之間，抗戰將及五年，勝利猶待努力，軍事也，政治也，外交也，經濟也，一一皆須以非常之眼光手段魄力應付之，此其不易，曷待煩言。願吾聞最高當局之詔示矣，曰「以不變應萬變」。夫萬變者，外界之勢態也，不變者運用之一心也。事變無窮，非我所能主，而能主者在我一心，我之心誠虛明焉，寧靜焉，不動一毫成見，不動一絲感情，『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不爲物先，不爲物後，』相其機而利導之，則內外之事態雖千變萬化，吾何懼哉。吾之先民予我以深厚之文化遺產，吾恃此五千年民族智慧經驗之結晶以應付一切新進之民族，吾綽綽有餘裕矣。吾故曰：亦有「無爲」而已矣。

三十年五月二十日成都新中國日報專論

戰後國策研究的重要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一——

此時便來談戰後問題，似乎爲時過早，但是戰爭無論打到一百年，也總有結束的一天。在戰爭結束，和會召集的時候，在戰後的若干年以內，任何國家總須有一個確定的國策，才能免於臨時應付，手忙腳亂之苦。我們經過這一番的苦戰，總算得知國際情勢的險惡，難道這些險惡的因素一到戰後便會一齊雲消霧散，永遠不會重生嗎？拿上一次歐戰的例子來看，拿無數的人類的歷史來看，我們不敢相信這種奇蹟。蔣委員長在本年元旦告軍民書中曾經指出：『自助人助是不易的眞言，世界種種事都首先要靠自己……而從立國久遠的基礎上來講，更要十分警惕。須知道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沒有眞正自立的基礎，即使我們的軍事勝利了，把敵寇消滅了，我最後仍有失敗的危險。凡是不能眞正自強自立的民族，徒然依賴外面

的形勢而疏忽大意，甚至驕矜懈怠的，最後必然失敗。試看古今歷史，常有打了空前勝仗的國家，却在十年二十年之後，遭受更大的失敗，甚至至於淪亡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就在最近歐洲戰爭中，也有若干國家足爲我們的鑒戒。今後的世界，更沒有一味僥倖而能生存的民族，一切都靠着自身真正立國的實力……。」我個人完全同意蔣先生的這一點看法。近三百年來的中國人，在異族專制的朝代下，養成了一種苟且敷衍的性格，凡事只講眼前零碎應付，不敢稍涉遠大之想。卽偶有一二遠見有識之士，發爲議論，不是目爲空想，則被斥爲怪論，這種現象實在是民族文化衰老的表現，不但過去的中國人有這樣毛病，就是現在正吃苦頭的英美民族，又何嘗不如此？英國人是最講實際應付的民族，但也就因爲太過重視現實而忽視遠見，才弄成今天手忙腳亂的局面。試想，二十年來的英國執政者，如馬丹諾、鮑爾溫、張伯倫之流，如果能稍稍有點遠見，世界何至鬧成今天的樣子？民族和個人一樣，有偏於理想者，有偏於現實者，二者都是過猶不及。德日等國因爲過偏於誇大的思想而不顧實力之有限，以致今天樹敵過多，終不免於失敗；英美等國則又過偏於現實而缺乏

遠大的見解，也不免要吃點眼前苦頭。我們中國人的性格近似英美，在今天，要糾正這種缺點，雖不必一定過爲非常可喜之論，但是稍稍把眼光放得遠點，總是應該的。

中國的抗戰到了今天，才算到了展開正面戰爭的時代，我們既已與二十五個同盟國家聯爲一條戰線，非完全擊潰敵人力量，決不中途妥協，在前途苦惡的奮鬥裏，我們無論任何犧牲，總要爭取最後勝利，並且我們也相信最後勝利一定會到來。但是勝利之後又怎麼樣？我們的抗戰不是單要爭取軍事的勝利，我們所希望的是在勝利之後能夠永遠保持我們獨立自由的國家地位，不至於再受這樣一次或數次的慘痛教訓，因此，勝利固然要緊，而如何在戰後確保勝利，確能收到勝利的戰果，則尤非易事。正如最高當局所指示的：『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沒有真正自立的基礎，即使我們的軍事勝利了，把敵寇消滅了，我最後仍有失敗的危險。』況且戰事一旦結束，和會的問題就立刻要到來，我們預備在和會中主張什麼？要求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預防些什麼？這都不是咄嗟之間少數當局者所能解

決得了的，必須在此時起，就動員全國的腦力，學力，根據國族的理想，歷史文化的背景，國際的形勢，和自身的力量地位，切切實實仔仔細細，作一番通盤的打算。最近「大公報」曾主張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下設立一個「戰後國際安全設計處」（見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該報副刊「戰國」第五期公孫震先生論「此後天下，此後中國」及本年一月五日該社社評），我個人非常同意這種建議，但在政府未經設立此項機關之前，我們也不妨以私人資格先行擬議一下。運籌於帷幄之內，折衝於壇坫之間，不是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也不妨以草野蕪蕪之見，對於帷幄和壇坫貢獻一點參考的材料。

自然，我們不知道戰爭可能於何時結束？我們也不知道在戰爭中將有如何的新變化？我們更不知道將來敵人的失敗會敗到什麼程度？我們的勝利會勝到什麼程度？同盟國的勝利是否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是否也就是同盟國的全盤勝利？因此有許多問題不好預擬。但有幾點我們不妨預爲假定：第一，我們（包含同盟國在內）在此次戰爭中必須勝利，因爲不勝利就要滅亡，那麼一切問題就無從提起

了，因此我們討論到戰後國策，必須假定我們在戰事中要打敗敵人這一點上。第二，勝利必須是完全勝利，最低限度也要做到解除侵略國家的侵略武裝，否則便不必談起，關於這一點，羅邱宣言和此次華府二十六國盟約俱已堅決聲明，中途妥協的事可以不必憂慮，此次戰爭無論在民主國家或軸心國家方面，都是賭國運於一擲的孤注戰爭，雙方領袖知之甚明，所以決無中途妥協之可能，中途妥協就是滅亡，民主國家再不會上這種當了。第三，民主國家既聯為一條戰線，利害存亡彼此共之，所以也決不會有一二國家中途拆台的事發生，因為中途拆台的結果不但友邦不利，自身也必無好果，事實上二十六個同盟國之中，已經有許多是流亡政府，早已無台可拆，其餘的國家至多戰爭一時不利，也不過再援例流亡一次，有何中途退出陣線之必要？所以這一點也不必憂慮。

根據這三點認識，所以我可以把我們的論點建築在以下三個假定的基礎上：第一，同盟國家必獲最後勝利；第二，勝利必要全部的勝利，即消滅敵人的主力，就我們中國言，還須加上敵人全部退出國境；第三，勝利必然是大家的勝利，即不能是

友邦勝利而獨令我向隅。有了這三點假定，才好預擬我們的戰後國策。這三點雖是假定，但却是必要的假定，因為這三個假定若不能實現，其反面即是我們的滅亡，一切問題就都不必談了。

只有兩個問題不好假定，第一，這戰事要延長到多少年才會解決？這一點關係不大，姑且不問。第二，我們中國在這次戰爭中將有如何的貢獻？將遭遇如何幸運的或不幸的變化？這却是決定戰後國策的必須注意之點。這問題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也靠天運。天運不必提，人事却必須盡到。我們所以要提起這個戰後國策的問題，也就是促我們盡到人事的一種辦法；我們必須確定了我們在戰後和平會議中所想要得到的結果，我們才能按照步驟在此時就預先打下了基礎努力做去。譬如說：我們在戰後希望收回東北失地，則在此次戰爭中就必須準備把國軍開到東北，辦到驅逐敵人出境，若是單等別人替我們打敗敵人，收回失地，則到了和會裏，是否真能慨然雙手奉還，以國際上的成例來看，似乎還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此外，戰後的國際形勢，也是必須考慮到的一點。我們自然可以說民主國家必

獲完全勝利，但勝利之後是否仍能常保彼此的和協？各國的內政在此次戰爭中有無變化？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國際間的團結合作兩者的關係如何？戰後資源的分配，利害的調節，文化思想的演變，社會組織的演變，各將如何？對於我們的國策都是息息相關，以後我們將首先討論到這幾個問題。

現在，我們假定戰事可能於明年（一九四三年）杪結束，和會於一九四四年召集，和會地點也許是華盛頓，戰事的結果是軸心全敗，至少日本的主力被消滅（依我的看法，希特勒的崩潰或許還要先一步）。根據這些假定，擬定我們在戰後和會中應爭取的條件，此後三十年內國家對內對外應採取的方針。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戰後國際局勢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二——

我們要研究出一個戰後整個國策的方案，首先必須對於戰後的國際局勢有一個通盤澈底的了解，預言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也是一件最不可靠的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對於未來的世界局勢完全預測得一點不錯，但這却不是說世事完全不可預測。具體事實上的預測自然是容易錯誤，因為其中含有許多隱秘的及偶然的因素為我們所無從知道者，但原則上的預測却大體可以不差。

我們現在要討論戰後的國際局勢，自然不能不以去年八月十四日發表的羅邱聯合宣言為討論的根據。自本年元旦二十六個同盟國家簽訂華府公約以後，羅邱宣言中所舉的八原則已由美英兩國的主張，變為全體同盟國家的主張，包含蘇聯、中國、印度、及部分美洲國家在內。最近汎美會議的結果，南美諸國的態度也必更

爲鮮明，頗有參加公約的可能。如果民主國方面完全戰勝，軸心國家潰敗，則戰後世界的建設自必以此八原則爲根據，不會有什麼大的出入，因此我們的討論即可由此出發。

按羅邱八原則中的主張，分析起來，約可分別爲五項：甲、關於各國領土主權的尊重及恢復問題（第一二三條）；乙、關於戰後經濟合作的問題（第四、五條）；丙、關於戰後世界和平安樂的保障問題（第六條）；丁、關於海洋自由的問題（第七條）；戊、關於解除侵略國家武裝及裁減軍備的問題（第八條）。我們試就以上五項分別討論其能完全實現與否。

甲、關於領土主權的尊重及恢復問題，自爲此次二十六同盟國之反侵略戰的主要目標，亦即中國抗戰四年有半的主要目標。戰後如同盟國家完全勝利，此項主張自必實現。但如欲完全依照此原則而實現，則必發現種種困難：第一，同盟國家彼此之間在戰前關於領土疆界問題本存在有許多爭執，如蘇聯與波蘭。第二，此次尚未參加同盟之國家，將來一旦參盟，是否亦將允其援例恢復領土主權，是否不與其

他盟國利益衝突？如波羅的海三小國之於蘇聯，如羅馬尼亞之於比薩拉比亞，如愛爾蘭自由邦之於北愛爾蘭。第三，參加軸心的國家，戰敗之後，是否仍許其保全領土之完整，如芬蘭、匈牙利等。第四，奧國是否仍認爲德國之一部分，抑贊助其獨立？如承認奧國人民之民族自決，則倘奧人因種族關係仍願與德合併，則是否德國勢力仍嫌龐大？如強爲分割，是否違背民族之自由意志而更伏將來的危機？第五，如澈底尊重民族自決，則印度、緬甸、越南、馬來、荷印、香港、澳門、及非洲等地是否亦可尊重當地多數居民之自由意志，聽其自決？凡此種種，在實行上均有困難，而在戰後共同敵人一經消滅以後，此種矛盾必更顯著。

乙、關於經濟之平等享受及合作問題，自爲安定戰後世界的主要問題，但其中亦有種種困難。同盟國家彼此間不但在經濟制度上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顯著的差異，即國民經濟生活程度亦彼此不同，對於經濟落後的國家是否仍准許其採關稅及其他經濟自衛的政策？如准許，則與宣言原則不符；如不許，則經濟落後的國家勢必不能抵制經濟先進國家的經濟勢力，將永遠淪於殖民地之地位，無法自振。此

外，人口多勞力賤之國家，如能自由取得原料及貿易權，則人口少勞力貴之國家亦有受窘之可能。又如世界有許多重要資源，皆出產於尙未取得自由獨立的殖民地中，此等殖民地之地位如不能明白確定，則將來關於資源問題必仍多糾紛。又世界經濟及對外貿易在戰前已有趨向於國家計劃統制之趨勢，戰後是否更加劇烈？如一國之對外貿易全由國家政府所統制，則貿易政策自必與外交政策一致，結果名爲平等待遇，仍不免有畸輕畸重之傾向。此外，戰敗國家如與其他國家享受平等之貿易及原料購取權，則如德日兩國人民之勤勞且有高等工業化之技術，是否在短期間即能恢復繁榮，更進而爲擾害世界和平之動力？這些問題也都是不容易解決的。

丙、關於戰後重建和平安樂的問題，宣言第六條所載僅係空洞之原則，並無具體方案，前述政治經濟上兩項矛盾無法消除，則雖有其餘七條的規定，亦無用處。故在戰後必須提出一種「廣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的方案，此項方案，自必早在各國政治家的意計之中，並有許多專家早已從事研究，我國關於此項討論似尙付缺如，本文即係爲此而作。

丁、關於海洋自由的問題，爲英美兩國多年爭執之點，此次已因英國之讓步而解決，但戰後和會中應如何使之實現，不至再蹈威爾遜十四條之覆轍，亦不可不加以顧慮。我國目前未發展海上勢力，但僑民徧布於六洲，將來終有建設海洋勢力之一日，對此問題亦不可不加以考慮。

戊、關於解除侵略國家軍備及普遍裁軍的問題，自爲吾人所歡迎。但國際間的種種矛盾如未能解除，則所有云云仍不免空話。上次歐戰後德國軍備已被解除，但到希特勒上臺後，重整軍備的計劃並未受到阻礙；蓋因國際形勢千變萬化，舊時之敵轉瞬間即可變爲朋友，舊時朋友亦不難一變而爲敵人。在此國際勾心鬭角的情勢下，如誤信列國能共同制裁侵略國家到底，事實上決無此理。即使勉強造一國際聯盟式的制裁機關，而因列國利害不能永久一致之關係，結果亦一樣無效。凡爾賽條約對於戰敗國家的處分不爲不酷，但曾幾何時，希特勒之報復即起，戰勝國家所受的慘禍更甚於往日。由此可見報復政策即使能堅持下去，亦未必是長治久安之道，況國際的形勢並不容許真能堅持報復到底嗎？

由此看來，我們雖認羅邱宣言中的八項原則，已較威爾遜之十四條進步，不妨即作爲討論戰後世界問題的根據，但也不可過分相信此項「世界憲章」的價值，尤其不可過分倚賴，以爲今後世界有此八條，即可永息干戈，進入大同樂土，若有此念，勢必重蹈第一次歐戰後各弱小國家相信威爾遜十四條的覆轍，受更大的慘禍。中國國民必須以自主的立場，正視未來國際的種種現實，獨立地有一番打算。

我以爲戰後國際局勢的演變將依以下的路向進行：

一、小國的時代已經告終，今後開始的是大國時代，人口至少在一萬萬以上的民族，才有獨立於世界的資格。

二、各小國將依利害情感，和文化理想的分野，分別依附於少數大國，構成一個聯合的單位，或共同的生活體。

三、今後世界上沒有孤立自足的國家存在的餘地，但也不會是全人類構成一個世界聯邦，今後國際政治的單位不是以前的民族國家，也不是尙在理想中的世界聯邦，而是上面所講的那樣一個聯合的單位，我們可以叫他做聯合的國家，或集團國

家。

四、由封建國家進化到民族國家，由民族國家進化到那樣由若干國家聯合而成的集團國家，是人類歷史向上時代的必然路線，是國家主義的發展，膨脹，而非消滅。

五、這樣的集團國家，在現今的「英聯」和「蘇聯」兩種政治組織內已早露端倪，今後可以預測者，如北美、中美諸國將以美國為中心而構成「美聯」，希特勒所夢想的歐洲合眾國雖因純以武力推行政策，而不顧及民族的情感，終必失敗，但中歐的條頓民族，將來未始不可依和平合理的方式構成一「中歐聯邦」。此外如南歐的拉丁諸國，如東南歐的斯拉夫諸國，如西亞的回教諸國，如印度洋上的印緬諸國，如南美洲的拉丁諸國，亦未始不可各自構成一聯合的單位。

六、聯合構成的基礎，第一是血緣的相近，第二是歷史文化的共同，第三是地理和經濟利益的連繫。此外政治人為的力量當然也佔重要成分，但純用武力侵略方式不能造成。

七、中國在過去二千年中，已將東南亞各民族團結成一文化的集團，今後如一旦復興，則東南亞的黃色民族，由文化的溝通進而為政治的連繫，自屬順理成章之事。日本以少數文化後進的民族，強欲以武力推行征服的政策，其必失敗自屬無疑。

八、過去以少數遠來民族支配多數土著的殖民地政策，在此次戰後無論勝負誰屬，自必有一個改變。強迫佔領的殖民制度終必崩潰，代之而起的是志願聯合的集團國家。

九、全世界集團國家共同生活體構成之後，各集團之間，可以維持相當長久期間的和平，在此期間人類的文化當更進步，但這並非說戰爭將絕跡於未來的世界。相反地，集團國家與集團國家間一旦發生衝突，其戰爭規模之大將更遠過於今日。

十、世界上落伍孤立不肯或不能構成集團國家的舊式國家，是將來世界爭鬥的根源，任何民族國家欲求不作犧牲品，必須努力向大國家的建設邁進。

十一、在戰後的最近若干年中，合理的集團國家尙未建設成功，舊有的若干矛

盾尚在殘留，如戰勝國家與戰敗國家間之矛盾，如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如白色民族與有色民族間的矛盾，如新興國家與舊有國家間的矛盾，如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皆可造成世界種種的不安。故世界各民族應在戰後努力研究一合理的建設方案，以消除此種種矛盾，而維持世界的和平。

十二、全世界的集團國家建設成功以後，彼時人類文化如更進步，則亦未始不可以合理的方式，聯合各大集團而成功一世界聯邦。

以上種種，自然不過是一種推測，其理由將於以後分別說明；但即使事實上戰後的世界局勢未必照此演進，也不妨當作一理想的計劃，而以人爲的力量促其實現，因爲這樣的政治區劃，才是既合理又合事實的。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九日新中國日報

過去的錯誤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三——

重建戰後的世界和平，這句話說來容易，做來實難。國際間既然存在有種種矛盾，即在戰後也不能澈底消除，則永久的和平安定實在是一種夢想，翻開一部人類歷史看，決無此事。要求世界的永久和平安定，只有實行孟子的一句話：『天下惡乎定，定於一。』讓一個國家用強力征服了全世界，或者讓全世界人用和平協商的辦法建設一個世界聯邦。這樣做去，內戰雖仍難避免，但國際的矛盾可以根本解除。但這種希望在最近期間能實現嗎？不用說，是完全不可能。威爾遜總統的國際聯盟方案，便是一個失敗的最近而又最觸目驚心的例子。天下事無絕對的好壞，適時者即為佳。世界大同理想雖好，但不是眼前這個世界所能夠就實現的。現在世界上的人類譬如轍中之涸鮒，所渴望的是升斗之水，而不是汪洋無涘涯的西江東海。

重建世界和平的工作中所應考慮的，不是那樣大而無當的大同之夢，而是怎樣酌取升斗之水以救活全世界奄奄待斃的涸鮒。雖然「天下水流通大海」，升斗之水也就是將來流入西江東海的淵源。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世界大戰並不是今天才有，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便是這樣的一個戰爭的世界，二十五年前，人類就曾經過一次大戰，在當時那次大戰快結束的時候，人類何嘗不想望此後可以永久和平，但是事實如何？『失敗是成功之母』，讓我們把過去失敗的經過重新檢討一下，或者可以幫助今後重建世界和平的工作，使有一個更正確的認識。

我們若說上次歐戰後主持世界政治的各國政治家，沒有誠心誠意希望永久和平的人，這話是冤枉的。威爾遜總統的信徒，就可首先起來舉出反證，不過，若說他們重建和平的方式不對，以致釀成此次更大的慘禍，則雖威爾遜總統本人復活也不能不俯首承認。上次歐戰後的重建和平方案，表現於國際聯盟及凡爾賽條約中的，有幾個重要的錯誤，這幾個錯誤便是釀成此次慘禍的根源。

第一個錯誤，是太輕信國際平等的空想，而忽視各國國力的比較根本有大小之分，不知大國間的協調，才是安定世界的主要因素。美國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國，但根本沒有參加國聯。蘇聯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國，但國聯將她排斥。德國雖然戰敗，但仍然是大國，在戰後受盡了壓迫。義大利名義上是參戰勝利的國家，但也不能滿足願望。以致戰後的國聯祇賸下英法兩個國家來唱雙簧。國聯的無信望，無能力，便是戰後世界不能安定，局面重翻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錯誤，是太重視民族自決的空想，替世界添出許多不必要的小國，更增加了世界糾紛的禍源。歐洲的局面，演進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除了巴爾幹一隅之外，本已統一成幾個大國，這幾個大國，對內則主權完整，無隙可乘，對外則勢均力敵，莫敢先發，因此從一八七一以後，到一九一四以前，歐洲才有四十年長期的和平繁榮局面。試想在德國和義大利未統一以前，這兩塊土地是否也是製造戰爭的亂源？上次歐戰後，世界的政治家如果有眼光，就應該順着這個統一趨勢，使紛亂的巴爾幹也統一成一個聯邦國家，減少歐洲大陸上的國家數目，則歐洲的亂源可以掃

除，不料不但不能如此，反逆着這個趨勢，將已經成功的德、奧、蘇聯三個大國，分割出許多新興的小國，從前一條通行無阻的河水，現在變成了兩國的境界，非有護照不能通過。結果替世界上添出許多貪慾的主權者，增加了許多軍備和經濟擔負，建築了許多關稅的壁壘，本來可以同屬一國、和平相處的人民，現在變成了兩個以上相互敵對讎視的民族，在人類文化生活上這是極端不經濟的現象，而這種現象的造成，一半誤於國際聯盟創造者的空想，一半也誤於英法兩國政治家的自私政策，此外，一部分莫明其妙的理論家，也要負一些責任。

第三個錯誤，是對於戰敗的國家處分過酷，以致種下了雙方永遠讎恨的禍根，釀成此次反動報復的大變局。希特勒之取得德國政權，純基於德國人民在戰後的苦痛讎恨心理，反對凡爾賽條約，固然是國社黨的一個口號，但也是大多數德國人民的心理要求。有人說，上次歐戰後對德國處分仍嫌太寬，以致養成反動的勢力，所以此次羅邱宣言乃主張在戰後痛懲禍首，這實在是似是而非之談。試想以德意志這樣一個民族，若非有方法將其種族滅絕，豈能永遠禁其復興，無論條件怎樣苛刻，

祇不過延長其復興的時間，從前所受的待遇越苛，報復起來也就越激烈，這是自然乘除之理，苛刻到了凡爾賽條約，也就至矣盡矣，也不過維持了十七年。今後縱使把德國打敗，難道還有什麼比凡爾賽條約更苛刻的手段。一八一五年歐洲列強打敗了拿破崙，但是維也納會議裏並沒有特別歧視法國，因此法國沒有懷抱讎恨的心理。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打敗了奧國，但是並沒有要求什麼，因此德奧不久便化敵爲友。一八七一年普魯士打敗了法國，訂了一個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因此德法尋讎往復不已。歷史家好罵梅特涅，但是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如果有梅特涅那樣有眼光的政治家，對於戰後民主的德國能夠待以平等，加以扶助，則民主勢力何至推翻？威瑪憲法何至撕毀？保守的興登堡何至登台？反動的希特勒何至站出？今後如果戰勝的民主國家仍然不能採取梅特涅的寬大政策，則打倒一個希特勒，誰能擔保過了幾年之後不再產生一個更兇暴的希特勒。那時節冤冤相報，人類浩劫更將無已時了。

第四個錯誤是沒有造成一個能夠維持世界現狀的中心力量。上次歐戰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覺悟了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但沒有尋出一個解決的好辦法。國際聯

盟是一個好理想，但却不是一個好辦法。人類如果希望靠加強國際聯盟或其他國際組織的力量，如創設國際軍隊或國際警察之類來維持世界的治安，這將永遠是一個空想。在國家組織和意識未消滅以前，國聯不過是一個協商的機關，本身並無力量，力量還在各個國家手裏。因此維持世界和平治安的責任，不當望之於國聯這樣有名無實的機關，而應當向各個國家本身求之。小國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因此責任就落在幾個大國身上。但是在幾個大國勢均力敵的局面下，也不會產生真正的和平，因此更應當有一個中心勢力的國家，以自身的力量負起這個責任來擁護國際的決議，制裁世界的強暴，維持人類的和平，這就是我國古代的霸主制度。國聯好比周天子，有其名無其實，必須有一二大國出而提倡尊王攘夷的大義，先放棄自己檢小利、避小害的心理，以公平恕讓領導各國，共同維持一個公認的軌道，如有不服者，不問對自己有無關係，必率衆以制裁之，這樣的勢力才是安定世界的要素。上次歐戰後英國是夠這樣資格的一個國家，但是不幸未能善用其機會。今後的世界，如果在各大國之間仍然不能產生一個霸主，則世界和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個空想。

第五個錯誤是對於幾個後進貧乏的大國，沒有給以正當的出路，以致激而橫決。這次戰爭軸心國家的口號是「以無對有」，平心而論，這個口號並不是絕對強詞奪理的口號。試想上次歐戰以後，世界上幾個工業發達、文明進步的大國，除了美國和蘇聯本身物大地博，無待外求以外，其餘都必須靠外面掠取資源以營養本身。然而世界廣大的殖民地，英法兩國就佔去了一半以上，四千萬人口的法國，擁有比其本身大二十倍面積的土地，而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德國，七千萬以上的日耳曼民族，反寸土皆無，尚不如幾個歐洲的小國，這樣的局面如何能維持下去？我們不要以為國家戰敗了，便應該剝奪了他殖民的權利，實際上國家雖敗而民族潛力猶存的國家，如果不給他一個正當的出路，那危險是可言喻的。即以俾斯麥執政下的德法關係而論，在歐洲，俾斯麥之對於法國，可謂待之極苛，備之極周，防之極嚴，然而他却曉得慫恿法國去作海外殖民的冒險，使法國人民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鬼有所歸，始不為厲。」上次歐戰後協約國的政治家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只知道一味箝制，一味把持，有己無人，貪利忘害，其遭受今次的教訓乃是當然。這一次

英美的政治家，總算懂得了這個道理，羅邱宣言特別提明『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利或潰敗，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這一點，才是今後世界和平的一線光明。

上次歐戰後的錯誤措施，也許不止於以上五點，但這五點却是最重要的。我們先認識了過去的錯誤，才能討論到以後的和平建設。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九日新中國日報

建設戰後世界的幾個原則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四——

因爲有過去的錯誤，才有今天人類空前的慘禍，這一次的世界大戰，不但是上次歐戰的翻案，並且簡直好像是上帝特別降臨執行末日審判的全權。所有過去數世紀來，一切民族所做的罪惡，所犯的錯誤，都要在這一次大戰中無情地顯露出來。這一次大戰，是整個人類的試金石，是所有民族的煉獄。同盟國家在過去也曾同樣犯過許多罪惡和錯誤，不將這些過去的罪痕澈底洗掉，最後勝利的前途恐尙遼遠。中國在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三十年來，所犯的罪惡和錯誤並不亞於其他各國，因此我們在忍受五年來的慘苦教訓以後，更應當積極發生猛醒。

我們希望人類在這一次慘禍以後，應當長進一些，因此對於戰後和平世界的建設便不能不多費一番心血。如果戰後還是不知悔改，人類的慘禍仍無已時。

戰後和平的建設方案，千頭萬緒，一時說不完，現在先說幾個應守的原則。

第一是公平。公平的意思不是平等，上次歐戰後巴黎和會的錯誤，便是誤認平等爲公平，結果又不能真正貫徹平等的主張，以致名實自相抵觸，弄成一個非驢非馬的世界。今後的國際和平，祇能依照公平的原則，却不能依照平等的原則。因爲民族與民族間正和個人與個人間一樣，本有智愚強弱大小文野之別，強使大屨與小屨同價，是最不公道的事，也就是最不等的事，結果必更釀成禍亂無疑。因此我們處理國際問題祇能講公平，不應講易惹誤會的平等。公平的解釋是各如其分，譬如大國應該有大國的分際，小國應該有小國的分際。人口衆多，增殖力強者，應該予以容納的機會；人口少而增殖力減者，也不應坐擁廣大資源，獨擅其利。民族自覺心已強的民族，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機會，不應使之常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民智愚下，精神萎靡的民族，也不必強爲提高地位，勉強製造一個似是而非的新國。歷史文化上，地理形勢上，血統和情感上，彼此融洽的民族，應該准許他們合爲一國，不可用人工割裂；自然和文化環境都不同的民族，也不應該勉強合爲一國，使彼此

都不相安。戰後的世界政治主持者，如果能體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心，爲整個世界設想，不專爲自己民族作一時短見的私利打算，世界和平必可多保持一些時候。

第二是消導。依照公平的原則，可以使世界各民族暫時相安一時，但歷史是變動的，今天之所謂公平，過了幾年幾十年之後，也許就變爲不公平了，到了那時候再來補救，就來不及，就未免要再釀一番禍亂。因此製定計劃時必須要放大眼光，看得遠些，要爲後來預留些餘地。譬如說，人口膨脹和資源的攘奪是戰亂之媒，戰後世界的締造便應當對於這個問題特別加以注意。對於人口過剩的國家，必須給他一個消納的尾閘，不能使貧無以爲生，激而成變。反之，以少數人口獨佔廣大土地的不平現象，也應該稍稍加以改變，今天的世界上，尚有許多未開發的土地，待人去開發，因此過剩人口的容納，並非沒有辦法，但是必須一些國家把種族之見，地理之見，以及一切猜疑防杜的政策修改一下。此外如戰前屬於國聯委託代管的土地，在戰後也應一律收歸國際共管，闢爲國際共同殖民地，由殖民地的居民自行組

織管理，名義上受一個新國際組織的統治，不可仍委託於任何國家，致被攘爲私有。

第三是化解。此次戰事，同盟國家如勝，則世界霸權將分屬於中、美、英、蘇四大國，此四大國均係地大物博的國家，本身可以自給自足，無待外求，又兼所信奉的政治原則傾向和平，故短期內當無向外擴張之念，世界和平的保障即賴於此。惟戰敗國家如德日等國，其民族性素來強韌，人口增殖力強而土地物產不足以副其慾望，雖經戰敗而讎恨益深，仍必伺機整軍經武以圖報復，時異勢遷，難保不更演出慘劇。加以同盟國家之中，如英國與屬地的關係，也難常保和洽。此等亂源不除，世界仍無真正和平之可言，但欲除亂源，不能一味用壓制剝削的手段，因其徒滋讎恨，更生糾紛，必須在實際上和心理上化除戰勝國與戰敗國、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讎恨，始可保其長治久安。化除讎恨之道，如對於已有自主能力的殖民地，須提早使其解放，成爲獨立國家。試觀此次戰爭中，菲律賓人之奮勇抗敵，和馬來、荷印、緬甸、印度土著人民之徘徊觀望，即可知美國的政策比較賢明些，自身亦受其益。

今後經此次大教訓，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當必覺悟殖民地政策之無益有損，在戰後自動放棄舊式政策，實屬順理成章之事。至於戰敗國家的處分問題，彼此更爲嚴重，更不可以意氣出之。若欲在戰後保持長治久安，必須對幾個戰敗的大國保持不割地，不賠款，不懲罰的開明政策，除戰敗國過去用武力攘奪的土地照理應交還原主，及其所侵滅的國家應使恢復獨立外，不可再割地寸土，以暴易暴。像凡爾賽條約的鉅大賠款，也決不可再施之於戰敗國家。軸心國家在戰敗之後，內部必然發生革命，民主勢力必再抬頭。戰勝國家對這些民主勢力必須待以平等，加以扶持，方可使極端勢力不至死灰復燃。否則若一味見利忘害，逼迫得他們走頭無路，則仇恨之心愈積愈深，後患更不堪設想。

第四是統制。單靠消導和化解還不能保永除禍患，因爲有些民族驢武性成，不甘失敗，雖待以平等也難免仍隱懷讎恨，故必恩威並用，加強統制力量，使不能妄肆荼毒。統制的難題在執行統制的主體屬於何人。過去國際聯盟一類大而無當的組織已證明其失敗，因爲人類大同的時期去今尙遠，任何國際組織不過徒爲大國的工

具，若賦予這些國際組織以武力制裁的實力，如國際軍隊之類，結果徒供野心國家的利用。況戰後無論結果如何，世界上總是幾個大國並峙的局面，尙難演出一個唯一的中心勢力。國際組織如爲某一大國所操縱，則其他大國勢難甘心，仍難免引起不合作或報復的行動。不如順已成之勢，將全世界劃分爲幾個集團，每一集團以一勢能控制其周圍的大國爲中心，聯合四圍小國，組成一區域聯盟，如現在汎美會議的組織，再加強些，便可以執行這個任務。同一聯盟中的國家與國家間發生爭執，卽由本聯盟加以調處，如有不服者，由聯盟中的中心國家聯合餘國加以制裁。此一聯盟與彼一聯盟之間，再組織一普汎的國際仲裁機關，逐漸推進人類合作的事業。如此組織較切實際，比已往的國際聯盟或更有效力。

第五是培植。世界永久和平的實現必須人類大同之後，大同雖不能驟躋，但不可向此方面做準備工夫，其入手之方，在教育思想的薰陶。過去軸心國家之所以特別發展侵略思想，主要在於其普魯士式教育之薰陶。今後若欲使此等民族由侵略轉爲和平，必須扶助其國內的民主勢力，自動改革其教育思想。如能由國祭產生一

文化教育同盟，凡加入此同盟者，其教育方針及教材教法必須由同盟審定，世界任何國家之師範教育必須由同盟主持，同盟應該就可能範圍內互換國民教育師資，使兒童在幼小時即受有博大寬容之世界教育，對異民族的情感風習得以了解，如此種政策能繼續至一代兩代之後，將來的人類或可懷抱一共同之理想，一切畛域之見自可掃除。但此事在今日未必即能辦到，不過應向此方面推進罷了。

戰後世界的和平建設如能依此五原則進行，則人類福利或可望及早達到。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新中國日報

民主運動者應有的風度

今天是民國第三十一年度國慶日，我們年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儀式，爲的是要珍重紀念這個光榮的日子，因爲三十一年前的今天，正是我們中華全體國民推翻二千年獨裁專制，建立民主自由國家的一個偉大日子，因此我願意趁這個機會，對於民主運動說幾句話。

現在全世界正在展開民主主義對獨裁專制主義的空前偉大的鬭爭，一方面是中、美、英等全世界大多數的民主國家，爲擁護有光榮傳統的民主自由而誓死抗戰；另一方面是德、日、義等專制獨裁的國家，爲滿足其領袖及一部分黨徒的權力欲望起見，不惜發動空前殘酷的侵略戰爭，向民主國家進攻，以奴役全世界自由人民爲目標，這戰爭打到了五年以上，戰火遍及七洲。照表面一時的現象看來，似乎獨裁國家因行動敏捷而着着爭先，民主國家因舉動迂緩而不免暫時落後一着，也許

有人看了這種現象，不免發生錯覺，以爲民主政治畢竟不如獨裁專制來得爽快，因此最後的勝利或許竟不在民主國家方面。我個人相信愛好自由平等的中國國民，決不會有此錯覺，但理論上或許可以推演到這一步，因此感覺有特別提出來說說的必要。

我以爲民主與獨裁的是非勝敗問題，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爲民主主義的勝利是早已確定了，民主主義的思想早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我們現在震駭於全世界的獨裁主義的反動兇殘，以爲勢不可當，但是如果稍稍有點歷史眼光的人，就不會承認這種事實是真的。從政治思想的演進史上看來，我們必須承認今天世界的獨裁主義者已經比他們三百年前的老祖宗氣餒小得多了。三百年前，歐洲的獨裁專制主義者，上自反動的君主，下至反動的思想家，一齊用「王權神授」的理論來否認民主的權利。他們根本不承認他們的政權是由人民所賦予的，他們以爲君主的權力是受之於天，是上帝的意旨，他們天然應該統治別人，大多數人民天然應該受他們的統治，而不許絲毫過問。試問今天的獨裁領袖們，有那一個敢採取這種態度，根本否認他

們的政權與人民公意不發生關係？希特勒是世界最大的獨裁魔王，然而他並不會否認納粹的政權基礎不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面。他在未取得政權以前，曾經努力於組織民衆，宣傳民衆的工作至十三年之久，最後，一九三二年三月的總統競選，他獲得了一千一百萬選民的支持，同年七月的國會選舉，他依然以一千三百七十萬票的擁護，獲得了二百三十個議席。由此才使興登堡讓步，而於次年組閣成功。他上臺以後，雖然着着實行專制獨裁的壓迫手段，但表面上却無一不根據民主的憲法程序；譬如，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國會縱火案而發布的「國民自由權停止命令」，是根據威瑪憲法中總統應有的權力，並非非法的行動。希特勒內閣的獨裁權力，也是根據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國會通過的「全權委託法案」，當時的議會中以四百四十一票的絕對多數通過此案，反對者僅九十四票。自此以後，希氏每遇國家大政，如退出國聯，收回薩爾流域，萊因進兵等，無一不舉行國會總選或全民投票，以覘民意。就是在今年二次攻蘇之前，也還請求國會授以獨裁全權，並沒有否認人民代表的權力。我們說這個話，並不是替希氏辯護，以爲他是真正實行民主主

義。我們的意思是指出一件事實，即猖獗狂妄如希特勒及其黨人之流，也還不敢公然否認民主的權利，否認他的政權不是由人民賦予的，如三百年前「王權神授派」的那樣膽大。此外，法西斯夥伴如墨索里尼及日本軍閥，在名義上也都有一個民選的國會，也都須取得選民及民衆代表的同意才能建立政權。因此，我們可以歸結到一句話，就是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公然否認他的政權不是由國民公意所賦予的，雖法西斯國家也不是例外。這件事實，就證明民主政治已成爲世界上唯一的潮流，民主主義在思想上已取得了決定的勝利。

反對民主政治的人，或許又引法國的失敗爲例，以爲法國因爲實行民主政治才敗於獨裁德國之手。這又是一個誤解。我們知道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爲實行民主主義，而是因爲並未真正實行民主主義，才招致了這次的大失敗。民主主義在法國是一個流行的口頭禪，但實際上法國的政黨和政治家沒有一個是真正致力於民主力量的培植和民衆意思的支持的。法國的政黨大多數是職業政客集團，他們掛着擁護民主的招牌，而實行買空賣空的政治交易；他們既沒有明顯的政綱，又沒有堅固的

組織，更沒有廣大民衆的後援，他們祇是二百家金融寡頭的奴隸；他們的黨籍可以朝秦暮楚，他們的政治主張可以忽左忽右，他們的政黨聯合祇視一時的便利而定。許多內閣改組，政策推行的大變更，祇因少數政客的領袖私人促膝於密室就可以忽然決定，他們不曾注意到黨員的公意，更不曾注意到民衆的公意。這樣的政黨，雖然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招牌，實際上還不如德國的納粹黨尚有民衆的基礎。所以貝當、賴伐爾之流，可以任意出賣祖國，取消民權，而並沒有碰到顯著的反對。因此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失敗於民主，而是失敗於沒有真正實行民主。如果我們把這種政客式的集團政治的失敗，認作民主政治的失敗，這是污辱了民主，也污辱了政黨。我們今天要講民主，必須澈底肅清這種政治搨客式的偽裝民主政治，而向真正廣大的民衆基礎上，建立真正的民主力量。

今天全世界的唯一主要潮流是民主政治的潮流，獨裁專制的時代早已過去，法國大革命已經替獨裁專制主義敲了最後的喪鐘，已餒之鬼不會再靈了。今天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一時，祇是因爲他們曾經比沒落的偽裝民主主義者（如法國及日本的政

黨之流）更致力於爭取民衆的工作，比較更有民衆的基礎，到了和真正有廣大民衆做基礎的民衆勢力碰頭的時候，他們必失敗無疑。我們中國今天是站在民主陣線方面，照我們五千年立國的精神和世界普遍的潮流方向看起來，我國今後只有民主的一條路，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而且也只有這一條路才是唯一到勝利去的路。我們今天的責任，不是討論民主獨裁的是非，（因為這問題早已過去了），而是如何以民主運動一員的資格，替自己的國家和整個的世界推動開一個真正澈底民主化的大路，以期對得起三十一年前革命的先烈。

爲達成這種偉大的任務起見，一個民主運動者需要培養出幾種必具的風度。

第一，須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綱領，並把自己的主張拿出來與全民共見。民主運動是一種堂堂正正的光明運動，需要全體人民的了解與支持，因此必須有具體明確的主張，並且須使全民普遍了解自己的主張。現在全世界的民主政黨沒有一個是沒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綱領的，即獨裁專制的法西斯黨也不會忽略此點。如果自己並沒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祇是隨時投機取巧，或雖有主張而不肯向民衆時時公開宣傳，

或自己也忘記了，或自己對於自己的主張並無真正的信仰和促其實現的決心，祇當作政治鬭爭的一種手段，又或自己的主張有不可告人之處，不便公開，所有這些都是民主運動的大忌。這是機會主義者的作風，不是民主的作風。民主運動的機會主義化是民主運動的致命傷。

第二，主張須切實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運動是為全民爭福利的，主張必須針對全民迫切的需要，要使全民認識這種運動是與他們的全體利益一致的，才能取得擁護。因此民主運動者不可祇注意於黨或領袖個人的局部權利，不可只注意於爭取政權的運動而忘記了爭取政權的目的，也不可以只為少數上層社會的利益打算，而須為廣大的全民設想。遇到社會上各階層的利益不能調和時，須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前提。譬如說，與其為紳士、地主、豪商的利益作呼籲，不如為廣大的小農工商人的利益而作更合理的呼籲。離開了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立場，便是民主運動的自殺。

第三，須爭取全民對於自己主張的了解和擁護。民主運動者必須時時向民衆講

話，必須深入民衆，必須與民衆打成一片，看民衆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害一樣。要講民衆的語言，要用民衆的文字，要過民衆一樣的生活。不但要爭取民衆，領導民衆，還須要學習民衆，追隨民衆。一個真正的民主運動者不是民衆的主人，而是民衆的夥伴。一切高車駟馬的貴族生活，奔走權門的官僚生活，養尊處優的紳士生活，詩酒風流的名士生活，作姦犯宄的流氓生活，酒食徵逐的惡少生活，書齋靜掩的學士生活，都不是一個民主運動者所應具的態度。

第四，對於異己的主張須有容忍的態度。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是「道並行而不悖」，獨裁專制主義者祇承認自己的主張是唯一的真理，而不許他人另有主張。民主主義者承認真理是多方面的，承認人人有自己選定真理的機會。民主主義者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自由猶如尊重自己的人格和自由一樣。因此對於與己不同的主張不可一筆抹殺，不可妄加猜忌，即使其主張十分淺薄幼稚，也祇能用平心靜氣的態度與之討論辯駁，而不必使用壓迫禁抑或造謠中傷的手段。民主運動者必須尊重他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權，自己既向他人爭取思想言論的自由，自己便須首先作出尊重他

人思想言論自由的模範榜樣。

第五，對於反對的主張須公開地加以討論辯駁。民主運動者需要容忍，但不是苟且調和的容忍；民主運動者需要尊重他人的意見，但也須堅信自己之主張。對於與己相反的主張不必害怕爭辯，要有辨明是非的精神與勇氣，如果自信很堅，雖千萬人反對也必堅持爭辯下去。民主政治就是容許萃異己的意見於一堂而光明坦白地加以討論，以真理折服他人。因此一個信仰民主的集團，必須時時容許羣衆有公開討論辯難之機會，真理由討論而顯出，不必盛氣凌人，也不可一味彌縫了事。

第六，以道德感化異己，以法律範圍羣己。孟德斯鳩說：君主政治的原理是光榮，而民主政治的原理是道德。民主運動的原則就是我們中國儒家的傳統精神，「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一個民主運動者如被人反對，被人攻擊，或被人輕視，則必須反省自己是否有招致這種誤會之處，從前人家何以肯聽話，現在人家何以紛紛自由行動，是否因爲自己的苦心孤詣不能爲人人所了解，自己的困難處境不能爲人人所鑒諒？要解釋這種誤會，便只有運用道德的感化力，依照民主的合法

程序，使幹部以及羣衆各自在法律所規定的職權之內，進行和平諒解的決議。自己先站在法律的地位上，同時人格道德的光明坦白態度又能爲人人所諒解，則一切問題自能迎刃而解。

民主主義不是一個漂亮的招牌，而是一個實際的生活態度。要爭取全世界的主，必須有一部份真正信仰民主主義的人，首先切實地自己履行民主的生活條件，庶能蔚成風氣，轉變了日趨紛歧的世界。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新中國日報

中英文化之異同

人和人相交必須志趣相同才能情感相孚，有了真交情，否則便是小人勢利之交，其交不久。國與國之交亦然。中國今天在世界上朋友甚多，但求其文化思想根柢相同，彼此情感不求孚合而自孚合者，莫如英國。中國和英國，彼此之間自然也存在著許多異點，如同：中國是一個五千年歷史的古國，英國在歐洲各國中雖然比較古些，但建國也不過一千年；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民衆，英國單就本土計算，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英國是一個海國，中國則爲大陸國家；英國是工業國的先進，中國尚在落後。但這些表面上的差別都不妨礙兩大國家間文化本質上的相同。

英國是一個崇拜士君子風度的國家，上自政治家，下至平民，無不自幼就養成一種士君子的風度，遇事雍容大雅，講禮貌，重節操，個人的見解雖有異同，但人與人之間相處仍有一定的規範，不至陷於傾軋險詐。這一點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中國人受孔子教義的陶鎔甚久，自來就尊重士君子的風度，評論人物必以道德人格爲先，因此與英人的觀點很容易接近。

因爲這一點士君子風度的陶鎔，所以這兩個民族都養成一種中庸的習慣，遇事按部就班，不激不隨。英國人自來就尊重常識，不過於空想。常識也就是孔子之所謂中庸，政治上因爲尊尙中庸和常識，所以遇事能夠相互諒解，相互讓步，造成各黨相忍爲國的局勢，凡百事業上因爲也尊重中庸和常識，所以變更不驟，一切都有軌道可尋。

這點常識或中庸的態度，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英國是憲政的先進國家，中國過去雖然專制很久，但二千多年前的哲人早已提倡過民本的政治，見於書經、孟子等書。中國人和英國人自來就是一種民主的民族，今後中國必能追步英國民族軌道，力求實現真正的民主無疑。

中英兩國又同是愛好和平，崇尙寬大的民族。英國屬地遍於五洲，但隨地都採取自由寬大的政策，尊重被治民族的習慣與自治權利，不常加以干涉。中國過去爲

亞洲盟主者垂二千年，對於屬邦向來也不加干涉，聽其自治。

內政方面，兩國也採取同樣的寬容態度，兩國同承認宗教的自由，從不以一教壓迫他教；同承認民族的自治，從不以一族凌駕他族；同承認地方人民的自治權利，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鄉治，鄉村農民保有極大的自由和自治權，這一點也是英國之所同。

兩國又同樣尊重自由講學之風，英國在十二三世紀建立大學制度的時候，中國的書院制度也正在同時發生，並且繼續延長下去。

兩國又同是尊重傳統習慣，微傾於保守而並不妨礙進步。英國人的保守舊習之強，世所共知，中國亦然。兩國對於歷史文化的崇拜愛護都已養成習性，雖經戰亂而不改。然而兩國的隨時進步也是一件顯著的事實，保守性與進步並不相妨。

兩國又同樣崇尚正義，尊重理性。中國自孔孟以來，下逮宋朝的程朱理學，都竭力鼓吹理性的尊嚴，反對使貪使詐之習，這一點也正是英國的哲學家格林（Green）、布拉得來（Bradley）輩所竭力鼓吹的。同時，中英兩民族又都是個實

際主義的民族，凡事務實際而不貪虛名，對於事功的重要性並不反對。

中英兩大民族因爲有這些文化上的共同根據，故自來邦交即極親密，此次在世界戰爭中又結爲共同生死的同盟，其相互了解的程度自必日進無疑。

自然，中英兩國文化之間，也有極不同的地方，如同英國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社會的基礎建立於個人主義之上，個人在英國是建國的堅強基石；中國則因爲孔教的陶鑄，自來就以家族主義代替個人主義做社會的基礎。這一點的區別，使兩國在政治上、社會上、人情世故的看法上，都發生很大的歧異，但這一點歧異並不是不能調和的。基督教的教義，雖尊重個性，但也極重視家庭的堅固結合，並未加以破壞。孔教的教義，雖傾向於家族主義，但對於個人品格的修養和權利義務的尊重，也並不曾抹殺。今後中國自應學習英國的長處，竭力發揚個性的尊嚴，中國孔教的孝弟倫常之道，若爲英國人所了解，也必能幫助英國工業化後動搖了的家庭制度，而重新將牠鞏固起來。今當英國國會訪華團及英國學者相繼來華之際，我們願將中英兩國文化上異同的關鍵，貢獻於中英兩國人士之前，俾可促進了解，而更能

增加友誼。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新中國日報

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一八四二年在中國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時期，這一年，中英鴉片戰爭告終，締結南京條約，劃讓香港，開上海、廣州等五口與英通商。過了兩年，法美兩國亦相繼援例與我訂通商條約，從此中國門戶洞開，積弱之形逐漸暴露，開百年來國恥之端。

現在，光陰迅速，轉瞬百年，當日南京條約所割讓與英國的香港竟不及舉行百年「祝典」而為東夷所掠據，上海的「大英租界」也入於倭人之手。「天道百年而一變」，倘有呂伯樊濫格爾者，卒然醒於長夢之中，覩此情景，不知作何感想。

這一百年來的世界舞臺上大英帝國是最主要的角色，許多幕精采的戲都由她一手導演而成。自一八一五年滑鐵盧之戰後，法國的霸權時代業已告終，德、義、美、日等四國俱尙未露頭角，遠東的中國已由盛而漸衰，這時候除陸上的俄羅斯帝

國外，無能與大英帝國抗衡者，因此英國能夠順利地支配了整個的世界，特別是在太平洋方面。一八一九年，英國宣布佔領新嘉坡，從此在東亞有了中心的根據地；一八四〇年，英國統一了上下加拿大，在北太平洋東岸造成了盎格羅撒克遜人種的清一色世界；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在太平洋西岸的英國形勢也造成了十九世紀一百年中英國的繁榮安富，特別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一八三七—一八〇一）的黃金夢，與英國在太平洋西岸的勢力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太平洋，英國人每天的午餐掉上，就要減少許多菜色了。

從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時候英國的主要工作是在防俄，角逐的中心是在土耳其。從維也納會議以後，法國霸權失敗，俄國在歐洲大陸的野心就一天一天地增長起來，其主要的企圖是粉碎老大的土耳其帝國，以便南出黑海。一八二一年希臘獨立戰爭起，最初英國輿論的同情在希臘方面，詩人拜倫因此戰死。但到一八二八年俄國以援助斯拉夫同胞爲名對土正式開戰後，土耳其一敗塗地，英國就開始着慌起來，一八三〇年的倫敦會議，一方面承認了希臘的獨立，一方面却也

保障了土耳其的獨立。不幸土耳其太不爭氣，一八三一年又引起了埃及獨立的戰爭，英法兩國在埃及開始暗鬪和明爭，結果英國總是佔上風。英法在近東的相持，使俄人又引起窺伺土耳其的野心，以至引起克里米的戰爭。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停止後，俄國的企圖又經一挫，但這時候歐洲大陸和全世界的形勢漸漸又變化了，幾個新興的勢力漸漸醞釀成功了。

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的風潮波及全歐，結果奧地利帝國因此失勢，德義兩民族的統一建國運動漸露頭角。一八四八年的佛蘭克福國民大會，使德意志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幾乎統一，雖然不久反動潮流即起，革命的火燄暫時被挫，但又過了二十年之後，德意志終於在鐵血宰相的手中造成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微弱分裂的義大利也在加富爾和加里波的二傑的手中脫離奧國羈絆，於一八六一年完成統一。

一八七〇至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澈底改變了歐洲大陸的形勢，法蘭西和奧地利失去了過去光榮的地位，而德義兩國代起。但是這時候英國的政策仍側重防俄，因為這兩國暫時尚無向歐陸以外發展的能力和野心，而俄國的黑海政策仍未改變。這

種形勢到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戰爭而達於極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根本粉碎了俄國南下黑海的企圖，英俄在近東的角逐才告一段落。

在這時候，全世界的形勢已有了大變化。一八六〇年左右，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與東岸的美國同時發生內戰，至一八六五年左右而同時停止。美國在南北戰爭後，國勢突飛猛進，逐漸造成了一個新的金元帝國。但中國就不能利用這種機會，太平天國戰事結束後，國事依然黑暗，外患反更加深。同時，太平洋上又新興起了一個蕞爾日本。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提督披理（Perry）的艦隊訪問，打破了日本鎖國的迷夢，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日本開始走上新戰國的途徑。

太平洋上的形勢雖然有這樣重大的變化，但英國仍然站在最有利的地位。英國的國運在這時候正是如日中天的時代，一八五三年英國伸手於緬甸、暹羅；一八五七年廢黜了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一八七五年收買了蘇彝士運河的股票，切實掌握了近東的交通命脈；一八七七年維多利亞女王承襲了印度的帝號；一八八五年滅了緬甸。直到這時代為止，除了法國伸手於越南以外，在太平洋上還沒有能和大英帝國

爭衡的勢力。

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以後，開始了一個帝國主義的新時代。俄羅斯在近東受了壓迫，一八五一年佔領了庫頁島北部；一八五四年木拉威夫略地到了黑龍江下游；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兩次中俄條約割取我烏蘇里江以東和黑龍江以北之地，俄國的勢力伸張到太平洋沿岸；到一八九一年西伯利亞鐵道的修築而形勢完成。在這時期中央亞細亞一帶的蒙古民族餘部相繼爲俄人所吞併，並進佔我新疆伊犁，幸經左宗棠、曾紀澤的努力始收復。

一八八〇年列強瓜分非洲運動開始，到十九世紀末年而完成。

一八六七年美國在俄國手中購取了阿拉斯加，經此伸手於太平洋；一八九八年美西戰後，菲律賓、拍托里科、關島、和夏威夷都入於美國之手，取得了太平洋上重大的發言權。

日本也在此時突興起來，一八七二年滅了琉球，隔了一年便侵我臺灣，一八七五年又藉口江華島事件而伸手於朝鮮。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一躍而爲強

國。

這時候中國積弱的形勢愈加暴露，中日戰爭後開始瓜分中國的運動，到八國聯軍進北京而達於頂點。這時候日俄兩國在太平洋北部發生劇烈的衝突，到日俄戰後始告一段落，結果俄國被挫，日本取得了世界列強的地位。

英國在這時代，注意力仍集中於歐洲和近東，對於太平洋方面仍取維持均勢的政策，利用日本以抵制俄國，英日同盟的結果，使這政策獲得了成功。

歐洲的局面，使英國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不得不發生搖動，德國以突飛猛進的姿勢出現於中歐，一八九一年俾斯麥罷相，威廉二世自領政權，開始向海外發展，與英國漸次發生衝突，到一九〇三年德土締定巴格達鐵道修築條約而形勢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英人鑒於雖有法俄同盟尚不足以抵制德、奧、義的三國同盟，因此才放棄孤立政策，才於一九〇七年締結了英俄協定，造成英、法、俄三國協商的新局面，以對抗德國的新興勢力，以至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歐洲大戰發生。

第一次歐戰期間，日本利用歐戰列強無力東顧的機會，出兵佔據青島，迫我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與美國訂立蘭辛石井協定，取得亞洲大陸的優越權。同時因爲戰爭中獲利甚鉅，使日本國富增加，海陸軍備更加充實起來。

第一次歐戰以後，德國潰敗，俄國革命，英國在歐沒有後顧之憂，乃與美國協力制止日本的發展，於是有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之召集，結果日本暫時退讓，造成了以後十年間的世界和平局面。

但是就在這時候，新的禍亂又已醞釀。義大利的法西斯黨於一九二二年取得政權，一九二三年希特勒黨在慕尼黑黑起事失敗，至一九三三年而取得政權。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自一九二三年以後，形勢漸趨穩定。同時中國的內戰直到一九二九年以後始告結束，日本受了這種種刺激才開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侵略暴舉。

在這時期，英國的政治家因爲誤信了和平苟安的政策，以致在西方對德義讓步，在東方對日本低頭，遂釀成今日瘡痍俱發的局面。

所幸在此時期中，歐洲大陸上興起了蘇聯，亞洲大陸上我中國已開始復興，這

兩個大陸國家的存在對於抵禦侵略勢力已有光榮的表現，今後海陸四大民主國家的攜手，中、美、英、蘇的團結合作，是安定世界的唯一力量。

就目前形勢而觀，拉丁民族的法義兩國已一敗塗地，失去重要性，世界列強惟存中、美、英、蘇、德、日六國，這六大強國正在分成兩個壁壘作殊死鬪。德日雖暫時猖獗，但無無論就資源、人力、及政策之合理方面去看，俱非民主國家之敵，得道者多助，今後的百年，必無侵略國家存在之餘地，世界的和平將由中、美、英、蘇四大民主勢力的開誠合作以完成之，人類之幸福，正義之伸張，蓋可以計日而待也。我中國人其勉之！

作於民國三十一年

學術與政治

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是社會的神經中樞。在有組織的社會之內，任何分子不能脫離政治的影響，所以胡適之先生曾說：『我不去管政治，政治要來管我們。』在古代大一統的帝國內，禁網疏闊，容或有高蹈山林，終身避免與政治發生牽涉的可能，但在現代國家之內，是絕無可能的，只有程度的深淺疏密而已。

社會上有一種人，是專門以治學爲職業的，他們因爲愛好學術過其他一切，所以對於學術以外的事情，如政治之類，常常不願去過問，亦無暇去過問。然而政治又常常逼迫他們不得不去過問。政治的隆替，常常影響到整個的社會，因而影響到他們治學者的本身生活和事業。並且這一般以學爲業的人，又常常是崇信真理和尊重氣節的，因爲崇尚真理，所以對於與自己所信相違背的，常常好發批評；因爲尊重氣節，所以常常厭惡別人的干涉，而對於現實不肯隨和。這兩種態度都容易招致

政治上的誤會，而使學術事業更容易捲入政治的漩渦。

柏拉圖雖然會經理想過哲人的政治，但一部人類政治史，政權操於有學術者之手的時候實在不多，政治的運用是靠著權力，權力的來源不是出於武力，便是出於經濟力，這兩種力量都是以學術爲業的人所缺乏的，因此他們除非兼具其他的力量，常常不能握取政治的領導權，但是他們對於實際政治的影響力却是亙古常新的。這沒有別的奧妙，祇因爲他們是比較有智識有學力的人，而政治的指導又常常離不了學術和智識。

這以治學爲職業的一種人，在中國就謂之爲「士」。有人說，「士」這一個階級，專屬於以治學爲業的人，這是春秋以後的事。在春秋以前的封建社會裏，所謂士者指的是武士而非文士，這話是不錯的，但這並不是說封建社會或封建以前的社會裏沒有專事研究的智識階級。在原始社會裏，有一個階級是高處於一切階級之上的，連貴族武士階級也不是例外，這便是教士階級。教士階級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初握得智識樞紐和保存文化遺產的人，他們比同時的一切都較有學識，因此在社會

草昧的時候，他們常常做了啓蒙的先鋒，人類生活改進的指導者。這樣，在社會初具政治組織形態的時候，他們便自然兼握了政治的領導權。埃及的僧侶，印度的婆羅門，猶太的先知，都是這種政教合一時代的領導者；中國所謂觀象制器的聖人，如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諸氏，也都屬於此類。

到後來，政治的事務日繁，種族的衝突鬪爭也日鉅，一個人不能兼理政教二種重要的職務，對外的戰爭也需要更強有力的人去領導，於是政權就漸漸脫離了教士而轉入於以戰爭爲業的武士階層之手，於是有國王和貴族出現。在最初，國王多半是由教會的最高領袖中選出的，他們以神的直裔自居，埃及的法老自稱是太陽之子，日本的天皇自稱是天孫系統，中國古代的皇帝也稱爲天子，這都表示他們之取得政治領導地位是靠著宗教的威信，而非純仗武力，因此他們的地位也必須靠著教會的證明。猶太自掃羅、大衛以後，歷代的國王都須受先知的膏沐禮而始得即位，中古歐洲的國王也須受教皇的加冕而始成爲國王。教會既能立王，就有廢王之權，因此即在有了國王之後，最初的時代，教權也仍然在政權之上，這就是說，智識階

級仍然可以駕馭武士階級而間接操縱了政治。

再往後，國王和貴族的地位因世襲而自趨穩固，不復需要教會的幫助，教會干涉政治的權日減月小，教士階級從國王貴族的指導者地位一變而淪為國王貴族的顧問，如周之巫史宗祝之類，國有大事，仍然要向他們請教，但政權已經不屬於他們，並且也不能直接加以支配了。隨着智識的進展，宗教迷信日趨衰落，教士階級也就完全脫離了人事，而變為專以事神為業的宗教家了。

但這時代，文化智識已從教士的手中解放出來，廣被到整個貴族階級裏去。在從前貴族階級是以打仗為專業的，所謂政權也就是戰爭的報酬，志在掠奪而已。到後來承平日久，戰爭的意味日少，而政治的意味愈多，統治一個國家或封邑，不是專靠武力掠奪所能濟事，必須兼有點文事的智識。社會承平以後，貴族們習於宴安，也就要尋求智識上的娛樂，因此糾糾武夫之風一變而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上層社會的貴族既已日漸博學多能，如春秋末年的叔向、子產、季札之類；下層的貴族，即所謂「士」的一個階級，在從前雖以武事為主，但也須幫助貴族封主治理民

事，因此早就於射御之外兼習書數，到了貴族封建社會一經崩潰，這「士」的一個階級，便完全脫離了武事，而以智識學問爲職業，形成了孔子以後的中國「讀書人」。

最不幸的是，這些讀書人仍然承襲着過去封建社會的武士餘習，以不治生產爲高尚，因此他們在社會上沒有自立的基础，不得不仍然依仗上層社會的提挈周濟，這樣便使士永久淪爲統治者的御用品，以口舌游說，以科舉干祿。他們不但不能直接掌握政治，並且不得不仰有政權者的鼻息，僅能以其智識學問博統治者的歡心，替統治者貢獻一點策劃，其地位與優伶弄僮相等。其中稍有氣節者，也只能高蹈山林，獨善其身，此外也沒有什麼辦法。

在近代西洋的資本社會中，士雖然不是專制帝王的弄臣，但又變成了資本家的弄臣，以瞻望有錢人的鼻息爲能事，其可憐程度正復相等。

士這一階級的墮落，並不是全體學術界的墮落。我們必須把「士」和「學者」這兩種人分開。中國傳統上之所謂士，始終離不開政治的意味，他們熱中政治，終

日夢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但又沒有把握了支配政治的力量，並且也不肯去認真尋求把握，因此只有墮落爲口舌游說或科舉干祿之士，以求時主爲榮，這種人的沒落是必然的了。但士之中還有一部分人，他們並不熱心於政治，他們自有境界，並不必住在政治的境界中，他們與政治上的任何方面都無需爭，因爲他們不屑於爭，也正如政治境界中的人不屑於與他們爭學術上的地位一樣。他們埋頭於學術，期望在學術上確有貢獻。他們如果在這一方面有成，間接上影響於政治的力量却非同小可；譬如牛頓，他終身無意於政治，然而他在天文物理學上的貢獻却整個改造了世界，連政治也不能例外。

學術界中的人，不但以其學問上的成就影響政治，並且也以其人格上的建樹轉移政治的風氣。自有談政治、做政治、以政治爲終身職業的士出現，而後熱中政治之風普及於學術界，結果爲達到政治的目的起見，任何手段皆在所不擇，其始尚欲轉移政治，其末反爲政治所轉，自身變爲政治罪惡製造者之幫犯而不自知。在這個時期，如果有一部分人能夠不汲汲於接近政治，熱中祿位，另闢一個學術思想的新

境界，使世界上的人知道糞溷之外，尚有自由的天地。這種風氣一經樹立，則人心獲得新生機，政治的惡濁空氣也可以望澄清一些。

所以專力學術，不問政治，並不是脫離政治，逃避現實，乃是更澈底的轉移政治，指導政治。至於一般以政治爲終身職業的士，如果目的真是在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並非係一己之私，則我們對於這一般人也不必厚非，不過應該知道，如果真想過問政治，便不是一味仰仗他人所能濟事的，必須自己有創造權力、把握權力的勇氣，以王佐自命是沒出息的，以爪牙驅使自命更無出息。今後的社會是一個生產力中心的社會，能夠掌握生產力者便可以支配一切。過去生產的力量掌握於少數資產者之手，但資本家自己並不懂得生產技術，仍然是靠着一般科學技術人才替他們奔走，這般科學技術人才（包括經理人才）便是新型的「士」，這些新型的士如果能覺悟自己的重要性，放棄了替資本家奔走的舊生活，自己團結起來，便能形成一種力量，而舊型的士，也應該放棄咬文嚼字的舊生活，努力學習新的科學技術，以應付今後的技術統治的新世界。

三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成都新中國日報專論

國策比國都更重要

近來討論戰後國都問題的文章很多，大家似乎過於着重了這個問題，彷彿國都問題一經解決，中國立刻就可以轉弱爲強，轉危爲安，以致把向來策論家的什麼「居中馭外」、「高屋建瓴」的陳套話也搬出來了。我以爲問題似乎不是這樣簡單，地理條件固然可以影響國勢和國家的一部分，但從歷史上看起來，人事的因素比地理的因素畢竟重要得多。在過去交通不便，戰爭器具不發達的時代，地理的形勢或者可以發生一部分重要作用，但在今日航空技術一日千里的時代，事實上已經沒有絕對安全的國都。就是在過去，又何嘗有一個國都是絕對安全的？北平、南京固不必提，以西安而論，大家盛稱漢唐的光榮時代，其實就在這個時代，長安也已經屢次受到外患的威脅。漢代長安附近的外寇共有七次：文帝三年，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寇朝那、蕭

關；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直到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取河南地後，邊患始少紓。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先零羌酋滇零僭稱單于，寇抄三輔，南侵益州，殺漢中太守，東侵河東，至河內，詔徙緣邊郡縣於內地以避寇，雍涼境內郡縣多陷；滇零父子叛亂凡十餘年，并涼二州爲之虛耗；順帝永和四年，燒當羌復叛，攻金城，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征羌失敗，諸羌遂寇三輔，殺掠吏民；桓帝永壽二年，諸羌復叛，屢寇雍州、涼州。唐代長安附近的外寇共有六次：高祖武德七年，突厥大舉入寇（前此數年已屢寇關中），上議遷都以避其鋒，幸秦王世民諫而止；武德九年，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突利兩可汗又連兵入寇涇州，進至渭水便橋；代宗廣德元年，吐蕃攻入長安，帝幸陝州；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進逼奉天；永泰元年，懷恩又誘回紇、吐蕃、土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寇，合兵圍涇陽；大歷八年，吐蕃寇涇邠。綜計漢唐兩代因建都長安之故，國都附近所受大規模的外族侵襲凡十三次之多，內亂如更始、赤眉、安祿山、黃巢等事變尙不在內，其他各代更不在內。

這並不是說長安不是理想上安全的國都，北平、南京、洛陽等歷史上有名的國都又何嘗不如此？這些事實祇足證明即在從前戰爭器械拙劣的時代，地理的條件也不足以保障一個國都的安全，要緊的還是在人事，人事的因素，比地理的因素重要得多。

因此，戰後國都無論建設在那裏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妥當的國策，能夠保障這個國家的正當發展，也就間接保障了國都的安全。關於戰後國策問題，自然頭緒甚多，除了民主憲政問題及戰後經濟復興問題已經政府當局宣示態度，國民只有盼其切實完成外，我以為以下的幾點是最重要的，特別與討論國都的問題有關。

第一是和平。我們在戰後必需有長久的和平時期，才能充分完成國防，改進民主，這個時期至少需二十年，多則五十年以上。我們的現代化基礎太落後了，無論在精神物質方面都需要長期精奮的努力，強國的頭銜不是輕容易就換得的，更不是輕容易就能長久保持下去的。這一次抗戰的最後勝利不成問題，但勝利之後千萬不

要把戰爭看得太容易了，我們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只有長期的和平，才能使民主條件完成，才能使民族精力恢復，才能使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因此必須以忍耐的精神，小心避免一切性質的戰爭，不問內外，和平第一。

第二是陸鄰。我們與英、美、蘇等民主同盟國家，邦交自來密切，戰後更宜保持戰時合作的精神，永久合作下去，即對我們的敵人日本，如果戰後有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日本出現，我們當然也不再視之為敵。在這個條件上我們所最需保持的，是中蘇的邦交。戰後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蘇聯這個朋友是絕對放棄不得的，這並不是出於崇拜蘇聯的心理，而是因為我們從東北到西北，與蘇聯接壤的國境差不多佔我們陸地國境的一半，全世界上從古到今從沒有兩個國家接壤之長有如今日的中蘇兩國的。我常說我們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很像歐洲的德國。德國的立國國策是保持對俄的邦交，這樣才能辦到國防安全，避免兩面受敵。威廉第一和俾斯麥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普法戰後小心翼翼保持對俄的關係，威廉第二和希特勒不懂這個道理，才弄到後來狼狽不堪。我們戰後國策之一應該是睦鄰，與一切國家保持友善的

關係，才能長久和平建設，而維持這個長久和平局面的最有力因素，就是中蘇兩大國家的精誠合作。

第三是空防。今後的世界，無疑地是空中第一的世界，因為航空技術和組織的發展，一切地理形勢都變了，國都問題因此失去了重要性。今後一個國家要保持安全，不是把國都建設在安全的地帶上，而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空防系統，能夠有效保護國土的任何地帶。當然陸防、海防也是重要的。我國的海岸線這樣綿長，戰後需要建設一個能夠保衛海疆的海軍是無疑的。但海軍的建設需要有錢而且有時間，在現在國防技術一日千里的時候，往往一隻軍艦造成，軍艦的效能已經過去一半了。況且我們和英、美兩大海軍國家做朋友，我們如果要建設海軍必須切實注意英美兩友邦的感情，不要引起他們的誤會，所以海軍的建設在戰後若干年間應該謹慎而有限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所能做到的是全力發展空防，所應該做到的也是全力發展空防。

「和平」，「睦鄰」，「空防」，這應該是戰後國防政策的三大口號，只有這

三大政策的成功，國都的安全才有了保障。至於談到國都問題，我還是主張建都北平，理由很簡單，第一表示我們不忘東北的決心，第二也省開支一筆重新建築費。不過希望北平那些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不要爲整理市容、修建衙署而拆毀了，那些有歷史意義的街道也不要胡亂改些平等路、自由路之類的新名。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人物與風氣

愚曩年論學專持主外之說，以爲文化之薰陶，制度之經緯，其力足以範圍人心，蔚成風氣。嘗欲爲中國主外學史，以荀卿上承孔子，下開非斯，以逮於漢之賈壘，唐之劉柳，北宋之范希文、歐陽永叔、李泰伯、王介甫，南宋之永嘉諸賢，以至明清之亭林、習齋、東原、實齋，其在中國思想界比於朱陸心性之學，似爲旁流，實則正脈。蓋宋明理學高談心性，實自印度思想一轉而來，若論宋以前中國本土之正統思想，制度文物之成分甚多，而心性玄言之成分甚少，凡此諸賢者，其立言之途徑各有不同，然其着眼於制度文物之陶冶，欲由外以治內者，大體固無不同也。孔子一生，性與天道，弟子之所罕聞，其所恆言者乃在詩書六藝，孔門四科，政事言語文章居其三；而所謂德行者亦不過孝弟忠信庸行之灼然易見者，無極太極之辨，無善無惡之談，孔子所未嘗有也。然則儒家者流，其始欲以政治致太平，其

後亦不過以文教陶末俗，惟孟子爲例外。以今所傳孔子身後諸儒以逮漢代經師之學，具見於三禮三傳者考之，大體方向如斯而已。中國古代學術之喜爲玄談者，莫過於老莊，然道家末流由老莊一變而爲黃老，則亦由玄言而轉入實用，及至魏晉之際，風氣始又一變。所以然者，中國民族之務實根性有以致之也。

凡此所論，至今觀點未變。惟比年以來，涉世漸深，經歷漸富，觀察所及，頗覺宋儒正心誠意之說，亦有未可偏廢者。蓋制度文教之已行，固足以陶冶羣倫，經緯邦國，然制度文教必賴有所以推行之人，徒法不能以自行，苟無其人，雖有良法美制，朝令夕改，適足以長姦而資詐耳，此荆公變法之所以失敗也。故制度與人物，若車之兩輪，不可偏廢，人物之養成，待乎風氣之鼓舞，鼓舞風氣之道，貴在以心感心，非塗飾表面所能奏效，此宋明儒者心性之說，所以不無可取也。

中國談變法四十年矣，由帝制而改建共和亦三十二年於茲矣，舉世界所有法制政教，幾無不一一納諸國中而做倣之，而實驗之，而推行之，其收效幾何？人所共見。今論者方爲民主獨裁之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實則凡百制度，繫乎人

心，苟民族根性之窳敗如故，泄沓如故，自私自利如故，雖有任何良法美制，將賴何人以持之？法西獨裁之制行於德國則強，行於義大利則敗；民主共和之說行於英美則富強，行於拉丁美洲諸國則禍亂頻仍，故知關鍵所在在彼而不在此也。

夫風俗之偷窳，人心之陷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鼓蕩而廓清之者，則不能仰給於齊民，必賴有俊偉豪傑之士，振起於流俗，相與以言論行誼培養新機，若萌芽之出於腐草，及其風氣既成，則雖鄙夫貪人亦將相率自飾於忠義，此中心人物之所以可貴也。

我國舊說，以士爲齊民之首，舉凡政治之興革，風俗之變化，無不責望之於士，故士之自負甚高而自律亦甚嚴。今世民主社會之義既行，則或謂士不當自別於齊民，而立國之道但恃大衆，亦無待乎有中心人物之領導，然吾考之於史而知其不然。國家民族之自立，必賴有中心人物之領導，無論何時何地皆然，而此領導之中心人物，不出於士則必出於流氓土棍貪人鄙夫，出於前者則國治而風醇，出於後者則俗薄而國亂，古今中外未有無中心人物而可以立國者。三代以上，政治出於封

建，而政權操於貴族，貴族風格之養成則資於「士」之制度，故古之所謂「士」者以武爲主，卽歐西中古之所謂 Knight，與後世文弱讀書之士，取義不同。在封建制度之下，貴族子弟智識一開，卽有阿保師傅之屬，夾輔左右，教之以禮義之行，自衛衛國之具，故其所謂士者，雖成就之廣狹不同，要皆有忠信義勇之氣，此中國歐洲之所同然也。自封建制度壞而後文武分途，士之名始專屬於讀書文弱之人，顏習齋氏所謂：

「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兵農禮樂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

然觀儒行所載孔子答魯哀公之言：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則知孔氏初教，亦未嘗專以文弱爲宗也。要之，春秋以前與春秋以後，所謂士

者雖稍稍不同，然舉一國之中心領導屬望於所謂士者則同。卽歐西亦何莫不然，封建時代同於中國，固無論矣，卽在今所謂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之下，不亦有所謂律師、記者、政客之屬，相率組爲政黨，以爭取政權乎？在法西獨裁、共產專政之下，不亦有所謂黨徒、領袖、委員、組長之流，由黨議而過問一國之政乎？夫一般庸衆，終日疲神於所業，無政治之素習，亦無政治之興趣，故不能不依分工專化之原理，委政治於少數專家之手，此任何時代皆然。故一國必有中心領導之人物，此人物所構成之階層而健全，則國興，否則亂且亡。故論國者不必反對有特殊之領導中心人物，而但問其是否健全而已。

遠者且不必徵，卽就清季而論，當時政治之頹敗，官習之貪污，慮有百倍於今日者，然民間清望猶存，所謂士大夫者，率皆誦習孔氏之說，服膺節義之教，濡染日久，其根實未撥，雖伏處草茅，手無斧柯，猶能張赤手空拳與當時之惡濁政治較得失，明是非，辨利害，黃花崗一役，仗義殉難者七十有餘人，四川保路之舉，呼而應者數萬，前仆後繼，視殺頭下獄爲家常便飯，清室雖有淫威，莫敢如何。卽在

朝服官者，縱或旅進旅退，脂韋之習未除，亦猶多數尙能愛惜官箴，輕佻變詐，比暱下流，常宦猶恥爲之。此無他，所受之教育及濡染之文物環境有不同也。此等人物豈非吾等今日眼中所罕見者乎？

夫造法制易，造風氣難，造風氣尙易，造主持轉移風氣之領袖人物尤難，人物若不造成，風氣若不轉移，雖百變其制，千易其法，政令諄諄，家喻戶曉，猶之無有也。以今日之政治教育環境，欲求培養此種士風，實無異南轅而北轍。吾人惟望上之有主持政教之責者，曉然於政本之所在，稍稍放棄以利慾威脅士氣之手段，開放輿論，激揚清流，而下之有領導士風之責者，亦毋自忘其地位，鬻身事人，與市儈傭保比伍，而稍稍樹其方剛之氣，堅其冰雪之節，以培養元氣於一一。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今日正貞下起元，一陽來復之候也，吾曹豈可不自勉乎？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行人荒

平陽宋平子先生（衡）嘗著「闢中原人荒議」，以爲『哀莫大於心死，悲莫大於人荒，心死之極，流血千齡，而不稍動惻；人荒之極，縱橫萬里，而不得一士。』其言曰：

『使中原人荒至此極者，其奇渥氏、朱明氏乎？蓋自有紀載以來，焚屠淫掠之慘，莫甚奇渥氏；閉塞愚弱之功，莫甚朱明氏。』

平子之言，誠有感於當時矣。抑何時無人？何地無才？菽麥稻稷之種，播於沃壤則怒茁，播於曠土則枯死，其所種同，其所出異，則機緣爲之也。龔定庵嘗有詩云：

『九州生氣仗風雷，萬馬奇疇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定庵蓋有感於當時之人荒，而不知與彼並世者，洪、楊、曾、左諸才傑早已在

人世間矣。使不遇非常之時，無尺寸藉手之地，則畢其生羅山一老儒，湘陰一劣衿，湘鄉一文學侍從之臣而已。是知有用人之柄者，不必患人荒，而患在無所以培養啓沃人才之道，雖有人才，不死於焚屠淫掠，卽死於閉塞愚弱。死於焚屠淫掠者，猶可謂異族爲之也；彼本不欲吾之有人也，彼惟恐吾之人多而有才且賢也；死於閉塞愚弱者，則以同一國族之人，橫設爲內外之防，上下之禁，脅之以威刑，誘之以利祿，腹誑有誅，耳語有禁，自牛角之日起，卽授之以愚昧閉塞之教，塞其聰明，蔽其耳目，使心無雜思，目無旁鶩。彼明祖之施政也，功臣如李善長、胡惟庸、藍玉輩，橫遭誅屠，猶可謂有由。宋濂一儒者，高啓一文人，亦必監其思想，摘其文字，甚至以孟子爲主張民權而欲撤從祀，其所懸以教士者，惟是高頭講章，八股文體而已。是其用心惟恐人之才且賢，與奇渥氏正同。然則人荒者人自造之，非天之生才有異也。卒之，明之一代，學問空疏，事功微弱，不百年而胡虜入侵，國君被俘，自後遂爲閹宦細人之天下，忠良之士，一廷杖斃之而有餘，是其愚弱人者適所以自愚自弱也，其智遜奇渥氏遠矣。蓋奇渥氏之焚屠淫掠，所以摧殘敵方也；朱明

氏之閉塞愚弱，則以摧殘己才也，其所施同，而其所審於人己者異。人有惡己之耳目手足以爲多事者，剝剔之，翦裁之，欲一切束縛錮蔽之，以爲舍此不能統一於心君，卒之，五官百肢俱失其靈，而心亦槁且死矣。朱明氏之所以爲政者何以異於是！

嗚呼！人荒之難，蓋古今無以異也。

夫才難之歎，古今所同，抑培養生發，非無其道。以西京之偷敝而有東京，以五季之頹汚而有北宋，彼漢光、宋祖非有異術以生才也，能執其風氣之柄，開其進退之路而已。故以天子之尊，屈於布衣，新興之朝，推獎異趣，敢言者無罪而有功，抗節者率土而從化，禁網悉撤，言路大開，此兩朝風氣之淳美，節義之輩出，皆賴養之得其道也。夫人荒豈難闢哉，貴在知其本而已矣。

民國三十二年（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憲法及其背後的力量

憲法是什麼？不是一張白紙寫上幾行黑字就算了事，如果祇是這樣，那麼憲政問題就很簡單了，用不着再談什麼運動了。

爲什麼美國的憲法是憲法，曹錕的賄選憲法就不算憲法？爲什麼英國的憲法並沒有成文，却爲舉世的模範憲政國？爲什麼德國的威瑪憲法條文那樣定得完密週到，却不到十幾年就失了效？這其中一定有些道理。

當然，憲法條文之周到合理與否，對於憲法的實施效力有密切的關係，但條文儘管周到，如果其產生憲法的背景沒有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情，以及實施之時並無誠意，則條文之研討不免多事。譬如曹錕憲法以天壇憲法爲藍本，最初訂定者爲各黨各派之名士，用意不爲不周到，但因係由賄選之直系政府所產生，故國民自始即不加以重視，其憲法亦卒歸於無效；又如美國獨立時的憲法，過重理想，缺少彈性

，偏於剛性，至今扞格難行，但美國全國人民，至今篤守此憲法，不敢輕議修改。可知憲法的地位初不繫於條文的完善與否，如果把條文看得過於重要，斷斷計較，那就不懂得憲法不是普通法律，不是幾個白面書生咬文嚼字就能夠捧得起來的。

當然，憲法產生的程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不是在表面合法的程序上產生的，即使是袁世凱自訂的新約法，也要假借民意，召集約法會議，但所謂法，非吾之所謂法，終於流產。而且越是元氣淋漓，能夠代表全國人民真意的憲法，其產生的程序越不十分嚴格，繩以手續，草率之處甚多。因爲此等憲法，大抵訂定於革命初期，程序的草率是不可避免的。譬如民元時代的約法，僅由十七省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產生，而此十七省代表也並非由全體人民依合法手續所選出，但因其能代表當時全國人民蓬勃的革命精神，故民元約法的產生程序雖草率，內容雖疏漏，至今仍爲談中國憲法史者所尊重。

憲法之價值既不在於內容條文之周到與否，又不在于產生程序之合法與否，然則在什麼地方呢？我們以爲憲法本身不過是一種形式，形式背後還有本質問題，憲

法的價值決定於其背後所代表的本質，本質如有價值，則形式上的憲法雖然草率疏漏，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精力，否則，雖然完密周到，依然不過是一張白紙上寫的黑字。

所謂本質，實際上就是憲法背後所代表的力量，此力量產生憲法的要求，規定憲法的內容，保障憲法的實施效力，有此力量，則憲政可以長治久安，無此力量，則憲法不過是一張白紙，力量如有缺陷，則憲法無論怎樣完善，也依然是一本缺陷的憲法。

所謂力量，可分兩種：一種是組織力，即在憲法背後有經過組織的大多數民衆爲之支持，如果民衆對於憲法並不感到興趣，也不感到對於自身權益的關係，或即有感覺而不能形成有力的組織，或雖有組織而祇限於少數智識較高的分子，則憲法縱具形式，沒有支持的力量，結果祇能流於形式化。

另一種更加重要的是精神力，凡是憲法之能光輝發越，永華久遠者，必由於其背後能代表一種精神的或道德的力量，全國人民對此精神的力量深受感動，聲光所

及，如響斯應，如此，則憲法一經形成，即具有精神的威力，使人視如神聖而不可侵犯，如是之憲法，始能垂之久遠。若如袁世凱、曹錕之徒，憑藉少數爪牙，私訂憲法，強姦民意，則精神全失，雖有憲法之形式，內容周到，程序嚴整，亦不過一張廢紙，當時之人雖敢怒而不敢言，事過景遷，丟到毛廁坑裏亦無人過問矣。

欲憲法之永垂久遠，與其徒重形式之討論，曷如致力於兩種力量之建立，此朝野上下所應共同努力者也。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新中國日報

論學者當知所以自處之道

封建壞而貴戚世族之權分於游士，六國之士，布衣立談以取卿相，降及後世，辟舉，科試，取途不同，而士之可以問政干祿則一，其任重則其慮多，其途闢則其志廣。故古之論士，不過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而已，後之人則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矣，顧亦有匪士之思慮所敢企及者。封建之世，帝王世及，迄乎漢祖，以亭長起家，開平民天子之例，自是厥後，易姓革命之際，起乎匹夫貴爲天子者往往有之，其人類多武夫走卒負販耕氓，顧未有出於士者，巨君以世戚，文叔以帝胄，皆非眞士也。原夫封建之世，士之一級，出則事公卿供役使而已；後世之士，出路雖殊，亦不過以向之事公卿者事帝王，任臣宰者任卿相，其名雖異，其仰面事人供奔走役使則一，故後世之士，雖志廣才高者，極其思慮，不過以帝師王佐自命而已，「彼可取而代之」之呼，「大丈夫當如此」之嘆，未聞敢出於士之口

而發於其心也。

夫士之自處既不過如是，則其欲申其志於天下，勢必待有能役使奔走之者，故士又往往談君臣遇合，「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其有擇而不得遇者，則「三月無君，皇皇如也。」然君臣遇合，談何容易！以諸葛之遇昭烈，宜可謂君臣魚水矣，當其遺恨吞吳之際，猶不能不竊竊嘆惜曰：「使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何則？諸葛雖親，不敵關張之多年共患難也，向使先主不死於白帝，關張不殞於寇讎，或者後主英俊有類威廉二世，則諸葛終未能大行其志也，求不爲俾斯麥之放逐則已幸矣。若夫其不及諸葛之遇合者，商君受傾於貴戚，李斯被擠於近侍，王安石得遇神宗而晚節寥落於金陵，劉基得遇明祖而未歲憂讒畏譏，憔悴以死，甚且有中毒之疑，士之不遇則仰屋興嘆，及其既遇，則末路亦不過商、李、王、劉而已。何則？其所處之地祇能如是也。

龔自珍氏嘗有「賓賓」之議，其言曰：

「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

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閭闔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烏乎！龔氏之言誠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夫與王之起，必起於兵戰，冒鋒鏑，爭死生；揮金貲，間敵情；聚米穀，通饋饋；此三者必與腹心肺腑從龍之臣計之，而俱非白面之士立談之間所能勝任也，故貴戚近侍武夫走卒尙矣，叔孫通所謂不能與絳、灌爭者也。故仗策之士，於地則不近，於情則不親，於功則不若武夫走卒之出生入死也，人主之以禮貌接之，不過取其搢紳縫掖，魁然大物，聊備冠帶之一格而

已，國家之大計，一姓之家法，固斷斷乎不欲賓知而議之也。爲賓者苟能審乎其分，明乎其誼，則不得已而仕於其朝，亦惟有杜口箝舌，旅進旅退而已矣，於此而猶欲伸眉攘臂，論家國之大政，與貴戚近侍爭榮辱於一朝，龔氏所謂「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者也。

然則世之學者當知其所以自處矣，政治，待於人者也，學問，自取有餘者也，待於人者，遇合不可必，榮辱不可知，而先已喪其所守，曷若優游乎學問之城，汪洋恣肆乎思想之園，自有園地，自闢而自耕之，其幸而有成，不異乎取天下之樂，其不幸而終無所就，亦尙得免於狗馬僕妾之辱也。竊悲夫世之所謂士者，多未能自審於賓主之分，放言高論以預人家國事爲己責，其始之未入藩籬，猶得偶蒙禮接，及其墮身於勢利場中，莫能自拔，則盡喪其所守，而人亦不復重之。其上者憔悴宛轉，掩戶自傷，其下者則揚眉翹首以某公某公厚我自詡，賣其師而及其祖矣。故作此論以續龔氏賓賓之議云。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論 熱 中

天下之惡多矣，而熱中居其一。

夫熱中非盡惡事也，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皆熱中於救世者，棲棲皇皇，日不暇給，後世以聖人稱之，蓋其一片悲天憫人之懷，莫能自己，故衷心不期熱而自熱。後世未有以熱中譏孔墨者，蓋知其熱中非爲己而爲人也。

然卽以孔墨之聖哲，因其熱中救世之故，行動上遂不得不有所遷就。衛靈公夫人南子，一怙寵擅權之婦人也，後世稍知自愛之君子，皆知其牝雞司晨，殃及家國，禍水終凶，冰山易倒，而孔子以熱中救世之故，不得已往就見之，遂爲其弟子子路所不悅，再三矢誓，未知終能解其疑否？楚人將伐宋，墨子命其弟子三百人持守圍之器，爲宋拒楚，而自往說楚。夫楚王、宋公等是民賊，楚固橫暴，宋亦未嘗非殘民以自肥者，惡楚而助宋，以大聖羣賢而甘爲民賊供驅使，蓋亦發於熱中救世

之一念。卒之，孔子既見南子，未得免於招搖過市之辱，而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墨子之道亦未見其得行於宋，二位大聖之兩片熱誠，徒爲殘賊獨夫所利用耳。

蓋人既熱中於某事，自不得不對環境有所遷就，以期其事之易成，其始尙以「爲目的不擇手段」自解，其漸則爲手段而忘却目的，其終則以手段爲目的，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本來目的遂不覺拋之九霄雲外矣。此熱中之雖非惡而終必爲惡也。

夫人，情動於中則智昏於內，水本至清也，沸之則騰躍渾濁，失其清之本性；燈本至明也，搖之則迴環惑亂，失其明之本質；人情凡事不干己者其判斷頗能公允，一經身入局中，便不免左袒右袒，諺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也。人之熱中者必有所欲，有所欲必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譽之惟恐其不至，於所惡者則恨之亦惟恐不至，其理智先已昏矣。以情動智昏之流，當家國經綸之業，嗜欲迫於中，情感發於外，黨同而伐異，是墨則非朱，國欲不亂，安可得乎？嗚呼！四十年來中國之所以紛紛不寧者，豈不以此乎？豈不以此乎？

人有轉物者，有爲物所轉者。熱中之人，既有所欲，情已牽於外物，以身殉欲，一旦不得則皇皇不可終日，故功名之士，拊枕嘆息，唐衢痛哭，屈子行吟，人生天地間，寥廓四達，儘多迴翔之地，自熱中之士觀之，則棲棲皇皇，若不可以終日者，人生苦境，皆自熱中而來，所謂自討苦吃者也。情既牽於外物，則俯仰由人而非由己，始則轉於物，終則轉於人，若登場之傀儡，笑啼皆由人而不由己矣，以此而談改造社會，復興國家，豈非南轅而北轍乎？

故人若欲爲「轉世人」而不爲「世轉人」（顏習齋語），則必自不熱中始。人不熱中則於世無所希冀，無所希冀則事不求其必成，功不期其自我。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空，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故能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雖有萬鈞之勢，百億之富，莫能牽率使之就範，若此之人者，非無救世之宏願也，特不熱中耳。世多以不能熱中者即爲冷心冷面，山林隱士之流，不知兩者之間原自有別，貴在有識者爲之辨之耳。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九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

在現代的國際政治裏，究竟是理想主義得勢呢？還是現實主義得勢？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特別是素來對於國際形勢隔膜的人，更應該加意警覺。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自來是國際政治的兩大主流，當中國的戰國時代，就有這兩種主流存在。儒家和道、墨兩家代表了前者，而法家、縱橫家、兵家代表了後者。結果，孔孟的仁義之道並沒有見諸事實，而成功的倒是最現實主義化的秦國，歷史第一次作了兩造的裁判人。

從秦以後，中國人在二千年大一統的長期孤立環境之下，漸漸忘記了國際環境的現實利害關係。直到清末受了鴉片戰爭以後歷次外患的教訓，才稍微明白了一點。我們看清朝末年一般政論對於國際形勢的剖析都是很健全的，但這種覺悟到了民國以後，不久便被理想主義的空氣所欺騙而忘掉了自己的地位了。當上次世界大

戰之後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曾經使中國人熱狂過一時，但不久就被凡爾賽條約和二十一條的現實教訓所糾正了。國民革命的前後，列寧的理想主義又曾經使中國人熱狂過一時，但不久也被蘇聯的現實所糾正了。這一次大戰，民主國家方面是站在羅邱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理想之下而作戰的，我們熱誠崇拜這輝煌理想的大西洋憲章，而祝其提早實現，但我們也希望中國的國際專家們同時要注意國際的現實主義環境，而加意警覺一點。

現代國際政治的中心仍在歐洲，而歐洲自從馬奇維利以來就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舞臺，儘管十八世紀以來，什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理想相繼出現，但都不過是在野政黨和文人的空話，這些唱高調的人一上了臺，就立刻現實化了，這並不是他們輕易忘却原來的理想，乃是現實的環境教訓他們不得不如此走。

現代歐洲的主要同盟國家是英蘇兩大國家，英國向來走的是現實主義的路，十七世紀以來英國的着着成功，大半依靠他們民族的現實性格，這一次大戰，英國在

邱吉爾首相的偉大領導之下，從敦刻爾克的撤退起，到今天爲止，處處都表現出現實主義的精神，其中如英法合併的提議，如東方的撤退，如印度問題的堅持，如歷次的飛聘美國，飛聘蘇聯，以及最近的開羅、德黑蘭兩次會議中的應付態度，處處都表現出英國政治家的現實精神來，最近邱相在國會的演說，明白表示對蘇波問題及南斯拉夫內政問題接受蘇聯的主張，更足表現英國的現實色彩，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其次如蘇聯，斯達林在這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手腕，如蘇德協定，如蘇芬戰爭，如蘇日中立條約，如蘇英二十年休戰協定，如解散共產國際，如修改憲法，承認十六邦的外交軍事獨立權，以及對於波蘭邊界問題的態度，也都是非常現實的，而且手腕更敏捷，魄力更宏大，蘇聯是現實的，和英國一樣的現實。

美國是比較理想主義的，現在的羅斯福總統雖比威爾遜總統實際些，然而根柢畢竟是理想主義的，這也是美國的地理環境使然。但我們也不可忘記在美國還有一個現實主義的大勢力在潛存着，民主、共和兩黨之中都有，在戰時，他們不得不擁

護羅斯福總統，到了戰後，現實主義也許抬頭，像上次歐戰及反對威爾遜的現實派抬頭一樣。

假如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人就更要後悔沒有老早注意國際的現實主義的潮流，現在就開始來注意，似乎還不為過晚。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日新中國日報

國防與外交

自從陳啓天先生在「國防中心論」一書中提出應以國防爲中國的建國中心主張以後，近幾年來，因抗戰事實的教訓，已成爲國人一致的公論了。但一般國防中心論者，往往只注意到軍備問題，以爲只有建造強大的軍隊才能鞏固國防，這種見解是很狹隘的，並且難免有流弊。軍事力量誠然是國防的重要基礎，但如僅靠軍力而忽略其他，則軍力愈擴張，國防或愈不安全。納粹德國可謂致全力於軍事準備了，但因其不知於軍事以外尚須兼顧其他要素，故弄成現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也許因爲憑恃其軍力之強大才發生忽略其他要素的自大心理，所以說軍力的強大有時未必即能達到國防安全的目的，甚至與此相反。

國防安全的要素有政治、軍事、經濟、地理、文化，外交諸項，現在祇談談國防與外交的關係。

外交爲國防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有時更重於軍事，不但軍備落後的國家須注意外交，即軍力強盛的國家也須注意外交，才能策國防的安全。以德國爲例，當十八世紀之初，普魯士不過是一個北方的新建小王國，兵力並不算強，因能與英瑞等國相結，共抗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才日臻於強盛；到腓特烈克二世憑恃其武力，侵略奧國，引起俄、英、奧的聯合反對，七年血戰，柏林被圍，腓特烈克幾乎自殺，幸俄帝易人，外交形勢轉變，始免於滅亡，這就是但憑武力不重外交的結果。俾斯麥相普，利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孤立其敵人，三次戰爭，俱獲勝利。普法戰後，俾氏不因德國之強而忽視外交，柄政二十年中，兢兢業業，以維持英、俄、奧、意的親交，孤立法國爲職志，對於北方強鄰俄國的交誼，尤其注意。直到威廉二世卽位，俾氏在被逐之前，猶含垢忍辱想完成俄德同盟，以策國防的安全，大政治家們的洞識與苦心，於此可見。後繼者的威廉二世與今天的希特勒，不懂得這個道理，妄自與俄爲敵，並與世界爲敵，才使德意志民族兩次墮落到悲慘的命運，德國的成敗往例，可爲世界各國的殷鑒。

以外交來策國防的安全，其要有三：

一曰知幾。幾者動之先，明眼的政治家和國手下棋一樣，在每一着棋未動之先，就要算到若干步以外。譬如眼前有一件事似乎對我有利，但高手都能看出在眼前的小利之後隱藏着無窮的大患，因此雖有利而不貪。政治家決不拿自己一時的小成功誇耀民衆，滿足虛榮，却要爲國家民族的遠大利益打算，有時雖受重誘而不辭。貪一時之小利而忘未來之大患，政治家所不爲。

二曰辨形。處於列國交爭之中，立國者必須審辨其四周的形勢，何國爲我之友，何國爲我之敵；何國可友而不可友，何國可敵而不可敵；何國萬不可爲我之友，何國萬不可爲我之敵。這一切都須依照地理、歷史、國情、及國際的利害形勢爲判，萬不可但憑個人的喜怒，亦不可迎合民衆的心理。每一個國家都有其萬不可開罪的友邦，如德之與俄。德國處歐陸中原四戰之地，與任何國家爲敵尚不至亡，但如與其背後強大的俄國爲敵則必敗無疑。俾斯麥一生兢兢以保持德俄國交爲務，就是懂得這個形勢。

三曰取實。政治家爭實而不爭名，國與國的交涉，不能但佔便宜而毫不吃虧，政治家能爲國家佔便宜，而忠於謀國的政治家尤貴有時能爲國家吃小虧，故小氣不必爭，小刺激須能忍，對於萬不可與敵的鄰國尤貴果決剛斷，吃虧忍辱，把枝節的懸案，儘量解決。吃點小虧不要緊，因爲小虧是大便宜，若是小事事爭執，絲毫不肯從容解決，到了吃大虧的時候，就手足無所措了。

偉大的政治家，知幾之來甚微，形之分甚明，故能事先準形而立策，臨事知幾而預謀，當前審虛實而果決斷策；無識的政治家，事前則爭小利而不知趨避，臨事則張皇失措，當爭不爭，當讓不讓，國事因之而敗壞者不知凡幾。所以立國當賴有大政治家之領導，國防的基礎與其說建築於軍事上，不如說外交更重要些。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新中國日報

遙贈威爾基先生

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偉大的人物？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人物？我也不知道；我祇知道，有兩個人物確實可以稱得起「偉大」兩個字而無愧，這兩個人之中的一個是大英帝國的現任首相邱吉爾先生，另外一個呢，便是美國新興的政治家，最近宣布放棄共和黨候選總統競選資格的威爾基先生。

這是兩個典型全然不同的人物，邱吉爾先生是英國的現任首相，是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也是成功的政治家。威爾基先生呢？則是曾經競選總統失敗過的在野的政治領袖，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的代表，至少在目前是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這兩個人代表政治上兩種相反的典型，其成功失敗也不相同，但同不失其為偉大。

邱吉爾先生的偉大是人所共見的，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支持一個風雨飄搖、孤城落日的大英帝國，他却能發揮他的鐵一般的意志，鷹一樣的眼光，電一般的手

腕，一步一步，腳踏實地，不受虛聲的恫嚇，不爲俗論所動搖，把自己的祖國從深淵裏帶到坦蕩的平途，看他這幾年來應付各種問題的手腕，既鎮靜，又機警，沒有一毫的失着，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大英帝國有這樣的人物來作領導，是大英帝國之幸，二十世紀的歷史能產生這樣的人物，是歷史之光，我們像看戲一樣看到一個第一流的名角在登臺表演，嗓音，腔調，臺步，做工，都火候純足，真夠過癮。世人是捧成功者的，邱吉爾先生的偉大，不但我知道，許多人都知道，也都佩服。

但要認識威爾基先生的偉大却不是這樣容易的了，因爲威爾基先生還沒有登過臺，他的表演成績如何無從知道，照理想，恐怕即使登臺也未必能成功。但威爾基先生的偉大，並不在他的成功，而就在他的失敗，就在他不怕失敗，敢於向失敗挑戰。凡偉大的英雄都是敢於向失敗挑戰的，邱吉爾先生在此次歐戰未爆發以前，也會在政治上失敗過十幾年，但從未屈服於庸俗的政客的淺見之下，他膽敢向庸衆挑戰，不怕失敗，這樣才奠定了他今日的成功。現在，威爾基先生也在膽敢向失敗挑

戰，他失敗了，他的失敗也奠定了他的偉大。

威爾基先生是生在國勢興隆，人民滿足現狀的美國，他的政籍是隸屬於比較毗於保守的共和黨，美國的民主政治是受支配於政黨和輿論，而政黨和輿論的背後支持者却是若干馳名世界的富人所結成的陣線，這些有錢的人他們對於政治的希望是保守現狀，不要輕易改革，是縮減政治軍事的費用，減輕他們身上的擔負，是抽身於國際漩渦之外，閉關孤立，是防止下層民衆的得勢，預防世界革命。在這個立場上，他們怕受英國的利用，捲入歐洲事件過深；在這個立場上，他們也不願意過分牽入太平洋戰爭，寧可坐視中國孤立；在這個立場上，他們特別憎恨蘇聯，深怕她不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在這個立場上，他們之中也許有一部分還暗暗同情於法西斯主義，希望她們不要驟倒。威爾基先生所碰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治氛圍，他假使想在政治上成功，他必須和這些「大亨」們妥協，接受他們的政見，代表他們的利益，把他的政策主張修改得十足穩健，十足保守，這樣他就一定會得到黨的支持和輿論的擁護了。然而他不肯，他寧可和失敗挑戰，他提出來的主張比羅斯福總統還

要激進，還要開明。羅斯福總統就因為推行新政，引起了敵黨和自己黨內一部分保守人士的不滿，上次歐戰的威爾遜也因為提議國際聯盟的理想而失敗於國內的政敵之手，威爾遜先生的主張比羅斯福總統還急進，比威爾遜總統還大膽，他的失敗是當然的，然而他不怕失敗，他並不因為怕失敗而和這一般有力者妥協，他的偉大就在這個地方。

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不如英國的民主政治有一個貴族風度的保守黨為中心，憲法裏對於總統任期和職權的規定又過於呆板，不容易活動，故英國常能產生第一流政治家，而美國的第一流政治家多遭失敗的命運。歷史上有名的美國總統，自華盛頓以後，不過哲斐孫、林肯、麥肯來、老羅斯福、威爾遜和現在的羅斯福總統，寥寥可數的幾個大政治家，其餘的並不是沒有人物，但偉大的人物就很難通過於這樣的庸衆之前，這就是美國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缺點。

政治家的成功不一定在事業，有時理想的成功比事業的成功還偉大長遠得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實際政治上的影響有時也許還遠不如一個失敗者，威爾基

先生這一次放棄競選，自然並不是說他永遠不能抬頭，但無論他將來能否東山再起，他的理想根本就是一件偉大的成功。時代的輪子一步一步轉了上去，有遠見的政治家雖然一時不爲羣衆所了解，然而終必有被了解的一天。我們現在誰人能忘記了脫離共和黨另組進步黨而競選失敗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雄姿，一隻受傷的獅子遠勝於一羣低首的綿羊，偉人之所以爲偉人者就在此。

我們敬祝威爾基先生在政治上不要灰心，四年之後，再和國人及世界相見。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一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變化裏的統一

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發現過一條關於美學的原則，這就叫做「變化裏的統一」。凡是藝術上成功的作品，都必須是一面有變化多端的複雜性，一面又失去其諧和的統一性，不合乎這個原則的，就不算是成功的藝術。

亞里士多德的這條美學原理，雖在二千年後的藝術學家眼中，也被認為不易的真理。

政治也是一種藝術，成功的政治家同時也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創造者，所以亞里士多德這條定理，也可以同樣應用到政治方面。

變化的統一，是對單調的統一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必須保持其統一性，這是無疑的，因為不如此則不成為一個國家，但所謂統一，決不是全國的人都穿一樣的制服，走一樣的步伐，讀一種報紙，喊一樣口號，只許保持一種的信仰，——這都

是納粹德國的拿手好戲。如果是這樣的統一，這是單調的統一，無機的統一，因爲在統一裏面沒有變化，所以失去了藝術的價值，只有像德國和日本那樣低能的民族，才會創造出這樣醜惡的失去藝術性的政治方式。

現在成功的國家，都是能夠遵守這種「變化裏的統一」的藝術原則的。英國是世界政治上最成功的國家，也是最能應用這個原則的國家。英國的政治外表最複雜，一面容許各自治領、各黨派、各階級、各個人的獨立自由，一面却又最能發揮諧和統一的作用，一點也不妨及國家的統一。其他各國雖不如英國人的政治藝術這樣高明，但也都漸漸地向這條路去走，就是蘇聯，自從撤消第三國際和准許各邦有外交軍事獨立權後，似乎也有遵着英國這條路去走的趨勢了。

特別在大國裏，這條原則的應用更形重要。統治一個大國比小國更難，人口多，土地廣，種族和信仰複雜，經濟的利害也不盡同，所有這些矛盾如果用一條鞭的辦法去強求單調的統一，結果必致反失却國家的機動性，使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大堆的機械木偶。只有應用變化裏的統一的藝術最高原理，才能使國家從無機的狀態

進化到有機的狀態，民主政治之所以高於獨裁政治，就在這個地方。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超過和戰的戰爭

人類國際間的戰爭可分兩種：一種是普通國際間的戰爭，可以叫做「和戰的戰爭」，這種戰爭以媾和爲目的，無論勝敗誰屬，敗者不過喪師失地而已，過後仍可以恢復兩國的國交，立於平等地位，我國春秋時代的大部分戰爭，和歐洲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許多戰爭，大體都是屬於此類；另一種則是兩個民族或兩種文化體系賭生死存亡的決戰，這種戰爭不是用通常的媾和關係所能夠解決的，敗者不但喪師失地，並須將全民族的命運和信仰屈服於勝利者鐵蹄之下，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接受戰勝者的統治，我國在戰國時代，和古代西洋希臘對波斯的戰爭，羅馬對迦太基的戰爭，以及中古初期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戰爭，都是屬於此類。

我們已屢次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由春秋時代入於新戰國時代，今天的戰爭是世界各民族賭生死存亡的大戰，而且是幾種文化體系的決戰，人類歷史到了現階段，

必然要發生這類性質的大戰，從前希臘時代的比羅奔尼蘇戰爭即屬於此類。但是有些人仍然不明瞭這類戰爭的嚴重性質，譬如在此次抗戰之始，還有些妥協分子暗中心以和議解決中日間的衝突，不但在日本，他們的軍閥曾經夢想三個月內解決「支那事件」，以為只要打到南京就可媾和，即在中國方面也還有不少汪精衛的應聲蟲，自命為悲觀主義者的人，暗中希望以媾和了結此事。論理，七年來的長期抗戰，應該把這種迷夢早就打破了，但是在此次日本東條內閣的坍塌和納粹德國的炸彈案發生之初，還有不少人以為是德國和日本投降的預兆。不錯，德國和日本終久必要投降，是不成問題的，我在七年以前就和一般自命悲觀分子的人爭辯過這個問題，但所謂投降，必然須是羅邱所宣言的無條件投降，而絕不是普通戰敗後的平等議和。即使德國的國防軍打倒了納粹，即使日本的文治派打倒了軍閥（這是決不能的事）他們也只能於無條件投降和繼續堅強作戰的兩條路間選擇一條，決不能希望還有平等議和的可能，如果盟國方面還有人夢想此次戰爭可以議和方式了結，則結果必致誤墜入敵人的詭計，培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就中日兩國關係而言，七個年來日本國策早就以滅亡中國爲目的，軍閥如此，文治派也是如此，不過文治派比軍閥所用的手段更巧妙些，更毒辣些，所謂幣原外交並不是和平的外交，而是用經濟、文化、外交等更毒辣的方式滅亡中國的手段，比軍閥所用的手段更狠毒百倍，幸虧天奪其魄，日本國民選擇了拙劣的軍閥來代替狠毒的元老重臣，方有今天的四面受敵。所以我們以中國人的立場看來，一個自由主義的日本，甚至社會主義的日本，也決不能放棄滅亡中國的念頭，比軍閥日本更可怕，更要防備，只有澈底打倒日本，解除日本的武裝，摧毀日本的工業基礎，才有永保東亞和平的可能。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五日新中國日報

編者按：先生在民國二十七年春，曾有一文論及中日戰爭的根本意義，頗有卓見。今該文已佚其大半，茲將僅存之末數段錄於後，以供參考。

『我們天生具有大國資格的中國人，根本不必乞食，我們應該覺悟自己的潛勢力，我們要認識這一次的戰爭，不但是一個救亡的戰爭，還是一個爭霸

的戰爭。黃種的領導權，無論從歷史、文化、人口、土地、資源那一方面來看，天然是我們中國人的，日本小鬼那裏配。至於對日本人，我們也要正告他們一下：大國小國的地位是天然生定的，決非人力所能徼倖巧取豪奪。一個國家的基本條件是民族的統一，用強權來征服不同的民族，勉強建設一個大國，這種國家的基礎是建在沙灘上的，決難持久。今日民族統一具備大國條件的，世界上只有中、俄、美三國，而中國在這一條件上尤爲完滿，其餘諸國，雖以英國人之善於懷柔屬地，尙難免自治領紛紛獨立，帝國隨時有瓦解之虞，何況日本人。朝鮮被滅已經三十年，尙難泯滅其民族意識，請問你吞得下中國這個大炸彈嗎？

『今日中日的關係正和過去德奧的關係一樣，過去德奧所爭者爲日耳曼民族的領導權，今日中日所爭者爲黃色人種的領導權。奧國過去本較德國強大，但因其民族複雜，根本無大國的資格，所以普奧戰爭以後一蹶不振，今日竟爲德國所合併。此次中日戰爭也就是一幕沙多瓦的戰爭，這戰爭無論延長到若干

年，中國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是無疑的。在未來的一世紀之中，日本必由頭等國家一降而爲三等國家，最後或竟淪爲中國的附庸。這並不是說大話，對於歷史有認識的人，應該首肯這個結論。

『豈惟日本爲然，在下一世紀裏，全世界的霸權必將分屬中、俄、美三國，德國如能完成大日耳曼主義，尙可建設一中歐大國，分享霸權。大英帝國恐不免終於分裂，蹈了西班牙的末運。至於法義等國則根本無在二十一世紀中做大國的資格。印度民族和亞洲西部的回教民族如果能早日團結復興，則可以取得二等國家的地位，否則不免爲大國爭奪之目標。至於澳洲和南美諸國，其命運屬於遙遠的將來，不在最近出頭之列。』

『中國人應該感謝我們過去祖先對於民族文化統一的偉績，使我們在今後有做大國的資格，對於目前的災難應該不必過於悲觀，因爲勝利之星是注定在我們頭上的。』

培養事業精神

抗戰勝利在望，而建國大業百端待舉，我國今日號稱四強之一，徒以過去七年血戰，軍民上下之犧牲奮鬥有以得之。顧戰後而欲永保此強國之地位，則非切實於建國必需之基礎事業下極深之努力不可，若如今日之文事武備，乃至衣食住行，舉無不仰給於外人，而猶欲自廁於強國之林，誠未見其可也。

建國事業，經緯百端，今人動輒期諸政治社會之全般改革，不知所謂政治與社會者，特抽象之代表名詞耳，凡大名詞皆由無數細微之小單位積累而成，由一點一滴之改革，累積而成鉅大之變革，所謂「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也」。若不從細微處入手，惟事大言壯語以奔走政治改造社會自命，則所變更者不過一紙空文，幾條口號，少數居上位者之人選而已，下層各項機構，依樣葫蘆，換湯而不換藥，所變更者殆已幾希。辛亥以前，一般人以為只要政治革命成功，國家即可一步登天。民國

十四五年之際，一般社會革命者亦以爲只要社會革命成功，中國亦必立時轉換面目，其結果均不如所期。大抵中國過去文人傳統，以不求甚解，務觀大略爲高，以爲有志天下者卽不必灑掃一室，其結果但能大言壯語，而委以事業，一籌莫展，甚至以事業家爲俗惡，爲萎瑣，舉天下之號爲清流者，但能揮塵清談，而凡百事業遂不得不委之於俗惡萎瑣者之手，此革命之所以數十年而國基仍未鞏固之原因也。

今日欲真正努力建國事業，則必自打破清流習氣，培養事業精神始。對於已成功之事業及事業人才，宜多方維護，略其小節而全其大體；對於未成功之事業及事業人才，尤宜多方協助，解除其困難，增勵其勇氣，使未成功者能循正途以成功，既成功者更得因舊基而猛晉，積少成多，化零爲整，一事成功，事事成功，則整個社會皆可得卒獲其益焉。

今日爲事業之敵者有數端焉：一曰嫉妬，見人成功則生嫉妬之心，必欲破壞之而後快，此其一也；二曰意氣，激於意氣，雖是亦非，不論實際，但圖逞快，此其二也；三曰情面，牽於情面，不能放手做事，事業家有求事業之合理化而不顧情面

者，則羣起攻之，此其三也；四曰凌犯，事業成功，貴於上下組織井然，如臂使指，而中國人習氣，多好以下凌上，以爲清高，結果使事業秩序紊亂，無法推動，此其四也；五曰鬆懈，凡事洩洩沓沓，不肯起勁，如已疲之卒，雖驅不動，此其五也。凡此五端，胥爲事業之大敵，欲事業之有成，必須去此五敵。

國人積習，好繩人之短而不好稱人之長，如有見一善而津津樂道不去口者，非日以鄉憑，卽疑以妥協，此種態度實使事業家灰心短氣，而任何事業不能企其有成。願舉國上下其共勉而改之！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戰後處置日本問題

我不知道在這個時機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合適，也不知道這個問題能否容許公開討論，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似乎終久有提醒大家注意的必要，因為今後五十年中，中國國運的安危和太平洋上和平繁榮的保持全看這個問題的處置是否得當，我們既是一個中國人，為忠於謀國起見，不能不憑自己的良知貢獻一點癡直的意見。一方面，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似乎也已經成熟了，盟國的勝利業已在望，四大強國已經在華盛頓開始討論戰後國際和平機構的種種問題，羅斯福總統已經宣稱中美兩國關於佔領日本一事成立口頭協議，外交大計雖由政府主持，但在民主國家中，全國公民對於這些問題是容許自由討論的，因此我願意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資格來公開討論這個問題。

有些戰後的問題，在戰爭期間是不大容易平心靜氣的討論的，特別是對於敵國

的處置問題。在戰爭進行的時候，國民心理充滿了讎恨，直捷痛快的議論最容易被人接受，而憂深慮遠的見解則每易忽略過去。立國的大計，世界的全局，豈是單憑感情所能應付得了的，一個國家中多有幾種比較理智一點的意見，對於事實總不會有什麼大害處吧！

日本不但是中國的敵人，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公敵，明治維新以來七十六年之中，日本的國策，一貫是由征服朝鮮以征服中國大陸，由征服中國大陸以完成其征服全世界「八紘一字」的迷夢。爲着抵抗日本的征服行動，中國及其同盟國家，七年以來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血汗，時間，以圖制止這個惡魔的行動，現在這種犧牲還在繼續擴大增長之中，到了戰後，豈不是應該想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以防止這個惡魔的復活，使我們的子子孫孫不再受一次或數次的蹂躪嗎？單就人情講，這種要求也是很公道的。

但如何才能永久防止日本侵略運動的復活？我們既不能從地球上面一舉把這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侵略惡魔移往地球以外，日本民族存在於地球上一天，和她鄰接

的國家便須時時刻刻提心弔膽以準備不定何時突然而來的侵襲。同盟國家不能永久派兵佔領這個國家，因為這是事實上所不容許的，中、美、英、蘇和太平洋上最多愛好和平的民族相互團結雖可以使日本從此不生野心，但國際間的關係是變動不常的，誰能保二十年後這些主要國家的關係還能沒有一點變動？國際制裁機構的成立自然是一種比較進步的計劃，但世界政府既然一時尚不能出現，民族的意識和利害打算一時也不能消除，照現在擬議中的計劃，將來制裁的責任仍將委之於幾個主要國家之手，這幾個主要國家間的步調，誰能保其永久融洽一致？過去國聯的失敗便是我們前車之鑒。然則靠國際和平機構來制裁野心國家的侵略復活，依然是一種不可知的變數，依然是不能保險的。這就是我們同盟國家當前的一個焦心問題。

爲着這個，主要同盟國家的幾個領袖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的諒解，就是在戰後短期佔領日本，以待教化日本人民學習了愛好和平的生活以後，再來讓其恢復自由，這就是羅斯福總統所宣稱的辦法，也是頓巴敦橡樹林會議中所行將解決的辦法，也就是我們此地所要討論的。

戰後暫時佔領日本，盟軍在東京大路上作勝利式的行軍，這是這次世界性大戰的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必要的。爲着教訓日本人民使了然於自己已經戰敗，而非自動放棄其「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免致再受其軍閥及野心家的欺騙煽動起見，盟軍以勝利式的姿態在東京市上出現，是必要的，但並不能單靠這個方式來保證永久消滅日本的復讎野心。因爲盟軍的佔領不能無限期地延長下去，如果善後的保障不能建立，一旦佔領軍撤退的時候，就是日本舉國上下埋頭復讎的時候，這復讎一旦到來，將比蘆溝橋和珍珠港的火燄更爲可怕。

我們必須承認，民族自尊的感情是不容易也不應該抹殺。納粹和日本的失敗，就在輕視這種民族自尊的感情，有己無人，妄想以征服的方式強迫他人與之合作，結果適與其預期相反，對於這些一味迷信武力的蠻族，雖不妨卽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叫他們也嘗嘗征服的滋味，但是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對於像德國、日本這樣愛國心強烈的民族，單靠佔領的方式去強迫他們洗心革面，而佔領又不能永久，控制的力量也難保永遠鞏固，這無異是埋藏一個火藥庫於地下，以待將來的爆

發，危險是不堪設想的。

羅斯福總統說得好：「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這句話一方面說，凡非日本人所生聚的地方，都不應該准許日本人染指；從另外一方面說，則凡日本人歷來所生的地方，就應該聽任日本人自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這種辦法不但是公道，也是聰明。我們既不能用殲滅，驅逐，及永久佔領的方式去對付這一個蠻族，則最合理而又最聰明的辦法，自然是扶植日本內部的民主力量，使理智的勢力戰勝感情的力量，讓日本國內的和平分子慢慢領導他們的國家走上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大道。誠然，日本目前並無此種民主和平的力量，但我們不能說日本人全是野蠻嗜殺之徒，其中產生不出一點和平的種子，凡和日本平民相處過的人，以及對於日本過去的文學哲理稍微了解一點的人，都應該承認日本大多數的平民原也和世界一切平民一樣，是願意過和平生活的，不然，在豐臣秀吉瘋狂的侵略之後，就不會有三百年長期的德川幕府的和平孤立時代了。日本人的侵略性，是近七十年來軍閥有意模仿普魯士教育的結果，是違反日本平民的自然欲望的。所以問題並不在日本人民能

否變爲愛好和平，而在乎如何使日本國內愛好和平，能過民主自由合作生活的力量抬起頭來。任何仰仗外國勢力所直接扶植起來的政府，是不會得其本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的，是不會樹立統治的威權的。一個被征服國家的政府，如果國內駐有外國軍隊，如果政治設施處處仰外國人的鼻息，如果國防經濟教育文化處處須接受不利於本國的條件，這樣一個政府就不會自動存在許久，而不過是替未來的反動派造成攻擊的口實，這個反動派一旦到佔領軍撤退之後，即刻會抬起頭來的。

歷史上有幾件國際的大舉措可以供我們作正反兩面的參考。拿破崙失敗之後，聯軍進入巴黎，在維也納會議中依然准許法國代表以平等資格參加，不割地，不喪權，因此在和議以後法國的路易十八政府並未受到民衆的攻擊，法國民族也不存復仇的心理，歐洲各大國之間和平相處了四十多年。一八六五年的普奧戰爭，俾斯麥力排普魯士軍人的橫暴主張，避免進軍維也納，戰後和議，不割寸地，結果普奧兩國由仇成好，奠定了後來三國同盟的基礎。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俾斯麥不能制止威廉第二和毛奇的虛榮心，不但割地賠款，而且在凡爾賽宮舉行德意志統一的典

禮，大大刺激了法人的感情，結果種下後來四十年兩國的深仇大恨，而招致第一次歐戰的失敗。第一次歐戰之後，克里蒙梭以復仇的氣焰威壓德國，強迫接受不合理的凡爾賽條約，以致威瑪憲法所產生的民主力量，因接受屈辱和約之故，不為德國人民所諒解，拉特瑙被刺於前，斯特萊斯曼盡瘁於後，反動勢力逐漸抬頭，遂有希特勒政權的出現。如果凡爾賽和會中的列強巨頭能稍稍有梅特涅和俾斯麥的遠識，以平等的條件處理戰敗的德國，則民主勢力不會在德國傾覆，復仇心理不會在德國人民心中滋長，這一次全世界的慘禍也許就不會出現。我們看了拿破崙失敗後的法國態度是如何，就可以知道一個民族復仇火燄會不會燃燒起來，是和他們在戰敗後所受的待遇如何有關的。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至少在今後五十年中，中國也必依然是個以陸上為生存主要條件的國家無疑。今後五十年中中國的國策，一面固須小心翼翼避免與海權主要國家的衝突，以免無謂捲入糾紛，一面更應該小小翼翼求取陸上國際的安全保障。陸上與中國毗鄰的大國，自以蘇聯為最重要，今後中國的國策必須效法德國俾

斯麥宰相的遠識，以求取蘇聯的友誼爲第一要務是無疑的。其次便是日本。日本雖是島國，但與中國大陸距離最近，與陸上鄰國無異，此次戰後，日本的海陸空軍武裝自必全部解除，以期除去侵略的爪牙，但解除武裝並不是一種絕對保險的辦法，凡爾賽和約後的德國何嘗不解除武裝，但希特勒上臺不過七年，便已有了征服全歐的武力，我們應該沒有忘記最初德國的軍事機構，是在蘇聯境內秘密培養起來的。明白了這個，便可以知道一個復仇心盛的國家，即使武裝全部解除，也依然有復興的辦法。海軍的恢復較難，而陸空軍的恢復則較易，將來日本如欲秘密恢復軍備，自必須從陸空軍着手，復讎的火箭不指向較近而較易着手的中國，又將指向誰？然則數十年後，我們豈不是又陷入第一二次大戰中間法蘭西的噩運？本欲求安全保障，而結果反保障終無，安全不易。所以今後無論何人何黨執政，對於中日的歷史恩怨必須求一長治久安的解決方策，否則幾十年後再來一次歷史的重演，我們實在受不了。

中國和日本過去歷史上的關係好比一對前生冤孽的夫妻，離又離不開，和又和

不了，中國人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既是前生對頭，今生便須謀解除冤孽之道，以免來生冤冤相報，糾纏不已。日本的侵略我國，由於其軍閥眼光短淺，不識大體，人來迫我之時，我自應誓死抵抗到底，給她嘗嘗苦頭，但到了戰勝攻取之時，我們的算盤便應該打得更精一點，更遠一點。照歷史上宿命的看法，中日的關係是有類於十九世紀德奧的關係，俾斯麥在普奧戰爭後對待奧國的方略，是我們今日所應該仔細研究一下的。

二十四年以前，我到日本的時候，當時改造社曾出了一本徵文專號叫做「百年後之日本」，記得裏面有一篇文章主張日本風景美麗，百年後應該闢作世界的公園，這篇出之日本人之手的論文，由今看來是很有見解的。為日本人民的繁榮福利計，為太平洋四周國家的安全和平計，日本變成一個世界的公園，實在是人已兩利的事情。日本人民如有遠識，應該效法北歐的瑞典，放棄侵略的野心，做一個和平孤立而繁榮的國家；太平洋上主要國家的政府如有遠識，也應該在戰後扶助日本使向此途發展。日本的重工業必須摧毀，但輕工業不妨聽其存在；海軍必須摧毀，但

商船不妨酌留一部分，使日本人民在戰後能憑藉其勤勞的習慣，科學的素養，從事於和平商業的發展，以養此三島上七千多萬的人口。日本人民有了生計，「鬼有所歸，始不爲厲」，野心家才沒有煽動的機會，一個民主和平的政府才能存在。爲世界人類的和平計，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應該注意此點；爲中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計，中國人更應該及早了解此點。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

回憶過去，創造將來

——三十三年國慶獻辭——

今天是民國成立的三十三度紀念日，我們欣逢國慶令節，曠觀國際大勢，最後勝利的光明局面已經擺在眼前，檢討國內的政治軍事局勢，又覺尙待警惕之處甚多。我們站在這三十三年後的今日，回顧民國締造的當初，尤覺感想重重。一個國家的締造真是不容易，時間經過三十三年了，我們這個國家還沒有真正走上民主國家的大路，國家的獨立與自由還在受威脅，失地還不能尅期收復，並且還在繼續失地喪師。人民的生活也還沒有改善，並且日益艱苦。我們有什麼說的呢？一句話說，我們對不起爲革命流血的先烈，對不起武昌起義當時全國人民熱烈的期望，對不起歷史的教訓，因爲我們直到三十三年後的今日，還在才從革命以前的預備立憲第一章開步走。

回想三十三年以前，中國的統治權正握在一般昏庸紈袴的滿清貴胄之手。滿清統治的命運，自從曾左諸人戡平洪楊的鉅亂以後，一時似乎有中興的氣象，但不久就被中法、中日兩次的失敗所沖沒了。中日戰爭的失敗，引起全國留心國事的人民的憤慨和要求改革的呼聲，當時國內對政治改革的主張自然分爲兩派：康梁的變法運動，始終不過想在保全清室政權的前提下求取一點進步的改革，這種運動不但與清室無損，並且確確實實對於清室是有利的。當時康梁一派的保皇黨人所持的理由，是清室這個政治中心不可輕易推倒，因爲推倒是容易的，但推倒一個中心之後，要想再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在這舊中心已倒，新中心未建設成功以前，國家的局面必陷於混亂，甚至危亡；因爲這個，所以他們誠心誠意希望在承認舊政權的前提下，謀取憲政的改革。當時的清朝君主光緒很能接受立憲派的這種要求，也很願意和他們携手共謀國家的改革。無奈頑固的反動勢力在滿清皇室貴族中力量太大，他們不了解憲政運動是大大有利於滿清政權的，他們不了解只有實行憲政才是保全清室政權的唯一大路；他們分不清楚憲政和

革命的區分點，視憲政黨人和革命黨人同樣可惡，同樣應該排斥，因此才使比較溫和的康梁一派始終不能推進政治入於常軌。結果全國人民由失望而憤慨，由憤慨而轉趨極端，滿清皇室貴胄的昏聩頑固，助長了革命黨，助長了革命的成功，到了梁任公先生在「國風報」上也大聲疾呼中國非革命不可的時候，滿清的命運就決定

了。

孫中山先生等領導的革命運動，起初本是直接受洪楊革命排滿思想的影響，最初本不為全國多數智識分子所了解，所接受，直到立憲派的戊戌變法運動受清朝頑固派的阻撓失敗以後，接着庚子拳亂和日俄戰爭兩次的國恥國難，清廷尙不知覺悟，徒以五大臣出洋，九年預備立憲的空言搪塞國人，這才使人民逐漸傾向他們一向所懷疑戒懼的革命黨。同時革命黨人也改變方略，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興中會，本是以海外華僑為主體，雖有雄厚的資力背景，但對國內尙感鞭長莫及，直到同盟會成立於東京，集合以黃克強先生所領導的兩湖會黨為主體的華興會及章太炎先生所領導的江浙智識分子為主體的光復會，三派合流，文字宣傳與武力革命並重，

革命的高潮才一天一天膨漲起來。當時在攝政王領導下的宣統朝廷，一面有慶親王奔動等老朽貪污的元老重臣，公然招權納賄，一面有貝子載洵，貝勒載濤等少年纨绔，竊弄兵權，驕詐狂妄，一面又有良弼等死硬派的滿人高唱「寧送外人，不送家奴」的口號。在預備立憲的假招牌之下，各省算是成立了諮議局，中央也成立了資政院，但是政權却死握在一般親貴之手，換來換去總不過是這一班人，政治上看不見一點革新的氣息，還在夢想中央集權，奪取各省地方的權利，結果引起了四川的鐵路國有風潮，斷送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統治的天下。

辛亥革命是革命立憲兩派合作的結果，自從武昌一起義，立憲派如湯化龍等就在軍政府中佔重要的地位，四川的保路風潮完全由立憲派人所領導，是人所共知。此外如江蘇浙江等省的獨立，也是由諮議局中的立憲派所促成的。立憲黨人爲什麼會贊成革命，會和革命黨合作，這不是他們願意如此，是滿清親貴的頑固政府所造成的。如果他們能服從他們有遠識的領袖光緒皇帝的主張，早點接受憲政派的要求，實行憲法，開放政權，則武昌革命不會發生，帝國也不會換成了民國。

我們今天站在三十三年度的國慶令節，來回顧民國當初的艱難締造的歷史，真有點替滿清惋惜，惋惜他們太愚蠢了，辨不清朋友與敵人的分野，不能當機立斷，採取一種最有利於自己的政策，以政治改革打銷革命黨的宣傳；反而逼迫溫和派不能不走上和革命黨携手的路上去，不但他們的政治生命完了，連國家的命運也幾乎同斬，大亂直亂了三十有三年。

人類是應該有自由意志的，過去這些陳舊的歷史覆轍，是不值得我們再重演一下了。我們今天舉國上下所需要的，是拿出理智來，拿出自由創造的勇氣來，同心協力，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國家，創造我們將來的、勝利的、歡欣鼓舞的中華民國第三十四年度的國慶。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新中國日報

開誠心，布公道，解決國事之本

抗戰到了今天，國際的環境，越趨越光明，而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諸般情勢却不能與此環境相配合，這種情形，不但使全國留心國事的人民內心焦急憂慮，同時也不免影響到我們辛苦得來的國際地位。國事到了今天，也樂觀，也悲觀。樂觀的是，勝利一天一天臨近了，驅除敵虜，還我河山，不過是一兩年間的事，最後的光明，總之是屬於我們的。悲觀的是，勝利儘管勝利，但大部分是盟友的努力，我們自省應該還有些慚愧。若是內政方面沒有澈底刷新眼前一切的積弊，則縱使徼倖託國際的形勢，獲得最後勝利，在戰事結束之前和結束以後，問題還是重重擺在我們的眼前，恐怕更有甚於此時者。何況在最後勝利到臨之前，還有一兩年最艱苦的場面待我們去努力，去支撐，不是坐待可以得到的呢？

我們不願意把眼前一切積弊的責任，都推在政府身上。因為眼前的中國，是明

清以來五百年君主專制、官僚統治的惡政治所遺留下來的一塊腐肉，在這裏惡劣的官僚統治之下，少數統治階層的皇室貴族宦官宮妾日趨於驕奢淫佚；多數爲統治階層作爪牙的官僚劣紳，則憑藉威福，貪污橫暴；最大多數的平民在這雙層壓榨之下，忍氣吞聲，過着牛馬似的非人生活；介於官僚親貴與平民中間的士大夫階層，一部份受收買，受豢養，變成了統治階層的御用品，做着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迷夢，一部分比較有氣骨敢言敢行的，不是受廷杖、謫戍、文字獄的摧殘壓迫，連性命都送掉，就是箝口結舌，杜門絕交，做一個得過且過的自了漢。近來「大公報」上引蜀賢徐子休先生的話，慨嘆於「三代以下之大患，在小人敢爲惡，而君子不敢爲善，」但是如果一個敢於作惡的官僚統治階層，把持着生殺的大權，對於有心爲善的君子壓迫摧殘，無所不至，請問善根如何能夠發榮滋長？我們只要把明清二代末季的歷史翻來看看，便可以知道，在這種長期盤踞的官僚統治之下，不但在下之士大夫和平民無法爲善，即有一二君主，挺出於上，有心爲善，且有爲善之權，也無法戰勝此腐爛的官僚勢力。明思宗和清德宗不是絕好的例子嗎？善根日減，惡根

日滋，惡果流傳，至於五百年後的今日，朝代是換了，國體是變了，但是官僚勢力依然如舊，作弊之法益精，藏身之術愈巧，投機轉變，望風迎合，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心法遍及天下，流毒至於無窮，像這樣一個惡劣的社會傳統，不但不是一二英明的君相所能轉移，就是合天下賢者之力與此惡勢力搏戰也未必能操勝算。政府可以變換，統治的人物可以變換，信仰和主義也可以變換，但是如果中下層的這一大批惡劣傳統勢力不能用方法澈底剷除，則無論怎樣變來變去，依然是換湯而不換藥，即使請羅斯福、邱吉爾來到這樣的一個國家，也將束手無策。因為我們這些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如果承認天下事不是一個人所能弄壞的，就應該也承認天下事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好的。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而不單純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然而這話也不是說握有最高統治權的君相便沒有責任，顧亭林先生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尚且有責，何況君相。匹夫雖有天下之責，但無尺寸之柄，赤手空權與惡勢力奮鬥，究竟困難。爲君相者，既握有天下之大柄，生殺予奪之權，盡在手中，若說是對於這種惡勢力一點辦法沒有，是欺人之談，問題是

如何向此傳統惡勢力進攻，對付此種傳統的腐惡官僚勢力應該採取何種的戰略，始能操必勝之權。

單靠一二在上的君相察察爲明，宵旰勤勞，蚤夜不能自休，是無濟於事的。因爲官僚的傳統戰術並不是正面抵抗，而是迂迴包繞，以退爲進，以柔克剛。越是以察察爲明自負的君相，越能勝剛而不能勝柔，巧言令色，脅肩諂笑，口蜜腹劍，以順爲正，這一套官僚的傳統戰略，就能夠把一個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所以君相斷不能靠一二人之力轉移風氣，戰勝此腐惡的傳統。君相而果有澄清腐惡的決心，惟一可取的戰略，是天下之事與天下共之，團結天下的善類，共同向此腐惡勢力圍剿。所以我想把徐子休先生的話改變一下，『三代以下之大患，不在小人敢爲惡，而君子不敢爲善，患在小人之爲惡有黨，而君子之爲善無黨。』怎樣把天下的、爲善的君子都團結起來，造成一個善黨，以清除一切腐惡的勢力集團，這乃是一切善類所都應該努力促成的。而握有大權的當道，如果真有轉移風氣、澄清政治的決心，則更應該及早努力於此。

團結善類，制裁惡人，這話說來容易，做來甚難。第一因爲君子不比小人是可
以隨風轉舵的，君子大抵中有所主，既有所主，便不能任意迎合他人，因中有所主
，則對於自己所主者必甚以爲是，對他人主張之異己者，亦必甚以爲非，一是一非
之間，感情易裂，意氣易生，小人之窺伺者乘機迎合，投其所好，故君子有時能與
小人結黨，而轉不能與君子爲朋，北宋的新舊黨領袖，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君
子，但因爲主張意見不同，不肯相下，由意見之異，演爲意氣之爭，末流至於亡
國。宋史是由舊黨思想得勝後的史臣修的，竟詆王荆公爲姦黨，由今觀之，豈不太
過！當時的君子不肯與君子合作，却偏偏肯認小人爲同黨；王安石引呂惠卿爲心
腹，司馬光認蔡京爲爪牙，總由胸中先互一死硬的意見，於是小人乘機迎合，得以
插入，而轉拒其他的意見不同的君子於門外。由今思之，君子何其愚！小人何其
巧！古來多少國事敗壞於此。門戶意氣之爭，直到寇入庭幃尙不肯罷休，北宋、晚
明之往事，豈不令人痛哭！

今天我們要掃清五百年官僚統治的積弊，挽救民族出荆棘而登坦途，我以為一

切門戶意見之爭，都可以不必。今天的中國，從政治的觀點看來，雖有許多黨，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却只有兩個黨，一黨是君子，一黨是小人。在任何黨派或無黨無派的人民中間，都有君子，也都難免有小人。小人而獲得政權，便形成爲官僚。君子與君子應該團結起來，向一切小人進攻，團結善類，制裁惡人，只有這才是中國的真正起死回生之道。

如何才能團結善類，制裁惡人？我以爲只有六個字，就是『開誠心，布公道。』惟誠惟公，做到了這六個字，中國就有光明可言。

什麼叫做「開誠心」？我感覺到今天中國民族普遍犯的是神經衰弱病，從宋明以來就已如此。患神經衰弱病者，多疑多忌，好爭小氣，要面子而不務實際，結果君子與君子不能相見以誠，而小人轉得以詐僞行其欺騙，二十年來的政治教育，更助長此種詐僞之風，教人以相互傾軋，教人以相互欺騙，始則以之施於敵黨，繼則施於同黨，最後則父子夫婦不能相見以誠，視天下人皆爲虎狼盜賊，相屠相殺，戾氣充塞，民族的生機由此斬斷。今天要轉移風氣，必須朝野上下，凡肯以善類自居

的人，都屏除疑忌的積習，樹立誠樸的風氣，不用一切手段，不採一切策略，彼此以誠相見，誠心誠意爲國家大計謀一妥當的出路。對於與我不同的意見，祇可就公的政策上去討論，而不可懷疑到別人的動機。惟誠能感人，亦惟誠能集事。一誠百誠，上下同風，才能談到團結善類。善類團結起來，才能剷除一切盤踞政治社會的小人，掃盡五百年官僚統治之毒，國事才有光明的希望。這話並不是專責之於握有統治權的在朝黨，但在朝黨人更應該開拓胸襟，以此自任。

什麼叫做「布公道」？我們說君子應該團結起來，合力對付小人，但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小人決不自認爲小人，小人亦必自居於君子。君子小人如何分辨？我以爲君子小人之辨惟在於公私，君子與君子，主張儘可不同，但動機則皆出於公，「自環爲私，背私爲公，」君子任何主張皆出於公的立場，小人則處處爲私。動機深藏於內，於何考察？於其行爲之表現於外者察之。凡假借公務營私殖產者必爲小人，凡暴戾恣睢殺人如草芥者必爲小人，凡驅民如牛馬毫無同情心者必爲小人，凡投機迎合毫無堅定意見者必爲小人，凡驕奢淫佚不愛惜物力者必爲小人，凡

祇知有己不知有國者必爲小人。總而言之，從詞令上看，君子與小人頗難分辨，但一就實地行爲考察，則君子小人立即劃然可分。譬如一個做官的人，每年俸金收入是可以算得出來，如果除了他的原有家產和俸給收入以外，還有多餘的資財，這資財一定是由貪污得來，這種人便一定是小人；如果一個做了多年以上官吏的人，家境還是一貧如洗，這人無論其他方面如何，至少在廉潔一點不失爲君子。目前中國最大的積弊是貪污，所以對於這一點更應該特別注意。小人誠多有才者，但如欲轉移風氣，則用才不如用德。要使君子願意集合團結起來，則不能以利誘，也不能以威脅，惟有是非賞罰一概以公義爲標準，而這公義又必須是公意之義，而非專己自是所認爲的公義。因此是非賞罰之柄必須與天下人共之，求公是，定公非，以公意賞功罰罪。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標準一定，不但善人有以自見，卽惡人也將不敢過於爲惡，有轉心向善之可能。

我們的公道標準是早已定下的，這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條，所差者是如何推進社會的公道，這就只有及早推進民主政治之一法，而民主政治之推

進，又賴於朝野上下能夠開誠相見，掃除一切懷疑猜忌的心理。只要大家都記得自己是中國人，凡事都好商量。宋明門戶意氣之積習，務須及早屏除，然後君子與君子才能團結起來，不致讓小人爲惡到底。

國家到了今天，一切黨派的意氣應該可以消除了，明末的黃得功與左良玉之爭，結果替滿洲人造成三百年統治的機會。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已經長進了，這幕舊戲應該不會再演出了。中國人如果真是長進，就應該另換行頭演出一番精采的新戲，這新戲的名稱就是民主政治，而非朝野上下大家一致開誠心，布公道，這幕戲是不會演好的。

作於民國三十三年

教育應該改革了

從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上臺以後，全國矚望這位新教育部長對於教育的現狀應該有一點嶄新的作風，輿論界喊出「教育應當改革」的呼聲，本報同人有許多都是曾經服務於教育界，或現在仍服務於教育界的，也願意趁這個時機對教育改革問題貢獻一點意見。

從民國十七年以來，中國的教育當局雖然換了好幾回，教育制度和政策也變了好幾次，但變來變去，根本的精神是前後一貫的，這一貫的地方，就是以統制的精神貫徹於教育之中，國立學校要受統制，私立學校也要受統制；校長要受統制，教師也要受統制；課程要受統制，教本也要受統制；教師在課內的思想、言論、行動也要受統制，在課外的思想、言論也要受統制；學生在受課時要受統制，在不受課時也要受統制；集會講演壁報要受統制，連私人的信件往來也要受統制。負各級學校

直接統制責任的，便是各校的訓導長、訓導主任、以及軍事教官之類，這些先生們受了教育最高當局以及不屬於教育的什麼團體的命令，隨時對於全校師生的思想、言論、行動有報告並糾察的任務，因此每個學校裏的員生（連校長在內），對於擔任這幾種職務的先生不覺另懷着一種眼光，兢兢業業，惟恐得罪。我們知道擔任這種職務的先生們，其中大多數都是自好之士，並不甘心擔任這種「教育特務」的工作，但是環境如此，教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打開後壁來說，以前幾年，這種現象還少些，自抗戰以後，特別是最近幾年，這種現象日甚一日。六七十歲的高齡校長，要穿上軍服，聽候調訓；學高望重的教師，要呈送履歷，聽候銓敘；稍有思想的學生，不知不覺便失了蹤；稍有思想的教師，無緣無故便解了聘。結果，有志者箝口結舌，不言不動；志趣卑弱者，醇酒婦人，縱慾自戕；更卑劣者，則受收買，受利誘，出賣同事，出賣同學，甚至以帶手槍，嚇同學，加入秘密社會，走私囤積爲豪。學風如此，還說什麼讀書？還說什麼救國？這種現象是怎樣造成的？我們不能不痛心疾首地說，是這多年以來，模做法西斯式的教育作風所釀成的。法西斯

式的教育所要求於人者，是奴隸，是機械，是死灰槁木，而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格。結果，這種教育成功了，造出了無數的奴隸，無數的機械，無數的死灰槁木，而沒有一個有靈魂、有人格的人。國難來了，敵寇來了，只見未受教育的農民去當壯丁，做砲灰，而號稱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却只有少數人肯去從軍，肯起來擔當國家的責任，大多數的智識分子，依舊昏天黑地，陶醉於麻木生活之中。誰使青年的靈魂麻木到如此地步？不能不歸功於法西斯式的教育政策！

現在，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應該知道一個有獨立自由精神人格的青年是如何的可寶貴可愛惜了。國家是由個人集成的，如果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機械，變成了死灰槁木，國家的命脈也完了。然而，法西斯式的教育，却正是向這條路上去走。

現在，全國稍有智識的人，對於眼前這種教育風氣，都感覺到痛惜，感覺到危險，也感覺到恥辱。因此我們不能不希望新教育當局首先拿出勇氣，打破這種現狀，採取一點適宜的改革，為國家民族保留一點最後的生機。「時者易逝而難再

者也」，「時乎時乎不再來」，國家生機已到最後一線了，趕快改革吧！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努力比賽立國的能力

東西兩面的敵人還沒有打倒，今天的盟國政治方面已經有了步調不能齊一的現象，留心世界政治問題的人不免對於戰後的國際和平局面有一點茫然之感。尤其是像我們中國這樣八年血戰的國家，眼前敵寇的侵略已經受不了，如果在戰後還不能得一點休養生息的機會，還要應付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未免太苦了，國家的前途也就危險極了。

以上這種看法雖未必即是過慮，但我們却以為問題的中心不在這一方面。國際和平的情勢雖未必即可使人樂觀，但也不定就非絕對悲觀不可。打開人類全部歷史來看，國與國的對立、競爭、和衝突本是最主要最平常的現象，一部二十五史就是人類的相斫書，問題是什麼一種國家才能在這樣的世界生存得下去，才能夠免於滅頂之禍？說到這裏，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從外界的國際環境方面轉移到國家自身

的立國能力方面，古人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一個國家如果在立國的作爲上能夠處處爭氣，怕什麼環境的風波？如果處處不能爭氣，則即使徼倖遇到和平的環境，也未必能夠善用這種環境。尤其是我們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如有辦法，則不但自身不致危險，還可以進一步作爲安定戰後世界的主要力量，反之，如中國自身沒有辦法，不能爭氣，像眼前的希臘和波蘭一樣，一面有一個流亡政府，一面又有一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政府，你罵我，我罵你，你開除我的國籍，我繳你的軍火，自身還得勞外國人大駕的干涉保護，那就不但自身無以立國，還得替國際上闖下一個大亂子，未免太對不住這一次大戰中流血出汗的幾千萬民衆了。

所以，今天的國際局勢儘管不可捉摸，但應付這種局面的關鍵却全繫於自身的能不能爭氣。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國與國比賽能力的世界，能力強的，在競賽場中便能夠迎頭趕上，取得頭籌，能力弱的，不但要落伍，還得受別人的干涉，淪爲附庸。中國要應付這種局面，也只有努力比賽立國能力的一途。

孫中山先生說：人民要有權，政府要有能，要國家有能力，當然先要有一個有能力的政府。但是我們現在的政府是怎麼樣呢？政令不一，因循顛預，是政治的無能；軍事失利，風紀敗壞，是軍事的無能；物價高漲，生產萎縮，是經濟的無能。單就這三點來講，如果不加以改善，不但無以立國於戰後的世界，也實在對不住孫先生的屬望，因此我們不能不以至懇切的心情，期望政府首先作出一個競賽能力的好榜樣，同時也希望全國上下都向此一目標努力。

先就政治能力的比賽來說，我們希望全國人民，特別是朝野各政黨，先在和衷共濟上比賽一下，無論是喊統一也好，喊解放也好，中國人要想立足於現代的世界，總之非團結一致不可，非和衷共濟不可，這一點是中國民族立國能力最顯著的試金石，我們希望大家努力先試一下。其次，我們希望政府在行政能力上，也要努力試驗一下，機關少設，政令少發，事權集中，言出必行，省兼職，禁浪費，去貪污，懲罪人，做到了這幾點，在政治比賽上才不致落伍。

就軍事來說，我們的士兵是能打仗的，過去七年多的戰爭和最近滇西緬北的戰

爭就是證據，但軍官的習氣却太壞了，軍事機關的重複和效率的遲鈍也不下於行政機關。軍事檢查機關的病民擾民，和軍事運輸機關的包庇走私，貽誤軍機，也是極普遍的現象。尤其最重要的，是軍隊沒有真正國家化，在軍隊中還不免有私人派系關係和黨派關係在內，現在的中國有許多軍隊單位是屬於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是屬於這個私人或那個私人的，但還沒有一個超然於黨派私人關係以外的真正的國防軍，這都是我們應該努力的地方。

再就財政經濟來說，戰時財政的困難引起貨幣的膨脹和物價的失常自有可以原諒之點，但爲什麼人家的國家的物價不過漲了幾倍，而我們就非漲到數百倍甚至千倍以上不可呢？爲什麼人家的國家能夠統制物資，平均分配，而我們就得讓前方士兵吃苦，而後方一部分發國難財的豪商地主們就可以盡情浪費而不能制裁呢？爲什麼人家的國家越是有錢的對於戰事的負擔越重，而我們的頭等豪富就能夠公然把資產存放於國外，逍遙西海，到南美洲去買橡樹林呢？爲什麼人家的財政機關收了錢往國庫繳，而我們的財政稅收人員却收了錢往自己的腰包裏放呢？所有這些情形，

一言以蔽之，是政府對於財政經濟的無能力，我們希望政府在這一方面也努力競賽一下。

我們不怕政府有權，但希望這個有權的政府同時也是個有能力的政府。有能力者有了權，自然會替國家做些好事，如果既無能力又有了權，猶如把飛機交給一個不會駕駛的人去操縱一樣，還不定闖多少亂子，今天國家的亂子已經闖得不小了，我們希望今後大家要在能力上努力學習一下，要能夠在能力競賽中佔了先，才不至於在國際角逐場上落了伍。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從情治到法治

本年元旦蔣主席訓勉僚屬，曾謂我們要使政治成爲戰時的政治，就必須簡化機關，簡化程序，簡化手續，使每一件事務的決定與執行，都能夠迅速處理，按期完成。自經蔣主席這一番訓示之後，聽說中央各機關都正在討論簡化的方案，將來自必有一番擬議。我們認爲蔣主席簡化政治的主張，不但是切合戰時的需要，就在平時也是應該的，我們自切盼其能夠早點實現。但依已往的經驗，改進行政效率，簡化機關程序的擬議，也不止一次了，爲什麼始終行不通呢？可見其中必另有癥結之處，若不從這癥結處着手，取消造成中國政治積弊的根本原因，則雖經蔣主席此番剴切訓示，恐怕結果還是大家敷衍一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了事。所以我們願就此點來討論一下。

這癥結之點是什麼呢？就是幾千年來爲中國政治根本原則的情治主義。中國的

傳統政治是建設在人情面子上，而不是建設在法治上，政治的標準是主觀的人情，而不是客觀的法律。中國歷來政治的原則是本於儒家的學說，儒家是擁護封建政治的，在封建政治之下，統治的階級不是同姓，便是親戚故舊，彼此的維繫是靠感情，根本就無法施用法律的制裁，法律是爲被統治的庶民設的，而不是爲統治階級的貴族設的，所以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說，統治階級如果犯了法，就得特別講講情面，周禮有八議之條，議親，議故，議貴，議賓，都公然認爲合理。後世的封建制度雖已消滅，但這種對統治階級講情面的習氣却由儒家繼續保留下來，至今未改。國家的設官不是爲事，而是爲人，儘管大家都知道某件事務歸某一主管機關處理，儘可處理得下去，但因爲有某一位大員閑散，需要位置，就不得不另外爲他專設一個機關了。又因爲每一位長官都有他的親戚故舊，都需要位置，所以同一機關之內，也不得不另添枝葉，增加許多無謂的附屬機關，以便位置他的私人，或其他有力者推薦的有大情面、大來歷的人物。在滿清時代，各省督撫用人是憑着軍機大臣的八行書，現在雖然沒有督撫和軍機大臣了，但八行書的權威尚在，

不但上層政治的習氣如此，就是我們這些在野辦報的，雖然號稱無冕的帝王，可以發揮言論自由的權威，但實際上筆尖一點也不敢觸及大人先生們的私人陰德，一涉及私人，便有人情面子的勢力來干涉你了。像這樣的社會，要想學西洋社會一樣，乾乾脆脆，就事論事，不問人情，如何能辦得通？歷史上不是沒有鐵面無私、不講情面的政治家，但大抵爲社會潮流所壓迫，身敗名裂，不得其死。吳起相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結果爲楚之貴戚大臣所怨恨，悼王卒而羣起殺之。商鞅佐秦孝公，太子犯法，刑其師傅，結果受車裂之刑。趙武靈王變法自強，爲公子成之徒圍絃於沙丘。賈誼勸漢文帝削藩，爲公卿大臣短以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鬱鬱不得志而死。鼂錯勸漢景帝削藩，招七國之怒，朝衣斬於東市。范仲淹與富弼執政，主張明黜陟，抑僥倖，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凡不任事者皆罷之，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結果被勾者紛紛譏議，遂僞造廢立詔草，欲以傾陷弼等，終不安於位而去。由這些史實看來，裁員簡政，說來似

很容易，但因為有許多被裁的人家不免於哭，所以主其事者非有商鞅、吳起以身殉法的精神魄力，是不敢輕於招怨的。今天的中國，到那裏去找一位敢於刑太子師傅的商鞅來做行政院長啊？也許因為商鞅本是客卿的緣故吧。

我們以為今天不論標榜什麼主義的革命，總之既要革命，就必須首先革掉這種幾千年來以人情面子為重的社會傳統習氣的命，革不掉這些習氣，就不要來談革命。革命就是與社會傳統習氣作戰，必須政治上的領導人物，多出些笑比河清的閻羅包老，祇認法，不認得什麼人情世故，這個國家才會日有起色，簡化機關和手續的提議才簡得通。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六日新中國日報

努力學習認識英國

從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來聘中國以後，中英兩國的正式發生國交已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至於兩國人民間的發生交涉則較此更早。英國雖是個遠西的島國，但在東亞保有廣大的領土，緬甸和我們的雲南，印度和我們的西藏，香港和我們的廣東，國界毘連，不止一處。英國是我們的近鄰，並不是什麼遙遠的國度。

但是在我們中國人的印象中，雖然和英國人拉朋友拉了好久，兩國間的交涉也特別頻繁，中英兩國間的相互認識則依然貧乏得可驚。英國人中有許多人還不會真正認識了中國，中國人中却也有許多人還不會真正了解英國的價值。在許多英國人的認識中，中國是一個老大貧弱、扶不起來的國家，至今男人的大多數還拖着豬尾巴，女人的大多數還纏着小腳。在許多中國人的認識中，英國是一個陰險權詐、專

務剝削的民族，是十足的帝國主義者。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有國個強大比肩的朋友，但是美國的精神，蘇聯的精神，甚至法國的精神，都有人能充分認識，且充分讚美，惟有英國，和我們交得這樣久，文化精神又這樣的類似，兩國之間却始終沒有建立了一種真正澈底的精神的諒解，錯誤的認識猶不免互存於兩國國民間，這真是十分的遺憾！從世界戰爭以來，英國人對我們的認識已經進了一步，認識了我們長期抗戰中所潛存的力量，但我們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却依然欠缺；甚至有些淺薄之流反誤認此次大戰中英國的勢力已經消退，英帝國有被清算之虞。這種錯誤的認識若不及時糾正，勢必影響到中英兩國間的邦交，而使中國的國際政策有置於錯誤觀點的危險。過去中英兩國相互訪問團之往來，雖已使此種隔閡稍稍解除，但我們以爲努力還不夠，就我們中國人自己說，還得努力再學習認識英國。

我們應該認識英國些什麼呢？

第一，我們須認識世界上文化精神建立在同一基礎之上的，再沒有過於中英兩大民族的了。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孔子所樹立的中庸之道，而全世界上能

夠確實以中庸之道立國的，除中國外，也只有英國。英國人的保守性，英國人的持重，英國人的不須重大變更而能有不斷的進步，英國人的認識現實而又不放棄理想，英國人的善於妥協、調和、而不趨極端，英國人的守信義、重法律，英國人的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精神，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數千年來牢守勿失的孔子之道，並世各國除英國外，也只有我們中國人還保有這種精神，並且能認識這種精神的重要。此外如英國人的外交手腕向來甲於全世界，而其根本得力之處，也正是我們中國文化中第二主流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柔弱勝剛強的黃老精神。儒家和道家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兩支巨柱，而英人皆具有之，中英文化精神之相似若此，而竟不能澈底相互了解，豈非怪事！

第二，我們須認識英國人雖是最明於利害，最善打算盤的，但却絕不是不守信約的侵略者，更不是野心無止境的帝國主義者。英國人誠然是最務實際者，若是於自己無利的事一點也不肯冒險，但也因爲其現實主義到了澈底，所以也就絕不會有無止境的侵略野心。世界上越是實際的人，算盤也就打得越精、越遠、越正確、也

就越不會貪圖一時的小利，而忘却將來的大患，這種朋友也就越容易交。英國人在世界上打過無數的仗，但大多次戰爭是爲着抵抗人家的進攻，作戰的目的是防患而不是爭先，但是你如果一定要惹動了她，她却也決不肯讓你佔了便宜回去。歐洲有許多小國，如瑞典、挪威、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她們都和英國保持很久的國交，但從沒有吃過虧。我們並不聽說英國要侵略荷蘭的東印度，或者葡萄牙的帝汶，並不是力量不及，而是她無此必要。像這樣的朋友豈不是可以交的，而且或許交得更長久些。因爲一個理智成熟的民族，只要肯和你做朋友是絕不會朝秦暮楚的。英國人因爲最實際，所以也最信守條約，英國人是爭權利，但絕不是要用欺詐的手段去討便宜，明白了這個，才會同英國人辦交涉。

第三，我們須認識英國在這次大戰中，實力並沒有削弱，地位也並沒有降低。這次戰爭並不是大英帝國清算的時機，這次戰後大英帝國的威權仍然不會比戰前低了好多。這個事實非常重要，但是在我們中國却有好多人至今還不曾了解。我們之中有些人之不懂英國，是因爲不懂得英國人的作戰方法，實在也就是不懂得英國人

的哲學。其實現代英國民族的哲學也就是我們中國民族向來傳統的哲學，孫子武經說：『戰而勝，非善之上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上者也。』又說：『多算勝，少算不勝，少算猶且不勝，而況於無算者乎。』淺見的人，只看到英國人常常打敗仗，只看到英國兵歡喜撤退，遇戰鬪不一定爭先，便以為英國人缺乏戰鬪勇氣，不能打仗，殊不知打敗仗是英國歷史上的常事，而最後結果總歸勝利，却也是歷史上的常事。英國人不是不打仗，也不是怕打仗，他們是用一種更高的作戰方法去打仗的。他們鬪的是智，而不是力；他們戰爭的工具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他們是以算勝，而絕不肯以拚勝。這種道理我們中國古人很曉得，可惜到了現在就很少有人曉得。輕驕之徒錯誤估計了英人的實力，因而釀成種種的錯誤，將來吃虧的還是自己。因此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喚醒國人，努力學習認識英國。

現在，駐英顧大使不日歸國，顧大使留英最久，認識英國也最深，對於促進中英兩國的邦交盡力最多。我們希望顧大使此行，把英國人的對華好意盡量帶回來，將來返任之時，再把中國人的對英好意盡量帶回去。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六日新中國日報

民主政治與政黨

在今天中國，沒有人敢公然反對民主政治，朝野上下都在表示中國非民主不可，似乎國論已經統一了，但爲什麼還需要各方面的意見協調呢？我們以爲這裏面存着一個歧異，這個歧異即在於各方面對於民主政治的解釋不同。中國需要民主，這個前提是無人會否認的，政府黨也在強調民主的重要，其強調不亞於在野的各黨派，但爲什麼黨派的團結還不能即刻實現呢？我們以爲朝野各方對於民主的意義認識之不同，似乎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政府負責方面的意思，民主的合法形式必須由國民大會來表現，因此只有等待國民大會召集之後，中國才能實現民主的局面，國民黨的政權只能交還於由民衆所選舉而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而不能交給其他任何機關，如黨派的聯合政權之類。就形式上來看，這種說法自也能言之成理。沒有人反對國民大會是民意的合法

代表機關，但問題是，怎樣才能使國民大會的選舉不受任何單一方面的支配？怎樣才能使國民大會成爲真正表現民意的合法機關？我們以爲真正的民主和形式的民主最重要的區別就在這一點上。

民主政治並不是單純的民本政治或民意政治，任何形式的政體沒有不承認民爲邦本的，也沒有不承認政治要尊重民意的，卽是專制的政府也不能例外。專制政治顯然不是民主政治，兩者間的主要區別是專制政治是任政府的意思來選擇民意，而民主政治則必須任民衆的意思來選擇政府。單說民衆，國民，民本，民意，都不過是些空空洞洞的名詞，如果民主政治僅僅是奉這種空空洞洞的民意來做指歸，則任何人都可以假借民意，製造民意，正如古代統治者之假借天意，製造天意一樣，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政治如想名符其實，必須使無組織的民衆成爲有組織的民衆，讓民衆依各種不同的政見自由結合爲一定的黨派，每一個黨派都能自由發揮他們的政見而不受任何干涉，每一羣政見相同的人都能自由結合爲一定的政黨，每一個政黨都能夠自由向民衆宣傳他們自己所信的主張，每一個政黨都能夠自

由去組織同情他們的政見的民衆，每一個政黨都能夠對民衆發表他們同情政府設施或不同情政府設施的意見。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所謂中國國民，不復是一盤散沙的四億五千萬個個人，而是若干有組織的政治羣衆，然後他們對於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才能夠自由聽取一切不同的政見而自由選擇能夠代表他們意見的國民代表，這樣產生的國民大會，才是真正民主的合法代表機關。反之，如果在國民大會召集之前，全國人民還不能公開地、合法地表示他們的政見，還不能夠使政見的結合取得合法的政黨地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各黨派，還不能夠自由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還不能夠公開取得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權，人民在選舉國民代表的時候，眼裏只能看見政府黨片面的宣傳，耳裏只能聽到政府黨片面的說話，除此以外，別無所知，這樣的選舉，即令在進行中絕對大公無私，所產生的代表也不能夠算是真正代表民意。何以故？民衆在選舉之前沒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故。

因此，如欲使國民大會成爲真正名副其實的民意代表機關，則在國民大會選舉之前，必須首先：

一、承認現有各黨派的公開合法地位；

二、承認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

三、讓各黨派有公開提名國民大會代表競選人的機會。

政黨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的躉，民主政治的運用不能離開了政黨，談民主而否認政黨的公開合法競選的地位，則所謂民主僅祇是形式的民主，離開真正的民主尙遠。中國人民所希望的是真正的民主，而不僅是形式的民主。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我們的言論態度

我們這個報，是在抗戰發生以後，全國朝野團結禦侮的基礎之上才出現的。因爲在敵寇的盲目侵略之下，我們中國人忍無可忍，才發動了全民抗戰，以爭取我們祖國的獨立與自由。因爲要全民抗戰，所以有國內團結一致的必要，因此才有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各黨派和各界領袖的會議，才有漢口召集的第一次國民參政會，才有抗戰建國綱領的產生。我們這個報，便是這種時代精神的產兒；時代需要抗戰，中國需要團結，我們的報便應這種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如果在抗戰以前，也許環境還不容許我們這一張報紙可以自由出刊，爲什麼？因爲我們這張報代表着國內一部分有特殊政見結合者的立場，是一個公開的事實，而在抗戰以前，環境似乎還沒有感覺到容許人民自由發揮政見的必要，也是一個公開的事實。

我們很明白我們這種時代的使命，因此自創刊於漢口以來，七年之中，我們一

實的言論方針，是一方面本言論自由的精神，發表我們所認以為是的主張，以規勸政府，喚醒國民；一方面本舉國一致、團結禦侮的精神，對於抗戰，對於外交，甚至對於內政，我們都願意本國家至上的原則，切切實實，為國家的整個利益貢獻一點有用的意見，以協助政府解除困難。爲什麼？因爲我們是國家主義者，我們相信國家的利益應該超過於黨派的利益，我們本政黨的立場，雖然遇事不免有所批評，不肯苟同，然而一切批評和建議，却從沒有離開了整個國家的立場，忘記了整個國家的需要。這一次的長期抗戰，日德兩巨寇必然失敗，最後勝利必然在我們方面，這是毫無問題的。但勝利的獲得却不是單靠我們中國人自己努力所致，多半還是因人成事，這却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我們不要以爲這次戰爭以後，世界的永久和平就絕無問題，中國能夠永久獨立生存下去，須知國際的環境是變化無常的，世界上沒有專靠國際保障而能夠真正獨立生存的民族，一切還須靠自己的努力。今後的中國，必須利用戰後十年二十年短期的和平機會，同心協力，發憤圖強，務必由名義上的強，做到了實際上的強，才可以在今後國際風雲的大場面中站得住腳。而要

到這一點，中國內部必須統一，必須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政府來作爲國家的重心，這一點我們的認識是和蔣主席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朋友們的認識是一致的。不過我們以爲統一的完成不是僅靠形式所能做到的，必須在國民心理上完成了統一的實質，由被動政治的形式統一，做到了自動自願的實質統一，使全國人民真正愛戴這個政府，願意爲這個政府所領導的政策努力。要辦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政治上建設了心理團結的堅固基礎，而這基礎只有依照民主的原則才能夠建立得穩當，因此我們高呼民主，我們爲民主運動努力，這並不是存心和政府搗亂，而相反地却是爲政府實力幫忙，這一點，我們希望政府方面的人能夠了解，同時也希望一切爲民主努力的朋友能夠有共同的認識。

國民黨爲中國革命努力五十年，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抹煞這一個大黨的功績。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確實是比以前的舊中國有些進步，我們很樂意承認。在舉國一致、精誠團結大目標下，朝野各政黨停止相互的攻訐，求取相互的認識，這也是抗戰以來的共同精神。我們過去的言論，自信絲毫沒有違反這一認識。但同

時，國民政府在施政過程中，不免有種種的缺失，却也是事實，特別是民主基礎的尚未建立，猶待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古人說，朋友有勸善規過之誼，今天中國的各政黨，無論朝野，在國家的立場上都是同胞，在黨的關係上都是朋友，是同胞就有推誠爲國之心，是朋友就有勸善規過之誼。爲國家，爲朋友，我們對政府施政都應該本良心的認識，直言不諱，有過必諱，自問是出於善意，決沒有故意搗亂的意思。同時我們也相信政府當局有聞過則喜的雅懷，能夠盡量尊重言論的自由，放寬檢查的尺度。舉一件小例來說吧，譬如蔣主席所宣布的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行將召集的國民代表大會，是中國進入民主的起碼點，這一件事情何等鄭重？關係於國家民族今後的命脈是何等的大？既然事體重大，就應該事前開放中國人民的言論，使大家對這個會議的產生方式、組織方式、職權效能，公開地，盡量地，加以慎密的討論，猶如允許全國人民公開檢討五五憲草的內容一樣。我們相信這樣的討論，是有益於政府的，而並不是有害於政府的。我們也期待政府負責方面對於這一種性質的討論，能夠盡量放寬檢查尺度，不必取封鎖的政策。

未來國家的環境，艱苦尚多，凡屬自認爲中國人的，那裏還有爭意氣，動感情，重小節的餘地。凡事從大處看，處處以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爲前提，彼此都是同胞，有什麼事不可以坦白商討？我們今後的言論態度當仍本過去七年來的精神，以此自處，同時也希望一切朝野有黨無黨的朋友，都能夠共同承認此點，都能夠以此自處。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慎重考慮國民大會問題

今天中國必須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是一件確定的事實，由一黨專政到民主憲政，必須經過民選議會這一關，也是邏輯上必然的結論。今天國民黨要還政於民，要由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來完成還政的程序，也並非不合理的主張。我們對於國民黨還政於民的誠意並不懷疑，對於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以完成還政的程序，也很願意以君子與人爲善的心理樂觀其成。但是這一件大事，關係今後數百年的國運，做得好了，中國從此就可真正和平統一，走上現代國家的正軌；萬一不幸事前考慮不周，胸中先存一草率了事的心理，對於異己的意見，並不尊重，以爲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看你們反對得起來起不來。如果是這樣的居心，便是一片乖戾之氣，俗語說：『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一家的事情且如此，何況一國。國民黨負國家政治責任已經十餘年，好比一家的老大哥，今天中國這個大家庭裏，一般小兄弟們沒有

一個是存心和掌家務的老大哥搗亂，要推翻他的掌家權的，不過家務既是大家的家務，就得拿出來大家商談商談，當老大哥的若是平心靜氣，把國事與國人共之，只要說得有道理，全家的人沒有不歡歡喜喜願意同舟共濟的，這便是一片祥和之氣，凡事都好商量。造成這種祥和之氣的局面，雖是大家的責任，但掌管家務的老大哥責任更重，更需得努力，因為家務如果鬧垮了，最受不住，最坍面子的還是這位掌家務的老大哥。

就國民大會這件事說罷，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還政於民，這個正大的題目，誰能說不贊成？但是既稱為國民大會，便得擺出來真正像一個國民大會，真正是經過自由選舉出來，真正能表現這一時代的全國公意的。試問十年以前所謂國民大會選舉的時候是怎樣一個時代？那時候，一黨專政的權威正盛，法西斯在世界上正在抖威風，全國沒有民主的聲浪，反對黨都成了罪人，每一個選民都得向三民主義宣誓才取得公民的資格，國民黨全體中委都有出席國民大會的特殊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又加上時間已過了十年，十年前未滿法定年

齡的兒童，現在都已經成了壯丁，正在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時候，而對於這一次民主憲政起碼點的國民大會，却沒有他們的代表。所有這些情形，薈集起來，已經很夠叫人懷疑這個十年前在特殊情形下選出來的所謂國民大會的民主成分究竟有好多了。『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以一個身份尚未分明的十年前的所謂國民大會來擔當今日民主憲政的奠基典禮，這不但褻瀆了民主，也未免褻瀆了國民黨遷政於民的誠意和一片苦心。我們很希望國民黨中不懷抱甚深成見的朋友們仔細把這個問題想一想。

今天中國雖已忝居四強之一，抗戰雖已勝利在望，但是國際上並不能擔保沒有險惡的風雲隨時可以吹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只有靠內部的真正精誠團結，才能夠不致授人以隙。波蘭和希臘的覆轍，我們不忍見，也不忍談。就是第一次歐戰後中國南北國會、護法護憲之爭，也應該是『殷鑒不遠』。我們誠意擁護蔣主席的領導權，誠意贊助國民黨替中國奠定下民主的堅固基礎，因此我們才不能不希望對於這件建國大業不要操切從事，以免再引起無窮的糾紛。中國是大家的中

國，大家的事最好先向大家提出來公開商談商談。國民黨是有歷史有政權的黨，在自由選舉的原則下重新來一次真正國民代表的選舉，國民黨也不見得就吃虧好多，而國民政府的地位却因此穩固了不少。爲什麼放着這樣平妥的路徑不走，定要授反對者以口，我們替國民黨想想，真正值不得。這一次國民黨六全代會第九次大會已決議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關於國民大會職權及其他有關問題決議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常會慎重研訂。我們知道國民黨的重要領袖中不乏智慮精詳之士，我們深盼對於國民大會這一個嚴重的問題，要慎重考慮求得一個圓滿周到符合國民希望的辦法。

昨天報載，英國本年總選舉，保守黨主張在七月舉行，但工黨和自由黨認爲邱吉爾首相在此時選舉必可取得民衆擁護，因此主張改在十月舉行，看看這就是民主國家的風度。選舉問題的爭端並不就是妨害國家的統一，英國的例子也許可以供我們參考吧？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大國的風度

這一次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中，大國和小國的對立現象，是一個很顯著而毋庸諱言的事實。在小國方面，站在國際平等的原則上，要求大小國的權力一律平等，對於世界的問題不希望大國包辦，這個態度，在理論上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若從現實政治的眼光來着，則小國的這種要求，却是在實際上行不通的。爲什麼？因爲權利和義務是相聯的，要享一分權利，就不能不盡一分義務，換過來說，盡過一分義務的，就有要求一分權利的權利，盡過十分義務的，就有要求十分權利的權利。今天小國的責備大國們太包辦，太攬權，太享權利了，但是試問像美英蘇中這四個大國，對於打倒德日義巨寇所出的力，所盡的義務，是小國所能擔負得了的嗎？若不是美英蘇中這四個大國出全力抵抗德日義三個強盜的吞併世界企圖，世界上那還有小國們存在的餘地！大國之出力固然是爲保衛自己祖國的成分居多，但聞

接的影響也就保衛了其他小國的獨立，這却也是不能抹殺的事實。因此，大國為維持戰後的永久和平起見，要求在聯合國機構中多賦予安全理事會以一些權力，這也是應當的。因為將來萬一不幸再有擾亂世界和平的分子出現，有力負責制裁的，還是這些大國，要大國出力負責，就得多給大國一點權力，這才是真公道，真平等。

不過若就大國的立場來着，盡義務，享權利，雖是合乎公道的，但我們究竟希望世界上的幾個大國，能夠拿出大國的風度來，對義務多盡一點，對權利少享一點，這樣的大國才是有道德權威的國家，才能夠以德服人，而不僅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亡，雖強無益，德日義就是榜樣；以德服人者霸，才能夠得道多助，歷久而國運不衰。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古來傳統的國際政治哲學，確有真理存焉，我們希望現代世界上的幾個大國都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就現今世界的幾個大國來看，美國最能得世界的同情，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不歡迎美國人的，就因為美國是現今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大國，而她却並不恃富恃強，去欺壓別人，美國用她的富接濟了全世界反侵略國家的物資，用她的強保衛了全世

界被侵略國家的獨立，正如杜魯門總統所說，美國是本着大國服務的原則去樹立她的世界政策的，所以她雖富雖強，而到處只有受人歡迎，沒有遭人忌怕。美國統治菲律賓四十餘年，但菲律賓人從沒有反美仇美的心理，這就是大國風度的實效。其餘歐洲方面的幾個大國就不能這樣盡善盡美，近年來英國對於印度和希臘的態度，蘇聯對於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態度，法國對於敘、黎和越南的態度，都有令人不能滿意之處。我們不必說這三個大國還在保持反動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但至少還欠缺一點大國的風度，是毋庸諱言的。因為這個，所以最近英國政府對於印度問題的讓步，和蘇聯對於波蘭問題的讓步，我們認為不失為一種覺悟的政策，雖然覺悟的程度還嫌不夠，但至少幾個大國能多採取一點這樣明哲的政策，世界和平的前途希望就多一些。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問題

我們雖然不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認「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然而經濟生活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是我們所願意承認的。我們以為經濟生活固然也不能不受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方式的影響，而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各種生活也同樣不能不受着經濟生活的影響。物質生活的要求是每一個人民的基本要求，無論任何形式的國家，不能不顧及人民的這種基本要求，而民主政治的國家更不能忽略這種要求，因為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建築在全民身上，一個大多數人民還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水準的國家，是不配談真正的民主政治的。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她的特殊環境，這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不能生吞活剝地全盤移植到另一個國家裏去。政策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設的，美國有美國的實際問題，

蘇俄有蘇俄的實際問題，中國也有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國的實際問題不是任何外國的那一套，因此在任何外國推行已見成效的方案未必能全盤適應於中國，政治問題如此，社會問題如此，經濟問題也是如此。

二十世紀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是趨向於國家統制，計劃經濟，就是以國家為主體，將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置於國家統制之下，由國家按全民的需要，制定全盤的計劃，凡生產、運輸、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爲的過程，都必須按照國家及全民的需要，加以合理的統制。這政策，在蘇俄行之有效，在英美也在戰時部分地實行了，也行之有效。我們是國家主義者，自然願意看見全國的經濟生活，在國家的權力統制之下，求得一個合理的解決。但是我們以爲要實現這個目的，必須經過一番淨化的過程，必須先把國家的權力從官僚階層手裏解放出來，使國家真正成爲全民的國家，然後談國家統制，計劃經濟，才能真正達到有效而無害的目的，如果盤踞在國家各級機構中的官僚腐化勢力不能肅清，而來擁護國家統制、計劃經濟的政策，就無異於替官僚腐化勢力造機會，使官僚資本的勢力能夠憑藉國家這個機關而

更形肥大，更增加了剝削人民、壓制人民的力量，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就永遠不能實現。

這就是我們所謂中國的特殊問題。在歐美，封建社會的消滅很遲，而工業革命的成熟較早，所以在歐美幾個主要國家中，緊接着封建社會之後的便是一個由工業革命所培植出來的第三階級——即所謂資產階級者作爲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今天歐美的一切社會問題都發源於資產階級勢力的過於龐大，因而引起種種罪惡。中國社會則不然，中國的封建社會在三千年前就消滅了，但工業革命至今不過才學步走，從秦始皇到宣統，這二千年中中國的社會是在歐美所沒有的，它是屬於另一種形態的，這就是君主專制的社會。在君主專制社會之下，幫助君主個人統治剝削的，是一種特殊的工具，就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在君主的蔭庇之下，不但集中了政治的權力，也集中了財富的權力，沒有一個官僚不是與土地、商品、勞動力發生連繫的，俗話所謂「升官發財」，最足以表示這種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政治上的官僚統治權在經濟上便形成了一種官僚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產物，如果

只會死讀歐美社會經濟史的人，他不會發現這種事實。這種官僚資本主義比歐美近代的工商資本主義更惡劣，更危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因為近代歐美的工商資本主義，他們雖然享受過度的利潤，剝削了人民的利益，然而他們必須憑自己的智力去奮鬥，他們必須將積聚的財富投資於生產事業，他們必須改良生產方式，迎合社會大眾的需要，才能獲得利潤。但官僚資本主義則全不必如此，他們祇須憑藉國家法律的和政治的特權，便可以為所欲為，坐在那裏不動而吸收人民的脂膏；他們無須像歐美的工商資本主義，必須改進生產，增加社會消費力，才能獲得利潤；他們更無須顧慮對手方的競爭，他們的權力是獨占的，而且不受任何權力的制裁，因此他們可以像一個吮血的臭蟲一樣，放心在吸取人民的血液，積聚，再積聚，而無須投資到生產方面。因此歐美近代的工商資本主義雖然有其過失，但對國家、社會、和人民也有他的功績，然而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對於國家、社會、人民，却祇有罪惡，而毫無功績可言，它不但是剝削人民膏血的主要勢力，也是障礙社會生產事業和科學發明的重大因素。中國改建民國雖然已經三十四年，但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

勢力仍在僞民主的蔭庇之下，發榮滋長，所以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問題，是應該針對這種現象，從扶植生產人民的力量，來消滅官僚資本的統治勢力，一切有利於官僚資本統治的思想和政策，我們反對，一切可以促進人民生產力量的思想和政策，我們擁護。

怎樣才可以發展人民的生產力量，消滅官僚資本，我們以為除在政治上應該實現民主化以外，在經濟上就應該主張「經濟社會化」。關於「經濟社會化」的內容在此處因為篇幅關係不能詳細說明，但我們可以簡單說明一句，就是「藏富於民而不藏富於官」，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反對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採取國家統制、計劃經濟的政策，我們主張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必須採取「自由經濟」的原則，廢除種種障礙人民生產事業的法令和機構，讓人民的生產力量自行長養起來，才可以促進政治民主的完成，只有在政治真正民主化，國家的權力從官僚手裏解放出來，交還給人民所支配的力量以後，才可以談到國家統制、計劃經濟，因為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才真正是人民的國家，而不復是官僚集團所假借名義的國家。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教育改造的途徑

這十幾年來，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各種政策之中，最失敗的莫有過於教育政策的了。拿現在的教育情形和民國成立以前的幾年作比較，和民六到民十五的那一段時間作比較，都顯見得只有退化，沒有進步。顯而易見的是一般青年對於教育熱忱的缺乏，在過去的時代，曾有不少的青年把教育視為神聖的服務事業，情甘自願犧牲個人的名利權位，投身於最清苦的師範教育，以做一個教師為理想的終身事業；現在，這種對於教育的熱忱已經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景。近年以來，教育當局雖然用了許多力量去推進師範教育，保障師範教育的獨立，鼓勵師範生的出路，然而青年們願意獻身於師範教育的依然是少數中之最少數。這種情形我們不能一概歸之於抗戰時期的特殊現象，因為在抗戰以前這種現象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以為這種教育墮落現象的養成，還是由於十餘年來教育當局所執行的錯誤

的教育統制政策的結果，因為要在教育上貫徹統一政策，結果限制私立學校的成立，劃一公私學校的課程，統一教科書的編製，監督教師學生的思想言論，其目的在求學校、課程、教材、及師生人格的整齊劃一，結果便是機械化。在機械化的教育統制政策之下，一切辦學者、教書者沒有一點自由創造試驗自己的理想的餘地，還有什麼樂趣？對於教育事業感不到樂趣，還能希望他們對於這種事業發生服務的觀念嗎？

要糾正過去的錯誤，必須重新喚起自由創造的精神，以自由教育的原則代替過去已推行失敗的統制教育的原則，實行下列的幾點自由：

第一是辦學的自由。過去教育政策對於公立學校的待遇太不平等，似乎有意採取一種限制私立學校的政策。依照現行的法令，創辦一個私立學校非常困難，首先是基金就難籌集，過去的私立學校誠然良莠不齊，但是我們如果想起現在歐洲的幾個古老的大學，在當初創辦時也不過是幾張板凳，並沒有什麼充分的基金，就可明白學校之好壞並不在乎基金之多少。今後的教育政策如果能把障礙私立學校創

辦的幾種限制取消，則私立學校一定會如雨後春筍地發達起來。我們不必怕壞學校太多，如果給他們一個比較觀摩的機會，我們相信一些壞的私立學校必能因社會的選擇作用而自趨於改良，國立學校也可因此得到比較觀摩之益。

第二是學制的自由。現在的整齊劃一的學制，在國家統制上固然方便，但是不知道摧殘了多少教育的新生命！教育事業是一種需要時革新進步的事業，必須讓各種教育理想都有實現的機會，教育新機才有萌芽的可能。我們回想在民國十年後，教育界的氣象真是蓬蓬勃勃，什麼蒙台梭利教育法，什麼道爾頓制，什麼格里學校制，都有人大膽的去試驗，去推行，固然試驗有得有失，但這種自由創造的精神，就是我們今天所缺乏的，因為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之下，是不容許教育家作自由試驗的呀！

第三是課程的自由。現行的教育政策，對於全國各大小學課程增減一點也不許通融，結果部定的課程在實際上不能推行的，也得照例推行下去。以大學教育而論，本當以專門學術的研究為主，但是現行的大學課程，前二三年幾乎充滿了普通

的常識功課，強迫學數學的再來學史地，學中國文學的再來讀外國文，所學的都是中學已經學過的功課，結果所志願專攻研究的科學反因時間限制學不到好多，大學水準的降低，不能說和這種呆板的課程標準沒有關係。我們以為要提高學校的程度，必須讓辦學的人對於學校課程有充分選擇的自由，不但大學如此，中學小學也應該如此，然後關於課程的良莠得失，才能因比較觀摩而得有進步。

第四是教材的自由。現在的教育政策，不但課程排列不自由，即教材選擇也不自由，大學還好一點，中小學校的教材，便一律實行統一化，從前各書賈得以自由編製的教科書，現在一律改為部定教本，以教育部少數編輯的作品，強迫範圍全國，使教者學者毫無選擇的餘地，以中國之大，各地風土、人情、節令、物產之不同，而強迫其使用唯一的教材，結果之扞格不通，可想而知。我們以為今後若欲改革教育，必須恢復教材編製的自由，不但應仍許各出版商自由出版教科書，且須允許各地域及各學校教師有自由編製教材的權利，才可以避免形式化的危險。

第五是教學的自由。因為學制、課程、教材全都統一呆板化，所以現在全國各

大中小學的教師，除了照教本宣講以外，無事可做，學者因此也就不能發生興趣。我們以爲現行的大學教育，應該盡量減少必修的課程，對於選修的課程應該盡量尊重教師的意見，自由開設專題研究的課程；譬如某校教師有一人對於龔定庵的思想文學特別有研究，就不妨特開龔定庵研究一科，讓學生自由選習，這樣才能提高學術研究的地位和興趣。至於中小學校難不能完全自由，但也不妨留一點自由選擇的餘地，讓教師和學生得一點自由的園地。

以上五點都是就教育制度的自由方面來談的，至於學校內師生思想信仰言論的自由，批評精神的養成，人格獨立的尊重，都是我們以前所屢次談過的，不再贅談。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新中國日報

立即實現民主措施

這一次國民參政會對於國民大會問題的決議案，有人說是富於彈性的，實際上所謂富於彈性者，僅祇關於大會的召集日期和代表資格兩點而言，至於其他的部分則是很硬性的，並且以全場絕大多數一致通過，並無反對的意見。這所謂硬性的決定者，包含決議案的第三項國民大會制憲兼行憲的一點，和第四項從速採取民主措施的四點，這四點的內容如下：

- (一) 繼續採取可能之政治步驟及協調之精神，求取全國之統一團結……
- (二) 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及集會、結社之合法自由。
- (三) 對於各政治黨派依法予以承認。
- (四) 依限完成後方各省各級民選機關之設置……

關於國民大會制憲兼行憲一點，是將來的問題，此時且不必談。關於決議案第

四項所列舉四點，既有從速採取措施之決議文，我們就深盼政府本此決議，當機立斷，付諸實現，不可再有徘徊審顧。第四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閉會已經十日以上，我們不知道政府對於這幾點措施的準備工作是否已在進行，據我們所觀察到的，除了決議案第四項第四點所舉完成後方各省各級民選機關之設置一點，政府已在籌備中外，其餘三點似乎還不見頭緒。我們深深感覺到目前正在國事千鈞一髮的機會，政府需要當機立斷，所以不妨再提出檢討一下。

關於第一點『繼續採取可能之政治步驟及協調之精神，求取全國之統一團結』一點，我們以為政府應該立即透過國共以外各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的協助，向中共方面提出立即召開黨派政治會議的建議，這個建議如果提出，我們猜想中共方面也該樂於接受的。至於政治會議的職權和代表成分，彼此意見雖有出入，但不是不可以協調的，協調的原則在於公平合理，只要公平合理，各方面應該可以通得過，但是在求取全國統一團結的政治會議召開以前，國共目前的局部軍事衝突，應該立即制止，並且絕對防止再有此類不幸事件發生，全國輿論應該一致動員斥責此類的事

件。

關於第二點「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及集會、結社之合法自由」一點，我們以為政府早該實行，更不必等待和別人商量，譬如保障人身的自由，政府就可以立刻把通過特務人員而羈押到集中營裏的一切政治犯、思想犯，立即無條件恢復他們的自由，像費鞏一類並沒有什麼政治立場的人，更應該早點釋放。如果再漂亮一點，把特務機關立即公開解散，更可以獲得國人的同情。我們相信這樣的做法是於政府有利的。至於政府方面所指摘的，中共方面也有政治犯一點，我們以為也不妨將這些事實公布出來，如果是事實，國民自然也會要求中共採取同樣的措施。

關於第三點「對於各政治黨派依法予以承認」一點，我們以為政府不必拘泥「依法」兩字，應該立刻就發表一個聲明，承認各黨派的地位，因為政黨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政府早已承認這個事實，不必再要依照什麼特別的法律，因為所謂「政治結社法」如果是由國民黨一黨政府所制定的，則國民黨即非依政治結社法而成立，是政治結社法有了例外，各黨派之間有了特權與非特權之分，各黨派不能承認這種

不平等的法律。如果政治結社法是經過各黨派的政治會議通過而制定的，自然比較合理，但既有黨派政治會議的召集，是事實上已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又何須再來一個畫蛇添足的政治結社法。所以我們以為政治黨派的承認只須國民政府發表一個聲明就行。所以要政府發表聲明者，並不是說各黨派的地位要靠政府的聲明來保障，乃是就國民黨的立場，單方面表示承認各黨派的地位的意思。我們當然同時也應該向中共方面要求，同樣來一個聲明，允許在中共政權所支配的地區以內，承認各黨派有公開組織及活動之權，包含國民黨在內。至於其他各黨派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步驟，即如我們中國青年黨，就準備與國民黨、共產黨同時也發表聲明，或者與國共各黨聯合發表共同聲明，承認一切既成黨派的地位。其他黨派雖然沒有政權，但這個聲明依然重要，因為發表了這個聲明就是表示其他各黨派已承認國共兩黨及他黨的平等合法地位，無需再有以暴力推翻他黨的意思，這在一個有革命傳統的黨，採取這種步驟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我們懇切地希望政府立即採取這三點民主措施的步驟，把握住當前的機會，『機者易逝而難再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新中國日報

政信不可自毀

政治的訣竅沒有別的，要在把握人心；把握人心的訣竅也沒有別的，要在建立政治的信用。孔子說立國之道，「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真是一句「要言不煩」的話。我們拿這兩句話來尋繹近五十年來中國政治的歷史，更覺得這兩句話的真理彌可珍貴，因為五十年來一切政治上派系的失敗歷史，都是由於對人民失去了信用所致。

中國近年來政治上有兩句流行的話，叫做「好話說盡，壞事做盡。」這兩句話就說明了近代中國的政治是向來不講信用的。口頭上的好話不妨說得天花亂墜，美其名曰宣傳，實際上所行所為却完全與之相反，結果人民對於政府所說，無一事相信，就是真正有誠意要推行的新政，人民也照樣給他一個「相應不理」，宣傳等於江湖上的賣膏藥，一次失信，下次就再也不靈了。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清政府採詹

事府中允黃思永的建議，發行昭信股票一百萬兩，以周年五釐行息，分二十年本利清還，令京內外大小臣工均領票繳銀，爲商民倡，這是中國發行內國公債之始，既定名爲「昭信」，可見十分注重這個「信」字了。不料剛滿一年，就採取軍機大臣榮祿等的建議，請將認領的昭信股票作爲報效，結果昭信變爲失信，從此清廷再有徵募公債的舉動，人民再不會踴躍輸將了。清朝末年，由五年預備立憲到九年預備立憲，是政治上對人民失了信用；由昭信股票到失信股票，是經濟上對人民失了信用。就是這兩件事，已足夠造成了清朝的滅亡。

民國以來，歷屆政府的不講信用，更甚於清朝，其覆滅也更速。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信誓旦旦，效忠民國，結果帝制自爲，政治上對人民失掉了大信；國家銀行的兌現鈔票，以一紙命令，改爲不兌現，結果在經濟上也對人民失了大信。就是這兩件事，使袁的政權卒歸崩潰。以後的北洋軍閥政府，更不待言。以經濟而言，北洋政府的政策，不但失信於人民，而且失信於國際，在那時候中國政府的債券證券在國外市場上是沒有信用的，北洋政府的崩潰也未始不由於此。

近年以來，行府是勵精圖治了，但政治上不講信用的作風，似乎並沒有改變了許多。軍訊戰報的失實，不但不能瞞過國際，瞞過敵人，就連沒有耳目的人民也無法瞞過，本屆國民參政會對於軍事報告審查意見中已痛切言之。政治上的失信之事，更層出不窮，人所共知，也不必多說。單就經濟一點來說，國民政府標榜民生主義，最近國民黨六全代會更通過許多經濟政策的綱領，但是有幾件是已經實行，或準備實行的？在通過這些綱領以前，對於實施的可能性和步驟是否曾經考慮過一番？管制物價已經談了四年，但是物價是否已能管制？最近的黃金政策，姑無論其本身是否合理，但是政府既預售黃金於人民，到期就應該償還，一再延期，已經失了信用，當初預售黃金之時，並沒有規定四成獻金的辦法，到了臨時却忽然來一套新辦法，強迫人民把預購的黃金提出四成來獻給政府，這種作法，無異於賣方向買方毀壞契約，實行勒索，在商業上是不守信用的行爲，如果是人民與人民間有這種行爲，就可以提起訴訟，如果是在一個真正民主政治、法治軌道的國家，人民也應該有權控告政府的失信。十七世紀英王查理一世因爲未經國會同意而強徵一種稅，

人民就可以起而控訴；十八世紀的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因為要強買波茨坦王宮旁一座磨坊，磨坊主人堅決不許，訴之法律，結果普王卒歸敗訴，這座磨坊至今屹立，成爲保障人權的光榮象徵。現在中國正在呼籲保障人權，須知道歐洲的保障人權是包括人民財產權在內的，即使是政府也不能以強權強迫人民在財產上蒙受損失，也不能以單方的意思變更契約，無論是假借什麼題目。中國要真正民主，就得處處都尊重人民的權利。政府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得自己先建立信用，政信是不可自毀的。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看世界，想中國

震驚一世的原子彈，自從蘇聯參戰和日本投降的消息接續出現以後，漸漸把色彩沖淡了。但據我個人的判斷，眼前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並不是日本的投降，也不是蘇聯的參戰，至於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覆亡，更不在數，人類利用原子能的成功，才是今天世界上的第一等的大事，並且也是自有人類以來的第一件大事，也許還是整個宇宙中所可能發生的第一件大事。至少從今天起，地球上又發生了一次的工業革命，人類開始從蒸汽動力時代，經過電動力時代，而踏入了一個原子能動力的新時代。人類利用原子能動力的成功，不但改變了整個的地球，並且或許還能夠超出了地球的範圍，向廣大的太空中去發展，到了那時候，回視今天地球上國際的紛爭，真不啻我們今天文明人之視非洲生番部落的互相砍殺。十九世紀是蒸汽動力時代，二十世紀是電動力時代，二十一世紀無疑地將是原子能動力時代，在這原

子能第一次被人類利用的時候，日本被迫投降了，因為她不會認識這個新時代，所以遭了時代的淘汰。

人們想：幸虧原子彈的發明是操於英美人之手，如果不幸而德國或日本首先發明了這樣空前的武器，那時候世界上人類的前途將怎樣？那時候，世界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命運將如豬羊一般，一部分束手被戮，好騰出地方來供主人生息；一部分俯首帖耳做了戰勝民族的奴隸，勞苦終身而不得報酬。如果是這樣，人類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如今英美民族握了這種利器，雖然目前除暴安良，將來開物成務，對於人類前途是利多於害，但是將來原子能之應用既廣，技術公開以後，難保無一二野心家利用以為顛覆世界的工具，如果真有這一天，那命運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我們不能想不到，人類發明這種工具也許太早一點，現今的人類距離石器時代還不到一萬年，工具雖然進化得很快，但頭腦的進化却還差得很遠，以原始的頭腦，使用最進步的武器，正如小孩子之手握炸彈一樣，一個不小心，就有炸傷自己的危險。危險呀危險！當心呀當心！

要預防這種危險，只有從心智改造方面着手，人類對於自然界的征服，是已經邁上成功之路，但人類對於自身的改造，却還毫無把握。心理科學較之物理科學，其進步的程度相去不啻天淵。我們盼望物理科學的研究工作能夠轉向這一方面來，利用物理上的不斷的發明，能夠藉物質能的力量，以控制心靈，改造頭腦，變更遺傳的質素，使人類本身一代一代向好的方面走，只有一個道德的人類，才配使用這種危險的武器。我們相信今後科學的研究應該向這一方面努力。

看世界是如此，回想到我們中國，不但談不到什麼原子彈，連已經落伍的汽車輪船都無法自造，走路要靠人家，穿衣要靠人家，甚至吃飯也要靠人家，打仗更不必說了。這樣的一個國家，如何能立足於今後原子能動力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且慢陶醉於勝利的還鄉，仔細把前途想一想。

看起來，今後五十年真得舉國上下，同心協力，把全部精力用在科學的建設上，純理論的科學尤其重要，看了中學數學程度的低落，和大學中數理系的寥寥廓廓，不能成班，真不能不令人驚心動魄！我們這個國家，從周人重文以來，已經有

三千年積重難返的歷史，古代聖人觀象制物的精神，早已丟却，今天急起直追都恐怕追不上，還有徘徊審顧的餘地嗎？

但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科學，就得先造成一個比較長期的和平環境。現在，外寇是已經打敗了，今後國際的侵略大約一時不會發展成什麼大問題，所剩下的就是我們內部的黨派的問題。看看世界的新局，想想自己的處境，什麼黨派的紛爭，還不是如同蠻觸之相持於蝸角一樣？爭些什麼？有什麼值得爭的？把中國全部黨派不同的武力合併起來，也抵不到幾枚原子彈。如果大家聰明一點，把相消的力量轉變為相長的力量，造成一種政治團結的良好環境，使中國今後可以保持相當長久時期的和平，那時候科學昌明，全民福利，各黨派所標榜的政策一齊可以兌現。有野心的，不妨向地球以外的太空去發展征服慾，支配慾，第一個征服星球的才算是真英雄，若是只會同室操戈的，不算！不算！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談自由大學

看到十月九日重慶「新華日報」友聲欄中登載着多年不見的老友焦菊隱先生一篇論「自由大學」的文章，讀了之後，頗有同感。現在先把焦先生的原文摘要轉鈔在下面，再來補充一點我的意見。

「現在的大學教育制度和傾向，說它是文化浪費還不夠，它實在是一架處決文化的絞刑機。

「爲了人類自由而幸福的前途，我們急迫而狂熱地要求一個自由的大學。在這樣的大學裏，教授和學生是學校的主人。教授不是名流而是學者，不是專靠博士碩士招牌騙人的人，而是各部門的專家，是公衆所尊敬的領導者；不是私人的親信，而是始終不懈於研究和創造者。校長是教授們中間公選出來的，他爲了要擔負重大的使命才作犧牲。在這樣的大學裏，課程和生活打

成一片，大部份的教材，是現實的生活；大部份的課室，是礦山、農村、軍隊、工廠……人民是這個大學的助教；這是一個高爾基的「大學」。學生到這樣的大學裏來，目的是共同而唯一的：爲文化，爲人民，而不是爲自己；他們進來的時候，並不查驗文憑，只查驗知識程度；他們在這裏邊學習的時候，不被人切去天才的頭或者截斷遲鈍的腳，他們隨時可以畢業，只要學習已經夠得上預期的水準；他們個個有科學的頭腦，革命的意識，自由的精神，艱苦耐勞認真實幹的工作態度。

「必須有整個爲人類文化努力的自由大學，才能使人類得到自由。爲了叫明天的人類幸福，今天的大學必須自由！」

凡是在大學中教過幾天書的人，大概沒有人會不感覺到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過於形式化的，無論公私學校，課程全要遵守部定的標準，不但學生無法更動，就是教授也無法自由開課，於是一個教授本來有他所專攻的學問，儘可以自由開設講座，但因爲這一門課在部定課程標準裏並沒有位置，就無法開課，反之，學校因爲

要湊成一個專任教授的鐘點起見，便不得不把他所未能自信的科目勉強的給他教，結果教學兩不能相長。在學生一方面，進大學的本來應該有他所願意專攻的學問，但大學的課程却應有盡有，門門都要學習，幾乎想讓青年成一個百事通，特別是現行的部定課程標準，在一二年級裏還要強迫學生複習高中所已經學過的功課。學理科醫科的人要強迫他們再來讀中國通史，對哲學毫無興趣的人要強迫他們來讀哲學概論，真是有點浪費時間，而且違背人性。

再如教授的方法，大概都是注入式，功課排得太多，絲毫不讓學生有充分的預備時間，再加上參考書籍根本缺乏，想指定學生自己多預備一點功課也無法做到，更不用說，於書本教育之外，再多提倡點田園、工廠、社會的實習功課了。

像這些弊病，一時也數不盡，而且也不用數，人人都心裏清楚，教授爲的是混飯吃，學生爲的是混文憑，校長之類呢，爲的是混社會地位，大家都以混爲宗旨，彼此心照不宣，只要形式上交代得過去，教育部的視察員和社會家庭，便算敷衍了事，國家社會花了好多錢，青年得了好多本領，誰管？

要改造這種形式主義的大學教育，自然只有提倡自由大學的運動，讓各式各樣的教育理想都可以自由加以實驗，不但大學應該如此，即中小學也應該如此。我在二十年前曾寫了一本「全民教育論發凡」（商務出版）的書，主張根本廢止學校教育，以社會教育代替學校教育，這個理想縱使辦不到，但讓學校的內容更自由一點，更開放一點，更社會化一點，總是可以辦得到的。譬如我就想辦一個理想大學，裏面的課程不必多，樣樣都是教授的拿手戲，教授的鐘點不必固定，每週只要講演一兩次就可，大部分的時間都讓學生自修，教授祇是去加以指導，去利用閒暇的時間和學生共同生活，以言行直接陶冶學生的品格。於讀書以外，勞動、團體活動、娛樂和體育，各佔五分之一，學校祇是一個圖書儀器館，教授祇是一些青年的朋友，一切學問、品格、身體都是青年自學，自己做，自己完成。

但是眼前橫着一個大障礙，這就是十幾年來教育部的統制教育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政府不但對於大中小學的課程、師資、課本、樣樣都要干涉，都要包辦，而且根本就採取一種限制私立學校的政策，對於各級私立學校的設立，在條件

上限制極嚴，新辦一個中學立案就不容易，何況大學！即使可以讓私人去辦一個私立的學校，但內容課程又非照刻板式的章程不可，這樣，雖有天才，辦不出一個理想的學校來。因此要提倡自由大學的運動，先決的前提還是得要求教育部開放私人辦學的限制，開放課程排列的自由，要有自由的教育，先得爭取教育的自由。

「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自經本報提出以後，現在已成爲舉國公認的口號了，在這裏，我想增加一個口號，這就是「教育自由化」。

爭取教育自由化的實現，這是中國教育界的當前首要的任務。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人民飽受戰爭的慘禍，一部分人士把這個責任完全推在國家主義者身上，以為只有全世界的國家組織一齊消滅，全世界人民的國家民族意識一齊消滅，戰爭才會停止，世界才有永久的和平。那時候一般人的期望都寄託在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上，更熱烈歡迎的是他的國際聯盟的理想，以為國際合作的組織一旦成立，便可以保證全世界從此可以不受戰爭的威脅了。我們中國的人士對於這種以國際主義代替國家主義的理想更特別歡迎，歡迎的人中約可分為三種分子：第一種人是受了英美自由主義薰陶的分子，他們是個人主義者，以個人為生活最高的本位，認國家的組織不過是為達到個人福利的一種工具，工具到了不必要時，便不妨廢棄，他們的理想是全世界祇有一個個自由獨立的個人，所謂民族國家都不過是人為的種種界限，到可以打破之時便應該打破。第二種人是受蘇聯革命影響的社

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根據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論，認爲人類最基本的社會組織關係是基於經濟關係而形成的階級，並不是基於生物及歷史文化關係而形成

的國家民族，人類的歷史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部階級鬭爭的歷史，國家在他們看來不過是階級的工具，猶如個人主義者之認國家爲個人的工具一樣。第三種人是受慣了王道大同的國粹思想薰陶的老師宿儒，中國從秦漢以後就是一個世界，而非一個國家，一般士大夫祇有世界觀念，而沒有國家觀念，他們夢想的是天下一家，車同軌，書同文，因此對於大同思想特別容易接受，對於國家主義的現代思想反覺得有點不合口味，格格不入。中國現代智識界的大多數不外是這三種分子所組成的，這三種分子的主觀見解雖然各有不同，但其反對國家主義，認國家民族的思想爲狹隘，爲不合理則一。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聯盟和第三國際的理想正在最出風頭的時候，一般淺見的人以爲從此以後世界就可以無需國家了，更無需國家主義的運動了，世界從此可以沒有戰爭了，也就無需建設什麼國防了。那時候只有我們國家主義者，中國青年黨的同志們，爲國家主義的理想孤軍奮鬪，但是受了

多少摧殘，多少譏笑啊！

事實的演變不如一般世界主義者之所期，不但全世界國家民族的界限一齊打破，建設一個以全人類為主體的大同社會的夢想至今渺茫無期，就連靠國際合作的力量以保障一些弱小民族，使之不受強權國家的侵略的希望，也變爲空想。在第一次歐戰以後，中國智識界的名流學者們，以爲中國的領土主權有了國際聯盟，和華盛頓九國公約的保障，可以高枕無憂，有些人甚至於高唱全國軍備一齊廢止的高論，直到九一八瀋陽北大營的砲聲一響，才把這些軟心腸的世界主義者教訓得箝口結舌，瞠目而不知所對。

人類真是愚蠢，十四年來日本強權侵略中國的事情，八年以上的護國戰爭的慘痛的犧牲，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在強權侵略之下所受的無國防保障的苦痛，竟還不足以教訓這一般世界主義的夢想家們，使他們糾正過去的錯誤，戰爭的炮火剛一停，和平的鐘聲剛一響，世界大同的思想就又復活了，國家主義就又成爲狹隘的、落伍的、反動的思想了。世界上有許多罪惡，健忘也是其中的一個。

國家主義應該負製造戰爭的責任嗎？別的話不必多說，事實擺在那裏，國家主義不過是個近代的產物，牠是法國大革命所發出來的理想，牠的歷史不過一百五十年，至多也不過三百年，但是人類的戰爭從石器時代起一直打到了今天，却已經不止幾十個三百年了。在國家主義未出現以前，人類就一直在相互戰爭着，一切生物也一直在相互戰爭着，並不是有了國家主義才有了戰爭，這筆賬寫在國家主義身上，國家主義者有點不敢承受。

世界大同以後果然就能夠永遠消弭戰禍嗎？別的話也不必多說，過去中國在戰國時代，西洋在希臘時代，都是列國紛爭的局面，到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出現以後，當時東西方之所謂世界是統一了，是大同了，但是我們翻開當年的歷史，這東西兩個大帝國之中，仍然是年年有紛擾，歲歲有戰爭。中國從秦始皇到清宣統，統一的時代至少有一千四五百年，但是二十四史依然是一部相斫書，並不曾因為世界統一而減少了許多戰爭。

戰爭是一種生物學上的事實，生命基本的要求一日不消滅，戰爭就一日不會停

止，我們只能用相互合作的方法使戰爭比較少一點，用文化昇華的方法，使武力的戰爭逐漸轉變為文化的、和平方式的競爭，却不能希望戰爭可以永遠消滅，永遠逐出於人類辭典以外。

說到減少戰爭，國家主義也曾盡了一部分責任，在國家主義的運動未成熟，現代國家未建立以前，各國內部都因為封建勢力的衝突，宗教信仰的歧異，而時常引起社會的擾亂。自從有幾個民族演進到現代國家的階段以後，國內戰爭的機會就減越少，剩下的只有對外的戰爭。英國自一六八八年以後，二百六十年間沒有內戰，美國自一八六五年以後，八十年間沒有內戰，我們中國到今天還有內戰危機，就因為中國人民的國家意識的覺醒程度還不夠，黨派的意識，階級的意識，封建集團的意識，超過了國家的意識，仰仗外力，犧牲國家，來滿足黨派集團的私利私益。要消弭中國內戰的危機，只有充分發展中國的國家主義運動，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成爲大家共同的信條，國家的利益超過一切私人派系的私益，然後大家才肯顧及整個國家的利益，而消弭一切不必要的成見。

至於國際間的戰爭，與其說是由於國家主義的過分發達而引起，倒不如說是由於國家主義的運動未能普遍於全世界所引起，還比較合理些。爲什麼呢？我們可以分兩層來說。就被侵略的弱小民族說，弱小民族之被強權侵略，正因爲他們的建國運動沒有成功，沒有具備了現代國家應具備的條件，沒有充分的國防和自衛力量才被強權選作了侵略的目標，如果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現代國家的條件，即使有大野心國想來嘗試嘗試，也只有碰個硬釘子回去。納粹德國的遇到蘇聯，就是一個榜樣。如果全世界民族的建國運動都成功，那一個國家能被侵略？這是第一點。其次，就作爲侵略者的強權國家說，他們之所以蓄謀侵略，乃是受着統一世界的動機所支配，他們不肯自安於狹隘的國家組織，而想把權力擴充到全世界或一部分世界上才引起了侵略的戰爭，「八紘一字」的迷夢和「大東亞」的國際組織，是促成日本侵略的動機；恢復古代包舉地中海的羅馬帝國的迷夢，是促成法西斯義大利侵略的動機；大日耳曼主義和歐洲合衆國的國際組織的迷夢，是促成納粹德國侵略的動機。當這些強權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他們的野心已經超過了自己國家的範圍，

他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熱心的世界主義者，要想把自己國家的理想，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組織形態強迫推行到別人的國家裏去，這才引起一場劇烈的戰爭，這種侵略戰爭的責任是應該這些熱心過度的世界主義者去負的，國家主義却不能負這個責任，國家主義者祇有在自衛或爭取其祖國的獨立自由的時候，才以戰止戰，才舉起了反侵略的或國族解放的戰爭，反侵略或國族解放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國家主義者唯一可承認的戰爭，只有熱心過度的世界主義者，才想去侵犯人家的國家主權，才發動侵略的戰爭，而這戰爭顯然是非正義的。

上面這一套話，並不是把挑動戰爭的責任都推在世界主義者身上，不過是說，世界主義有好壞兩方面，好的世界主義，是尊重各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各民族的自決權的，並不想把一種理想或一種制度強迫每一個國家都來承受，更不是以一個國家來奴役其他國家，不過是在國與國平等的地位上，把一切具有共同理想的國家聯合起來，以促成一個世界合衆國，或世界聯邦。如果是這樣性質的世界主義，是值得我們擁護的。反過來，如果想用消滅一切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和特殊的國民性，

來強迫歸納於一種範型之下，不問你願意不願意，非如此不可，這就是壞的世界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原形，挑動戰爭的責任是由這一種的世界主義者負的，因為他的目的是在消滅人家的國性，國格，當然要引起人家的反抗。至於國家主義者目的祇在保持本國的獨立自由，並不想去干涉別人的國家，除了在爭取自由或保衛其獨立主權的條件下才會起而抗戰以外，更沒有發動戰爭的理由。所以國家主義祇有一種，而世界主義是有兩種的。

好的世界主義，為正名起見，應該叫作國際主義。世人往往以為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是兩個對立甚至相反而不相容的名詞，其實這是錯誤的。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並不相反，實際上倒是一線的相承。國際主義就是國家主義的一種形態，國際主義不是國家的消滅，而是國家的發展，擴大，和延長。為什麼呢？我們試從國際主義這個名詞來看，就可以明白。既說國際，當然是先有國而後有際，如果先否定了國的存在，當然也就談不到什麼國與國之際了。因此很明白的，國際主義在本身的涵義中，並沒有抹殺各個國家的獨立性的意思，牠的本意，祇是想把各個獨立的國

家聯合起來，成爲一個聯合國的組織，與大同主義之根本不承認國家民族的區別，只想以全世界的每一個個人爲單位而組成一個總體的世界大同社會者，根本意義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同主義者是以消滅國性而達到世界統一的希望的，國際主義者則是在承認國性的基礎上面達到世界聯合的希望，至於世界主義這個名詞，則頗爲含糊，兩種的解釋都可以用。

站在一個國家主義者的立場上，應該嚴格地區別這兩種名同實異的概念，對於大同主義的理想，我們雖尊重其不失爲一種高尚的理想，但祇能作講壇上的遊戲而已，實際行不通，因爲和社會進化的公例相背反。對於國際主義，我們却應該加以擁護，促進，（當然國際主義其名而帝國主義其實之偽裝國際主義不在內）因爲牠就是國家主義的延長，也可以叫做大國家主義。

爲說明這個道理，我們需得費一番言辭。我們須知道，國家主義的出現，雖然是近百餘年來的事情，但國家這個事實的存在，却是遠在國家主義的理論出現以前好久好久的了。一切主義都是先有理論而後有事實，因此牠們是人爲的主觀的

產物，惟有國家主義却是先有事實而後才有理論，所以國家主義是唯一自然的、客觀的產物。人類在不識不知之中享受國家生活已有若干年，到晚近才意識到這種生動的價值而加以理論的解釋，前者我們可以叫做是不自覺的國家主義時代，人類在行爲上是國家主義者，但在意識上還沒有國家主義的自覺，到了後一個階段，才可以叫做自覺的國家主義的時代。

國家的出現既然是一個事實上的產物，並不是由任何國家主義者的理論所創造的，那麼我們就應該追問人類何以要有國家生活的主要原因。要了解這個道理，必須從生物學的觀點去追溯人類未出現以前的歷史。一切生物的演化有一個既定的趨勢，就是從無組織到有組織，從簡單組織到複雜組織。最初出現於地球上的生物是組織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由單細胞生物逐漸而演進到複細胞組織的個體生物，中間演化的階段是很分明的。到了高等生物的階段，個體組織已經相當複雜而固定，不容易再有變化，於是生物演化的內容又展開了一個新方向，這就是從複細胞個體生物進化到了複個體社會生物的階段。社會生活並不是人類的專利發明，有幾

百種的動物都已經發展了或高或低的社會生活，其中如我們熟知的蜂，蟻，白蟻三種昆蟲，牠們的社會性比我們人類還高。所以要估定人類的社會組織的真正的地位，必須把牠擺在生物演化的最高一層的行列裏去，才能夠真正懂得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價值。

人類自始就是社會的動物，從他們的類人猿的老祖宗時代，已經是社會集團生活者而非個人孤獨生活者了。盧騷所想像的原始時代自由獨立的個人根本沒有那麼回事，因此社會不是個人的工具，而個人乃是社會組織下的一個細胞。個人從母親胎裏起，就受着無數代種族社會遺傳的性質所支配，種族的公性凝成了個人的個性，落地以後立刻就變成了社會的一員，非加入不可，毫無自由選擇的餘地。因此民約論者所主張的社會契約說是不合事實的，世界上從沒有一個社會（家族也好，國家也好）是由個人的自由契約而結成的，個人既無權選擇那一個社會，也無權退出那一個社會，因此社會工具說或國家工具說之不合理是很顯然的。

社會或國家工具說者之所以有這種錯誤，由於他們沒有分辨清楚兩種不同的社

會的性質。一般所謂社會，實際上有兩種絕對不同的涵義。第一種是依生物血緣的先天自然關係而形成的，我們可以叫牠做自然社會或生物社會；另一種是依個人自由志願的後天心理關係而結合的，我們可以叫牠做人爲社會或心理社會。其實爲正名起見，後一種祇應該叫做社團，或契約團體，不應該叫做社會。一切人爲的組織如教會、政黨、學校、銀行、公司、工廠、軍隊、俱樂部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牠們是由個人志願結合而成的，也可依個人志願而撤出或解散。盧騷所謂社會契約說，應該僅限於這一類的社團，一般個人主義者之所執持的社會工具說，也應該限於這一類的社團。但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社會，即自然社會，便絕不能應用這個公例。譬如就自然社會最簡單的形態如家族說，就不是由契約的關係而成，也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自由支配的工具，每一個人生來即有其固定的父母和家族，任何人不能於未生以前自由選擇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姓氏，他們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遺傳特徵，以及他們的家庭組合，這些關係都是由先天所規定的，強迫的，毫無自由選擇之餘地。因此家族絕非個人的工具，而是超個人的集體生命的一種形式。家族先個人而

存在，而非後於個人。

家族社會不過是人類自然社會組織的最簡單形式，家族社會的組織只能維繫相當數目的人口，到了超過這個限度以上，便不得不分裂，由一個家族分裂為若干家族，而這些血緣相近的家族又依聯合的原則重新聯合起來，以構成進一步的社會組織，於是宗族便代家族而起。宗族的組織並未曾消滅家族的組織，牠是以家族為聯合的單位的，牠是家族的擴大和延長。由宗族聯合而成部族，由部族聯合而成民族，由民族聯合而成國族，其演進經過的情形大體相似。每一種上層結構都是以下層結構為基礎，上下層各種結構之間彼此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還有一種相互倚賴的關係。人類用這種聯合的方式，擴大了社會合作的範圍，使集體生活趨於高度化。

現今我們人類的最高度社會合作的組織便是國族。現代國家的構成是以國族為主體的，但一般使用國家這個名詞的時候，往往含義較廣。譬如一個部族，也可以叫做部落國家；一個民族，也可以叫做民族國家。這裏所謂國家，相當於英文中的

State，現在我們說一個現代國家，具有地理的、政治經濟的、文化心理的高度統一性的時候，則所謂國家指的是英文中的 Nation，State 不過是政治組織的一種形式，而 Nation 的意義是不限於政治的，牠是一種具有集體生命意義的社會綜合體，依我個人的意思，用國族兩字來表示 Nation 這個名詞，比較可以少含混些。

如果注意到這種分別，則一般個人主義的政治學者所常說的國家工具說，對於國家主義者的所謂國家並無妨礙，因為一般英美式的政治學教科書中之所謂國家，指的多是 State，而並非指 Nation。所謂國家工具說是說 State 這一種組織不過是一種保護個人福利的工具，並沒有說 Nation 是工具。State 當然不妨說成是工具，不過並非個人的工具，也非階級的工具，牠是國族即 Nation 的工具。國人把 State 和 Nation 這兩個字譯成國家，因此不但常常發生含混，並且還鬧些笑話，譬如張君勳先生所領導的國家社會黨，其所主張的國家社會主義本指的是 State Socialism，這是俾斯麥和德國一部份講壇派社會主義的學者所主張的，與希特勒的 National Socialism 根本意義不同，但兩種在中文都譯作國家社會主義，無從分別，因此就

有人開玩笑說，張君勱先生是中國的希特勒了，弄得張先生不得不改黨名，這都是翻譯上的錯誤，與本來無涉。至於 Nationalism 一字在中國有時譯作國家主義，有時譯作民族主義，而且大抵是在說好的時候，便譯作民族主義，應說壞的時候，便譯作國家主義。其實 Nationalism 不應譯作民族主義，Nation 更不應譯成民族，因為 Nation 並不是一個單純民族的結合，所謂一民族一國家的觀念，已經是十九世紀過時的陳腐觀念了。現今的大國，沒有一個不是包含若干民族在一個國家之內的，蘇聯是最顯著的榜樣，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前，因為排滿復漢的關係，不得不提倡民族主義，但到民國以後，立刻就發生困難，孫中山先生鑒於民族主義的可能發生的流弊，才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提出了國族這個名詞以代替民族，這是很遠大的眼光。可是民族主義已成爲三民主義的三位一體，在憲草中規定中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政治氛圍之下，除了孫先生復活，沒有人有權敢改民族主義的錯誤的譯文。因爲這一錯，把外蒙古竟錯出中華民國以外，文字之不可不慎如此！

從部落封建的國家進化到民族的國家，從一民族的國家又進化到現在多數民族

聯合而成的現代國族的國家，這種演化的痕跡是很顯然的，而且演化的趨勢和人類社會及生物演化的整個趨勢是相符合的。國家的形態演進到了今天，是不是還會再向前演化下去？應該經那一個方面去演變？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我們知道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凡是有機的生命沒有一個不是變的，時時刻刻在變的，不變便是靜止，靜止便死了，過去的國家已經從封建的變到民族的，從民族的變到國族的了，今後當然還要變，這是國家主義者所應該把握住的現實。

就近年的大勢看起來，一民族一國家的國家觀念已成過去，今日大勢，不但單獨一個民族不足以立國，就是幾個民族聯合而成的國族國家也還不能自保其確切安全。今天的世界，是以一個大國為中心，團結其四圍的小國，構成一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思想上的相互聯帶的集團，才足以保持其安全。這一次戰後，蘇聯有中國歐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的東歐集團，美國有南北美兩集團，英國除了大英帝國的自治領以外，還想造成一個西歐國家的集團，法國也應以拉丁民族為主體造成一個西歐集團，可惜國力不充，不得不讓英國出一頭地。這一類集團，並不止是從前各

國間的攻守同盟，其主要的意義在經濟間的相互聯繫，和文化上的相互溝通，所以今天的什麼集團什麼集團之類，其意義的重大只有十九世紀上半期德意志各邦的關稅同盟可以相比。關稅同盟是把封建的德國進化到統一的一個重要的過程，今天的區域集團，是把全世界若干孤立的民族國家進化到集團國家的新時代的開始。這一次聯合國憲章中特別注着重區域組織一項，爲前此國聯盟約所未經提起者，這就是說明了時代演變的趨勢，這趨勢是什麼呢？這便是從小國時代進化到大國時代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主要進化趨勢，是從封建的小國家進化到民族的大國家，廿世紀以後的主要進化趨勢，是從民族的大國家進化到集團的更大國家，這是國家的擴大，而非國家的消滅，是國家主義的展開，而非國家主義的退伍。順着這個趨勢下去，當然會有全世界統一的一天，但須要記着，所謂世界的統一，並不在否定國家的前提下而出現的，並不是全世界的國家界限一齊消滅，只有無數世界公民所集成的世界國；世界的統一，決不能以一個個單獨的個人爲單位，而必須以世界上的幾個區域集團大國家爲單位，眼前世界的形勢明明擺在那裏，除了閉着

眼不看現實的人才會不知道。你說這種趨勢是國際主義的趨勢嗎？不錯，牠確可以稱之爲國際主義的趨勢，但同時也仍舊是國家的擴大化，由小國到大國，這仍然是國家主義的延長，如果明白國際主義就是鑄造一個更大的國家的先導，是國家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段落，先有國與國的聯合，然後才有國與國的融爲一體，則對於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可以得一個正確的了解。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沒有國家主義，不會產生國際主義，沒有國際主義，也不會產生更高階段的國家主義。

作於民國三十四年冬

對國事要樂觀

在八年以上的堅苦抗戰裏，中國人民是苦痛的，但却不是悲觀的，因為人人心中存一勝利的希望，人人心中有一勝利後黃金時代的憧憬。天快亮了，天一定要亮的，人人這樣想，而天亮果然也就隨原子彈時代而到來。勝利當頭時的爆竹，曾給長期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以何等的空前快樂！這記憶還在每一個人心目之中。

但是隨着勝利，鐵一般冷酷的客觀事實也隨着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勝利以後的中國，不是一個夢想的中國，而是一個冷酷的事實的中國，面對着這一切冷酷的現實的中國人民，頓時從極端樂觀的氛圍墮落到了悲觀的深淵，這是無足怪的。充這種悲觀空氣之所及，可以使一切向上的努力都化爲烏有。人人祇作五日京兆的打算，拚命搶錢，拚命享樂。一個民族充滿了這種世紀末的思想、行爲、和態度，這個民族的前途，是無可救藥的。

我們必須替大家指出，眼前種種現象的悲觀是事實，但這種悲觀現象，却並不是不可救藥的。相反地，我們如果認清楚了悲觀現象的動因，則這一切現象並不是不能醫治的。

今天擺在眼前的一切可悲的現實，分析起來，不外以下幾種：第一是紛爭，從辛亥革命起，中國人打內戰就打了整個三十五年，就連一致對外的抗戰期間，也並不曾根絕了國內各種勢力的相互火併。第二是貧窮，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一天一天接近貧窮線，八年的抗戰，更加速了中國的貧窮化。第三是腐化，貪污和泄沓，都是腐化到底的徵象，國民道德，墮落到了最低度。第四是黑暗，政治上社會上的專制黑暗，越到下層越厲害，淳樸的人民，在各色各樣的專制虐政之下，失掉了一切自由，和人生的最低權利。造成人心悲觀的客觀事實，歸納起來，不外這四種。

紛爭現象的造成，主要由於野心侵略國家的策動，而過去日本的軍閥，應負的責任最大。日本的傳統政策，是分化中國，不許中國大陸有一個統一強固的政府。

就在抗戰以後，對於所親手培植出來的漢奸傀儡，也是如此。在長期戰爭中，日本軍閥在所控制的區域，盡量地破壞中國的社會秩序，摧殘中國人民的經濟力，直接間接製造各種武力的集團，以致在日本投降以後，留給中國的是一片紛亂，勢如亂絲。今天要根治這種現象，必須提高人民的國家意識，使紛亂的力量，在國家至上的信仰下團結起來，才可以脫離野心侵略國家的影響，而獨立建國。

貧窮現象的造成，一半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半也由於中國政治的不安和腐化黑暗勢力的猖獗。要根治這現象，只有促進政治的民主化，使國家政治走入開明建設的軌道，則人民才能慢慢安居樂業，恢復固有的生產力，才可以談到用國家的力量，去防止外國經濟力量的榨取。

腐化和黑暗兩種現象的造成，主要是由於二千年長期專制政治的結果。近三十五年來，中國在形式上雖號稱民主，實際上專制思想、獨裁思想、甚至英雄主義的帝王思想，還充滿了一般政治上領導人物的腦筋，結果口口聲聲說民主，說人民，而實際上所圖所謀的，却依然是傳統的獨裁專制。全國各地，還存在着無數大大小小

小的皇帝，在每一個皇帝之下，都有一般御用的爪牙，在那裏張牙舞爪，吞噬人民。像這樣情形，人民焉得而不貧窮？政治焉得而不腐化，不黑暗，甚至紛爭？要根治這幾種現象，也只有促進政治的真正民主。人民真正有了民主的權利，能夠自由反抗一切虐政，政治才能免於腐化和黑暗。

因此，國家觀念和民主政治的養成，是根治中國目前一切悲觀現象的主要靈藥。我們只有堅定地依賴這兩種靈藥，才可以根絕了眼前的一切悲觀事實，而中國必然向這兩條大路走去，也是無疑的。一切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勢力，必然會有自行淘汰的一天。在這種正確的認識之下，因此我們對國事並不悲觀，並且也希望全國人民鼓起樂觀的勇氣！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廿九日上海中華時報社論

告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

中國必須走上民主的道路，這是命定的，可是假如要求民主的人過於愚蠢，則中國民主的前途可能發生波折。這種波折的現象，大抵不外兩種：一種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其名，而不民主其實；一種便是對民主來一次徹底的大反動，把中國逼入一種長期的殘酷的革命狀態之中。

上舉兩種現象無論是出於那一種，都可以使中國一直糟下去，糟到全國人民發生空前的死亡，糟到一切工商業全部破產，糟到外國的經濟勢力無限制的向中國伸長，糟到挾有大量資本的官僚完全不要國家，一切托庇於外國經濟勢力之下，而以身爲其工具，而以國家爲其附庸。等到一天因國際種種因素的醞釀，果然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則中國除供人利用，供人驅使，供人宰割以外，將不復成爲一個國家。這些話決不是全憑想像的危言聳聽，一切眼前的事實，都是真憑實據。

某報常常責備政府低能，以二十年來秉政的結果，鬧到今天全國的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說它低能還有什麼話可說。可是感到不足的，便是某報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的一切現象其所以鬧到如目前的不死不活，政府低能僅僅能說明一方面，假定在野的有力黨派與社會有力的賢達果然多少有些智慧，我們敢說中國便再糟也不會糟到如此，甚至中國的民主已經可以開步走也不一定。

中國本來沒有所謂民主，整部的歷史便是走的與民主相反的路線，以中國人的頭腦，中國人的態度，中國知識分子的懶惰，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愚昧無知，再加上一切生活習慣之難於矯正，說今天才喊出民主，明天便可以民主兌現，這便把民主看得太不值錢。我們始終相信實現民主是有步驟的，只有一次一次兌現的民主，決沒有整批兌現的民主；一次一次兌現的民主是爭來的，整批兌現的民主是賜予的；只有由人民自己爭來的民主，自己才知道寶愛；賜予的民主今天可以整批的賜予，明天也可以整批的收回。

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愚昧，民主的實現顯然的只能由簡易趨於繁複，假定不按

部就班而躡等躁進，則以毫無民主素養的人民，以之運用現代繁雜的民主制度，其勢必始也感到茫然，繼也陷於凌亂，最後乃流於厭倦。果然等到人民對民主發生了厭倦，則必有野心者起，利用人民這種弱點而使政象復返於黑暗。所謂欲速不達，求前反却，在若干頭腦簡單，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即期求實現高度民主的人們，是很容易犯着這種毛病的。

我們承認在今日的中國實現民主，作民主運動者必須具備若干的力量，對於這種力量我們可以放寬尺度，連一部分的武力也包括在內。清末的皇室所以不能不汲汲於籌備立憲，便是因爲有個革命黨在那裏積極活動，然後立憲派才有說話的餘地。可是運用力量必得小心，第一、不可誤虛聲爲實際，而自我宣傳中毒；第二、不可因一部分的開明分子多少寄以同情，即認爲天與人歸而衝昏了頭腦；第三、自身具有若干力量的人們，對於因利乘便並無真知灼見而亂唱高調的投機分子，最宜警戒，不可誤認爲這類角色除掉其自身的風頭以外，對於民主的促成真有多大的益處；第四、中國人幹政治，因爲側重在人，最容易引起恩怨，今日一部分貌似急進

的分子，其實並不是真能急進，其目的不過想摧毀現狀以發洩其自身的一股怨毒，這種人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究應如何推進，實際是很空洞的。假定具有相當力量的人們，而又真想實現一點民主，如果錯認這類所謂急進分子，以為憑着他們的吵吵鬧鬧，便可以作自己的先驅，這等於治絲益棼，其結果可能上當。

總之，歸根返本，我們決無高調可唱，第一，我們還是要努力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第二，無論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必須使黨治提前結束；第三，官僚的氣餒與作風必須加以遏止，而逐漸做到摧陷廓清；第四，解決當前人民的生活問題，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不容絲毫忽視。至於憲法如何美妙，國大如何理想，人事如何安排，各方面的面子如何顧到，這在今天都算是第二義。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上海中華時報社論

人心風俗之憂

今天中國最大的危機，並不是黨派的衝突，也不是政治的貪污和經濟的崩潰，最大的危機是人心風俗的江河日下，具備了一切亂亡的徵象。因爲人心風俗的日趨澆薄，才會引起黨派的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貪污，經濟上的攘奪，而這幾種現象的最後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便是人心的自私自利，「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正是今天中國的現象。

試就黨派間的傾軋，鬭爭，甚至擴大爲內戰來看，過去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上很少有政黨，唐之牛李所爭在私人恩怨，雖然派系分明，還不會懂得組織和鬭爭的技術；宋之新舊黨更是堂堂的政見之爭，所用的方法也很簡單；便是清末革命立憲兩派之爭，也不過僅僅在言論上彼此互詆，和少數青年的隨聲附和而已，一切方法並不高妙；民國初元的許多黨派醜史，也僅限於國會中少數的政客，還沒有把這種惡

風氣傳染到整個社會。自從民國十三年國共合作以後，把蘇聯革命前的一切鬭爭組織的技術，傳佈到中國，共產黨唱之於前，×××和之於後，始則此黨與彼黨鬭爭，繼則同黨中的各派相互鬭爭，終則同派中的私人又互相鬭爭。鬭爭的技術也越演越烈，始則互罵，繼則互打，最後則互殺，殺了異黨之後又來殺同黨，力量如果不足，則用哄，用騙，今天的主張，明天可從而推翻之，明明荒謬絕倫的主張，也可以杜撰出一套理論來，當漢奸爲的是和平救國，失敗後又可以說是地下工作。這種黨派間的鬭爭風氣傳染到整個社會上去，便成了任何關係無不可成爲組織，同學、同鄉、同訓、同期，把整個民族分裂爲無數小組織，而每一個小組織與其他小組織間又必須要發生猛烈的鬭爭，甚至夫妻父子之間也不能互信互助。結果慘酷暴烈之氣，充滿於中國社會，率人變獸，率獸食人，在這樣的社會裏，無正義，無公理，無是非，無曲直，黨同伐異，指鹿爲馬，只要有利於己，任何事都無不可爲，人間無不可爲之事，人人就都變爲肆無忌憚的小人，戾氣所之，這樣的國家焉能不亂不亡！

就政治上的貪污，和經濟上的崩潰危機來看，也是人心風俗所造成的。過去君主專制時代不是沒有貪污，但貪污風氣僅限於少數官僚羣中，並且膽量也還不算過大，到了今天，貪污成了普遍的現象，不但做官要貪污，連治兵也要貪污，辦學也要貪污，辦外交也要貪污，辦黨也要貪污，慈善救濟也要貪污，甚至做生意的人領了股東血本之後也要貪污，社會上不以貪污爲恥，而以貪污爲榮，能貪污者謂之有辦法，不貪污者謂之瘟豬仔。除了非法的貪污之外，還有合法的做生意，商人做生意之外，國家要做生意，軍隊要做生意，交通人員要做生意，大官小官要做生意，教授要做生意，太太小姐要做生意，娘姨大姐要做生意，甚至青年學生也要做生意，人人腦筋中存一做生意的觀念，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上下交爭利，國之不危何待？

每一個集團，都以爲非鬭爭不能自存，非貪污營利不能自養，却不知道鬭爭和貪污營利的風氣一造成，其始雖在對外，而最終之禍仍必中於自身。在對外鬭爭的對象消滅之後，對內就必開始鬭爭，在對外結黨營私成功之後，也必然要向組織以

內去爭利，人吃人的結果，最後祇贖一個最兇、最惡、最貪污、最嗜利的人，整個的民族趨於滅亡，這贖下來的最後一個人，無論怎樣本領高超，一人也不能立國。這種反演進的現象正在中國社會中繼長增高地進行着，這是最可怕的現實，我們不能希望人心風俗在一霎那間就能變好，但不能不勸一切有造孽機會的中國各界領袖們，為你們的子孫起見，少種一些惡因，使中國民族還能在世界上多活幾天。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中華時報社論

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

——擁護「白魯塞爾宣言」——

昨天報載「比利時京城十六日聯合社電：比利時與英、法、丹麥、荷蘭、瑞士、瑞典及西班牙自由主義派代表今日在此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其對於人類精神自由之信念及改造世界之各項原則，此項宣言名曰「白魯塞爾宣言」，係於比利時自由黨百年紀念慶祝會閉幕時發出，其主旨除闡明各國自由主義派人士對於人類之精神自由具有信念外，並聲明反對一切反動或集權政府，主張經濟制度應尊重私人企業，戰爭唯有藉聯合國機構始能予以廢止，自由人爲世界唯一希望。」

我們看了之後，非常地興奮，也非常地覺得重要。雖然電文簡略，關於「白魯塞爾宣言」的內容，全文尙未得讀到，但就電文所傳幾項要點看來，我們感覺到這宣言是值得擁護的，並且更特別適用於中國。

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主潮，牠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所培育出來的。從十七八世紀以來，歐洲的思想家，法國有福祿特爾、孟德斯鳩、盧騷，英國有約翰洛克、亞丹斯密、休謨，德國有吳爾佛、康德、歌德、席勒、非希特等，他們這些哲人從政治、經濟、哲學、倫理、藝術各方面來闡揚自由主義的真理，替自由主義奠定了理論上堅實的基礎，在行動上引起了法國大革命，引起了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兩大風潮，引起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引起了哲學上和藝術上的浪漫主義運動，引起了馬志尼的國家主義運動，由創造義大利青年黨，到創造歐洲青年黨，這一串的運動，都是自由主義者的偉大的成就，說十九世紀上半期是自由主義的世紀，也不爲過。

自由主義者的主張雖然很多，但歸總一句話，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獨立自由的人格，承認個人人格的尊嚴及其價值。盧騷在政治上闡發的是這一點，康德在哲學上闡發的是這一點，歌德、席勒等在藝術上表現的也是這一點。

但是就當一八四八年歐洲的自由主義運動達到了極頂點以後，反動的潮流便相

繼而起，第一個是俾斯麥的官僚集權主義，第二個是馬克思的階級集權主義，第三個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一黨集權主義，這三種勢力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向自由主義進攻，他們一致的主張，是否定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承認個人自由應當屈服於他種目的之下。從此以後，自由主義者在歐洲因為受不住這三種反動勢力的相繼進攻，漸漸地退却逃避到西半球去。在歐洲，祇剩下英倫三島和西歐法、比、荷、瑞幾個殘餘堡壘，在那裏掙扎。

反動勢力的高潮，引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都顯明地分成了兩個壁壘，一方面是集權主義的國家，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國家。每一次都是自由主義戰勝了集權主義，而以這一次大戰中表現得更為清楚。這一次大戰，打倒了德、日、義三個專制魔王，希特勒葬身火窟，墨索里尼上了斷頭臺，東條之流也快引頸就刑。自由主義的勝利，證明了自由主義的真理，所以才
有現下歐洲自由主義運動的復活。

中國儒家的哲學，承認個人的人格價值和尊嚴，本符合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不

幸二千年來，在帝王專制之下，自由主義的精神，屢受摧殘，無法發揚光大。民國以來，一切專制餘毒，跳梁至今。今天中國在勝利以後，還不免要遭受戰亂的威脅，便因爲法西斯專制和布爾什維克專制的兩種反動集權思想，還存在於中國境內。人民在兩種集權思想之下，都沒有自由，個人的價值和權利，都不被承認。而這兩種集權思想的發展，又競以人民和國家爲其犧牲品。因此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抬頭，不但是應該的，並且也是必要的。

中國今天大家都在講民主，但我們以爲與其講民主，不如講自由。因爲民主的口號，容易爲集權者所利用，民主其名，反民主其實，不如自由這個口號，比較要鮮明得多。只要你擁護自由，就不應該再去利用任何口實去限制人的自由權利，反動者不容易曲解。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勢力實在太微弱了，需得聯合。因此我們希望一切自由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不要一味夾在左右兩集權勢力的中間，打躬作揖，學做調人。而是應該與真正的人民站在一起，爲擁護中國人民的自由權利，予一切集權勢力以迎頭的打擊！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中華時報社論

公是與公非

現實的政治和理想的政治，從來是不大合得攏的。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一部人類政治史，不外是力與力的關係，有力者勝，無力者敗，力多者強，力少者弱，力與力相持而不下，然後始有均衡，始有折衷。實際的政治，不外就是從各種複雜錯綜的關係中，找出一個均衡點來使整個局面穩定一下。現在巴黎正在召開的二十一國和平會議，所作的就是這一點功夫。舜的「執兩用中」，所謂「中」也就不外是力的均衡點。找出這個均衡點來，所謂事物才能攔得平。這裏面赤裸裸地是力的關係，只有均衡，只有中與不中，無所謂是非曲直。

但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們，是不甘心於這種現實觀點的。人類之所以進化，就在乎以理性來控制自然，乃至人類本身。理性控制自然的工作，到今天原子能時代，已着着成功。但理性控制人類本身，特別是關係人類最大的政治行爲時，却不免有

點力不從心。從威爾遜的十四條，到羅邱的大西洋憲章，一貫是理想主義失敗於現實的慘史。但理想主義者並不因此灰心。究竟理想主義，並不是毫無成就。古來的有力者，祇要說一句『臥楊之旁，豈能容人鼾睡！』就打起來了。今天的有力者，無論是國際或者國內，儘管時時備戰，時時要戰，時時在戰，滿口却都是和平，人道，『我並不想戰呀，是他先開火，我才不能不採取自衛行動呀！』這就是證明有力者雖有力，還不能不多多少少顧忌一點公理。理想主義前途的尚可樂觀，就在這一點上。

既要講理，就不能不有是非，因此談政治而辨是非，雖未免有點迂闊，並不是不可以的，也並不與執中之說相牴觸。因為一個是就現實的觀點來看，一個是就理想的觀點來看，兩者原可並行不悖的。所要問的，是所謂是非，究竟是人心之公的公是公非呢？抑還是少數人偏執之見的私是私非呢？這倒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什麼叫做私是私非？譬如在抗戰期間，有些漢奸明明是賣國求榮，却滿口和平救國，曲線救國，直到如今身敗名裂，還靦顏以地下工作自解。這種是非，就是邪

是邪非，私是私非，我們決不容許有這種歪曲事理的是非，也決不容許這些漢奸以是非自解。但是這一類的歪曲是非的是非，是很難絕跡的。譬如，在從前，明明日本人是割裂我們的土地，分化我們的統一，掠奪我們的物資，混淆我們的思想，而美國人既不會佔據我們任何土地，還歸還我們以臺灣；也不會掠奪我們任何的物資，還供給我們以租借物資，是非之明，如此顯著，但有歪曲的論者，偏偏要發爲排美之論，而對於割裂我土地，掠奪我物資的野心強隣，偏偏不置一辭，甚或還引爲良友，這就是少數人的私是私非，邪是邪非，不足以語於人心之公。又如張獻忠、李自成之流，明明是殺人不眨眼的流寇，有些歪曲學者却捧爲農民革命的英雄，大唱其「神皇躍馬起延綏」之論，這也是邪是邪非，私是私非，不足語於人心之公。因此要談是非，就必須先建立是非的客觀標準，否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越談是非，是非越不明，這就成了平劇上所說的：「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倒越糊塗了。」

今天中國的政治上要找是非標準並不難，最低限度，可以有兩個標準。第一

個標準，是國家的權益，凡是有裨於國家權益的就是「是」，凡是違反國家權益的就是「非」；凡友邦行爲是在精神上物質上幫助我們強大統一的，就是好朋友，凡蓄意分化我們，割裂我們，掠奪我們的就不是好朋友。除了少數抱有歪曲成見的人以外，全中國的人，都可以擁護這個理論。第二個標準，是人民的權益，凡尊重人民的生命、財產、思想、立場、集會、結社等一切權利的，就是「是」；凡剝奪人民這些權利的就是「非」。如果有兩個政權，同時都不尊重人民的權利，那就應該比較一下，那一個剝奪人民的自由，迫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強姦人民的意思想更厲害一些的，其「非」更大。要談是非，就應該如此談。這個道理，除了少數抱有歪曲成見的人以外，也一定能獲得全中國人一致的擁護。

我們不要說，中國人民沒有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更不要說，是非曲直，可以讓少數有成見的人任意歪曲；我們須知道：公理表面上雖似屈於實力，但天長日久，公理終是最後的戰勝者。民國三十五年來，有多少依附侵略國爲背景的政治集團，如安福系之流倒了；有多少殘賊民意的政治力量，如北洋系軍閥之流倒了。人

心不死，公理常存。談是非者，要注意由人民心理所反映的公是公非才好！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華時報社論

『解放區』的地方政權問題

讀了馬歇爾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關於調停國共問題失敗的聲明以後，知道談判的重要爭執至少有兩點：第一是軍事復員的問題，第二是共軍撤退後的地方行政權問題，而後者尤爲爭執的焦點。

關於軍事問題，國共雙方早已商定了雙方同意的整編方案，應該祇要照計劃切實執行便是了，用不着再討論。究竟延宕實行的責任在那一方面，事實具在，不難覆按，用不着再變更原來的方案，另出什麼新花樣。

關於地方政權的問題，確是一個最基本而最急待解決的問題。照馬、司徒的聲明，似乎問題祇繫於蘇北共軍退出後的地區範圍內有問題，而事實上，這個問題是關係整個「解放區」的人民的幸福與痛苦的。政府和美國朋友雖把這個問題看得不十分重要，而其實却是關係到一萬萬以上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言論、思想、居

住、遷徙等基本自由能否得到保障的問題，如果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人民被迫有自起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利。

我們始終不明瞭現在中共控制下的「解放區」的政權，自最上層以至最下層，究竟在法理上是處着一種什麼地位？如果延安政府是一種革命政府，根本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權，並將一舉而顛覆之，則「解放區」的地位就很容易了解。因為既是革命政權，就不必顧慮一切，可以為所欲為，但同時也就不必指責政府的武力對付，因為任何一個經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對於蓄意顛覆他的革命政權，斷然沒有絕對祇許束手挨打，不許動手自衛的道理。不過從十年來的事實表現看來，延安政府似乎並未自居於與南京政府對抗的革命政權的地位，中共中央在抗戰前發表了四項諾言，承認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跟着紅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接受軍事委員會的統率，在法理和事實上都等於中共承認了國民政府的地位，而放棄了過去用革命手段顛覆國民政府的主張。去年毛澤東在重慶，曾親口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就是這一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既然如此，照法理上說，中共所統治的區域，就不過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一部分地方政權，而第十八集團軍也不過是國民政府統率下的軍隊之一單位。既是地方政權，所頒布的法令，所施行的政策，就不能與國家法令相牴觸，即使有特殊化的必要，至少在事先應得中央政府的同意，事後應向中央政府提出報告，人員的任用，機構的創廢，賦稅的徵收，法律的頒布，都應該經過中央政府的核准，才能有效，至於軍隊的調動更應聽候中央統帥的調遣。但事實上所表現的，中共在「解放區」的政治，首尾一貫有另一套的作風，連貨幣和郵票都另換花樣，而且並未經過國民政府的核准，軍事方面更不必說。這樣的作法，即使不是革命，也是獨立。任何一個中央政府，對於這種地方獨立的狀態，只有兩條路可取，不是承認，便是不承認，他可以自主取舍於兩者之間，我們不能責備他祇許承認，而絲毫不許否認。

其次，地方政權的獨立或特殊化，必須有其必要的理由，照歷史的往例看來，一部分地方政權的特殊化，不外基於三種理由之一，第一是當地民族的志願，第二是國防的特殊需要，第三是當地人民的志願。中共所控制的區域，如華北、東北各

省及蘇北、鄂北，當地並無少數民族問題，中共也不是中國人以外的另一少數民族，因此不能援外蒙之例，要求獨立或特殊化。中國今日並無假想敵國，華北東北等地在日本投降以後，已無特別畫爲國防特殊區的理由，因此也不能基於國防的理由而成立特殊化的政權。所贖下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當地人民是否要求首先成立中共式的民主政權的問題，中共所堅持的理由就在這一點，而這一點確是值得考慮的。如果「解放區」的政權，果真是基於當地人民的志願，則縱使國民黨不承認，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也應該承認，並加以熱烈擁護；如果當地的人民並不歡迎這種「解放式」的政權，祇是在暴力脅迫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則縱使國民黨與共產黨相互諒解，分贓而治，在「解放區」暴政底下呻吟的人民，也決不容許這種政權繼續存在，如果國民政府不能援救他們，他們一定要自己起來向這種政權清算，革命！

要問「解放區」的政權是否真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我們不妨先問問由華北、東北、蘇北、鄂北逃出來的難民，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解放區」的辯護者當然可以說，這些難民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應該在打倒之列，他們的意見沒有尊重的必

要。但我們記得現在中共宣言所擁護的是三民主義，而並非馬克思的階級鬭爭主義，在三民主義中只有「主權在民」，並沒有主權在「貧民」或「無產階級」；三民主義中只有「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也並沒有「打倒資產階級」，「沒收地主土地」，甚至逼死這些人。而且中共領袖周恩來在重慶還再三聲言，願與中國資本家合作。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是全民的，資本家地主不能因為他有產有地，便否認他們的公民權，不聽取他們的意見。

其次，這些難民之中，真正的大地主，大資本家，不過是佔千分之一的數目，大多數是一家數口共耕幾十畝田的自耕農，每月靠薪水收入的小公務員，中小學教員，小本生意的店主，股東。爲着中國農村不像蘇俄革命前有那麼多的大地主，而這些少數真正的大地主倒是住在都市，自在享福，受不到「解放區」的「解放」，於是鬭爭的對象不得不集中到小資產階級和自耕農、小商人身上去。逃出來的難民，大多數倒是這些人，而在民主政治的原則之下，這些人是並沒有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

其次還有一部分是真正的貧農，佃農，體力勞動者也逃了出來。爲什麼他們不坐在家中等着分地？第一，他們怕拉壯丁；第二，他們即使分到地以後，還得向當地政府繳納數倍於過去向地主繳納的公糧，他們負擔不了；第三，他們不能忍受那種羞辱合法婚姻子女，在鼻子上劃一個字，獎勵私生子，在門口掛一塊紅，逼迫寡婦再嫁，強迫閨女獻身「參軍英雄」，鼓勵兒子親手殺死父親的社會革命新道德生活；第四，他們不能忍受那種「聽房隊」、「聞香隊」的特務組織的偵探，而隨之以「望中央」、「上天梯」等慘酷刑罰的威脅。他們不像李公僕、聞一多一樣，死了有人替他們聲冤，他們爲保全一條微命起見，也只好逃了出來。在民主政治之下，這些人不能說不是公民吧？我們也應該聽取聽取他們的意見。

我們所有以上這些估計和敘述，都是有事實根據的，但「解放區」的辯護者當然可以說這全是捏造，逃出來的難民百分之百都是應該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絕沒有一個甚至半個（小孩子只好算半個）小資產階級、薪俸收入者、體力勞動者、自耕農、乃至貧農，我們當然也無法反證。我們謹建議於國民政府底下的官吏，在酒

食酬酢夤緣奔走之餘，不妨抽出一點時間來，對這些逃出「解放區」的難民的資產狀況，和他們的經歷及意見，作一番調查統計的工夫，而把事實公布出來。

當然，逃出來的難民無論怎樣多也總是少數，留在「解放區」的人民應該是多數，中共當局於是可以說這些留在當地的全體人民都是擁護我們的，因為他們曾舉手擁護過我們的決議，選舉過我們的同志做他們的統治者，所以「解放區」政權之爲民主是決無可疑的，沒有人能到「解放區」來自由向每一個人徵詢他們的意見，卽有，人民也不敢直說，因爲調查的人前一腳走，說真話的人後一腳就有生命的危險，所以這個辯護是無法證明其真假的，但我們不妨用另一種方法去證明。

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主要的試金石，中共和一般同情中共的人會同意過載入於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曾主張在將來的憲法中逐條積極列舉，曾攻擊過國民黨當局的蹂躪人權，我們大體都很同意他們這種態度，對於國民黨當局的不尊重人權，我們也曾屢次三番大聲疾呼指斥過，但我們再回頭看看，「解放區」的政治，是否已經實行澈底保障過了這些人民的基本權利呢？我們所得到的答案是

否定的。

身體自由——可以隨時逮捕，加以「國特」、「頑固分子」、「托匪」、「人民公敵」等罪，而加以苛刑。

財產自由——可以任意沒收，甚至將祖居房屋拆毀。

居住自由——有聽房隊聽你的房。

遷徙自由——有糾察隊，離家出外，不論遠近，都要報告。

信仰自由——除毛澤東主義外無他信仰，人民偶不留意，說出「老中央」「來不來」字樣，即處以「望中央」之刑。

言論思想出版自由——「解放區」除官辦的報外，沒有別的報，區外的報，雖左派報紙也在禁止之列。

集會結社自由——除中共操縱之團體外，他人敢有活動，就是「國特」。
黨化教育——比國民黨還兇。

連任何國家都有的吃飯自由，也有聞香隊來聞你的香！

也許我們這些話都是誣蔑之辭，則我們建議：在蘇北、鄂北共軍已經退出的區域，不妨組織一個大規模的考察團，分隊到鄉村去聽取真正老百姓的批評意見，如果老百姓真正擁護這種政權，我們也應該力爭他的繼續存在。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華時報社論

民主政治需要獨立的人格

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的最大區別點在什麼地方？在乎對於個人價值的估定如何。民主政治承認每一個個人有獨立的人格和意志，人與人是平等的，個人不是任何組織的工具，而是獨立的人格，人只能爲他的獨立意志而驅使，而犧牲，不能爲任何其他目的而犧牲。極權主義者則不然，一切的極權主義者，從最古的部落封建社會到最新的法西斯主義，他們一致不承認個人有獨立生存的價值，而認個人的生存不過是另一種更大的目的的工具，爲了這個目的，個人的權利不妨犧牲，甚至個人的意志也不妨加以強制，一切暴政的原理都從此而出。

最初，在神權政治時代，以爲神的意志大於人的意志，因此個人的權利和價值應當爲神意而犧牲，教會的權力由此而起。在封建政治之下，只有每一個統治的君主貴族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大多數的平民則不過是統治者的奴役，本身毫

無價值可言。就是這些封建貴族們，因為有封建規制的約束，本身不過是比他階級更高的封主的奴役，也不能說是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整個封建制度的最高層，站着天子，只有他一個人才是比較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但上面還有天，天子也必須上同於天，代表天神或上帝來表現神意的，依然還有一個教士階級，他們由傳統的神權駕馭着君主使他不能爲所欲爲。到了君主專制政治時代，神權的勢力才打破，天子變成最高的權力者，具有圓滿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一切臣民都不過是他的工具。以至於近代，君主和上帝的威權是推翻了，但集體生活的威權代之而起，法西斯主義者強調國家民族的至上，共產主義者強調社會和階級的集體利益，在這些口號之下，個人的權利被制約了，個人的意志被抹殺了，個人的權利被更高更大的所犧牲了。個人從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來，又陷入於一種新的奴役裏去。在這些集體主義的口號之下，產生了一批新的貴族，新的統治階級，他們用種種新的口號來取消人民的獨立自由，爲新統治者所鼓吹的一切主義而犧牲，而工作。在這種制度的最上層，站着十幾個手握大權的統治者，他們有爲

所欲爲的權利，所以謂之爲極權主義。

個體生活與集體生活之孰爲目的，孰爲手段，誰的價值大，誰的價值小，本是一個亙古爭論不決的問題。集體生活當然有其本身獨立的價值，和存在的必要，如果果不如此，則從古到今不會有這麼多的集體生活的時代層出不窮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個人的獨立價值也不是輕易可以抹殺的。一個集體生活的世界，並不需要抹殺個人的獨立人格和生存價值，相反地，只有在個人獨立人格和生存價值極端被重視的時代，才有真正的集體生活可言，因爲這種集體生活是建築在每一個構成分子的自由意志和平等權利之上，而不是建築在強制的威權之上，這樣，集體生活的基礎才能穩固，集體生命才能因每一個細胞的活躍的生命力而發揮盡致。因此集體生活並不一定集權生活，更絕對不是極權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只有最上層的統治分子是有生命的，其他大多數的被治者都不過是機械，這種政治的結果，大多數被奴役人民的生命意志逐漸枯竭，可以爲這一個極權統治階級的奴隸，也就可以爲其他極權統治階級的奴隸，甚至也可能向來自外族的征服者低頭，這樣的一個社會，

雖有少數精明的強幹的統治者集權於上，也不能持久而不敝。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勝於極權政治的社會的理由。

歐洲近世史上重大的特點便是個人獨立人格的發現和被承認。在希臘時代，號稱人類是自由的，其實每一個城邦都有其特殊的神聖的威權以約束人民，因此人民並未真有自由，觀於蘇格拉底的被刑可以想見。原始基督教承認人類在上帝之前一律平等，但不久就有教會以極權的姿態出現而統治着教民，一直到十八世紀理性主義昌明之後，個人的人格才被尊重，而有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民主政治產生。近世的民主政治，建築在每一個個人有獨立自由的意志和平等的認識之上，不尊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而談民主，其民主就不是真的民主。

中國儒家的思想本來從尊重個人的獨立人格出發，孟子尤特別發揮此義。但自秦漢以後，君主的威權和家族主義的倫理，漸漸把個人的價值貶低了。民國以來，雖然家族的權威已因西洋機械文明的輸入而根本動搖，但君主專制的餘威尙未淨盡，國家號稱民主，而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權利從不曾被重視過。在新式的極權

主義面具之下，復活了各式各樣的專制習慣，而且是最惡劣的軍事專制的形式，再蒙蓋上一層神權化的主義政治的皮，一切神權政治的形式，如起廟宇，拜偶像，強迫誦經，強迫做禮拜，異端裁判所，教條主義，一尊的國教，在學校中推行宗教教育，從事於荒誕神秘的神學爭辯，所有一切都變形地存在於今日的某些國家。一切軍事專制的形式，如武力支配一切，如依賴戰爭解決問題，如奴役人民去當砲灰，如強制徵發人民財產，如強制人民勞動，如軍事間諜的特務制度，如武力與財富打成一片，如軍法裁判處決人民，並且以秘密的形式出之，如軍事的特別秘密會計制，所有這一切也都變相地存在於今日的某些國家；而尤其最不幸的，是在這些國家中竟有存在着兩個較大的宗教團體，兩套神學的理论，兩個對立的教會，兩種軍事統治，兩方面都有異端裁判所，都有秘密警察制度，都抱有不容忍的宗教精神，都有若干熱狂的信徒，都相信只有一個上帝，一個教會，一個國王，情形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代的歐洲太相類了，相類到了可怕的程度，其結果難免不有一個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慘禍發生，而且事實上已經影響到其他國家零星衝突了。

二十年了。

要挽回中國不走入宗教戰爭的覆轍，進入民主和平建設的康莊大道，不是單憑一時的彌縫補綴所能奏效的，必須全國上下，發心懺悔，一改二十年來政治上的作風，切切實實從養成每一個中國人民的獨立思考，批評，和判斷力入手，讓每一個中國人，憑自己的良心來抉擇，來判斷，並且還得有發表良心主張的勇氣，這個國家才有希望。

二十年來政治上的作風是什麼？一句話說是因為要爭取政治上的力量，就不能不把多數人組織在一個單位之下，因為要爭取組織的發展，就不得不從事宣傳，而宣傳發展到了極點，便成爲說謊，其內容是凡在己者必是，凡在人者必非。在平常的道德之中，說謊是一件罪惡，但凡在發展組織的目的之下，說謊便爲功勞，越是善於說謊的人，越成爲煽動大家，相習成風，恬不爲恥。其次，爲鞏固組織起見，就不能不講訓練，講紀律，訓練是強把一種教條注入到每一個受訓者的腦筋中，紀律是用強制的手段，壓迫懷疑動搖的思想，消滅每一個分子的自我批評精神。這兩

種手段施行的結果，是使凡參加組織者，不知有獨立的思考，不知有良知的權威，俯首帖耳以聽命於他人，揮之使東則東，揮之使西則西，本身變成了組織的一個機件，有了行動，沒有了靈魂。再其次，要實現組織的目的，便不得不講求策略，便不得不與敵對的組織從事鬭爭，講求策略的結果，始則爲目的而擇手段，繼則爲目的而不擇手段，又繼則以手段當作了目的，忘記了本來的目的，最後則只知有手段，不知有目的。從事鬭爭的結果，務求必勝，不問其他，於是一切窮兇極惡之事，常人之所不敢爲不忍爲者，爲鬭爭起見，一切敢爲之，忍爲之。講求策略的結果，使人性日趨狡詐；從事鬭爭的結果，使人性日趨殘忍，狡詐與殘忍的心理充滿於國中，亂將無已。最後，爲鞏固組織，齊一步伐起見，不得不製造一個教條，幾種口號，一套神學，幾個公式，越神祕，越玄遠，越能夠動聽，起初不過拿來騙人，其後連自己也自我中毒起來，最後教條統治了每一個自由的靈魂，淹沒了每一個獨立的思考力，無理殺人之事遂可以公然肆行而無忌，甚至連自己也犧牲於其下，雖死不悔。

這是二十年來中國政治上演出的種種現象，我們不惜揭穿後壁來說，二十年來，中國的青年，在這種各色各樣的政治活動之下，所得的結果，是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力消滅，理性、良知、和正義感消滅，慈悲、博愛和同情心消滅，自己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勇氣和責任感消滅，宣傳教人以說謊，訓練教人以盲從，紀律教人以機械化，策略教人以狡詐，鬭爭教人以殘忍，教條、口號、神學、公式教人以愚昧，結果是國民性中的仁義知勇信一齊枯亡，而代之以愚、詐、狡、忍、貪及奴性，一個國家的國民性趨向如此，不但不能止亂，而且速亡！

因此，要真正懷抱救國救民的心理，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就不能再走組織的路，因為既要組織，就不能不走上面說的那一套，其結果是一罪未滿，一罪又起。如果組織是散漫的，自由的，則組織無力，不足以從事鬭爭，不過造孽還少些；如果組織是強有力的，謹嚴的，則其能力愈大，其造孽也愈多。今天從事內戰的這些政治組織，其初心何嘗不都是爲的救國救民，但是在鬭爭的過程中，漸漸與原來的目的越離越遠，結果，驅人以戰，殺人盈城，救了什麼國？救了什麼民？能夠滅

少些禍國殃民的造孽行動，已經算是造福無量了。

這就是我們所以呼籲全國人民，特別是政治上的領導者，應該大家一齊發心懺悔二十年來錯誤的政治作風，從新回頭來糾正過去的錯誤，替未來的中國留一線生機，保一絲正氣的緣故。但是靠政治上的領導者們覺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吃的就是那一行飯，應該覺悟的，還是一般無知被動的民衆們，自己抬起頭來，先解放自己。

因此我們眼前需要喚起一種運動，而不是建立一種組織，這運動可以叫作「自我解放運動」。在這種運動下，不需要有任何的領導者，不需要任何教條，不需要任何的組織和紀律，所需要的是自己啓發自己的良心，正義感，判斷力，統而言之，是召回自己已經枯亡或出賣的靈魂，恢復獨立自由的自我人格。從今以後，再不要盲從任何人的說教，再不要說自己良心上所不想說的話，或行自己良心上所不忍行的事。良心並不是什麼高深神祕的東西，他祇是一般庸夫庸婦的常識，譬如說，殺人是一件常識皆知的罪惡，則我無論根據任何理論，決不去殺人；賣國是一

件常識皆知的罪惡，則我無論根據任何理論，決不去當漢奸。常識譬如一盞明燈，一切妖魔鬼怪，邪說莠言，只要拿常識衡量一下，自然冰消雲散，這就是所謂良心，而我們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正是拿出每一個人的良心來。

只此才是真正救國救民的大路，只有靠每一個中國人的自我解放運動完成以後，中國人才恢復了良心，理性，正義感。一個有良心，有理性，有正義感的民族，才不會被任何侵略者征服，任何獨裁者專制，任何野心者利用，這個國家的前途才有希望。

自然，在政治上講求組織、紀律、策略、鬭爭的今日，一個赤手空拳孤立無援的個人，雖有良心也不容許拿得出來，然而歷史上的事例所昭示我們的，却往往是一個有良心，肯說真話，作真事的個人，能夠戰勝了空擁組織而無靈魂的羣衆。馬丁路德在威丁堡大學門外焚燒教皇命令的時候，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具有千年以上的權威的羅馬正教會的龐大組織，而他自己只有少數學生羣衆在參觀，却並沒有組織，他終身也沒有從事任何組織，但是宗教改革運動却因此變成了歐洲近古史上巨

大的潮流了。伽利略在推翻教會所崇拜的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在比薩斜塔上試驗物體下墜率的時候，他更不會從事任何的組織，但是却把教會的權威根本推翻了，比馬丁路德還澈底。由此可見，一個本諸自己良心說真話做真事的人，其改變歷史的影響比任何組織可能的還大。中國今天所缺乏的就是這一批肯說真話、作真事、不爲任何權威所脅服、利祿所引誘的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如果有少數人有這樣的自信力，肯來說，肯來做，中國的民主政治才有真正建立的可能，一切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之下所推行的暴政才有斂跡的一日。而且這也不必一定要離開現有的一切組織，或者摧毀組織。因爲一個真正民主的組織，是容許每一個分子有獨立思考和表示意見的自由。美國的華萊斯是一個民主黨員，並且曾經是民主黨政府中的副總統和部長，但他可以公開反對民主黨的政策，至多不過退出政府，民主黨並不會以紀律繩他，開除他的黨籍。有了這種民主精神，才可以用組織來推進民主，而不至以組織來限制民主。可惜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黨多半學的是蘇聯和法西斯的路，而不曾把英美的政黨精神引入進來。今後中國既非走民主的路不可，我相信有幾個

政黨必然要用英美式的政黨組織來代替蘇聯、德、義式的政黨組織，其最大的區別點是尊重黨內各分子的言論、思想、行動的自由權，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種紀律的專制思想必須拋棄。

當然，在民主習慣還未養成的時代，個人反抗流行的組織下的權威是必須準備犧牲的，因此首先要建立的是個人本於良知所發的勇氣，這勇氣在過去中國歷史上是不會缺乏的，在世界人類歷史上也不會缺乏的。個人如果沒有爲自己打算的自私觀念，則自然會有爲真理犧牲的勇氣，這就叫作「無慾則剛」。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必須先有無數肯爲真理犧牲的個人，用他的至大至剛之氣，去面對現實的暴政，獨立去奮鬥，一個犧牲之後，自然會有一個繼起，用不着去作人爲的操縱。歷史上這種事例太多了，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中國能有若干這樣的大丈夫出現，一切暴力都無法將他鎮壓下去，中華民國才能成爲真正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

作於民國三十五年秋

學人與政治

東西文化中有一最不同之點，即在西洋，學術自學術，政治自政治，彼此各有範圍，互不相涉，政治施爲雖有時不能不借重於學術之研究，但學術則不必一定假政治以自表現。蓋西洋人治學之目的在求真，苟於真理有獲，即得欣然自足之樂，不必定求與實際政治有關。中國人則不然，凡中國式之學者，自古迄今，無不企圖接近政治者，無有不求於政治上有所表現者。『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二千五百年前之古訓，仍可以應用於當前。蓋在中國學者之心目中，所謂學術研究之目的非求真，而爲求善，求致用，學術如欲見諸實用，自莫過於取得政權，借政權以實現其抱負。故西洋之學人不一定爲政治家，中國之學人則無一不欲爲政治家，其不得表現於政治，抱道守璞甘處牖下以終老者，非不欲也，蓋不得已耳。

中國與西洋治學精神之所以不同，蓋由於社會制度之不同使然。在西洋，封建

之時代最長，希臘，羅馬，以迄於工業革命以前，無一非封建之時代。在封建制度之下，治學者屬於祭司階級，與政治家無涉，政權屬於貴族，依世次而升，非貴族，雖績學有聲，終不能過問政治。貴族之取得，以武功而非以學問，故開國雄君如查理曼大帝之流，大率胸無點墨，惟祭司、僧侶、教士之流，寺院潛修，世守其業，始有餘力以過問學術，然此輩職業在事神而非治人，其目的在出世而非入世，故學雖專家，與世務無涉。降及近代，封建社會雖已崩潰而旋即代之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力量超越於政治之上，隱然為政治之支配者，學者欲求致用於實際，與其仰賴政權，不如仰給財權，凡屬於實用範圍內之學問，為經濟事業效力者多過於為政治事業。社會之分功既細，治學與問政更為判然兩途，即政治學家，其所務亦不過研求政治之原理原則，其對實際政治之客觀態度，與昆蟲學家之對昆蟲，初無二致。政治學尚如此，政治學以外之純理學科更不待言，故西洋近世學人之治學，為學問而學問者也，為真理而學問者也，非所以干祿也。

中國則不然，西周以前，學術集於王官，殆純屬祭司階級之世業，與西洋之古

昔正同。春秋時代之學者，史官、卜人而已，逮學術分散，而布衣卿相之局已成，學術與政治由此打成一片。孔子生於春秋末季，正值封建崩潰之際，其本身係出貴族，降而爲士，猶以統治階級自居，終身汲汲皇皇，歷干七十二君，所志不過恢復文、武、周公封建之郵治而已。其視政治爲學者當然之出路，殆由於本身家世之文化薰陶所致，而由此學術遂永爲政治之附庸，莫能自拔。墨者出於刑徒，則亦效儒者之所爲，爲列國國君效死，其自視殆封建時代之武士也。於是陰陽家之闕肆不經，名家之探折名理，本可以優游於真理之域，不問政治者，則亦以諸侯擁藉，列國傳食爲自豪矣。法家者流之志在經世者更無論也。其間惟道家莊周之流，齊物養生，超然於外，不屑屑於世務，然末流歆羨儒墨之榮寵，則亦喪其所守，造作言說，以求取容於世主，於是黃老之徒遂亦佐漢家而爲一朝君臣帝后之顧問矣。自秦迄清，君權一統，科舉旣興，士得自奮，識字之徒，舍作官外無他出路，則亦相奮於競官而已，此中國學術之所以始終爲政治之附庸而莫由獨立之故也。

究竟爲學問而學問是乎？爲經世致用而學問是乎？此其是非得失，本不易下斷

語。惟以中西歷史之往事較之，西洋治學雖不問政治，但其效果所及反能旋轉政治，鼓盪新猷。哥白尼之天文學說，開歐人航海闢地之風；伽利略之力學，推翻教會之權威，爲宗教革命鋪一先路；約翰洛克之哲學，爲民主政治建立理論，遂有法國大革命之爆發；達爾文之生物進化學說，爲帝國主義侵略供給根據。此數學者，本身皆無政治之興趣，畢生爲眞理而眞理，言其所欲言，非以求用於人，效用云云，其自身殆未嘗思及，然結果則如此，可知惟言之無待而近眞者，其中始卓然有所主，用能轉移政治而不爲政治所轉，其效視汲汲皇皇者大小何如？

近觀中國之學者，畢生以干祿爲志，而所冀不過卿相宰輔而已，過此則非所望也。一部二十五史，帝王霸主，出身於椎埋屠狗、武夫悍卒者佔大半，其以學者而能創業開國者，不過王莽、劉秀二人而已。然莽以外戚，秀以宗室豪族，均非由學者而起家也。以曾國藩之戡定江南，而始終不敢取清室以自代，其志趣視洪楊輩殆已卑矣，何則？曾讀書而洪楊不讀書也。惟其志趣不過如此，故所求汲汲在於得君，苟逢其時，則諸葛之遇劉備，王猛之遇苻堅，庶乎可以行其志矣，然一部二十

五史，有幾個劉備符堅？惟備與堅在窮蹙時始有禮賢下士之需要耳。就有所成，要如劉文靜之佐李淵，趙普之佐趙光義，劉基之佐朱元璋，烏盡弓藏，輕則貶斥，重則誅戮，賀者在門而弔者在室，平生志業果有幾何得以發抒？趙劉輩尙如此，況遇合之能如趙劉又有幾人？夫權操於上，則惟一人之喜怒足憑，以孔明、昭烈君臣之魚水，猶有『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東行』之歎，則其情勢殆亦有難言之隱者，況草茅疏遠之士，欲以立談而取卿相，逕行直遂，以行其志於天下，其爲事勢之所不許，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或曰：子所言者皆君主時代之事也，今日民主政治，主權在民，非如往日之取容於一人一姓，政治家本其所信，堂堂正正，訴諸民衆，苟能取得大多數人民之擁護，正色立朝，何慮不能大行其志，其出處之光明磊落，殆與君主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其言似是矣。究之民主政治云者，所求者在多數民衆之了解以至擁護，欲求民衆之擁護，則必須人人而說之，且且而聒之，昔之所說者在一人，今之所說者即在人人，一己之口舌勢有所不能周，則必有黨，於是又須先求黨衆之了解以至擁護。

人與人之意志不同，利害不同，滿意於此者或失意於彼，政治家欲求多數之擁護，勢不能不委曲求全，調節人與人間錯綜複雜之利害關係，而有以彌縫之，籠罩之，幸而有成，其本來志業已折扣過半矣；況團結多數之民衆於一爐，需人，需財，又需時勢，又不能不遷就於此三者，則其本來志業又折扣一半之半。是以民主時代之政治家，在取得政權以至保持政權之間，其艱難困苦，隱微難言之苦痛，更有非君主時代之政治家所能夢見者。以君主時代所說者在一人，一人之心易移，民主時代所說者則在萬人，不啻有億萬之君主臨於其上，而一一需要干而說之，以保持其歡心也。以此之故，在民主政治之下，強桀兇狡之徒，不屑於人人而說之，則聚若平暴徒於一團，以暴力規持其民，驅市人白手爲之效死，號爲人民之政治，實則規持人民爲之擁護其政權而已。此與古昔曹操、劉裕之徒，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殆無二致，爵祿縈之於前，刑賞威之於後，爲人民者令之舉手則舉手，令之獻身則獻身，與周赧、漢獻之爲君主無以稍異。以此而言民主，民則益敝矣，何主之有？至於柔弱之徒，不能持白刃以驅市人，則豪奪不能，易以巧取，或寄生於強者之下，

或依違於兩可之間，上之則乞資助於財閥，下之則受操縱於豪劣，言非由衷，行非任己，凡其卓然有聲於朝野，言論行動似乎魁率羣倫者，實則俱不過登場之傀儡而已，其背後爲之提線者固有人在也。此不獨人民智識落後之國家爲然，熟悉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之政情者，皆知其當國人物之一言一動，背後皆有長袖善舞者爲之提調，苟不得此輩之歡心，則競選費用尙無所出，何能望其當政。所幸此輩長袖者不只一人，利害互爲衝突，始有多黨政治之可能耳。

凡此種種，苟爲實際政治慾甚強之政治家，務重現實，不問理想，但求當國登臺，上之則滿足其權力慾，下之則爲滿足其官爵慾，更下者則滿足其貨財慾，政治理想云云，在彼輩本無所謂，自不感覺其苦痛。若在稍有理想抱負之學人，視理想之價值遠重於現實，苟自信爲真理所在，雖赴湯蹈火不能稍易其辭，伽利略之對簿教廷，所爲者在地動一說，雖經教會之百端威脅，其自信地動之爲真理，依然如故，以如此性格之人，而欲其獻媚羣衆，變易所守，以苟獲一時之政權，在彼自視，其所得蓋遠遜於其所失矣。然學人之所以爲學人，有此性格者甚衆，固不獨

利略一人。故學人者，最不適於作政治活動者也，如其有之，則其學乃奄然媚世之僞學也。試觀近世政治雄傑，出身於學術者果有幾人？美之威爾遜總統以失意死，捷克之貝奈斯總統以流亡脅困送其半生，至今仍不過強隣之傀儡，求如馬薩里克總統以手復邦國，高齡以終，殆景星慶雲之不可多得矣。

不但此也，學問與事功本屬兩途，治學需要理智，事業需要意志，理智發達者，其客觀態度每多於主觀，以此治學，庶得廓然大公之效，以此治事，則不免遲疑審顧，致誤事機。從來事業上有成就之人，皆為主觀意念極強，富於自信力之人，遇事果毅，不恤人言，其成就愈大，其所損折愈多，而彼等不顧也。此與學人治學之態度判然兩途，且如冰炭之不相容，世固有兼具兩種性格之人，且於兩者俱有成就，例如王陽明，然陽明之學，直標良知，不事支節，近於宗教之學，衡其立說固多可議者，要之，此英雄之學而非學人之學也。往昔治學，但揭原則，無事旁證，又當事機湊赴，以壯歲成功事業，以晚歲優游學域，此非常之機緣，非人人所可求而得之者。近世學術分支既繁，議論愈細，兼功旁鶩，事難兩全。故學人而苟

自信能力興趣，俱宜於實際事業，則宜屏絕學問一意以赴之，若其視學問之價值過於實際之事功，則亦宜於兩者間斷然有所抉擇。世未有兼營旁鶩，志鴻鵠而有造於弈棋者，學人於此，當知所以自處矣。

吾非謂學問當與政治分離，爲學問者不當過問政治也。近世專門之學，碎義逃難，玩物喪志，治一科者，於其相聯之其他學科，且不能通，遑論世務。故專家之學愈專，其常識愈乏，此種學風，雖似爲學術之進化，實則爲學術之沒落氣象。凡元氣淋漓之事物，皆爲粗枝大葉者，及發展愈細，形骸愈全，則真氣愈鑿喪，結果去槁死之日不遠。今日科學之分功愈細，卽爲科學時代行將告終，而新宗教時代代之而起之徵兆。今日一般學者，固將嗤笑吾此言，以爲狂論，實則依歷史哲學之見地觀之，古今固無二致，吾固不願爲此學問，亦不願天下之學人羣入此途。苟治學之態度意在求通，則固不能屏絕政治，以政治亦應通之一事，且可與其他學問互相發明也。惟治學而旁通政治，與治學而兼鶩實際政治爲兩途；學術上之成就影響相於政治，與棄學術而專務政治尤爲兩事。世固需要實際救國救民之政治家，亦需要

卓然有以自立之學者。學術苟真能自立，其裨益於國家人民未必遜於實際之事功，而其遠大或有過之，是在人之自擇而已。

作於民國三十五年秋

憲法問題的我見

這一次在路上，有人問到我對於憲法的意見，我說：我只有一個意見，我希望國家有一個柔性的憲法，不希望一個剛性的憲法，憲法的修正程序越簡易，越能隨時適應國家的需要。

把憲法當作是百年大計的舊觀念應該是過去的了，今天是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一年的變化至少可以抵得過十九世紀的十年，十年就抵到一百年，一個憲法如果不賦予以隨時可以適應時代需要而修改的自由，結果必至扞格不通，而釀成未來的禍亂。

明白了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在這一次憲法討論裏，有些問題像建都之類，是大可以不必爭論的。在航空和原子能的時代，國都問題已經不成爲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照理想來說，適應這個新時代的國都應該是建設在空中，在九天之上，不

然，單爲防禦起見，就應該建築在九地之下，這兩者既然都無法規定，而且也難免驚世駭俗，那麼索性還是不規定的爲好。

明白了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一次國民政府蔣主席所提出來的根據協決議而修正的憲草，內容的不能盡滿人意是無足怪的。這個修正憲草，不是根據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而產生的，乃是各種不同的政治理論體系在協調的精神之下相互讓步的結果，既是協調，就不能不相互讓步，就不能不拼湊，就不能不做搭截題，看起來是充滿了矛盾衝突，任何方面都不盡滿意，——雖然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在道義上都負有約束自己黨員共同支持這個憲草的義務——但正因爲其矛盾衝突，才能真正代表我們的時代需要，才是真正可行的憲法。憲法不是書案上的講義，而是國民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的中國，存在着許多矛盾衝突，我們無法否認，召開政協和國大，議定憲法，就是想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中找出幾點最低限度大家可以共同支持的國家組織原則。時代不許我們再依照一種政治理論體系，而需要協調各種不同的政治理論體系來作成一部協調的憲法，這是我們這一次國大召集的任務。我相信大部

分人當然都了解這種任務的莊嚴，而願意共同努力促其實現。

有一部分人，認為國大代表既是來自民間，對於制憲應該有充分的自由，不應該受政府所提出來的憲法草案的拘束，因此主張自由制憲，這個意見當然是絕對值得尊重的。實際上，政府祇是提供一個草案，作為討論時的根據，並不會加以任何拘束。但在有黨籍的代表，無論是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在黨員的立場上是負有服從黨的決議，不能持相反論調的拘束的，這種拘束是出於自願，因為在入黨之始就已經受了誓約的約束了。

就我個人講也是如此。我對於這一部憲草，當然也可能有許多異見，譬如我個人是不贊成在憲法中規定「基本國策」這一章的，因為憲法所要規定的是靜的關係，而不是動的態勢，憲法的主要任務應該祇有三點：第一是說明國家的權力的來源，第二是規定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第三是規定國家所屬各種機構的性質及其相互的關係。所有這些都是屬於制度性的，而非屬於政策性的，基本國策是政策，不是制度，政策的變動性較大，很難膠柱鼓瑟，如果規定得過於詳盡，則窒礙難行，如

果規定得簡單，則除了口號以外還能有什麼更具體的內容？現在大家批評基本國策一章盡是口號，但是既要規定這一章，就無法避免口號的填寫。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這一章的意見，但爲遵守政協決議起見，我願意放棄我個人的異議，來支持共同的決議。

我相信凡屬有黨籍的代表，一定都有這種犧牲個人意見以支持黨的決議的精神，民主議會政治的運用就靠着有政黨，就靠着黨能約束他的黨員，黨員能服從黨紀，不然便成爲一人一議，十人十議的築室道謀了。民主政治與政黨是不可分的。以上所說是我對於憲草的整個看法，底下再提出幾個大家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來說說。

第一、是國民大會組織和職權的問題。有人嫌國民大會的職權太小，有人主張立法、監察兩院委員不應爲國民代表，有人認爲創制、複決兩權應該立即付與國民大會，始符行使四權之實。其中中心問題在乎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常設的人民代議機關以監督政府的行使治權。中山先生遺教中關於權與能分開、政權與治權分開的理

論，我以為應該看作是學理上的分析，而不應解釋為實際制度運用上的隔離。譬如我們從學理上研究一個人的時候，儘可認某些部分屬於生理現象，某些部分屬於心理現象，但在實際生活上心理生理是不能分隔的。即以機器為喻，機器的管理必賴工人，沒有工人在旁時時運用，這個機器就難免出毛病。一個萬能的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常設的人民代議機關從旁時時監督，誰能保總統常是賢明，官吏常是盡責？如果不賢不能，人民有什麼辦法去糾正他？照五五憲草的規定，國民大會每三年僅召集一次，會期不過一月至二月，是三年之中有二年零十個月政府可以為所欲為，無人掣肘，假使政府首長永遠都是賢能的，自可不論，但誰能擔保？萬一不幸而不賢不能之人掌握治權，國家的損失就不可逆計了。因此，常設的人民代議機關，是絕對不可省略的。至於這個常設的代議機關，應該叫作立法院，或叫做國民大會，本來無關重要。不過照五五憲草和政協憲草中關於國民大會組織的規定，以每縣市一人為起點，再加上由其他部分選出者，至少代表總額總在兩千人左右，以兩千人左右的國民大會，斷無法長期集會，行使監督政府的職權。如果由國民大會來行使

監督政府的職權，則必須變更一縣一人的原則，代表總數不可超過五百人，然後才易於常常集會。至於由國民大會選出一個駐會委員會，和由國民大會選舉立法委員一樣，都未免把直接民權變為間接民權，有背孫先生的遺教。有人認為依照遺教，立法院是治權機關，修正憲草賦予以監督政府之責，似乎是行使政權，與遺教不合。依我們的認識，民主政治的精神，就在人民保有立法權和審核預算權，五五憲草和修正憲草同把這兩權付之於立法院，這就是承認立法院多少是有點人民代表的意味，也就是多少有點行使政權的意味。中山先生曾說過「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又云「立法機關就是國會」，可見把立法院當作國會，是完全符合遺教的。如果立法院是國會，就應該有現代各民主國家國會中常有的彈劾權和不信任權。現在的修正憲草，把不信任權未曾列入，已經不是遺教的原意了，有人還認為立法院權力過大，不知所大者何在？

第二、談到總統職權的問題。修正憲草與五五憲草中關於總統職權的規定，雖有出入，但大體不過詳略之分而已。其最重要的區別點，是五五憲草規定行政院長

由總統任免，而修正憲草則爲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的同意而任命。因爲五五憲草的精神是使「總統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而此次修正憲草的精神，是使行政院有限制地對立法院負責任。在今日的中國，不需要一個賢明有爲的總統，但把總統置於直接負行政責任之地，這不是愛護這個總統，而是把全國愛戴的總統置於爐火之上，對國家和總統個人都不見得有利。修正憲草的規定，使行政院代總統負行政上的責任，把總統位置在較超然的地位，以便行政措施有不愜民意時，較易變動而不致動搖國本。實際上行政院長既由總統提名，當然是總統所可同意的人，他的措施當然不會與總統的意思大相違反，我們何必又憂總統的無權呢？

第三、關於立法院與行政院的關係。有人認爲立法院權力過大，未免拘束行政，因之主張應予行政院以解散立法院之權。關於解散權的問題，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本來曾經討論過，因爲行政院如對立法院有解散權，則立法院亦必對行政院有不信任權，有些方面願慮立法院如保持不信任投票權，則政局未免常生波動，因此把不信任權打消，連帶地也自然就把解散權取消了。至於行政院長雖可因與立法院

意見不同，而被迫辭職，但其中已有層層限制：第一，行政院經總統之核可得移請覆議；第二，立法院如仍欲維持原議時，須得委員三分之二之通過；第三，如交覆議時立法院仍堅持原議，行政院長仍可於執行或辭職二者間任擇其一，並非必須辭職。可知立法院並不會保有過甚的權力。何況經過立法院覆議後，辭職者僅限於行政院長一人，其餘各部會首長仍可不動，則行政部門儘可將行政院長與其他部會長官對調一下，即可敷衍立法院過去。如此規定，我們方感連帶責任之不足，代議機關無法真正能監督政府，論者乃謂立法院權力過大，然則把立法院變為一個單純的法制委員會，一切權力集中於行政院而無人能課其責任，才算不過大嗎？其如違背「立法機關就是國會」之遺教何！

第四、關於司法院之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設立大法官制一節，反對者似尙少。惟有人主張司法行政部應隸於司法院，則未免系統混淆。司法院如兼掌司法行政，則不能不對立法院負行政上的責任，結果易妨及司法的獨立尊嚴，故司法行政部仍以隸屬於行政院為宜。至於司法院院長及大法官之任命是否應由監察院同意，

抑或由其他民意機關選舉或同意，我個人認為尚可商量。

第五、關於監察院的組織及職權。此次修正憲草較五五憲草於彈劾、監察兩權之外，多增同意權一項，對於彈劾及監察權的行使，規定也較為詳密，最進步的為調查委員會的設置，惟關於彈劾案的提出，仍以監察委員個人提出，雖人數限制較高，似不如以全體決議來執行彈劾權較為合理。至於大法官及考試委員之同意權由監察院行使，雖為政協決議，似不無可以考慮之處。此外將審計權移歸立法院執掌，或仍歸監察院執掌，兩者亦均有理由，這些處所，似乎都還可以商量。

此外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省縣制度兩章，異議較少，把省縣兩字改為「地方」亦無不可。省的自治地位，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一切屬於地方性的建設事業，無從着手。縣財政未曾明白確定，是此次憲草的缺點，當初是想留到省縣自治通則裏去規定，如果一定要在憲法裏取得保障，似亦可以考慮。

關於基本國策及施行修正程序兩部分的意見，前面已說過了，不再贅述。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青年生活第十二期

三條路線

歷史上任何民族的任何事變過程之中，反應着這種現實的，總有三種不同的方面，因此也就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意見，這就是：頑固的保守派，溫和的改革派，激烈的革命派。歷史上一切事變中的矛盾衝突，都起於這三派的相互激盪之間。

保守派並不是一個絕對壞的名詞，現狀如果需要保守，還沒有到了一定非打破現狀不可的時候，則保守的主張，便是真理，便沒有推翻的必要與可能。歷史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究竟不多，大多數時間，還都是在沿常襲故的狀態之中。因此，從時間的長短上說，保守派佔勝利的時候總是最多的。這因為大多數人民，都是「可與樂成，而不可與圖始」的，他們寧願照傳統的日常慣習生活着，而不願輕易加以變更。在一般人民心目中，他們所最歡迎的，實在還是保守派。這便是人性中的一種「惰性」的表現。

不過我們也須知道，世界上並沒有絕對一成不變的保守派，社會總是經常向前變動的，任何最頑固的保守派，也不能不隨着社會演變的形勢，逐漸在不知不覺之間，修改他們的主張，以便適合於新的環境。不過這種修改，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慢慢變過去的。因此，人民不覺其爲變，他們也不自知其爲變。

到了社會需要劇烈變動的時候，這種保守派的維持現狀的主張，便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了。這時候，在比較感受變動環境需要較強的人羣之中，便形成了後兩派的意見，這後兩派在變動的過程上，緩急進退雖然不同，但其對現狀必需加以變更的要求則一。

每次在變動過程之中，常有一部份抱着極端激烈意見的人，他們非澈底毀滅現狀，不能過癮。這一類的人，在全民中常是最少數，但因爲他們的意志極爲堅決，其頑固的程度，並不下於保守派中之最極端者。因此他們也常能以其堅強的意志影響大多數人，帶着大多數人往他們所指定的方向走。

但是我們須知道，頑固的保守派和激烈的革命派，在主張上，雖然是兩個極

端；在性格上，却是一樣的堅持自己意見，絲毫不能容忍接受他人的主張，因此在頑固的成分上，與保守派同一模型。今天的保守派，也許就是昨天的激烈革命派，而今天的最激烈的革命派，到了明天自己掌握權力之後，一定就變成了最頑固的保守派，其頑固的執着力，比現有的保守派或許更強。西洋宗教改革時代的長老會領袖加爾文，是反對舊教的最堅強的領袖，但在掌握了日內瓦的政權之後，對於信仰自由的迫害，並不下於頑固的舊教分子。曾經親手焚殺了西班牙人反三位一體說的宗教改革領袖塞爾維塔斯（Servetus），法蘭西大革命時山岳黨的領袖羅伯士比，一面推翻專制，一面建設起更專制的恐怖政治；一面推翻宗教，一面建設起自由女神的新宗教。我們如果明白極端的革命派和極端的保守派之間，原有性格上的共同之點，這種結果並不足怪。

社會固然需要變動，但變動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必須激烈派成功。溫和的改革派，在推動革新過程中，常佔有較有力的決定力量。溫和派和激烈派合作，則激烈的革命可以速成；溫和派和保守派合作，則變革可以在穩定的環境中逐漸進行，而

不至發生劇變。吉倫第黨和山岳黨的合作，促成了法國的革命，是前者的例；加富爾和義國王室合作，阻止了瑪志尼的共和運動，而使義大利變爲立憲的君主國家，是後者的例。溫和派的主張，是大多數人民所要求的，但其能否成功，却繫於保守派或革命派對於這中間力量的認識和爭取如何。

如果保守派堅持頑固的保守態度，連較溫和的改革也不肯接受，則勢必逼使溫和派走向革命或消極的路向，極端派中之較緩和者也必失勢，而激出一個最極端的激烈派，革命的禍變由以發生，歷史上這種事例非常之多，不必列舉。如果革命派也堅持其極端主張，不能認識與溫和派合作的必要，則結果也難免迫使保守派中的較緩和者失勢，而產生一個最極端的保守派，如宗教改革中之有耶穌會，共產主義運動中之有法西斯，這都是革命派的極端態度所逼迫出來的。

如果不幸而兩極端派都出現，則歷史上的信仰戰爭便由此發生。宗教改革之有三十年戰爭，以及此次大戰前的法西斯與共產黨的鬭爭，都是這種不幸的結果。雖然結果仍是兩敗俱傷，大勢歸於調和，如三十年戰後之有威斯特法里亞會議，但人

類的犧牲，已經不可勝計了。

中國五十年來，便徘徊於這三條路線之中，今日仍是如此。何去何從，繫於兩極端派中頑固分子的一念。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八日中華時報社論

安定第一

戰後的中國惟一的需要是安定，國家需要安定，社會也需要安定。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一致的要求，誰能辦到了這一點，誰便可以成功。

在二十世紀中，最痛苦不安的國家，莫過於中國了。中國人民自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起，就飽受了戰亂的威脅，始則有推翻清室的革命，繼則有二次革命與護國倒袁的戰爭，又繼則有護法之役與南北政府的對立，北方則有直皖、直奉三大戰役，南方則有討桂、討陳兩大戰役，其間地方性的小戰爭更不勝縷數。北伐成功以後，應該可以統一安定了，不幸又繼續了九年的內戰，到二十五年西安事變以後，全國已漸臻團結，而外患已蔓延可不收拾，由此遂又進入八年以上的對日抗戰。抗戰結束，人民仰望國事的安定，但國共戰事已日漸表面化，雖經政協和美國的軍事調處，迄無效果，竟成爲今日的狀態，中國的老百姓如果還可以自由表示意願的

話，他們一定翹首而佇望道，何日是河清乎？

從前的老百姓把撥亂反正的希望寄之於真命天子，在今天的民主時代，他們就祇能寄之於有抱負的政黨和政治上的領導人物了。

政黨以爭取民衆擁護爲必需條件，而民衆的意願不過如此，按理應該很容易做到，不幸三十餘年來，竟沒有一個政黨做到了此點。過去的舊政黨不必說，現在尙未執政的少數黨也不必說，單就近二十年來曾經掌握政權的國共兩黨說，便不但沒有注意這一點人民心理，而一切行爲似乎還是從相反的方面去做，這是很可以慨歎的。

就共產黨的主張立場講，本來是要整個推翻舊秩序，創造新秩序的，他對於全世界都是如此，不但中國。他所要推翻的不僅是政治的秩序，而且是整個社會的秩序。共產黨的立場根本與安定相反，他不僅不需要人民生活安定，還在製造不安定，人民生活越不安定，共產黨的革命才越有機會，所謂逼上梁山是也。共產黨這種行爲與理論是一路的，我們不必責備共產黨，因爲責備他是不受的，他並不會違

反他的理論，所需要的倒是共產黨以外的人應該深切認識這一點，不必希望共產黨還能接受使人民生活安定的這一要求，因為共產黨如果接受了這一要求，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

因為共產黨這種打破安定的方針是與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相反的，所以他不得不用盡種種軟的或硬的方法去逼上梁山，結果因為太違反了人民的意願，所以他的前途命運可想而知。

國民黨既是二十年執政的在朝黨，又是一向反共的主力，似乎應該採取與共產黨相反的觀點，竭力使人民安定，造成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了，事實上却又不然。二十年來，我們祇看見大家相信武力，從事於不斷的戰爭，使人民生活被擾亂於戰亂、兵役、苛雜、攤派之下，田園蕩盡，墳墓為墟；又重之以貨幣的濫發，機關的重疊，政令的紛更，與民爭利的統制政策，貪污的官風，保甲制的擾民，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的層出不窮，對於私人企業的種種公私限制，使農村的農民不能安於畝畝，都市的工商業者不能安於闔閭，其結果也是造亂不已。我們不知道一個掌握政

權至二十年之久的在朝黨爲什麼還要在農村中造成土地的紛擾，在都市中要造成經濟的束縛？行動與理論相反，似乎太不聰明，因爲共產黨的目的是在造反，當然不惜採用種種逼上梁山的手段，執政黨既已獲得政權，目的應該是設法阻止造反，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而其所採用的手段，有意無意地却是爲淵驅魚，爲叢驅爵，爲共產黨造機會。

現在國民黨已準備開放政權，在野黨派已可能參加政府，我們希望這個改組後的新政府，不必一定要做好事，但須要努力減少做壞事的機會，應該集中注意於除弊方面，把一切擾民病民的法令制度大刀闊斧盡量解除，政簡刑清，人民自然安定，這是當前第一要務，也是未來新政府成敗的關鍵。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中華時報社論

所期望於當代政治家者

維新五十年來，中國國家的基礎始終沒有鞏固，在今天雖然抗戰勝利，憲政初布，舉國人民望治已極，但陰霾之氣，始終未掃除，在人心上還看不見有多少光明的希望，這是爲的什麼？爲的是過去政治上給予人民的失望太多了。回憶民國建造之初，北伐成功之後，以及最近日本投降之始，全國人民都曾經過一時盛大的歡欣鼓舞，但都不旋踵而繼以失望。一個人，事先的希望越大，則其事後的失望也越甚，特別是一次兩次接連若干次的失望以後，國民的精神便日益頹喪，意興索然再也提不起來。到了這種境地，任何好辦法，任何新作風，都不易博得人民的相信。政治上的領導人物已全然失却人民的信任，國家沒有了中心，人心也沒有了向上的機運。

在這個時候來擔當國事自然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但如果大家都袖手旁觀，把

國事付之天運，也不是忠誠愛國之道。因此今天的擔負國事的人物，無論是黨派領袖也好，社會賢達也好，都必須有一種根本的覺悟，覺悟國事是艱難的，擔任國事是一種犧牲，是一種義務，而決非權利與虛榮。政治家在這個時候來擔任國事，好比戰士上了沙場，時時刻刻有粉身碎骨的危險，而也必須有粉身碎骨的勇氣與決心，把此身交付國家，絲毫不作個人的或黨派的打算，牙根要咬緊，骨幹要挺立，要有張江陵所謂願以此身為枕藉，使天下人踐踏其上的抱負和氣概，才能夠旋乾轉坤，把眼前一派陰霾之氣掃除，打開了時局的新機，恢復了政府的信用，安定了社會的人心，鼓舞起未來的希望。國事敗壞多年，在今天的情勢之下，一舉而廓清權陷，是不可能的，但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政治家，則必須有此認識，有此擔當。方法上儘管不妨細針密縷，但風格上却必須有海涵地負之量，嶽峙淵渟之操。盤根錯節所以見利器，越是這樣的時代，也就越是孟子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的時候，「今時則易爲也」，剝極則必復。

我們所期望於當代政治家者，千言萬語，一時也說不盡，最重要的一點，是太

家都以國家人民利益爲重，小己利益爲輕，能以國家人民爲重，則有爲國爲民之誠；不以小己利益爲重，則公而不私。誠於謀國，則有擔當大任之勇，而不至陷於苟且敷衍；公而不私，則處事無偏見，明足以察庶事。誠生勇，公生明，惟誠惟公，能明能勇，則可以轉移一代之風氣，感動異己，見信於人民，消弭一切鉤心鬪角的戾氣怨氣，開拓公誠爲國的祥和之風，國事前途才有希望。

我們希望一切當代的政治家能以此種偉大的精神來推誠相與，國事是有光明的前途。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八日中華時報社論